

第六章 英国如何沉睡

九月危机

直到这个时候，张伯伦仍对希特勒最终会做出妥协寄予希望。他告诉肯尼迪——这位美国大使说，如果战争能够得以避免，“那我们现在进行的就仅仅是一场规模宏大、史无前例、耗费巨资的彩排，而它的正式演出则永远不会开始。”为了讨好希特勒，他仍拒绝让邱吉尔进入内阁。私下里他对肯尼迪说，“他不打算这样做。邱吉尔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如果他进入内阁，英国早已陷入战争之中了。”

然而，当希特勒与苏联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并随之在波兰边境大量集合德国部队时，连张伯伦也意识到了避免战争发生的希望非常渺茫。肯尼迪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我从未见他如此沮丧。”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认为，张伯伦“仍希望能够找到和解的方法。”然而，当肯尼迪向他建议对希特勒作更多妥协时，张伯伦仍显得非常沮丧：“我能想到的都已经尝试过了，乔。”这位英国首相透露，“但结果是，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我不能再前往那里了，”张伯伦解释说，“慕尼黑政策只能成功一次，现在再让我劝说波兰人做出让步根本就是毫无意

肯尼迪传

义，因为如果我们那样做只能被视为软弱无能，而且真正令人恐惧的是，现在做什么都没有意义。我们无法劝说波兰人，英国所能做的将只是发动一场战争作为报复。而这样做却又意味着使整个欧洲陷入战火之中。”对此，肯尼迪建议说：“那教皇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随后肯尼迪又提出另一个建议，即邀请罗斯福，再次举行新一轮慕尼黑谈判。肯尼迪在发给赫尔的电报中说：“现在惟一的希望是，在与德国的谈判中，波兰能采取一定措施使局势可以延缓……假如罗斯福总统也愿意维护和平的话，在我看来，他努力的目标应该是劝说波兰改变政策。为了尽快解决问题，我认为，这件事应赶快进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途径行得通。”

但民主国家的再度让步能否还会有效？8月25日，肯尼迪在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看到了内维尔·汉德森爵士来自柏林的最新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引用希特勒的话说“英国用不着再替波兰想办法了，因为他与俄国人已经决定要将它瓜分。”

“在看了这些报告之后，霍勒斯·威尔逊爵士邀请我到会议室开会。”当然张伯伦身穿小礼服正在首相位置上坐着。坐在他对面的是身穿西服的哈利法克斯勋爵，而身着休闲西服的肯尼迪则在第4个座位上就坐。在这4位推崇绥靖政策的高层领导人中，只有张伯伦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他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他们的对话颇为神秘，“每人面前都放着一本电报复印件。”事后肯尼迪描述说，“张伯伦先请我坐下，然后转过来问我：“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肯尼迪回答说：“如果不是看了汉德森在另附的那份备忘

录中，引用希特勒说的话，即德国和俄国下定决心要瓜分波兰，我可能会猜测，希特勒这样做要么是想离间波兰和英国，要么就是他是真的胆怯了。”

然后肯尼迪回忆说：“我们详细讨论了这份紧急文件及将要实行的对策。”

我表述了自己的意见。我说，针对波兰问题不能再让步了。那样做不仅将损害英国的名声，而且还会降低保守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对此，他们都表示赞同。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在波兰问题上尽力谋求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一点至关重要。我说，“您必须赶快采取行动。”

“什么意思？”张伯伦问。

“您先须提出对德国更具吸引力的一系列方案，让希特勒觉得他从中得到的经济利益远比侵略但泽得到的利益更大。同时，迫使美国表明，它愿为维护国际繁荣与和平而努力。毕竟，最终美国将成为这种行动最大的受益者。现在无论投资是多少都是值得的。因为如果它有作用的话，我们能够把这些投资连本带利全部赚回来。”

在经历了以往 16 个月的教训之后，仍认为希特勒能为经济利益或贪欲所左右，这实在令人难以夸奖肯尼迪大使的外交政策和政治智慧。不过，同样是这位大使，他在理财上却是位高手。他的经济顾问詹姆斯·费恩曾赞扬他具有“看准时机果断进退的特殊才能”。同时，肯尼迪还是一位常令人不愉快的现实主义者。罗斯福的得力助手汤米·科科伦曾这样评价过约瑟夫·肯尼迪：

肯尼迪传

他在分析权力集中的问题上能一针见血，从来不被表象所困惑，这就是现实主义者肯尼迪的高明之处——他总是能击中要害，通过现象认识本质。他一直因为说实话而让人们难以接受。其实，他说的是这个时代的实话。乔会说，目标是什么？权力。除了参与重大事件进展的讨论还能有什么其他的乐趣？这是真正的一种完全统治一切的感觉，除此之外别无他求。“权力是惟一的目标，如果你不承认这种游戏规则，那你认为目标应该是什么？爱国？但我怎么在那些手握大权的人身上看不到这一点呢？那些名门贵族是如何发家的？因此权力来源于金钱。”

然而对于希特勒而言，权力的根源并不是金钱，这使肯尼迪与张伯伦一样感到很奇怪。“我们又继续谈了半小时，”肯尼迪回想起了上次他在唐宁街 10 号的会议，“然后我就站起来离开了。我拍了拍张伯伦的肩膀说，‘不要太着急，内维尔，一切都会好的，我认为上帝会支持你的。’”

在那之后肯尼迪每天都与张伯伦或哈利法克斯勋爵会谈几次。有一次，肯尼迪正准备从唐宁街开车送这位外交大臣回府，但倒车时他却不小心将车撞到了张伯伦专车的挡泥板上。最后旁人将肯尼迪的车抬起来才将两辆车分开。这件事是一种奇怪的象征，它象征着他们已经开始紧密连在一起。即使与希特勒来往的绝密文件，张伯伦都会允许肯尼迪在其他内阁成员之前先看。

看到汉德森从柏林发过来的那封令人失望的电报后不久，肯尼迪再次见到哈利法克斯勋爵时看到了希特勒对华沙下的最

后通牒。它要求波兰派一名全权代表参加有关吞并但泽问题的谈判。当时，英国内阁起草的声明被送到了肯尼迪手上。他觉得它的言辞过于强硬。“目前的局势还有两大障碍。第一是英国人过于自信能够打败希特勒，因而他们的态度表现得十分强硬；第二是波兰人也认为希特勒将会被吓退，而且他们自己还有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后面撑腰，所以他们也会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不肯妥协。在我看来，这项草案的问题就在于口气太强硬……我认为英国内阁应该坚定态度，但它也应该给希特勒一个台阶可下。”

英国副外交大臣 R·A·巴特勒也赞同这一观点。

“我也这么想。尽管这是内阁起草的，但我们还可以对它略加改动。你有什么建议？”我提了一系列的意见。巴特勒向内阁转达了这些建议，但马上便被内阁否决了。

“你应当亲自去面见首相，”巴特勒说，“向他陈述你的看法。你是有数几个他所喜欢并信任的人，也是能对他制定政策产生影响的人……我曾竭力向他表达了你这种‘安抚德国人’的观点，但首相只要一想起希特勒对他如何不恭，尤其是去年三月份对他非常不礼貌，他就会变得十分态度强硬起来。”

巴特勒的这些话让肯尼迪听起来十分舒服。

“就像昨天他在下议院发表的那篇关于‘德国必须要使用限额卡而英国根本不需要它们’的讲话。”我说，“其实那是在讽刺德国落后的经济。我的儿子乔曾有一天在柏

肯尼迪传

林与尤妮特·米特福德小姐共进午餐，她引用希特勒的话说，希特勒非常佩服英国人，但张伯伦并不领情，一面宣扬‘我们时代的和平’，一面又大谈整顿军备加以提防希特勒的野心。对此他感到很难过。”

“我知道，”巴特勒说，“当时我也在场。这样的评论有失公正。我一听就认为这将是个人大错误……但愿波兰问题能够顺利解决。这样我们便不会再亲眼目睹到“九月危机”的重演了。现在英国内阁已经准备在更广阔的阵地上与德国进行比试。他们已经考虑到马上着手解决殖民地问题的必要性，这对他们来说是自尝一枚苦果，但他们现在已经将这枚苦果咽下了一大半。我现在就去见首相，帮您定个时间。”

在没有总统及国务院支持的条件下，肯尼迪直至最后关头还致力于通过影响高层领导来影响英国政府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这个事实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被小心谨慎地隐藏着。“6点30分，我去了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约瑟夫·肯尼迪继续进行这段从未公开过的“自白”：

张伯伦和以前一样，我重复了曾对希特勒提到的建议，张伯伦表示支持。

“为什么不宣布一些对全民都会产生影响的战争命令呢？让他们都感受一下爆发战争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因为现在的人们对于波兰人因为拒绝谈判，从而导致战争爆发好像并不感到担忧。”张伯伦认为只要他能够劝说德国人和波兰人真正坐下来谈判，危机就能有所缓和。他说他已

命令汉德森务必把“让希特勒忘记但泽”作为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来办理，因为欧洲的和平是关系到世界格局大事……张伯伦说，“只要有机会，这完全有可能办到。因为现在我与这些人的私交都很好，这对我很有利。不过，波兰人必须更要理智些。然而不幸的是，英国目前有以艾登和邱吉尔为首的一群人支持波兰人不作退让……这样做并不明智的，如果他们继续糊涂下去的话，那终将导致战争。”

后来肯尼迪炫耀说，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影响，英国人“才由迟疑转向坚定”地向波兰人施加强大压力——就像他们去年对待捷克人那样——强迫波兰人答应由英国代表他们与希特勒进行协商。而波兰人亲眼目睹捷克斯洛伐克在“英国代表他们谈判”后落得了个灭亡的下场，所以迟迟不肯答应。直至8月31日傍晚，波兰人才向里宾特洛甫发出复文。但即使在该复文中他们也没有答应英国的要求，甚至根本就没有表明愿意与德国进行谈判。肯尼迪失望地回忆说，“那天午夜，总统与我进行了电话会谈……我们对希特勒已决定入侵波兰竟然一无所知，”事后肯尼迪称，“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们也没有明白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过，即使肯尼迪没有听说德国入侵的准确时间，他对此也应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尤其是杰克从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带回来的一则消息更使他肯定了自己的判断。事实上，肯尼迪后来承认他曾与驻巴黎的布利特大使通过电话，布利特认为“只要法国与英国一样态度坚定，希特勒就会停止入侵。”肯尼迪当时肯定地反驳说，“‘不，’我说，‘希特勒是不会停止入侵的，’

肯尼迪传

这肯定会是一场战争。’”

果然战争爆发了。“我刚放下电话，就有消息传来了。它来得如此突然——宛如暴风骤雨一样经由电话线如潮水般涌上来——德军已越过边境；飞机正在狂轰波兰城市；德国军队正在屠杀平民；德国人甚至还使用了毒气……国务卿赫尔匆忙打来电话找我。而我所能肯定的只有一个事实：德军正在全面出击。”

面临宣战

即使战争已经爆发，肯尼迪仍然认为，如果英国放弃对波兰的责任，它依然可以避免战争。事实上，张伯伦的确想要恬不知耻地逃脱英国应该履行的义务——尽管他于9月1日向柏林发出了一条消息，警告德国政府，除非希特勒撤军，否则英国将会履行它对波兰的义务。但这只是英国内阁一种最基本的最后通牒。肯尼迪回忆说，现在甚至连这个最后通牒也被故意地“暂时耽搁”了。

第二天，“星期六，9月2日，大家在一片沉默中关注着战争的发展。柏林方面没有传来消息。”张伯伦在下议院发表的那篇无力的讲话显然激怒了反对派执行主席阿瑟·格林伍德，肯尼迪在英国下议院的贵宾席上亲眼目睹了这个场面。肯尼迪后来回忆说：

他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因为激动和愤怒，他的表达显得有些急促。他认为妥协的想法有损英国的名誉，并且还会引起法国的怀疑。“不要再拖延已经被拖延得太久的

事了。”他说。激动的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接着表示担忧“我们向波兰履行的光荣义务将被拖延”……地方的情绪也都差不多。年轻人对张伯伦表露出来的胆怯和软弱深感厌恶。我在笔记中记道：“这些年轻人，还有这个国家里的主战派，以及美国国内那些自以为是、支持英国发动战争的人，不久就都会理解张伯伦的良苦用心。”

此时以张伯伦为核心的政府已经面临着垮台的危险，内阁草拟的最后通牒，直到9月2日午夜还没有交给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送到柏林。那天晚上，最后当议会以弹劾相威胁时，张伯伦才同意发出最后通牒，而且这也是在他计划由墨索里尼带头召开挽回面子的一次五国会议刚刚告吹之后。这次会议原打算“认可”希特勒的行为。肯尼迪接着讲：“意大利人的建议被否决之后。9月3日凌晨2点，我给赫尔先生发了份‘特急’电报。”他告诉国务院说，刚刚他得知“英国内阁经过一个通宵的商议之后，最后决定将‘在几个小时之内’向德国政府下最后通牒。”

反复衡量了三天之后，张伯伦终于下定决心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人们对此都给予高度重视。那天上午，肯尼迪在前往位于格拉斯维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过程中顺便送妻子在布朗普顿教堂下了车。肯尼迪让他的助手在自己办公室里准备了一台小收音机收听新闻。11点15分，张伯伦首相正式向全国——实际上是向全世界——发表了演说。肯尼迪记得：

与使馆人员一起听取了他这篇重要而简短的讲话。我们都被这刻的庄严与悲壮地气氛深深打动。当听到首相张

肯尼迪传

伯伦说“我为赢得和平所进行的长期努力现在已经宣告失败”时，我不禁黯然泪下。我本人也曾积极地付出了这种努力，所以如今我也在亲眼目睹我希望的破灭。在张伯伦结束讲话后不久，我便打电话要求与他谈话。令我惊讶的是，他马上就过来接电话。

“内维尔，”我说，“我是乔。我刚才听了您的讲话。非常感人……它的确很出色。同时，我也对我们没能够将世界从战争的陷阱中解救出来而深表遗憾。”

对此，张伯伦回答：“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他说，“不过看起来现在我们似乎失败了……谢谢你，乔，但愿你一切顺利，感谢你对我一贯的支持——再见了，再见。”

张伯伦计划于中午将在下议院发表讲话。杰克、小乔和凯思琳一同前往下议院与父母坐在贵宾席里目睹了他的正式宣战。“我们赶到下议院，那个时候，张伯伦恰好准备开始发表讲话。”肯尼迪大使回忆说：

突然听到了一阵空袭警笛，我们立刻躲进了议会大厦内的防空洞。不过警报很快就解除了。张伯伦讲到一半时，一名工作人员招手示意我去接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好像是总统打来的。准确地说，并不是总统，打电话的是罗斯福总统的秘书利汉特女士。她告诉我，总统要在当天下午与我通话。而且他想让我立即知道他很担心我。她在电话里感动地哭了，并告诉我，他们都很想念我，要我一定要与他们保持联系。

等我接完电话回到座位时，已换成了格林伍德在滔滔

不绝地讲话，在他之后发言的是邱吉尔和辛克莱尔。

当时邱吉尔还是一名普通的国会议员，所以他只能在后排的座位上发言。他的讲话在下议院赢得了满堂喝彩。他称：“这不是一场为了争夺统治权、为了扩大大英帝国势力或为了夺取财富而进行的战争，也不是一场阻碍其他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战争。就战争的本质而言，这是一场为了维护个人权利、为了建立与恢复人类尊严而进行的战争。”

“但我一点儿都不想喝彩，”肯尼迪日后承认，“倒是张伯伦的讲话更好地反映出我此刻内心的感受。他说，‘对于我们全体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日子……任职期间我所为之奋斗的一切，我所希望的一切，我所相信的一切现在都已成为了泡影。’那一刻，我实在忍受不住，不想再听任何人的发言了，我站起来穿过沉默的人群，回了大使馆。”

杰克的母亲后来也想起了张伯伦那篇“听完后令人肝肠寸断”的讲话，她认为在这篇讲话中那些“催人泪下”的语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对于杰克·肯尼迪来说，在他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印象的，却是邱吉尔充满激情的演讲。听了他的讲话后，除了张伯伦最忠实的崇拜者以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目前受轻视的官员温斯顿·邱吉尔，而不是张伯伦，更可能会在即将来临的战争岁月中成为英国的领袖。

“在外面，战争的风暴将席卷这片土地，给它带来累累的伤痕；”邱吉尔大声地说，“但在我们心中，在这个星期日的早晨我们仍拥有和平……因为我们的良知仍是平静的。”邱吉尔承认，张伯伦首相对于战争爆发所表现出的悲哀是可以理解的，但除此之外，此时此刻，人们还应该能感受到另外一种心

肯尼迪传

情——那便是一种感激。因为新一代的不列颠人已“准备用行动证明，他们无愧于曾经的光荣，无愧于曾经的伟人——那些曾在这片土地上奠定了法制基础，并为这个国家创造了丰功伟绩的祖先们，这不是为但泽或者为波兰而战的问题。我们正在为将整个世界从纳粹统治的痛苦中拯救出来而战，为了维护所有人类最神圣的权利而战！”

杰克·肯尼迪是邱吉尔最忠实的美​​国听众之一。当时，他坐在那里，深深地被这番讲话所吸引。但罗丝·肯尼迪却在回忆录中连提都没提邱吉尔的这篇演讲。她只记得，当她正和孩子们一起走向王子门的大使官邸时，“突然听到空袭警报，于是我们便跑向最近的一个防空洞躲了起来。”

有趣的是，那个防空洞竟是她的服装师莫利纽克斯的一间地下室。

危难之船

听说战争爆发，惶恐的肯尼迪大使赶忙给罗丝·肯尼迪、9个孩子与管家卢埃拉·亨尼西以及埃迪·穆尔夫夫妇订了最早一班前往纽约的客轮，让他们立即回到美国。

然而，因为战争即将爆发，据估计还有 15 000 名美国公民急于回国。由于担心舆论可能会指责自己的家眷像寓言中的老鼠那样，先于其他美国公民逃离充满危险的英国，肯尼迪只得同意将他们分期分批地送回。杰克和小乔被派去帮助美国侨民回国工作，同时，他们的家人正在大使馆等着回国。于是，当一名报社记者问起杰克本人及其家人的情况时，杰克回答说：“我们必须尽快赶回学校上学，但我们要在其他美国公民

动身之后再走。”

乔·肯尼迪在描绘战争爆发后第一夜的情景时说：“轰炸即将成为事实，一种恐惧感开始在人群中广泛蔓延。”据记者罗伯特·金特纳和乔·艾尔索普描绘说，肯尼迪与罗斯福通话时，一直在不断地重复，“这简直是世界的末日，一切都完了。”“我已通过电话和电报告诉赫尔，”肯尼迪必须承认，“我们大使馆急需防空设施。那晚他看上去很沮丧。但哪里都是一样。我刚上床，电话铃就响了。那时已经是凌晨 2 点 30 分。打电话的是大使馆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他简要地向我汇报刚收到的一份电报‘唐纳森航运公司的客轮雅典娜号，在离码头 200 海里的地方遭鱼雷攻击，船上有 1400 名乘客，现已收到求救信号，目前该船正迅速下沉。’”

在伦敦，新上任不久的海军大臣温斯顿·邱吉尔严肃指出，“雅典娜”号客轮没有任何武器装备，只运载乘客，在未经提醒的情况下，竟被德国军艇击沉。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插入德国新闻发表讲话，他怒斥这位“撒谎大臣”的话没有丝毫根据，并宣称，在该海域内没有德国潜水艇，“你这是在无耻撒谎，邱吉尔先生，让你这些荒谬的谎言见鬼去吧。”

其实，真正在撒谎的是戈培尔本人。事实上，当时在该海域内进行军事活动的德国潜艇多于 39 艘，正是它们中的一艘击中了这艘从利物浦去往纽约的英国客轮。后来德国海军上将雷德尔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承认，由于 U—30 潜艇的艇长肯普上任不久，有些紧张，错将“雅典娜”号当作了一艘英国海军的辅助舰。

几百名幸存者在爱尔兰上了岸，不过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搭乘英国客轮来到苏格兰。1939 年 9 月 6 日晚，就出现了这样的

肯尼迪传

报道：“由于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太忙无法抽身，因此，杰克·肯尼迪被派往格拉斯哥代表大使处理‘雅典娜’号幸存者的安顿事宜。”

杰克的父亲原本觉得这只是一起普通事件，但杰克不久就发现事实上根本不那么简单。它是二战中首起运载乘客的客轮遭鱼雷击沉的事件，而且有 300 多名美国公民也在这艘船上。在这起事故中，100 多人丧生，其中包括 28 名美国公民。

尽管杰克·肯尼迪这时已经 22 岁了，但他看起来依然像个十多岁的小朋友，《伦敦电讯》的一名记者在发自格拉斯哥的报道中对他进行了这样的描写：

今天下午，美国肯尼迪大使 18 岁的儿子约翰·肯尼迪先生在当地一家颇有名望的宾馆的大厅内会见了一群美国人，他们刚从遭鱼雷击沉的英国客轮上被救上来。他听取了他们坚定而又礼貌的要求——他们希望下星期三乘坐一艘有安全保证的轮船回国，目前该船正在从纽约返航的途中。这位年轻的外交家连夜赶往格拉斯哥去通往“雅典娜”号的幸存者，政府正努力采取措施来减轻他们的悲痛，并设法让他们尽早回到家乡。

他说：“今天早晨父亲与我进行了通话，之后他又与美国官员通了话，他让我转告你们，政府已为你们所有人准备了大量的抚恤金。”

然而，这些幸存者们想要的并非仅仅是肯尼迪大使在财务方面的承诺。这些生还者们有的仍还蜷缩在毛毯中，有的裹着旧衣，他们大都还停留在沉船的恐惧中，而政府却只派了一个

“毛头小伙”来告诉他们将有一艘美国轮船送他们回家，并且“罗斯福总统表示，因为美国船只不会受到攻击，所以没有必要派护航船队保护。”对此，大家都感到很愤怒。在发回国的电报中，一位美国记者描述道：“这些生还者爆发出一片抗议声……许多带着肿痛、烧伤以及这次事件带给他们其他伤痛的美人开始抗议，‘你们不能相信德国海军！更不能相信德国政府！’”对此，年轻的肯尼迪则解释说，美国船只不需要保护是因为“我们仍然处于中立状态，并且中立法现在依然发挥着作用。即使英国船有整个舰队护航，坐美国船也远远比英国船安全。”

然而对于那些刚刚经历沉船之痛及敌人袭击的幸存者来说，这种做法就相当于在拿着红布挑逗一头公牛。

一位妇女大声叫道：“我才不相信这种鬼话呢。”她的话引起了人群的喧哗。其他的生还者都表示赞同，他们大声叫道：“我们也不信。”肯尼迪先生试图再次与众人解释，但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尔人士托马士·麦克卡宾插进话来，“派遣护航舰队是绝对必要的。美国海军刚把 90 艘驱逐舰整编进了军队，总能分几艘来保护我们吧？纳税人在美国海军身上花费的钱多达 60 亿美元，他们难道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另一位生还者也表示强烈抗议说：“两年前，为了寻找一名女飞行员，他们连整个太平洋舰队都派遣出动了。”一位女大学生则称“除非我们有舰队保护，否则我们绝不动身，你已经看到了他们的行动，他们还会用同样的手段再次来进攻我们。”

面对这种情况，年轻的肯尼迪吃了一惊，但他强有力

肯尼迪传

的声音仍压过了众人的叫嚷，“根据国际法，在悬挂美国国旗的船上你们肯定是安全的，中立国的轮船是绝对安全的。”

但是，生还者们对他的这种担保根本不相信，他们继续吵闹，肯尼迪先生只好答应将他们的要求转告给父亲。随后，他连忙乘快车回到了伦敦。

有生以来第一次，杰克品尝了面对一群颇有敌意的美国人的滋味。然而，伦敦《晚间新闻》记者却在报道中对他大为赞扬，他没有惊惜失措。“好心的大使——19岁的杰克，美国大使的儿子今天度过了在他年轻时代里最为繁忙的一天，在格拉斯哥，他奔波于医院和宾馆之间安慰从‘雅典娜’号上获救的美国人。他那充满稚气的迷人风采和天生的和善气质使那些受到慰问的人深刻感受到，美国政府的确正用她仁慈的目光密切关心着他们的安危。我一直跟随着年轻的普罗沃斯特·多兰勋爵和肯尼迪先生……肯尼迪先生显示了两倍于其年龄的能力和同情心。”一回到美国大使馆，杰克便提出了以下建议：

1. 派遣护航运输队保护这批海难生还者安全返回美国。因为：第一，这次人们已经受惊过度，难以克服孤船返国的恐惧；第二，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是美国政府令护航运输队不必冒风险来保护他们。

2. 政府派去接运这些获救者的船只到达港口后应立即前往格拉斯哥，因为：第一，大部分人都在那里，那是最方便的地理位置；第二，可以趁机对普罗沃斯特·多兰

勋爵在格拉斯哥市的所作所为表示由衷的感谢。

3. 美国政府应对负责营救这些生还者的那艘驱逐舰上的所有官兵表示正式感谢。

4. 政府应对格拉斯哥市所做的一切表示正式感谢。

虽然约瑟夫·肯尼迪向英国皇家海军和格拉斯哥市都正式表达了谢意，但却坚决不同意杰克提出的主要要求。这位美国大使后来在回忆录中轻描淡写：“他们中许多人竟然要求在美国海军舰队护航下回国。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看来那时候他早已忘掉了自己曾有过的歇斯底里情绪。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尽管存在分歧，杰克还是被指定负责安排将生还者运送回国一事。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内，他从伦敦给哈佛大学的学生注册组寄了封信，在信中表示，由于他“目前正负责处理‘雅典娜’号生还者运送委员会的工作，同时由于交通紧张，我很难赶在9月29日之前回到美国。”他希望这不会“影响我上学的资格”。

其实杰克所担心的并没有发生。幸运的是，9月20日他于最后一刻在泛美航空公司的“迪克西”号航班上找到了一个临时座位。该航班从爱尔兰佛恩斯启程，途经纽芬兰最后抵达美国。这样，杰克将于1939年9月21日按时抵达纽约。《波士顿全球报》报道说：“在迪克西号上，他成了人们最喜欢的人。这并不因为他是约瑟夫·肯尼迪大使的儿子，而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他是一位聪明豁达、非常有趣并且乐于助人的小伙子。”

失恋及求和

回到哈佛后杰克遇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他的室友托比·麦克唐纳。现在他已经是哈佛橄榄球队的队长，他和杰克共同住在了温斯洛普大楼 14 层的一间套房。一位记者曾这样描写搬进了新居的杰克：“高瘦、英俊、容易激动并喜欢将双腿跷在椅子两边扶手上的杰克，在渡过了如此激动的 7 个月以后，忽然发现静下心来过单调无聊的学生生活是很难忍受的。在温斯洛普大楼的这间三居室套房内，收音机、该洗的衣服以及花瓶等乱成一团。”

匆匆收拾好行装，并选修了本年度前四门课程之后，杰克就在下一个周末动身到纽约去和家人团聚——他们已经全从伦敦回来了，另外杰克还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即弗朗西丝·安·坎农。这时候她与她母亲完成了环球旅行后也已回到家中。

在纽约杰克遇见了一年前的室友查理·霍顿。霍顿现已在一家匹兹堡的厚玻璃厂找到了工作，他也在“热烈地追求”刚刚回来的坎农小姐，甚至霍顿还因为是名新教徒而占了很大便宜。10 月 1 日，那天是星期天，他们二人都被邀请去坎农家在纽约的公寓中做客。

杰克已经与他妹妹姬克详细谈过，他很想娶弗朗西丝·安，而且这种想法经过分离之后，更加强烈。凯思琳在写给她父亲的信中说：“这个周末杰克计划约弗朗西丝·安出来玩，我们很想见到她。”连肯尼迪夫人也知道了这段恋情，但是她是否已感受到杰克将即向弗朗西丝·安求婚，这一点还很难说。40 年后，当罗丝在回忆录中引用凯思琳的一些信来说明子女对她的

孝顺时很自然地提到了弗朗西丝·安，夸奖她是个“有魅力的女孩，那时候杰克看上去对她非常喜欢。显然，她也很喜欢杰克。至少姬克曾暗示过杰克将会宣布一则消息。”

到底杰克的母亲会怎样对待这样的一段恋情，现在只能成为一种有趣的猜测。令罗丝感到欣慰的是，她永远都不会再听到这样的消息了——因为，当杰克和霍顿去坎农小姐的公寓作客时，他们认识了弗朗西丝·安的未婚夫约翰·赫西。

霍顿感到非常吃惊：“当她向我介绍赫西是她未婚夫时，我们原来还只把他当作一个无聊的家伙。”霍顿很生气地回忆起他的这段经历。这两位当时什么也没说，最后只得悄然离去。几年以后，杰克对于感情上被拒绝一事仍记忆犹新。对那些询问此事的朋友，他都说是自己拒绝了弗朗西丝·安。实际上，那时候霍顿与杰克一样是非常失望的。之后过了一星期左右，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坎农和我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我很想找一位能够替代她的人。”这位“替代者”就是姬克的教友，夏洛特·麦克唐奈。

此时，欧洲战争越来越激烈。9月25日，哈佛大学《猩红报》在头版报道了德国飞机强烈攻击华沙平民一事——“这次可怕的轰炸在24小时内已使1000多名平民失去生命、一半的城市陷入硝烟与废墟之中。”两天之后华沙不得不宣布投降。在波兰抵抗德国侵略的四个星期内，据统计有6万波兰士兵惨遭不幸，另外还有10万人都受了重伤。

杰克曾在数周之前刚去过华沙和但泽，按理说应对波兰人的遭遇感到愤怒，至少应有一些同情。然而在战争爆发初期，他不自觉地受到了父亲悲观主义观点的极大影响，其程度丝毫不亚于张伯伦给他的影响。他的朋友托比·麦克唐纳后来回忆：

肯尼迪传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段时期杰克认为那些支持‘美国第一’的人是正确的，美国毫无必要卷入一场在欧洲爆发的战争。这种观点在他的头脑中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杰克的父亲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呼吁有必要与希特勒进行和解。9月12日，杰克还在伦敦，波兰战局尚未见分晓之际，肯尼迪大使给罗斯福写了一份私人信件，杰克曾经看过这封信，它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依我看，这一形势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总统简直就是救世主。”罗斯福将之称为“我所收到过的最愚蠢的一封信。”总统私下里向摩根索说，“乔一向是个绥靖主义者，而且他永远都是个绥靖者！明天，一旦意大利和德国提出一项和平解决方案，乔就会开始劝服英王、皇后以及他们的朋友，并逐级往下到每个人，他会要求他们接受这个和平方案……我觉得他真烦人。”甚至他命令国务院要教训一下这位驻伦敦的大使。肯尼迪回忆起那天晚上国务卿赫尔先生作出的答复：

这份电报纯属机密，目的是指导你的工作，提醒你不得向任何人透露。罗斯福总统希望你能明白，只要欧洲目前的局势保持不变，美国政府认为，总统没有理由也不具备时机接受任何一项和平方案。如果美国政府倡导和平方案会促使一个法西斯政权得以生存和发展，那它将无法取得美国人民的支持。

赫尔的电报并没有打消大使的绥靖的主张，反而更强化了他的这种想法。肯尼迪的现实主义思想使他清楚地看到美国驻法大使布利特对法国军事力量期望过高。但他的软弱却使他无

法看清：与希特勒谈判根本没有什么结果。

不过，在百万富翁们中间，肯尼迪也有不少支持者。英国《每日快报》的老板马克斯·比弗布鲁克就支持肯尼迪说：“请你的总统考虑一下，看看怎样才能避免这场灾难，我的钱、我的报纸以及我所有拥有的一切，你都可以随便使用。”到1933年9月底，苏联和德国已经瓜分了它们的战利品——波兰。肯尼迪被逼无奈，不顾赫尔的回复，再度致函罗斯福，恳求他出面调解欧洲战事。日后他回忆起致信总统表达自己坚定的信念时说：“法国和英国对此已无能为力。但在美国大众的支持下，总统采取的明智而果断的外交行动……将可能为世界带来和平，同时维护各参战国的尊严。世界上惟一个能做成此事的人——只要他愿意做——我依然认为，只有您。”

显然，肯尼迪已经将罗斯福当作了美国的张伯伦，在这封请求信中，美国驻英大使的肯尼迪进行了他糟糕的陈述：“迄今为止，我还未遇到任何认为以现在的英法联盟的实力对抗俄、德及其潜在盟友组成的联盟，英国会有胜利可能的军事专家……无论是否同意，英、法现在都已骑虎难下，欲罢不能。由于我本人就生活在英国，我深信，英国将会奋战到底。不幸的是，我并不相信那将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他在信中将英国描绘成一个已经在走下坡路的国家，并且坚持认为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将无人能够取代。“不管哈利法克斯如何仁慈、睿智，邱吉尔在处理德国问题上的预见如何高明，我仍然无法相信他们能带领英国人民走出死亡的幽谷。”如果罗斯福不想看到“世界上最可怕的灾难降临到我们朋友的身上，从而危及我们自身”，他认为总统应该“控制我们的情绪和感情，着眼于我们最重要的利益……而这些重要利益，依我之见，就是西半

肯尼迪传

球的和平。”

罗斯福对他的大使这封满纸失败主义论调的信函十分反感，“我未收到任何答复。”肯尼迪失望地回忆说。

同样地，邱吉尔对于约瑟夫这种绥靖主义思想也不屑一顾。后来肯尼迪回忆说，尽管邱吉尔当时还不是首相，但“这段时间到处流传着邱吉尔将取代张伯伦成为首相的说法。”约瑟夫记得，当他与英国外相哈利法克斯针对邱吉尔取代张伯伦一事交流意见时，“哈利法克斯并不喜欢这种说法，因为邱吉尔的判断力令他感到心烦。”

他告诉我，前几天召开的一次内阁会议上，邱吉尔谈到了一艘希腊船只遭鱼雷击沉的事。当他描述波涛汹涌、海风怒啸的情景时，仿佛面前是成千上万名听众，而不是九位内阁成员。张伯伦曾经很有礼貌的对他夸奖邱吉尔，“邱吉尔有吸引听众注意力的才能，而我却永远做不到那样。”哈利法克斯也担心，如果再不提出和平方案，人民对于战争爆发的埋怨一定会与日俱增，这样以来，要求选举新首相的呼声也会高涨……我们讨论了一些可能实施的和平建议。我告诉哈利法克斯，我想在美国国内做好辅助工作，以便使她能接受那些被提出来的和平方案。我说：“如果英国认为她能接受，却由于美国而不接受它们的话，那将是一场灾难。”那时，我突然想到了犹太人目前在华盛顿和新闻界不断扩大的影响，而他们都主张战争要继续下去……

为了应付这种影响，肯尼迪再次开始在美国国内展开绥靖

宣传运动。他一边给国内的相关人士致函游说，一边四处散布英国局势处于不利地位的观点，促使美国趁现在为时未晚，尽早与希特勒达成一致。

不过可悲的是，在所有的宣传活动中，第一个“受害人”便是他自己的儿子杰克。

《猩红报》

1939年10月，杰克给父亲写信：“随函附上我在《猩红报》上发表的一篇社论。虽然主编曾对它加以修改，淡化了一些我想强调的事，但不管怎样，我认为它比较好地反映了我的支持——尽管支持这种观点的只有几个人，而它的反对者不少。”

这篇社论的题目很有意思，叫做《时代的和平》。在文章中，毫不夸张地说，杰克的论调甚至比签署慕尼黑协定的林登堡和张伯伦的论调更为软弱。他甚至建议他的同学别管波兰发生的暴力事件，并声称“总统有义务在他的职位上尽一切努力来促成和平”。杰克进一步表示，英国和德国第一次交战之后，其实都很痛苦，希望能尽早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如果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而谁都不愿主动提出和平建议，从而使双方的和平愿望遭受打击的话，那将是有史以来最遗憾的一件事。很明显，必须有第三者来促使他们进行谈判。同样十分明显的是，美国总统正是这项工作的最佳候选人，他陈述说，“罗斯福先生最初的行动可能需要通过秘密外交途径进行，他必须得事先清楚是否存在促使问题和平解决的基础。”

杰克的初衷是真诚的，他希望罗斯福能够通过他父亲，不

肯尼迪传

惜花费任何代价——除战争以外——来争取和平，以避免英国和法国遭受战争所带来的灭顶之灾。杰克的这篇社论也反映了他父亲的悲观主义观点：“很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英国会战败。”他预言，“轻者，英国会失去她目前所有的工业中心以及自殖民主义时代以来积累起来的财富；重者，她则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面临严重的屈辱。追求和平才是目前的明智行动。”这是一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和平。”

但是，杰克·肯尼迪的这种“纯粹现实”的思想并不比他父亲的看法好多少。“不论局势怎样发展，让波兰恢复原样是绝对不可能的。”杰克表述说，“现在，要想结束战争不是取决于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取决于我们还能做什么。”然而正如杰克所说的，“然而不幸的是，这需要向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做出很大的妥协。这意味着除了将波兰陷入困境之外，纳粹还将在东欧享受经济特权；另外殖民地也可能得重新瓜分。但如果这样做能使希特勒放弃战争，对民主国家而言，这依然是一种胜利。以强盗面目作为其外交武器的希特勒主义也将成为历史，欧洲也将能够获得自由。英、法帝国也将得以恢复完整。这样，整个世界将会拥有和平。”

杰克几次去德国旅行之后，居然还会认为希特勒会放下武器，真令人难以置信。幸好他在《猩红报》上发表的这篇社论没有署名，这是他在哈佛选修了一些与政治无关的课程之后，首次针对有关希特勒和绥靖主义行为所发表的评论。不过不久他便会为自己曾发表这篇文章后悔不已。

骚 动

在《猩红报》上发表那篇文章之前，杰克就曾经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一次聚会上发表了1小时讲话，反响相当不错——不过我却不想再作这样的讲话。”他向父亲保证。他还援引了约翰尼·伯恩斯——他父亲在马萨诸塞州的一名法官朋友的话说，“可能这会带来麻烦，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坚持到英国战斗到最后一刻。”然后，杰克又讽刺地说，“人们大多数都拥有一种宿命论的态度，认为美国一定会在战争结束前加入战争——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

杰克这种孤立主义观点正反映了他父亲的态度。伦敦外交部一位外交官在日记中写道，离开伦敦前，这位大使的儿子便已经对罗斯福计划取消《美国中立法》的想法表示强烈反对——理由是，他父亲认为英国无法承担购买美国货物所需款项。这位外交官记录说：“杰克先生突然插话说，即使没有了‘中立法案’，也不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黄金可以在美国购买货物。”1939年10月从哈佛大学给他父亲写的信中，杰克预言罗斯福可能会下定决心取消《中立法》——但他们使用的手段却很不正当：“约翰尼·伯恩斯说禁运令将会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被取消——他指出，参议员贝尔纳斯已经巧妙地抵制了反对派的谴责，斗争已日趋平息。”

这确实是，只要声明永远不会让美国陷进欧洲战争，罗斯福便能将孤立主义者牢牢掌握在自己统治之下——目前相关活动正在林登伯格，也许还包括约瑟夫·P·肯尼迪等人的领导下蓬勃发展。通过运用他的非凡才智，罗斯福向美国人民明确表

肯尼迪传

示：要使战争远离美国海岸，就必须帮助欧洲的民主国家运转，而且按照“现金购买、运输自理”的要求不仅不会威胁美国的中立地位，反而还能对它有所强化。

到10月底的时候，杰克已在《猩红报》一个专栏上为自己谋得了一席之地。不过这个专栏不是社论版而是商业版。他自称“在这里已算得上是一位‘专家’了。”他向父亲吹嘘说，“那一年的锻炼的确让我获益非浅。”甚至他还认为，《纽约时报》最近倡议再由美国发起召开第二次慕尼黑会议的背后，很可能是他在《猩红报》上发表的那篇社论所起的作用。“布朗和李普曼都已发表了几篇倾向于赞成和平协议的社论，这可能是我在《猩红报》上的那篇社论带头起的作用。”杰克自鸣得意地说。

然而，假如肯尼迪大使真的爱好和平，那他表达这种爱好的方式却颇有些特别。据说，在伦敦，瑞典大使曾表示，尽管肯尼迪经常发表一些有关和平与繁荣的言论，但他却经常在股票市场做一些“特殊的”交易。一位英国外交官这样评论说，这种行为“足以证明他具有反英思想，而且还可以证明他在不择手段地获取不正当利益。”亚历山大·卡多根也在英国外交部里写道：肯尼迪“看待任何事情都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出发。”达维·斯考特表示，“他不禁有这样的感觉：肯尼迪先生无论任何时候想的都只有两点：1）他自己的经济利益；2）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一位美国记者总结说：“乔·肯尼迪一直忙于操纵股市。”英国安全秘密机构在窃听大使馆电话时也证实了这件事情，并“发现肯尼迪在利用他的‘内部消息’大肆炒作自己投资的股票。”他的传记作家写道。

与此同时，在波士顿杰克也肆无忌惮地忙于同样的事。他

与父亲的老朋友阿瑟·哥德史密斯合作，甚至还说服他的朋友勒姆·比林斯也加入了他的投资项目。杰克写信给父亲说：“我和大阿瑟·哥德史密斯在股市中成绩非常好。目前我们正密切关注着航空股，现已控制了杰克·戴利的公司——共和航空公司的部分股票，该公司即以前的莱弗斯雷公司。戴利是董事长，占有重要地位。我已成了一位正式的股东，目前已经获得了几百块钱的红利。不过我办事情非常谨慎。”

杰克·戴利曾经是肯尼迪家在海恩尼斯时的邻居。10月21日，比尔·科尔曼与杰克对戴利进行了一次拜访。这是他与戴利最近一次的见面。他告诉比林斯，他们收购的原始股“已涨到了每股25美元，根据哥迪的建议，我已将它们脱手卖出，并在场外证券市场以每股5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共和航空公司的股票。现在看起来情况不错，每股已有20美元的红利。何时收回这些红利就告诉我一声。”

尽管曾向父亲保证会小心谨慎，但当他将所有的资金都押在共和航空公司时，杰克已经被金钱冲昏了头。等到11月初罗斯福取消《中立法案》的工作有了效果时，杰克已经在恳请比林斯“将你股份中的那100美元寄给我吧，因为我现在已经一贫如洗，不得不靠一点点抛售股票来凑些钱花。”

杰克大声呼吁和平与停战时的慷慨激昂与他在购买航空股上的这种投机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宣传“我们时代的和平”这一过程中，杰克将对希特勒这种明显的妥协解释为：“我们对民主国家怀有强烈的同情心，但对美国而言，这种解决措施是它能想到的最佳方案。它将使我们免于1917年灾难的重蹈覆辙，否则，这次我们的损失将比上次更加严重。即使对整个世界而言，这样的和平也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恩惠。它将

肯尼迪传

阻止一场极度残酷的战争，使人类避免一场空前残酷的灾难浩劫。”——不过这种看法却完全忽视了纳粹对奥地利、德国的犹太人、波兰人和捷克人施加的野蛮行为。

实际上，杰克这种绥靖主义思想不仅反映了他父亲的观点，而且也反映了大部分哈佛大学生的观点。1939年11月9日，《猩红报》报道说：“‘不惜花费任何代价赢得和平’似乎成为周末的停战日聚会上许多学生反战组织的宗旨。”第二天，哈佛学生会在全校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重复了三年前那次牛津学生会声名狼藉的辩论所造成的结果。在所有参加投票的1800名学生中，95%“反对美国参与”这场战争；“即使英国和法国被纳粹打败，78%的哈佛大学生也反对美国参与这场欧洲战争。”更有“部分”学生支持立即与希特勒举行和平谈判。那天上午，在桑德斯剧院举行的一次哈佛反战委员会和平会议上，35名学生在戴维·托德的带领下重复了“牛津宣言”，他们表示“不支持美国进行任何战争”。

不过这种和平主义思想在哈佛并非没有遇到挑战。“当时整个校园都动荡不安，”多纳德·瑟伯回忆说，“各种看法与运动席卷了整个校园。那些日子学校内的气氛十分紧张。我们一直围绕着这些观点和运动争论不休。我认为杰克·肯尼迪受这种气氛的影响很深。”

哈佛的老师们也没有保持沉默。校长詹姆士·B·科南特从一开始就公开支持援助法国和英国。“我相信，如果连这些国家都被纳粹国家打败，那么想要建立人类现代文明基础的自由制度就会受到冲击。”在一封《致反对派领袖》阿尔夫·莱顿的信中，他警告说，“背离我们历史上制定的政策，并因此使那些与我们有共同信念的盟友遭受打击，在我看来，这是既不道

德，也不明智的行为。”

杰克的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们更是支持援助英国和法国。“与杰克·肯尼迪最亲近的那些哈佛教师——那些给他上课或辅导他论文的人——都非常支持美国控制欧洲局势，一点儿都不赞成孤立主义政策。”后来多纳德·瑟伯称，他记得“要想在政治系中找到一名支持慕尼黑协定的教授非常困难，而且几乎不可能找到。”

杰克的教授们并非仅仅将他们的观点主张局限在课堂上表达出来。佩森·怀尔德教授在《猩红报》“和平主义者”专栏内公然建议取消陈旧过时的《中立法案》。他认为只有法国和英国“坚持下来，我们才能够置身于战争之外。”阿瑟·霍尔库姆教授在对哈佛学生会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表示：“美国要想在战争中完全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所以“美国政府必须决定究竟对哪一方施加压力。”布鲁斯·霍珀教授表达了他对日本制定“亚洲新秩序梦想”的重视。埃利奥特教授则认为“目前中止战争将会巩固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的地位，”“这对于我们来说将是不利的。”埃利奥特也对日本构成的威胁提出了警告，“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有可能采取的举动对我国地位构成了最大威胁。”他预言说，“所以对美国而言，能保持远东地区的势力平衡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其父甚有名望，但杰克仍在一种远离政治斗争战火、完全学术性的安全环境中学习国际关系和政治，然而随着这次战争在欧洲的爆发，不论是出于对学术兴趣还是受责任的影响，杰克对政治的关注在日益加深。“他对国际事务和政治问题方面确实很感兴趣。”佩森·怀尔德教授回忆说，“他在国外的经历对他非常有帮助。在这些经历的基础之上，他掌握了许

肯尼迪传

多很困难的知识。因为他曾亲临现场，在那里见到过很多人，并获得了第一手资料，正因为他有这些经历，所以他对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了解得比其他人更清楚。”

杰克在一度受父亲思想的“影响”，发表过呼吁容忍希特勒的幼稚文章之后，现在终于开始仔细聆听教授们的观点。他放弃了当初在《猩红报》上发表的主张以及在基督教男青年会和女青年会发表讲话时的主张。到 11 月 4 日，杰克的名字已经从《猩红报》的商业版上消失。他对自己以前的主张产生了怀疑，还开玩笑似的对父亲说：“今年的课程非常有趣，所以我一直都在忙……我选了弗莱德里奇教授的一门课。他是位风趣幽默的老师，现在我还没有告诉他自己的身份，不过我准备走过去，跟他握手，然后与他讨论他的文章发表后将会给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就是杰克的幽默。事实上，也正是这一点使他避免了走哥哥小乔相同的命运。在杰克的心底，他的政治信念并不坚定。他在《猩红报》上简短的亮相与他的性格也并不相符。霍尔库姆教授在回忆杰克一生时谈道：“此人的风格在他很年轻时就形成……他决不是一位政治上的斗士。而有些人却已经成为斗士，尽管他们现在还只是大学生，但你却能在课堂上将他们挑出来。他们为一种理想而奋斗，这种理想对他们的一切行为起决定作用。不过，这种信念杰克并不喜欢。”

在此后漫长的日子中，杰克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致力于把他培养成一名崇尚自由的民主党人。但他的党派信仰却经常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内容。对此，霍尔库姆更了解他，“他对事业不感兴趣。”霍尔库姆教授进行了非常准确的描述，即使连杰克具有党派信仰那也是“别人为他安排好的。因为他在民主

党人的家庭中出生，所以就注定他要成为民主党人。否则的话，他根本找不到支持其中一个政党的理由。”

在佩森教授的记忆中，正是由于他缺乏这种“责任感”，所以在哈佛读书的日子中，“没人敢说，他会预料到他将来会当总统”。他缺乏他哥哥那样的勃勃雄心和坚定意志。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做些什么。就像在学校里那样，他的问题不在于他是否有才能，而在于有着太广泛的兴趣，并且又缺乏明确的目标。霍尔库姆教授回忆说：“每个人都知道，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他肯用功，他就会做得很出色。”

不过，杰克关注的不只是他的学业，还包括女孩。“看起来我在女孩中间更受欢迎，大概是你在那边所起的作用。”他在信中与父亲开起了玩笑。他父亲在伦敦的特殊地位确实让他在社会上有了一席之地。因此他请求父亲“在辞职前请您稍微考虑一下我的前途……我正准备约姬克的朋友夏洛特·麦克唐奈一起去观看普林斯顿与哈佛的比赛。这是我第一次与天主教女孩约会，对此我很感兴趣。”

不过，杰克与异性在夜间相处时，想的根本不是爱情。“我想找个喜欢做爱的女孩，安排在科特角的周末娱乐活动时，”杰克告诉比林斯说，“所以这个周末最好就不要叫姬克过来玩了。”他11月份写信告诉比林斯，“上周末我去纽约过感恩节，在那里好好开心了一阵子。而且我还遇到了那个模特儿乔治·卡罗尔，她相当棒——当然，还有其他几个好女孩。”

就这样，杰克一边在他的房间内享受这些“好女孩”，一边与那些刚刚步入社交圈的单纯女生亲切来往。这些刚入社交界的女孩至少能在社会上——如果不是在性方面的话——给杰克带来好处。“或许你知道，哈佛已经被打败了，”当耶鲁在年

肯尼迪传

度校际橄榄球赛中以很大的优势战胜了哈佛之后，他写道，“托比表现非常出色，最后还得了一个底线分——但哈佛队整场都到处失球。”他将失败归咎于“那个曾经参加天主教舞会并在舞会中出尽风头的讨厌家伙——伊顿。伊顿看上去很喜欢夏洛特·麦克唐奈，”他酸溜溜地说道，“上周末我去看过她，她的确可爱极了。”

然而在这种丰富的生活背后却总是隐隐呈现出战争幽灵。当然，一旦美国参与战争，杰克的身体状况能否参战，又是另外一回事。在法国的一起车祸使他那原本就很严重的背疾变得更加严重，并使他不得不经常穿一件特制的紧身胸衣。他已经试过许多种药。本·史密斯回忆说：“过去，我们常常比较谁的药片多，因为我们俩都有不少药。”此外还不得不接受其他的疗法。“今天我接受了第一次肝脏注射。”11月，杰克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希望这能有效果。”他正在拼命“学习”那年年初他居住在英国时落下的课程。这些课程“必须在感恩节前学完。我已补完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不过补习很艰苦，因为与此同时我还必须完成正常的学习。”

就在这个忙碌的时候，杰克收到了他哥哥的朋友汤姆·施莱勃寄过来的信。汤姆现在已经去人寿保险公司工作。“我劝说小乔买了保险，”施莱勃后来回忆说，“而且我正设法说服杰克也买一些保险。我说，战争即将爆发，最好趁他们还没有对保险实行限制，就投保。”我知道杰克身体不好，他有血液病。但我想我们能够帮他，并帮助他顺利投保。于是后来我收到了杰克的这封来信。上面没有写日期，但我想应该是1939年。

亲爱的施莱勃：

肯尼迪传

收到你的信我很高兴。看来我现在可能是西北公司有史以来最适合的潜在投资对象，就像银行里等着你们来取的钱……我愿意让你的公司成为幸运者——尽管许多其他公司都在努力争取我。

不过我现在有些为难。一方面，因为我在乔特中学那份吓人的体检记录，即使战争爆发，让我上战场的可能性也很小。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为了预防万一我在战争中丧生，我还是想参加投保。我将向乔丹医生询问一下，看看是我避免服兵役的可能性大，还是成为该公司投保人的可能性大。之后，我会给你寄去有关的详细记录。希望下次在纽约时能见到你。

祝好！

杰克·K

十九世纪留下的遗产

1939 年秋杰克所选修的四门课程——《政治学原理》、《比较政治学》、《国际法原理》以及《现代帝国主义》——是他在哈佛的学习生涯中最具挑战性的几门课程。与导师布鲁斯·霍珀讨论之后，杰克确定了他的优等生论文要写的内容。这篇论文将在 2 月份之后的第二个学期中代替目前所学的一门课程。他写信告诉父亲，“我将以《英国 1931 年以来的外交政策》为题完成我的优等生论文，主要讨论英国的外交政策对各阶级影响。”

多年之后，一些历史学家和作家误认为他当时是想分析有关 1731 年以来英国的外交政策，因为杰克的字迹潦草，许多

肯尼迪传

人把 1931 年误看成 1731 年了。杰克的真正兴趣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而不是英国的 18 世纪 30 年代，而且他认为，他的调查研究最好从 1931 年拉姆齐·麦克唐纳组建两党国民政府时开始。尽管罗丝·肯尼迪对杰克在哈佛的课程了解甚少，但她却肯定地认为杰克挑选这个题目是因为他对英国的亲切感。

他讲话时浓重的波士顿口音与英国口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他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爱好文学、文化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东西。这种爱好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多数政府里的人，大多数自己拥有豪宅和经常宴请宾客的人，他们都会有一些家人曾在政府中任职。他们不仅对政府、政治和历史方面的内容感兴趣，而且这种兴趣已延续了好几代。因此与这里的人比起来，他们可能有更高的文化内涵。而这里的大多数人，或者说许多人才刚刚起步。杰克对所有这些都很有同感，因为他从心底里爱好文学，也的确懂得欣赏文学，而且他还对政治相当感兴趣。当然，他也很喜欢看到有些美丽的住宅，因为它们多少都与历史有联系。如果你在周末出去散步，你会看到一幢幢像德文希尔家族的豪华巨宅那样已经耸立了几百年的房子……在那些房子中，在所有能引发杰克共鸣的事物中，杰克能看到那些人在政治生涯中留下来的痕迹。他的确过得很充实——我想，我们也一样过得很好。当然，这些地方与波士顿多少有些相似，因为波士顿有很浓厚的英国氛围，那里的人们都有英国——爱尔兰的悠久传统。但在其他一些地方，比如说纽约，这种传统远不如波士顿悠久。

杰克死后，在罗丝记录下的这段混乱的回忆中，好多地方说得确实不错。在杰克生活的那段日子里，学《政治学》课程的学生很少有人愿意写有关英国的论文。大多数同学比较喜欢写一些诸如：《缅因州电气设备的管理制度》或《波士顿机动车辆登记制度》——甚至还有《印地安那与东芝加哥——都市问题之一》这样的题目。相比之下，杰克挑选英国外交政策为题反映了他对英国的强烈兴趣——包括从它原始的制铅工业到它如今的社会阶层状况。当然他不打算写有争议或比较烦琐的文章。优等生论文一般长 60 页左右，是学期论文的 2 倍。1939 年 11 月底，他写信给父亲，信中他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我需要什么东西的话，我会与吉姆·西摩进行联系。”

在怀尔德、埃利奥特、霍尔库姆、弗莱德里奇、霍珀和爱默生等哈佛教授的教诲下，杰克渐渐对现代史有了比较深刻的洞察力，导师们的鼓励更促使他打开了自己的思路。托比·麦克唐纳后来评价佩森·怀尔德博士说：“我跟他相处得很好，并且很尊敬他，杰克也是这样。在杰克理性思维能力的发展上，他起了直接而且巨大的作用。因为他会在我们面前，故意刺激杰克，责骂他为什么不像他哥哥那样用功读书，他是个有能力的好人，非常了解杰克的脾气。当时，我也知道他是在故意激励杰克，希望能激发起他的动力，敦促他走上能充分发挥自己才智的道路。”

现在这把火已经点着了。“小乔毕业后，杰克就开始放射出光芒，并且对自己也多了几分信心。随着成绩的提高，他对自己的信心与日俱增。”佩森·怀尔德后来回忆说，“在大学四年级时，他的平均成绩已经升到了 B⁺。那时他已经完全具备资格去写优等生的毕业论文了。作为指导老师，我和负责《国

肯尼迪传

际关系学》的副教授布鲁斯·霍珀都感到很欣慰。”

1939年10月，在聆听佩森·怀尔德博士讲授的国际法个案分析过程中，杰克明显地表现出了他不断增长的智慧。“我常常有这样一种印象：他比公众或许多人赞许的那个杰克要更深刻得多。”后来怀尔德回忆说，“他的确是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对国际事务和政治问题非常感兴趣。”

他在欧洲的所见所闻促使他对如何处理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他想知道，各国奉行的政策是以什么为依据，各国之间的关系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是如何得到合法约束的。他曾向英国客轮“雅典娜”号上获救的美国公民保证，一旦登上表示中立的美国船只，在国际法的保护之下，他们将会享有高度的安全。但是，实际上，杰克知道，“雅典娜”号上也曾有其他数百名幸存者从海上被救到了美国商船“燧石城”号，但这艘中立的美国船并没能保护他们。事实证明，他们经历的痛苦远远超过了那些在格拉斯哥登岸的生还者，因为“燧石城”号很快就被德国战舰“德意志土地”号征服，并被德军连人带船一齐掠到了摩尔曼斯克，后来又转往挪威，最终才得以获释。

这些个案以及其他一些最近发生的事件使杰克对于隐藏在冠冕堂皇的面具之下的国际法的真实面目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怀尔德教授的课上，他在就战时中立国导航员引导交战国船只通过其水域是否应被看作破坏中立一事进行的个案研究中，十分机智而又准备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他这篇还分析广播和航空问题的论文，怀尔德教授给了杰克一个B⁺的好成绩。当然，在他修改这篇论文及另一篇有关在交战区内，一国潜艇是否有权进攻向敌国运送弹药的中立国船只这个问题的论文

时，他绝对想不到，有朝一日他的学生竟会命令美国海军封锁古巴海域，将苏联和美国推向几乎爆发核战争的边缘。

正是鉴于杰克在学习《国际法》课程中的表现，怀尔德教授认为杰克毕业后可以继续“上法学院”。同样，鉴于“相信他确实拥有从理论角度进入深入思考的能力”，怀尔德教授非常相信杰克将来能够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尽管他曾一度钟爱小乔，但通过比较之后，怀尔德博士还是觉得这位做哥哥的“办事有些鲁莽。他不会花很多时间看书，也不像杰克那样喜欢深入讨论问题。”

当然，正如杰克的朋友里普·霍顿回忆的那样，如果杰克对什么感兴趣，他那强烈的好奇心就会一直驱使他，直到“完全吸引并掌握”那个主题为止。1939年秋杰克所做的大量笔记表明了当时他对国际法的浓厚兴趣。一方面，他喜欢思考国际法中的一些诡异惯例；另一方面，他又对国际政治中法律的重要性颇感兴趣。和平条约在国际法中真的具有约束力吗？国际法是否会承认诸如《凡尔赛条约》那样在被逼迫之下的协定？如果参与签约的国家中一些国家拒绝改变其中的条款，那另一些国家除了诉诸武力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途径可以获得好处呢——如果一旦诉诸武力，它所造成的后果便会受到国际法的承认。“一旦战争开始，它便是合法的。除此之外，这场战争结束后签定的条约也将是合法的。”杰克这样记道，并且还讽刺说，“按道理讲你不能偷马，但如果你真的偷了，那它也就合法地归你了。”

在弗莱德里奇教授的指导下，杰克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立宪民主制度及官僚主义也同样认真进行了思考，并取得了好成绩。尽管弗莱德里奇教授的一些思想还比较简单，不过

肯尼迪传

从总体而言，他的课还是让杰克对各种当代的世界政治制度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这正好与杰克的性格一致——对事物既热衷，又能扮演一个局外人的角色。

在好奇的同时，杰克还不时地针对共产主义进行一些讥讽。他注意到，斯大林一面“不断发表演讲，号召人民热爱祖国”，另一方面，却又对那些企图逃离这个可爱祖国的人疯狂地进行迫害——判死刑和没收财产。“俄国人民代表制性质的政府简直可笑极了，”杰克这样评价：

自从列宁去世之后，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这个政府已经变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掌权的官僚机制——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工农组织了。马克思在其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中没有提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坚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作为一种强制工具”“逐步消亡”，并且一旦一个国家的工业开始实现社会化，这一过程也就开始了。然而，俄国工业 10 多年前就已经实现社会化了，但这个国家机器没有减弱却变得比过去更加强大和蛮横。

现在的俄国并不是社会主义，它与其他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也存在着阶级……“莫斯科审判”证实，斯大林的政治生涯确实受到了托洛茨基的威胁。结果，每位被告都因为不可思议的诚实进行了检讨，然后他们都称托洛茨基是幕后主谋，并大力称颂斯大林，但随后，他们全都被拖出去判了死刑了。对此人们的解释是，可能斯大林曾经秘密地许诺这些人：如果他们表扬斯大林，并且谴责托洛茨基，他便宽恕他们——但后来他却又违反了自己的许诺。不管怎么说，每位被告在列宁统治下都曾经是热情洋

溢的布尔什维克，而他们的死亡则意味着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终结。

在布鲁斯·霍珀教授的帮助下，对这些事物的思考促使杰克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以及俄国共产主义进行了更深刻地分析。他认为，俄国的共产主义和德意的法西斯主义制度都代表着“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它们强迫个人服从集体。而个人自由和尊严正是西方十九世纪留下来的最宝贵的财富。”

尽管在一生中，杰克都是个勤奋的读者，但他此刻所研究的这些 20 世纪的各种“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民族主义，是他有生以来所进行过的最为专心的学习。温思罗普宿舍楼的看门人的妻子约瑟芬·富尔顿后来回忆当时杰克废寝忘食学习时的情景时说：

我不知道他在学校里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我去商店时经常碰见他从另一边走过来，手里捧满了书。很少会有人与他在一起，每次我都看见他手里捧着书在街上走，我常问他，“你的帽子呢？”他就是这个样子：上街不戴帽子，尽管那时天还下着雪呢。他总是很忙，从来没时间与别人聊天……只有当他接电话或打电话时我才会看见他与别人谈话。他的电话并不多，有一次他来打电话时我又问：“杰克，你的帽子呢？”

当时他身穿大衣，除了帽子之外其他的防寒衣物都很齐全，他回答说：“乔，我不能戴帽子。我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在春天，有时我们都已经睡觉了，才听到杰克回来的

肯尼迪传

声音。我们经常打开窗户，而他却习惯将窗户全部打开，所以我们能听到他的声音。他打字的声音会传得很远，是的，他自己打字。我老是对我丈夫说：“听，杰克回来了！”他经常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当时周围一片寂静，只有“滴滴答答”的打字声不时从他房内传出。

与大部分哈佛学生一样，杰克刚从伦敦回来时还是个坚定的孤立主义者。然而在 1939 年末的那几个月内，他的哈佛教授们取得了一项重大成果——引导思维敏捷的杰克·肯尼迪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席卷世界和欧洲的强权势力，同时对民主国家与这些霸权主义作斗争时的惨状进行更为深入地思考。在一篇长达 35 页的关于国联的论文中，杰克在回忆 1919 年到 1938 年英国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观点之争时，已能够分析出英国在两次大战之间政治上存有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差别。该文以表述英国没有对奥地利的灭亡说“不”，以及张伯伦在签署慕尼黑协定中表现出来的妥协，作为其高潮部分。英国政府“将危险地区局部化的政策意味着，她要将各国在 1914—1918 年四年中以 2 000 万人牺牲为代价换来的战斗成果拱手让给德国。”杰克尖锐地批评说，“无可否认，这项政策正是源自孤立主义。”

于是，杰克开始进一步分析这种孤立主义思想从何而来。

要不要竞选

杰克在他关于国联的论文中总结说，英国的保守党并没有认真地对待希特勒的威胁，他们是“一个有产阶级，自从俄国

变成布尔什维主义以来，英国保守党对俄国曾带有的同情心已荡然无存……对于共产主义入侵的担心对英国在国际事务上与俄国进行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并且，这种观点还使以洛瑟安爵士为代表的英国上层人物相信，“德国早日完成统一，早日填平其不满之心，希特勒就有可能早日垮台，欧洲也就能因此早日得以安定。”

“英国对付国联的政策，”杰克写道，“从国家眼前利益——国家的安定——及维护我们时代和平角度看，有其一定地道理；但从英国宣称它将维护的国际新秩序的角度来看，英国对国联所采取的政策，对弱小国家确实不公正，同时也辜负了那些国家人民寄予的期望。”尤其是捷克人，他们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日子里已经依稀看见了民主的曙光。

毫无疑问，杰克的同情心正与他父亲的想法越来越相反。他父亲于1939年12月7日请长假回美国，动身之前，他受到了英国国王的召见并被邀请共进午餐，那时苏联还没有攻打芬兰。在那次午餐上，他收到了国王送给他的临别赠言。约瑟夫·肯尼迪感觉到：

那天早晨的国王会开幕式中，查特菲尔德勋爵拿着皇冠的样子就像一个香烟女郎抱着烟缸，后来当我向国王问到此事时，他说，这不可能是真皇冠，因为它太大了。然而皇后却保证说这是真的皇冠。她说，因为它从温莎堡里被拿出来，而那里正是放置皇家珠宝的地方……国王看起来状态不佳，他瘦削的脸此刻拉得很长，而且说话也比平时更结巴。当晚的主菜是野兔肉，我尝了一小块。这时皇后注意到了我的犹豫，她说：“这是野兔肉，或许你不喜

肯尼迪传

欢它。但不论怎样，这是英国的传统风味，就像你们吃蟹一样。国王和我都吃不惯。有一次去吃饭时，就是那个经常自以为是的人不断劝我吃它，你知道我指的是谁——就是众议院议长。”

“是班克黑德吗？”我问道。

“对，”国王插进话来说，“你知道，他就是塔卢拉·班克黑德的父亲。”

“夫人，对不起，我确实不喜欢它。”我指着那兔肉说。

“你真是个诚实的人，”她笑道，“吃点野鸡怎么样？”

野鸡被端上来了，与它一起端上来的还有包子、甘蓝和土豆泥，我小心地尝了一点儿，随后我们就很自然地谈起了美国和战争。

当肯尼迪表示反对美国加入时，皇后说：“我早就料到你会这样说。”

国王问起了罗斯福，想了解他是否会参与竞选第三任总统。“我无法给他一个确定的答案，”肯尼迪讲，“那天下午很严肃的谈话并没有什么，但我感觉，在这次谈话中却有种与以往不同的论调。国王夫妇都清楚，英国正在尽力为其前途命运而战，为维护大英帝国而战，而他们能否保住王位也将直接取决于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结果。”

肯尼迪的这种评论有些不恰当。事实上，国王乔治六世并不在乎他的王位，而且他在继承哥哥爱德华八世的王位时，也没有人征求过他本人的意见。如果他希望保住王位的话，只要向希特勒投降便能实现这一点，而不必支持政府参战，并经受

战争的考验。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乔治国王才担心他的哥哥爱德华回来。爱德华夫妇曾拜访过希特勒并对纳粹表示同情。第二天，为了使约瑟夫·肯尼迪更加清楚地看到英国皇室的决心，他专门写信给这位美国大使，向他正式表态，英国皇室反对温莎公爵的观点，并坚决支持政府及国会在这场战争进行到底。“在我看来，美国、大英帝国和法国是世界上三个真正拥有自由民主的国家。而今，其中有两个国家正在与我们共同痛恨的一切——希特勒以及纳粹政权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切——进行斗争……不论结果怎样，大英帝国决心已定，而我也乐于如此。”

对此，肯尼迪大使作了嘲讽地回答：“与大英帝国人民一样，美国人民也痛恨战争，他们正满怀同情地关注着贵国政府为和平解决这个已经升级为公开冲突的灾难性问题所作的努力。美国人民认为，我们应维护和平——除非我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他们相信大英帝国人民也一样，只有在生死存亡关头会奋起战斗。”他只字不提波兰的亡国命运及英国迟迟才作出的决定，反而认为，“鉴于上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美国人民必然会尽量避免卷入欧洲战争。”

此时，这位以买空卖空手段而在华尔街立足的投机商再次开始了大甩卖。在离开伦敦之前，肯尼迪到海军部访问了邱吉尔。邱吉尔的预言是：“未来的世界将由美国、英国、俄国和日本控制。”当时这些国家中只有英国正处于战争状态，故此肯尼迪对邱吉尔的预言不屑一顾，可能邱吉尔是正确的，“但那不是当今世界的阵容组合。”此后他动身途经里斯本和巴黎回到了美国——路上他一直都在考虑回去以后是否参加总统提名的竞选。

肯尼迪传

作为第一位卸任回国的美国大使，肯尼迪在华盛顿港被一大群记者团团围住。他们不仅想了解他对欧洲形势的预测，而且想了解他本人的政治计划。然而肯尼迪也需要了解罗斯福以及其他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的计划。于是他只得言不由衷地表示支持罗斯福第三次竞选连任，从而应付了记者们的提问。在与家人团聚了一天之后——这是他这一年中第一次见到家人——他便匆忙赶往华盛顿会见罗斯福。

“总统与我约的时间很早——早晨9点。在经过一夜旅途的颠簸之后，我几乎还没来得及稍加梳洗便被带进了他的卧室。他坐在床上一边吃早餐，一边用一个玻璃器皿给自己冲咖啡。他看上去很疲惫……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向他谈了我对欧洲战争的意见。他听后认为总体形势‘不太乐观’。我表示同意，在我看来，局势就是这样……然后我又谈到了我对记者说，我支持他参加竞选。对此，他表示说：‘不，我不能这样做，我们还是以后再谈这个话题吧。’”

肯尼迪已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但如果罗斯福不去参加竞选的话，那谁将会出来竞选呢？肯尼迪立刻赶往国务院对国务卿赫尔进行了试探，“令我触动的是，他并不完全支持罗斯福身边的人参加总统竞选。我说到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时提及了他的名字，他未作明确表示，但给我的感觉却是，他也想参加总统大选。”

那天，后来肯尼迪又返回白宫再次试探罗斯福：“您对第三次竞选连任总统究竟有何打算？”他问道，“您必须参加竞选！”他却回答说：“乔，我累了，我已经受不了了……除非我们参战，否则我不会去竞选第三任。”由于突然想起他是在跟肯尼迪——一位绥靖政策的拥护者讲话，于是总统又迅速补充

了一句，“不过即使那时，我也绝不会派援军过去，我们将帮助他们——向他们提供物资援助。”

肯尼迪接着追问了总统提名赫尔为候选人的可能性有多大，罗斯福认为他办事繁琐，因此不会考虑他。

“如果您不看好赫尔，那么，您认为谁比较好呢？”肯尼迪继续问道。

“有很多，”罗斯福回答说，“我们年轻的人才多于英国。卡默迪很会办事，麦克纳特也很有进取心……还有哈瑞·霍普金斯，他的体重已经增加了16磅，尽管有过梅奥的预言，不过他并没有得癌症。还有弗兰克·墨菲……还有鲍勃·杰克森，他是个好人，而且很有能力。”另外罗斯福还夸奖了比尔·道格拉斯，最后，他终于说到了肯尼迪，“我们至少还有你。”

这正是肯尼迪一直在寻求的答案。但如果总统真的认为肯尼迪是民主党比较理想的总统候选人之一，那他又为何“与邱吉尔进行私下联系呢？”肯尼迪问，对于总统曾使用过他无法解开的海军密码以及外交邮袋中的密封信件与邱吉尔联络一事，他仍难以忘记。他的提问引起了罗斯福对邱吉尔一成不变的评价：“自从1918年出访英国以来，我一直都不喜欢他。在我参加过的一次宴会中，他的表现令人厌烦，处处想压过我们。后来布肯海德制止了他，并让他有些收敛。”但是，紧接着罗斯福又补充说，“我之所以现在要关注他，那是因为他也许会是未来的英国首相，现在我必须要有所准备。我非常愿意尽力帮助英国，但我可不愿让他们把我当笨蛋来耍。到时候，所有努力都会得到回报的。”肯尼迪立即意识到，这些话绝非一个打算从白宫退休的人应该说的。

肯尼迪不由警惕了起来。如果邱吉尔成为首相的话，他将

肯尼迪传

会尽可能地说服美国加入同盟。后来肯尼迪的确声称，在得知邱吉尔——罗斯福之间有私下的联络之后，他曾在日记中记道：“我就是不相信他。他经常会给我这样的印象：只要能劝服美国加入战争，他甚至会炸掉美国大使馆，然后指责是德国人所为。”

肯尼迪同样也不信任罗斯福，尽管罗斯福临别时还对他说：“既然回来了就好好休息。”肯尼迪却匆忙赶到学校，在那儿他见到了杰克和小乔，并告诉他们，如果罗斯福不竞选总统的话，他可能会去竞选。接着，他就开始准备发表首次竞选演讲。对这个决定，杰克心中忐忑不安。

收集资料

“我的讲话是即席之作，”肯尼迪后来回忆他在东波士顿古老的教堂中所发表的那次演讲时说，“我重申了在机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我所发表的观点。我指出，美国正直的天性会使她自然地憎恶不道德和不公平的事情。但这并不是美国的战争，我们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或社会的理由支持美国卷入这场战争。‘你们热爱美国，’我对听众说，‘无论什么时候，不要让其他国家的任何事情使你们认为，通过参战你们能让局势有所好转。’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捞不到什么好处，如果让美国参战，形势可能会比现在更加糟糕。”

作为美国政府驻英国的官方代表，这次演讲当然颇有分量，而他并没有事先征求国务院意见，便擅自发表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他这个人向来有些蛮横专断，而且他也正打算趁机试探一下当时的政治空气。日后肯尼迪承认说，罗斯福“曾

表示，我应在圣诞节之后尽快地赶回伦敦。”为了拖延日期，他买通了波士顿的家庭医生莱希作了一份报告寄给罗斯福总统。该报告要求“我至少还要休息两个月才能返回英国”。带着莱希医生的证明书，肯尼迪前往棕榈滩，在那里，就像去年冬季一样，他身边围绕着谋士、绥靖主义者、顾问、老朋友以阿瑟·克罗克、比尔·道格拉斯和洛瑟恩勋爵以及萨默纳·威尔士等各方人士。“尽管我对记者明确表示打算支持罗斯福竞选第三任总统，”后来肯尼迪坦率地承认，“但总统犹豫不决的讲话却使新闻舆论将注意力逐渐转向了民主党内其他有望竞选总统的人选。”

正在棕榈滩与家人共度圣诞节的杰克，又一次陷入了父亲及其那些绥靖主义友人失败主义论调的包围之中。不过，此时正赶上杰克准备深入分析英国绥靖政策，英国大使洛瑟恩勋爵的出现在他看来是难得的好机会。尤其是洛瑟恩勋爵还进一步表示，如果杰克在回哈佛的过程中愿意顺便拜访英国大使的话，他会为他提供进一步帮助。

洛瑟恩在布利克林大厅中举行的一系列家庭聚会能与 20 世纪 30 年代阿斯特夫人在克莱夫恩为广泛传播孤立主义政策及亲德思想而举办的聚会相媲美。杰克应邀在那时找到了他，他当然会尽力地为杰克描述英国绥靖政策。“我们去年 11 月进行的那番谈话使我开始着手准备论文写作。”杰克后来致信给洛瑟恩勋爵向他表示感谢，“我非常感谢那时您对我的帮助。”

聆听了洛瑟恩对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主要人物的评价，杰克回到哈佛之后很快就投入到了他的论文写作之中。他决定向世人说明这个号称拥有举世无双的海军部队、一度被称为“世界强国之最”的帝国，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衰退到了连

肯尼迪传

生存都无法保证的地步。

尽管日后有些评论家将个人动机、甚至“家庭阴谋”强加在杰克四年级的毕业论文上，但事实上，自从动手写论文以来，杰克一点都未受其父兄的影响，甚至连哈佛教授们给予他的指导也极其有限，因为当时哈佛围绕着副教授职称的评定正进行着一场硝烟弥漫的战斗。正如霍珀后来回忆的那样，杰克却“利用这一机会独自写他的论文”。“这是他自己努力的成果，”后来霍珀教授解释说，“我在文字方面的修改并不多，只要要求他以‘准确’的史料为依据。”——遗憾的是哈佛大学的威德纳图书馆根本无法满足杰克的需要。因此，1940年1月11日，杰克匆忙给父亲在伦敦的秘书詹姆士·西摩发了封电报：

请速寄关于自由党、保守党、工党以及反战组织的宣传材料，以备我在撰写有关1932至1939年间影响英国绥靖主义政策的论文作参考。建议征求拉斯基的看法。参考资料有《曼彻斯特卫报》、《泰晤士报》及《英国议会记录》。多谢。

杰克·肯尼迪。

尽管此时英国已经卷入了战争，伦敦也已经开始实行灯火管理制度，西摩收到电报后还是立刻行动了起来，他从美国大使馆给杰克回电说：“正在准备材料，祝好。”然后又马上给正肯辛顿的拉斯基发过去一份电报：

方便时请速来电话，美国使馆负责人 4111，大使儿

子需要帮忙。

在英国，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人，对于西摩的要求，他们都愿尽力照办，并毫不怀疑杰克的兴趣和看法。当时，美国的援助对于英国来说至关重要，他们都愿意讨好这位目前尚未返回伦敦的美国驻英国的官方代表。1月11日西摩给杰克加信说：“你父亲曾要求我帮你积累资料，不过你的电报让我可以不必去复印那些你已经有的资料，如《英国议会纪事录》等。关于这个研究课题，工党、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有关组织已向我承诺，表示愿意帮助……工党组织还告诉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里藏有他们发行刊物的全部卷宗。另外阿瑟·格林伍德也即将出版一本书，书中约有一章左右的内容专门分析‘绥靖’问题。”西摩答应与出版商核对之后马上把它寄出。

我正在向牛津大学出版社和查塔姆出版社进行咨询。牛津大学出版社最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和书籍，查塔姆出版社许诺将马上给我答复。牛津大学出版社已迁至牛津。同时，伦敦经济学院已迁至剑桥。不过，我还是利用电话找到了拉斯基，他……向我推荐了E·H·卡尔的一本关于英国外交政策的书。他说该书包括了最近10年内发生的大事，有较强的阅读和参考价值。我已经订购了这本书——另外还有两本或许也有价值的书——可能我明天就能拿到。拉斯基还答应我，他会再想想是否还有其他有价值的资料，过几天告诉我，我会经常与他联系的。此外，我还请几个书商向其他出版社进行咨询。同时，我将到英国博物馆阅览室看看是否有关于此类问题的书籍。

肯尼迪传

西摩的工作是非常有作用的，而拉斯基也帮了很大的忙。在杰克之前，没人对英国绥靖主义行为的根源及其推行过程进行过如此详细的调查。拉斯基除了向西摩推荐卡尔即将出版的那本关于英国外交政策的书以外，一周之后，他给西摩的信中又提出，“经考虑，在‘反绥靖实例’方面，还有两本书对杰克很有价值：治安维持会的《对和平的裁决》和《通向战争之路》。这两本书资料很不错。”

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来说，战争的爆发太突然了，他们谁也不想花时间去思考和平是如何丧失的。然而对美国人来说，英国从孤立主义走向干涉主义的转变却与他们有着惊人的联系。从这点上讲，正是谦逊而朴实的詹姆士·西摩帮助杰克把他那篇原本普普通通的优等生论文变成了一篇有学术价值与创意的作品。西摩于1913年—191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他是个热心人，曾在哈佛担任管理员职务，然后又曾校对过约瑟夫·肯尼迪的《电影轶事》。在加入肯尼迪大使在伦敦的工作小组以前，他还在好莱坞当过导演、编剧和制片人。

西摩为人沉着、勇敢、敏感，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荣获法国十字勋章。他爱好诗歌、戏剧和艺术。他不仅在伦敦经历过德国的空袭，而且还在这里度过了后半生。“寒冷和浓雾似乎没有‘改变’这里的灯火管理制度。”他给杰克写信说：

此时此地，伦敦真的成了个特殊的地方，它美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竟能有机会在空旷的大街上行走，真是难得——月光为它增色不少……这里的人民带有非常令人敬佩的精神——坚定、果断、勇敢。我感到，尽力争取胜利是

他们惟一能够接受的目标，他们为此已作好准备，即使面对千辛万苦，也没关系。

或许你比我更了解世界局势是什么样子，但你或许并不知道：我真地非常想念你，这是我的真心话。祝你好运，希望再见面之前我能收到你的来信。

你永远的朋友，吉姆。

令人讨厌的怪人

肯尼迪在波士顿的讲话已经在英国新闻媒界引起了不小的震惊。这使得英国的外交界和社交界很快都在传言：美国大使预言英国将会被希特勒打得“落花流水”；他已建议罗斯福总统考虑重新与希特勒举行和谈；甚至还说，只有罗斯福答应让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他才会支持这位总统的竞选连任。这些传言促使伦敦外交部专门负责美国事务的顾问作了如下记录：“肯尼迪先生是位非常令人讨厌的怪人——背叛者和失败主义论调者。除赚钱以外他对任何事情漠不关心，我希望在这场战争中，像他这种人最终会消失殆尽。我们应当把他赶回美国去。这样以来，人们才会真正了解他的真正价值。”

然而肯尼迪会回伦敦吗？这主要取决于罗斯福总统的安排，从另一方面说，这当然也与邮政部长詹姆·法利有关系。后来肯尼迪解释说：

立志要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邮政部长法利成了罗斯福竞选三度连任的最有力的对手。法利极力宣传反对三次连任，企图以此挑起公众反对罗斯福的情绪高潮，从而

肯尼迪传

使这位总统在即将要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不可能再次获得提名……为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争取到多数代表的支持，法利2月初参加了在马萨诸塞州的总统初选。2月10日法利参加马萨诸塞初选一事，促使公众要求我竞选总统的呼声越来越高。鉴于公众的要求，我于2月13日清早宣布，将在当天晚上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

肯尼迪的表弟乔·凯恩已经准备好了肯尼迪参加马萨诸塞州候选人竞选的提名文件。但在事先没有了解罗斯福的安排前，精明的肯尼迪是不会草率出马的。于是，他立即赶赴华盛顿再次会见总统。令肯尼迪非常惊讶的是，罗斯福自己先跟他说起了马萨诸塞州的情况：“你为什么不参加马萨诸塞州的竞选呢？”罗斯福说，“你肯定能轻而易举地胜过吉姆。不管怎么说，在你的家乡他向你挑战是不明智的。”

这番话不禁令肯尼迪感到有些为难。一方面，从他本意讲他有意参加竞选；但另一方面，在波士顿他的表弟提醒他，如果他要与罗斯福针锋相对的话，他将永远得不到民主党的认可——从而使他所有的政治追求都将成为泡影。因此，现在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取决于罗斯福。“但我知道，他本人也在为是否竞选第三次连任而犹豫不定。”肯尼迪说。

事实证明，这种迟疑的态度正是罗斯福的高明所在。与赫尔和其他潜在的竞选对手们一样，肯尼迪也完全被罗斯福玩弄于股掌之中。后来肯尼迪回忆说，“法利试图逼迫总统就是否参选一事进行表态，并强迫他退出政治舞台的这种做法显然使他很恼火。”如果肯尼迪真像罗斯福建议的那样，与法利竞争的话，他失败的可能性也很大。“他的话令我颇感惊讶，但我

没有说什么，只是坦言相告我并不打算参加竞选。”在那天下午预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极不情愿地当场宣布，鉴于目前状况，他将不参与竞选总统候选人，并将尽快返回伦敦开始工作。

他这样选择得正是时候。1940年2月24日，他乘“曼哈顿”号从纽约前往热那亚。当时克莱尔·布思·卢斯正好乘坐这艘船，据说后来她与肯尼迪双双坠入了情网。

“她言谈的欢快与大海和天空的阴暗形成了鲜明对比。”肯尼迪回忆说。由于相信肯尼迪有关纳粹将在战争中获胜这一预言，克莱尔对她丈夫——《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出版商——不断地施加影响，要求该杂志呼吁美国政府尽快将肯尼迪召回国内，如果有可能的话甚至还要让他到新兴的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处帮忙。

然而肯尼迪的辉煌正在迅速远去。当欧洲战争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他竟离开工作岗位长达三个月之久，所以，当这位失落的竞选者离开美国时，国务院已经对他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更糟糕的是，由于他在美国期间曾说了不少对英国不利的话，因而他即将返回的英国对他也已经很不欢迎了。英国保守党议员哈罗德·尼克森在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在外交部，范西塔特“对约瑟夫·肯尼迪的归来十分担忧。他表示，肯尼迪在美国时到处宣称我们必定会战败，并且声称他会利用他在此地的影响推动谈判，他将会因此得到昔日那些绥靖主义者的协助。”《观察报》对肯尼迪进行了一番以往任何美国大使从未受过的最为尖锐的攻击：“当然，他将会受到孤立主义者和银行家们的欢迎；将会受到骑士和爵士们的欢迎；将会受到伦敦贵族中那些胆小的女人和白厅内那些怕事之徒的欢迎；将

肯尼迪传

会受到求和同盟、基督教反战人士及布克曼博士忠实信徒们的欢迎；另外欢迎他的人还将包括冯·里宾特洛甫、慕尼黑党徒、纽伦堡党徒、塔维斯托克勋爵及前亲纳粹组织的残余力量……很少有大使在回到自己工作岗位时，需要面对如此众多令人厌恶的人。”

肯尼迪大使已经充分意识到，英国对他的直言不讳肯定会做出类似的反应。在从意大利开往巴黎的列车上，他恰好遇见了罗斯福派往欧洲的真相调查特使萨姆纳·威尔士。肯尼迪竟然劝说威尔士要将那些主张与希特勒斗争的人——而不是将希特勒本人——看成好战分子。更令人吃惊的是，当他抵达英国的赫斯特时，面对众多英国记者，他仍然毫无顾忌，仍大肆宣扬他在美国的那番言论，说道：“我相信，这些话正确反应了当时美国人的想法，但英国媒体却不能接受这些想法。”他继续说，“事实上，英国媒体也对我进行了大肆攻击。贝弗里·巴克斯特在《星期日画报》上……痛斥我没有向美国公民大力宣扬英国在这场战争中的目的。其他人的指责与巴克斯特差不多。这些情况都表明：无论是官方人士还是非官方人士，他们对我的反感在与日俱增，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美国参战。”

此刻，连一度对肯尼迪非常支持的托南希·阿斯特也开始对他的言论表示不满。当肯尼迪声称“如果盟国能找到这样一项和平政策，它既能给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一个很好的交待，又能为欧洲赢得安全，那么即使希特勒以此向他的人民炫耀其丰功伟绩，那又何必反对呢？从这些情况来看，我真不知道战争为何还不停止。”听了这些言论，甚至连张伯伦也有些不解。

身为美国大使，肯尼迪却对这些“事实”——尤其是希特勒计划当时在西线发动一次大规模军事进攻的认识——竟如此

天真无知，这实在是令人吃惊。不出肯尼迪所料，他的大使馆真的成了那些妄想与希特勒重归于好的求和派人士，如巴克卢公爵及塔维斯托克勋爵之流在伦敦高谈阔论的阵地。当萨姆纳·威尔士到达英国时，肯尼迪坚持要求陪他参加每次会谈和会议。在第二次与张伯伦及哈利·法克斯见面时，肯尼迪自以为察觉到张伯伦在宣布拒绝与德国纳粹谈判时，其言辞之中颇有些犹豫：“在我看来，张伯伦说‘是’时，似乎信念并不坚定。于是我插话说：‘我认为，如果世人相信，这些谈判能使战争得以避免、安全得以实现，并且为世界带来永久与稳定的和平，那英国政府的这种观点就会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你也表示同意，那我本人仍会带头反对张伯伦政府。’”

可笑的是，肯尼迪现在已经变得比张伯伦更加推崇绥靖政策了。然而，在肯尼迪为威尔士介绍政府中那群“胆小的官员”的过程中，与温斯顿·丘吉尔在海军部办公大楼的见面却为肯尼迪的工作划上了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句号。

“我们被通知去他的办公室。”肯尼迪叙述说：

邱吉尔嘴上叼着雪茄，身旁放着一杯白兰地，正坐在火炉前的一把大椅子上看报纸。他问我们想喝些什么，我们谢绝了。他表达自己观点时既有把握又很坚定。“不在军事上打败德国，根本就无法实现和平；除此之外，一旦德国战败，它的武装必定解除……我们将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他说，“但是，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这也是恢复人类文明的惟一希望。”在谈及德国及其罪恶行径时，邱吉尔滔滔不绝，他将纳粹政府描绘成一只“仇恨和恐怖生下的怪物”。在回忆起英国和上次世界大战时，他说，“一

肯尼迪传

旦胜利者健忘，失败者便会图谋不轨。”他的听众虽然只有我和威尔士两个人，但他的夸张手势和强烈语气却好像面对着无数人演讲……回去的路上，威尔士在多切斯特下了车。一路上我们很少交谈，因为实在不知道该谈什么。

当时邱吉尔离正式成为首相只剩下几周时间，而在英国备受冷落、在美国又不为国务院重视的肯尼迪大使，数月之后便辞去了他的职务，悄然离去。

查理国王

此时，大使秘书詹姆士·西摩仍在为杰克·肯尼迪努力地搜集英国近来出版的关于英国两次大战期间外交政策的书籍，其中包括赫恩肖、卡尔、西顿—沃森、马金托奇、盖索恩—哈迪、邱吉尔、弗朗西斯、艾顿甚至张伯伦等人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然而杰克真正需要的是表现这些岁月中英国的孤立主义者、反战主义者以及绥靖主义集团观点的材料。杰克将通过这些材料来回顾英国人头脑中曾经进行过的思想斗争——因为如今的美国人也在与英国人一样进行着思想斗争。1月30日，他再次给西摩发了份电报：

请速寄 1932—1938 年的《自由劳工》。如找不到，务必寄保守党议长 1932 年以来的言论摘要，其他相关材料也可。多谢，杰克·肯尼迪。

此后，外交邮袋便经常会鼓鼓囊囊地装满了像《保守党拾

遗》、《政论回顾》及《备忘录》等 30 年代杂志。所有这些杂志都以肯尼迪大使的名义被寄到肯尼迪在纽约的私人办公室里，然后再从那里被转寄给哈佛的杰克。由于这篇论文必须在 3 月底之前完成，目前杰克正在争分夺秒地写论文。2 月 8 日，西摩在给肯尼迪大使在纽约私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鲍尔·墨菲的快件信中写道：“收到后请尽快给华盛顿的国务院邮政室打电话，告诉他们在收到的外交邮袋中，有 6 件上面标明大使地址并要求由你转交的东西已经寄到，请他们给你尽快寄来。”

杰克的需要仍没有停止。2 月 9 日他又发了封电报：

速寄反战主义资料及剑桥、牛津学生会报告、议长言论摘要等，以及与外交政策有关的各党商务报告及其他资料，向托尼及您本人问好。

“亲爱的杰克，你在电报中所要的东西越来越难找了。”西摩在回信中略带怨气说道。他已找到了一大堆反战联盟的宣传手册，并且已经订购了剑桥和牛津学生会的报告。他甚至还弄到了张伯伦本人亲笔题名的《为和平而斗争》一书。1940 年 2 月 27 日，又有 22 本关于反战联盟的宣传手册和书籍从伦敦途经华盛顿空运到纽约，然后又被转寄到了哈佛大学。

尽管关于副教授职称的评定斗争十分激烈，杰克的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却仍然十分重视杰克的论文。佩森教授回忆说：“他先试写了一些章节，然后交给我看。除了一些小毛病以外，我不记得有什么问题。我经常对他说：‘在这上面不要拖太久，你必须在 4 月 1 日之前完成。’反正是诸如此类的话。我记得，他对一些问题钻得过细。反正是布鲁斯·霍珀和我都说：‘嗯，

肯尼迪传

可以了，杰克。你不可能把每一点都论述得非常透彻！”

霍尔库姆教授后来认为，他本人对杰克的这篇论文“并没有帮上什么忙”，但“杰克的头脑灵活和刻苦用功”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随着这项工作的深入进行，它们越来越明显。杰克一旦将注意力集中到学业上，就能显示出他的平凡想象力和创新才能。”

布鲁斯·霍珀回忆说，杰克首先是“缓慢地起步”，“然后从三年级时开始崭露头角”，此后又“迅速成长起来”——尤其是当他从伦敦旅行归来之后。这篇论文是“杰克自己的看法”，它绝没有附和霍珀的观点——因为霍珀是位忠实的反纳粹和干涉主义者。他回忆说：“我无法做到公正，”因而“对这篇论文中的部分内容提出了异议。”

杰克的一些朋友也不同意这篇论文的观点，其中包括吉米·鲁斯马尼埃。实际上，施佩俱乐部已经成了他与支持美国孤立主义的《猩红报》编辑布莱尔·克拉克及赞成美国干涉主义的鲁斯马尼埃进行辩论的固定地点。“那时我在政治方面非常活跃。”鲁斯马尼埃回忆说，“我们曾专门为探讨干涉主义的问题逃了不少课……我们常进行深入的讨论。”

尽管与施佩俱乐部同学们或导师的探讨使杰克加深了对围绕美国中立问题的言辞——合法性、经济、政治和道义等的理解，但他们却都没能对杰克的论文产生任何影响。在文中，他完全控制着自己的思想，并收集了大量大西洋彼岸那些鲜为人知的辩论记录——它们曾吸引了 30 年代英国众多宗教领袖、政治家、学生、作家以及选民的注意力。而今，杰克决定证明，30 年代英国国会外交政策的犹豫不决并非完全是政治领袖的错误，它更源于 20 年代以来广泛流传、并已扎根于大众

心中的反战主义的影响力。而今，美国也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昔日的英国领导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导地位，只得被迫顺应民心而不敢改变这种影响力，目前，美国的政治领袖们也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在霍珀这种好战分子看来，这是一个模糊的观点，它只是为了迎合给论文评分的两位教授的口味。事实上，杰克却是故意在论文中阐述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历史真理。他不但没有应和父亲绥靖主义的观点，而且希望自己能以一名历史学家的真正身份，论述这种情况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这一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客观立场对一位年仅 22 岁的青年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

后来鲁斯马尼埃回忆说：“我们过去经常拿他的论文开玩笑。”在施佩俱乐部里“有一个阅览室，墙上挂着一些人物画像——杰克过去就常在那里学习。不知杰克在那里有个打字工总替他打稿子。我不知他用的是什么办法，但那位打字员常把稿子送到施佩俱乐部。然后由服务生将稿子转交给杰克。他经常在施佩俱乐部里审阅稿子——开始是他的学期论文稿，后来是他的毕业论文稿。我们老是嘲笑他：‘你的书进展得怎样了，杰克？’其实，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过它将来真会出版成书，只是经常看到这些稿子被一名没见过的打字工送过来。”

“他写这篇论文时我和他认识吗？当然了，我们还常拿他开玩笑呢！”卡姆·纽伯里笑着回忆说，“那时候，杰克每时每刻看他那篇了不起的论文，像看查理国王的头一样，我们常拿这件事和他开玩笑，后来厌烦得连听都不愿听他谈起他的论文，我想，他意识到后就闭口不谈它了。”

有生以来第一次，杰克真正投入了一项课题研究之中。那

肯尼迪传

些不了解他的人，以及那些嫉妒他如此年轻便能以自己的论文博得盛誉的人，都断言这篇论文是由别人代写的，或是得到专家们的专门指导。奥古斯塔斯·索尔就是怀疑者之一。索尔回忆说：“有人说，杰克在自己的论文上从未亲自写过一个字，完全是由英国那边的人代写的——他父亲当时是美国驻英大使，想找人替杰克写论文非常容易。”索尔认为这些传言是“无风不起浪”，尽管不知道传播这种说法的人是否“出于嫉妒，不过当时的确有很多人都这么认为。我曾写过一篇论文，花了我好长时间。但我认为杰克不会花费精力去这样做——因为依我看，杰克并不是那种专心致志做事的人。”

在随后几年内，这样的谣言越来越多。一定意义上说，这些谣言也反映了大多数拥有良好社会背景的新英格兰人对肯尼迪大使的极端不满。“我认为哈佛人非常傲慢——简直到了极点，”索尔承认，“而且门第观念非常强……我敢保证，杰克是那时候走进施佩俱乐部或任何这种俱乐部惟一的天主教徒——而且还是惟一具有爱尔兰血统的天主教徒——至今人们仍不知道他如何成功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这篇论文——包括里面每个字，都确实出自杰克之手。泰德·里尔登是小乔在哈佛的室友，他证明了这一点。“我记得，”泰德·里尔登回忆说，“毕业后，我曾接到过杰克一个电话，当时他正忙着写这篇论文……他打电话过来说‘泰德，你是学英语的，过来帮一下忙好吗？帮我看看论文’，于是我便过去帮他看了看他的那篇论文，并帮他在文法上作了一些改动——但我记得曾对他说：‘老天！我必须把这些东西全部看完吗？你什么时候要交上去，明天？’”

杰克给他的论文最后命名为“慕尼黑之绥靖”，副标题为

“英国民主政府在从裁军政策向军备重组政策转变过程中由于动作缓慢所导致的结果”。在信上，杰克向父亲解释说：“这篇论文本来准备写 70 页左右，但最后却超过了计划，长达 150 页。”杰克坦诚地告诉父亲。同时，他十分感激在过去几个月内在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予他的大力支持，“我很想知道您对这篇论文的看法，因为它是至今为止我最重要的一项成绩。”而事实上，他父亲对此文的贡献只是简单回了一封电报：“非常感谢你的电报，我将把它写进文章中。”

对于一位大学生来说，这篇论文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杰克在文中参考了 50 多本英美书籍，其中一半以上都是近两年才出版的新书。他 1940 年 1 月才开始写作，并且 2 月份和 3 月初还仍不断搜集各种宣传手册和参考书籍，而他居然能在 3 月 15 日之前就写完了这篇长达 147 页的论文，这不能不说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在论文的序言中，杰克解释了他撰写此文的目的：

在民主制国家与法西斯国家的斗争中，慕尼黑谈判被视为一起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别会议。但许多为慕尼黑谈判奠定基础的判断和政治事实却一直受到政治情感迷雾的蒙蔽。这份协议签定以后的几年中，尤其在美国，似乎赞成这一协定就是支持希特勒和法西斯，而反对的就是支持民主和自由。

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 9 月份欧洲大战的爆发，围绕慕尼黑谈判的辩论比以前已经少了许多，但这个主题却依然是颗“定时炸弹”。没有任何其他主题能像它那样引起专家们和普通公众如此激烈的争议。目前许多文件和报

肯尼迪传

告仍属机密，在它们被公开之前，我们根本无法了解它的全部情况。

与此同时，杰克希望自己能对英国这番既缓慢而又痛苦的转变过程深入地进行冷静的分析。否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这在“大多数英国人的基本信念”中是一次伟大的“革命”。所以，他认为将英国对战争的准备不充分归咎于慕尼黑协定或张伯伦的前任首相史丹利·鲍德温并不公平。因为作为一个由热爱和平的人民所建立的民主国家，它的“内在本性”将使英国这样一个深受孤立主义思想影响的国家很难——如果如果还有可能的话——与德国那样一个已经被公认为战败国的中欧国家开展军备竞赛。

通过回顾英国在裁军和反战方面的历史过程——并以国防军火的统计数字作为依据——杰克的论文几乎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前便已为美国人描述了一段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虽然，他在文中有不少拼写、句法和语法错误，语气也带有不成熟的幼稚，但这篇经过缜密研究而完成的论文仍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它总体上反映了作者对此事真正的关注和好奇。

在杰克一生所写的作品中，这篇论文最能说明他的性格特点。“慕尼黑之绥靖”一文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只有在核对事实论据的基础上才有资格进行历史性评论，而这都要归功于杰克在哈佛政治学课上所接受的教育。在英国，民主政府内在本性所受到的束缚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1933年10月的伊斯特·富勒姆参与补选时，英国前首相史丹利·鲍德温对于“通过制定国际协议实现和平”并不赞成。但是，杰克指出，他不得不写信给保守党候选人，表示要“人民最为强

烈的要求……”为确保竞选成功，他不得不写了这封信。这一事实表明，此时的不列颠民族完全处于反战主义的影响之下。回顾这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反战主义产生的影响程度之深，令我们现在都很难理解。

在这篇慕尼黑协定之前关于英国绥靖政策情况的论述中，体现了杰克不偏不倚的政治现实主义风格。尽管风格还不成熟，但杰克对历史的这种思考却体现了他的正直诚实。他长篇引述鲍德温 1936 年在国会发表的那篇著名的自责演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 1940 年罗斯福与美国面临的问题：“假设我在 1933 年的大选中说，德国正在准备发动战争，所以我们也必须重整军备。难道说完之后会有人相信，像英国这样一个弥漫着强烈的反战情绪的民主国家会团结起来响应这种号召吗？依我看，如果真是这样，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在这次大选中失败得很惨。”

杰克写道：

在分析这篇讲话时，我既不想对他进行批评，也不想为他辩护。我只想了解他的真实意图……通过思考他的一些讲话及其批评家和朋友们的评论，我认为，无疑鲍德温是位擅长制定政治策略之人……他不但把大选作为测试现代民主国家公众意见的最佳标准，而且还努力证明：对于这个多年来一直深受反战主义情绪影响的国家来说，要在这里获得有利于重整军备的支持是不可能的。通过调查研究，我觉得他这种说法是对的。他只是因为言辞过于激烈才招致各方的猛烈攻击。不过，对我们来说，能够得出他的真实意图才是最重要的……它是这篇论文中非常重要的

肯尼迪传

一点，我已经对它进行了详实的论述。

借助英国国会及各种民间组织的辩论记录，杰克用了大约 100 页的篇幅详细记录了英国人民如何不情愿却又迫不得已一步步迈向 1936 年重整军备这一进程。“鲍德温的讲话很大程度上导致英国大众没能及时将重整军备之罪推给他一人。不过我认为将所有过失归咎于他一人，这不仅有些偏颇，而且有失公道。推卸责任当然容易，不过，本文是想说明，英国重整军备时行动缓慢并非鲍德温一人之过，而是英国全体公众思想转变迟缓所导致的后果。我相信的确鲍德温有错误，”他承认，“而且我会把这些错误指出来。但我觉得，如果人们将英国整个在重整军备上的失败都归咎于一个人‘想赢得一次大选’，并打算以此蒙混过关的话，那英国的经验所具有的价值就会彻底消失。”

甚至连肯尼迪也没有看出这一点，他对这篇论文的看法与大部分读者的看法一致，认为杰克是在先为鲍德温、继而是为张伯伦“进行责任开脱”。但杰克的目的却是要从一个处于独裁时代的民主政权核心深处获取一个宝贵的教训。杰克写道：“培养一名士兵需要一吨半装备和机械，而建构一个生产这些机械装备的工业体系却需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我们从这里便可看出民主制度存在的弊端。她一切费用都必须得按照预算，同时还要受资本主义的供求关系限制。因此，长期存在一支庞大的防卫军队势必导致经济崩溃，并将促使集权主义滋生。然而，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又意味着民主国家将处于受人欺侮的地步。看起来，解决这个矛盾似乎并不容易——而且现在的确还没找到能够解决的办法，可以说它的前景不容乐观。”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再自负了。”杰克最后谈到英国的历史教训时说，“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局势的不利局面”，而不要凭借财富来炫耀美国民主的好处。民主国家现已成了一种濒于灭亡的稀有物种，而退回孤立主义政策则是对外国独裁的一种无能反应。

“我们不能将生活的提高和国家繁荣完全归功于我们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忽略了我们所具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的重要作用。或许，民主制度曾经是国家发展的最佳政体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改进就仍然是最好的。换句话说，我们应了解它的优点和缺点各自是什么。如果你仍认为民主制度是最佳形式，那你就不得不准备为之牺牲吧。”接着他说到了下面这一番后来成为其政治理想的重要标志的讲话：

要尽力从表象看清事实内部真相，不要将慕尼黑协定仅仅看成是某个领导人胆小懦弱或判断失误的结果，而应该看清其本质——它是英国为其多年的反战主义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要把英国重整军备不力的过错归咎到鲍德温一人身上，而应努力寻求导致这种结局的真正原因。在此基础上，美国必须做好准备，为挽救民主制度而必须做出牺牲。

英国的幸运就在于，她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还有一段备战时间，而我们的幸运在于有一个广阔的大洋作为天然的保护。但如果希特勒赢得了目前这场战争，那我们也不得不与去年的英国一样，准备好迎接战争。或许我们能凭借着丰富的自然和地理位置资源得以避免独裁统治，但我们必须明白能战方能言和的道理，只有小心备战才能保

肯尼迪传

证安全，千万别再炫耀民主体制是无懈可击的。

民主制度或许是种适合人性发展的伟大制度，但它也有各种弊端。如果我们希望能继续采用这种制度，那就必须以更现实的眼光来看待国际局势。在外交上我们必须善于利用一切有利之机，充分发挥我们的有利资源优势。我们必须避免与独裁者妥协退让，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便会输得一败涂地。我们经不起一再重犯我们在慕尼黑谈判上的失误。我们必须尽量作出正确的选择——即便我们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尽管后来被出版成书时，杰克的这段话被删去了，但它毕竟是杰克首次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信仰。有关这部历史性喻世论文的写作促使他清楚了自己对于真实和自由的基本看法。他不仅由此显示出他具有深入研究近代史重大课题的能力，而且确定了自己的政治信条——这可能是他将终身都恪守的一则原则：与独裁政体相比，民主政体的防御力更软弱。

失恋的经历

在交上去之前，杰克的论文必须先清晰地打印成稿——不料这一过程却引发了杰克在哈佛期间轰动全校的一桩丑闻。托比·麦克唐纳回忆说：“杰克说他曾经问过邓斯特或霍利奥克关于大街上的达林秘书学校和职业介绍所，但都没有找到打字工，于是他就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消息。”温斯洛普宿舍楼的辅导导师埃尔斯博士后来向舍监法利博士讲述了广告内容：“兹需要一名打字工，任务是将论文打印出来。”托比·麦克唐

纳受杰克的要求在杰克赴芝加哥参加本·史密斯的婚礼回来之前“负责这件事情”。不幸的是，托比竟然让这则广告在报上登了10天。后来麦克唐纳回忆说：“那天上午9：30的时候，在我们寝室外竟然聚集了60位喧闹的应征女郎。”

法利博士并不认为这件事很有趣。杰克也因此受到了严厉斥责，而他回来也痛骂了一顿他的室友，麦克唐纳至今还记得杰克责怪他的那番话：“你就是爱胡闹，托比，但这次我想这次你做的有点过分了！”

虽然如此，杰克还是幸运地赶在了最后期限之前上交了他的论文。小乔给当时正在王子门工作的父亲写信说，杰克“上星期拿着他的论文发疯似的到处找人，在5位打字工的努力下，这篇论文终于在最后一天交了上去。在文中他提了些很有意义的观点，所以论文质量很高。”杰克自己也匆匆给家里写了封短信：“正在写几篇国际法论文，论文结束之后我准备到南方去。”

显然，佛罗里达的愉快度假不仅使杰克忘记了速记打字工丑闻所带来的不快，而且还让他愉快地度过了两星期的轻松时光。“这里的天气是我有史以来见过的最棒的，”杰克对正在伦敦的父亲说，“来这里度假的人真不少——每位男士几乎都能找到三位迷人的女郎相陪——因此我比以前的时候高兴多了。”

尽管表面上杰克表现得如此高兴，但私下里，他仍“经常想起坎农”——凯思琳在给王子门的家信中透露。她的话没有错。在接到了坎农·安定于4月28日举行婚礼的请帖之后，他曾向比林斯坦言：“我愿意去参加婚礼，但我可不想被别人看作是一个在婚礼进行一半时会走出去在暖房里因失恋而自杀的人。”然后他又自我嘲讽说，“我惟一要砍掉的是我的午餐……

肯尼迪传

正打算星期五晚到巴尔的摩去，我想我们也可以星期六开车过去，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暂时不去巴尔的摩，我可以飞过去……然后我们借辆车……我知道你可能想去看亨特·波尔，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这并非关系生死的重大抉择——等你决定下来之后请告诉我一声。”

令杰克遗憾的是，比林斯没能和他一起去。这位失恋的情人只得独自一人前往白橡园。杰克惆怅地回忆道，在坎农家的豪宅中，他亲眼看见了“夏洛特家中最漂亮、最迷人、最受宠爱的姑娘”在父亲的陪伴之下高兴地投入了杰克的情敌——约翰·赫西的怀抱。赫西比杰克印象中还要瘦，还要高，他当时已经担任作家辛克莱·路易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私人秘书一职，现在是《现代》杂志的专栏作家。

第二天，杰克便回到哈佛询问他的论文评分情况。不久，他便得到了一个令他失望的消息：他的论文只得了一个最低等级。

优等生毕业论文的完成

按照惯例，哈佛的优等生毕业论文成绩一共分三个级别：优甲等、优乙等和优丙等。约曼斯教授认为杰克的论文“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进行了有趣、认真而且颇有见地的讨论”，他推荐这篇论文为优乙等，这是论文中的中等成绩。但弗莱德里奇教授对文章的印象却不好，认为它：“尚未分析基本前提，文章啰嗦而又冗长、重复太多。参考书目尽管很多，却没有实际意义，题目应为：《慕尼黑谈判之前的英国政策》。关于慕尼黑谈判的评论缺乏说服力……打印出现了较多错误，遣词造句

有很多毛病。”在杰克的论文成绩卡上他写了上述评价，并将它的成绩划为优丙等。

小乔给他父亲写的信中说，这篇论文“似乎花费杰克很大精力，谁知最后却得了一个这样的成绩”。

然而，对于杰克来说还有点安慰的是，阿瑟·克罗克对这篇论文的评价却截然相反。他大力称赞了杰克的论文。4月4日，即希特勒进攻丹麦和挪威前5天，克罗克给在伦敦的肯尼迪大使写了封信，上面说道：“我在棕榈滩的斯图尔德·麦克唐纳家庆祝复活节时见到了罗丝和你的孩子，他们一切都很好。而且我还看了杰克的毕业论文，很优秀，惟一令我遗憾的是，他竟然对民主体制的有效性如此怀疑。”杰克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不够恰当，而且措辞有些草率。“在许多方面，它都有些缺乏文字表达的技巧，”后来克罗克回忆说，“但它却比研究此类题材中的大多数作品高出很多。于是，我对他说，我肯定它会成为一本深受大家欢迎并且很有价值的书。我愿意帮他找一位出版商——如果他本人也有此意，而且他父亲也同意我这么做的话。”

由于已经给这篇论文打了最低的成绩，哈佛教师们一点都不赞同这个想法。布鲁斯·霍珀以前曾在杰克的导师记录上写过“一旦开始工作，他便会表现出超人的才智”。但此时连这位导师也建议杰克不要将这篇论文出版成书——后来杰克回忆说：“霍珀对此很不支持，不赞成他出书，”但是他，杰克，“却没听他的话。”

相反，杰克给在伦敦的工作父亲去了封信，他在信中，除了为没有按约定给吉姆·西摩和父亲寄去他的论文表示歉意以外，还告诉父亲，阿瑟·克罗克大力称赞他的论文。

肯尼迪传

他认为我应该将它出版成书，而且，还给这本即将出版的书取了个更好听的名字：《英国为何沉睡》，这样便能与邱吉尔的著作《英国沉睡之际》相照应。文中的结论主要是为学院评分而不得不写的，它应该修改一下，而且我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尽管一些观点我可能仍会保留。克罗克预计这本书能在今年春天——5月或6月出版，出版的关键取决于：第一，你打算何时辞职；第二，您认为它是否有出版价值；第三，如果今夏您仍在职，那它是否可以在您的任期内出版。您可以在看完之后再作决定。我想在5月10日之前将它修改完毕，甚至有些地方需要重写，这样才能更有趣味性，且更加完整，从而能吸引更多的普通读者——在我看来，目前文章的观点还可以，但一些地方仍需进行修改。

肯尼迪在海恩尼斯的邻居杰克·戴利也读过此文，他“也建议应该将它出版。但这主要还取决于您的意见。”杰克向他父亲保证说，“如果我开始努力的话，吉姆·西摩或许能够帮我修改一下语言……请您尽快把对这篇论文的意见告诉我，我正准备将它拿到克罗克给我推荐的人那里去听听他的意见。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杰克又一次重申，“一，修改之后它是否值得出版；二，它能否在您任职期内出版。”

它是否值得出版？克罗克认为当然值得。只不过克罗克此举却是出于两种目的——事实上，这种情况在他充满矛盾的一生中并不少见——一方面，他有着记者的天分，善于发现好的素材，而且他在命题方面的确颇有天分。然而另一方面，将杰

克的论文推荐到格特鲁德·阿尔加斯在纽约曼德逊大街上的那家小型出版社时，克罗克还怀有另一种目的。他自从 1932 年首次遇到约瑟夫·肯尼迪时，克罗克便看出，这位骄傲的爱尔兰裔波士顿银行家日后必将大有作为，他具备了足以与罗斯福相媲美的才能，而罗斯福则是克罗克很厌恶的人。

像阿瑟·克罗克这样一位老谋深算的美国政治观察家竟会如此瞧不起出身名门的罗斯福，而看好这位华尔街骗子，这可能正是记者们的职业习惯——长于现实，而拙于判断。但不管怎样，反正在随后写给阿尔加斯小姐的信件中，克罗克很坦率地解释了他为何要将肯尼迪的论文送到她那里：“我之所以推荐这位男孩来找你，是因为考虑的是他父亲将来的著书立传。”

当然，从商业利益角度看，关于约瑟夫·肯尼迪大使生涯的故事远比他儿子的大学论文有利可图。阿瑟了解到肯尼迪在英国过得并不好，于是便建议他辞职回国，以便通过言谈讲演和著书立传尽情表达自己的看法。然而，杰克却不同意克罗克的这种想法。“似乎克罗克认为，您 6 月的辞职将不会为您带来麻烦。对此，我不同意，”杰克建议说，“由于国内大选在即，美国外交官极易成为众矢之的——而这很可能会给您 7 年清白的公职生涯蒙上污点。”

杰克关于父亲反对他们暑假来英国的计划，“我从您给母亲的上封信中得知您不希望我们暑假过来。但如果有我感兴趣的事情，我很想过来看看。”杰克抗议说。凯思琳也“很想过来，鉴于她只是个女孩，我认为那里的反美情绪不会像伤害我们一样对她造成什么伤害——而且我们这种行为更能表明英国即使在处于困境之际，我们也不会离她而去。”

肯尼迪大使感到不好意思，“我思考了一下你提起的关于

肯尼迪传

6 月份辞职和回国的事，”他在给克罗克的回信中说，“我想，即使不在政府中担任职务，我还是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我不会简简单单地通过辞职来给 6 年的公职生涯划上句号，并因此而招致众多的议论”——他转述了杰克的观点——“据我所知，美国公众都认为此时此刻，大使们更应当克己奉公，兢兢业业。如果此时我辞职的话，那只会让他们觉得我根本不顾本国的利益。”然而，他又尽力使克罗克相信，在“过去一年没有改变任何立场”。“我一直认为，如果英国能避免战争，对美国而言，情况将会更好。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我非常推崇绥靖政策。”然而，鉴于绥靖主义活动的中心已迁至美国，他认为不是欧洲而是“美国看起来在今后 6 个月中将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据他声称，他仍“非常佩服你的判断力”并很想知道你认为我怎样才能做到置身事外。当然，如果总统真地需要我，并提供给我某种能胜任的工作，那问题就解决了。”

然而对肯尼迪来说不幸的是，罗斯福从未计划在国内任用肯尼迪——尤其在选举年的特殊时刻。在罗斯福的命令及儿子杰克的建议下，肯尼迪只得依旧在伦敦“流亡”。在此期间，他还做了一件一生中最卑劣的事情。2 月份他回到伦敦之后，未经美国国务院同意，便私自租了一幢乡村巨宅，“作为一旦发生战争，逃离伦敦后的居住地。我大致看了一下，决定将它租下，”他后来回忆说，“此宅门庭宽广，约有 70 个房间，而且紧挨温莎堡，距伦敦 25 公里之远。”在约瑟夫·肯尼迪驻英大使馆任职生涯即将结束之际，他老是撇下伦敦的大使馆官员们，晚上独自到这里来避难。

他的懦弱性格和对邱吉尔的强烈反对，使他在判断上出现了更大的错误。例如，这位大使曾于 4 月末致赫尔和罗斯福：

“自从我到达这个国家，我还从未见过人们有像现在这样强烈的不满情绪，有人已经将挪威的情况描绘成第二个加利波利，它正在迫使邱吉尔先生的威信迅速下降。”

然而，真正在事业上下滑的并不是邱吉尔，反而是肯尼迪本人。英国公众的攻击对象也并非邱吉尔，而是那些绥靖主义者，正是由于他们当初对希特勒的军事野心做出错误判断，才致使英国不得不卷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剩余力量交战中。9个月前，公众还在为张伯伦欢呼喝彩，然而现在随着纳粹在挪威南部的胜利，公众已转向对他兴师问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5月8日在下议院对张伯伦进行了严厉指责。肯尼迪大使坐在贵宾席中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一年前当张伯伦从慕尼黑签约归来时，肯尼迪也是坐在同样的贵宾席中发自内心为他庆功。

劳合·乔治对下院议员们说，作为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曾号召人民为避免战争做出牺牲，“英国人民愿意做出任何牺牲——只要政府明确他们追求的目标，只要人民相信他们的领袖还在尽最大努力。我郑重表示，首相应该带头做出牺牲，因为只有牺牲他自己的首相席位，才意味着他能为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这位受人尊重的政治领袖发表的这番严肃的讲话为张伯伦敲响了丧钟。尽管政府在随后的争论中反败为胜，但肯尼迪承认，张伯伦已经“看上去垂头丧气，呆若木鸡。”

局势仍在急剧恶化。回到格洛斯维诺广场的官邸之后，肯尼迪马上与罗斯福通了电话。此时罗斯福担心的不仅是一个内部分崩离析的英国政府可能会成为德国宣传舆论的攻击对象，而且还对希特勒已向表示中立的荷兰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这一消

肯尼迪传

息深感焦虑。

第二天，议会中的反对党——工党便强烈要求英国内阁辞职。很明显，如今英国必须重组一个政府了。“当晚6点，在唐宁街10号举行了一次会议。邱吉尔、张伯伦、艾德里、哈利法克斯和格林伍德都参加了，”肯尼迪描述说，“张伯伦给了两位工党领袖两种选择：他们是愿意加入由张伯伦组阁的政府，还是愿意加入由邱吉尔组阁的政府。在没与同党们商量之前，格林伍德和艾德里都不愿对此做出决定。但他们暗地里的意思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将是‘行’。”

正如张伯伦告诉肯尼迪的那样，这对他而言的确是一枚苦果。他曾希望他的“朋友们”在辩论中支持他，但这种做法却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因为议会中的友谊无法为英国赢得战争中的胜利。邱吉尔允许艾德里和格林德加入由张伯伦组阁的政府，但他们拒绝了，甚至表示，只要内阁中有张伯伦在，他们就不会加入。

张伯伦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于是恼怒之下，他便拒绝交出官印，这场危机直持续到1940年5月10日才得以解决。那天早晨6点，国务卿赫尔的一个电话叫醒了肯尼迪。他告诉肯尼迪，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已遭受德国空军和地面部队发起的进攻。“奇怪的战争”终于遗憾地划上了一个句号。从此，西欧就陷入了战争之中。

英国为何沉睡下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发动的进攻使张伯伦更加相信

他没有理由辞去首相职务而应继续留任。中午与报界的一位重要人物比弗布鲁克会谈时，肯尼迪“得知，鉴于希特勒的进攻已使张伯伦改变主意，他告诉比弗布鲁克，鉴于目前正赶上多事之秋，他决定暂搁重组内阁一事，直到危机全部过去。”

值此国家面临战争之际，张伯伦竟然还构想没有工党的支持，他也仍然能控制国会，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不过，这样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几小时之后，”肯尼迪叙述说，“情况急转直下。张伯伦已下定决心辞职，因为，一方面，工党坚决反对加入一个由他组阁的政府；另一方面，他又知道现在重组内阁至关重要。于是，邱吉尔便替代了他的位置，定于晚上去觐见国王以便领命能够重组内阁。”

虽然肯尼迪没有表现出自己内心的种种担忧，但大使馆官员，如美国海军武官回忆起当年的情况时说，在得知希特勒入侵荷兰的消息时，肯尼迪的确忐忑不安，惊恐不已。苏联大使迈斯基描述：

肯尼迪当时忐忑不安，他认为英国在德国面前毫无反抗之力，这场战争英国肯是会被打败，因此，她最好与希特勒讲和。我告诉他英国并未遭受巨大损失，而且她很可能成功地抵抗住德国的威胁，甚至将它打败——当然她必须紧握手中的枪。在我看来，英国人民的意志十分坚定……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将情况想得太糟。听我说完这番话后，肯尼迪十分惊讶，他叫道：“天啊，您真是个乐观主义者……我从未听过如此乐观的说法。”不过也难怪，与肯尼迪经常在一起的英国人都是克莱弗顿那类人。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及自己的前途都没有信心。

肯尼迪传

然而，最终张伯伦的辞职和邱吉尔的继任首相是那个令人失落的月份中，欧洲民主国家所经历的惟一一件鼓舞人心之事。这时的欧洲局势，先是挪威放弃了抵抗，随后是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也相继投降。不久，随着德国装甲部队越过阿登高原逼近英吉利海峡，法国北部地区也被孤立起来。

在这个时候，杰克在哈佛建立一个专门帮助红十字会为欧洲难民募捐的学生委员会。《波士顿先驱报》5月20日报道说：“年轻的肯尼迪昨天说，‘欧洲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现在需要的已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同情。在向哈佛学生发出这一呼吁时，我们委员会很清楚，由于这学期将要结束了，许多同学们已经是囊中羞涩。但是我认为，学生应该而且能够有一些钱为这一募捐活动尽自己的一份心力！’”杰克骄傲地向在伦敦的父亲炫耀说，“在已过去三个星期内，哈佛掀起了一股红十字会捐款活动热潮，并筹集了1700美元，比规定的数额高出了500美元。”

而在英吉利海峡彼岸，目睹着他最害怕发生的事不断发生的肯尼迪大使觉得忧心忡忡、前途渺茫。因此，尽管他那位活泼的女儿凯思琳一再安慰他说“尽管英国人打了几次败仗，不过最终他们会打赢这场战争的”，但悲观的肯尼迪大使仍不允许杰克和她来伦敦度暑假。“母亲告诉我说，您不赞成我们去伦敦。可能您是对的，但是因为时间很仓促，而且我还必须去趟科德角。”杰克无奈地说，“还有我的那篇论文……我应该尽快努力让它出版。因为我要赶在这个问题过时及放暑假离校之前将这本书出版。我很愿意通过对英国这番经历的研究，在结尾简单谈谈美国应采取何种策略才是上上之策。当然，在表述

观点时，我不想表现得太有倾向性。”他模仿外交家的口气说，“《英国为何沉睡》是否可以作为书名？邱吉尔是否会介意？在选择出版商的问题上我应该怎么办——用克罗克向我推荐的人，还是您另行为我确定一个？”

而事实上，格特鲁德·阿尔加斯小姐已经开始了给杰克寻找出版商的工作。5月20日，她将稿件送到了哈珀兄弟公司。原稿封面上这样写着：“阿瑟·克罗克已审阅这篇稿子，并对它大加称赞，随后将作者推荐给了我。读完此稿后，我认为它的确针对一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根据自己需要，在学术上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他曾复印了几份原稿，拿给英国的几位知名人士过目……其中包括哈罗德·尼科尔森，他与其他的人一样，都对这部作品极力赞赏，并提出了宝贵建议。所有这些人的建议都由肯尼迪大使转达给了小肯尼迪，而小肯尼迪则将它们融入自己的重新修改中。哈罗德·尼科尔森将为这部书作序；阿瑟·克罗克将为它写封面简介……因为它的确很有出版价值。全部稿子约五万字，将在6月5日之前交稿。”为了增加吸引力，阿尔加斯还提到了“杰克的哥哥也将写一本有关于西班牙经历的书，其中包括一些秘密的材料。”当然最重要的诱惑还是杰克的父亲肯尼迪大使将来可能写的自传。“这位大使，我不能妄下断言，但……我希望他将来会写本自传！”阿尔加斯小姐讲道。收到杰克最后定稿后，她只希望哈珀兄弟公司预付250美元作为定金就行了。

哈珀兄弟公司商议此事的同时，杰克正在乔治敦市阿瑟·克罗克的书房中审阅自己的稿子，准备进行改稿。克罗克后来回忆说：“除了语言的润色以外，我并没有提供其他任何帮助。因此，这的确是他自己的努力成果。”他父亲寄来的打印的信

肯尼迪传

中记录英国人士的评论。根据这些评论，杰克改正了文中的许多错误，甚至还删去了部分内容。尼科尔森等人认为，杰克为替鲍德温和张伯伦这类人辩护，而对“英国公众批评得过于严厉”。当时正值英国军队丢下了他们的大炮、坦克、武器和盟友，退往敦刻尔克，马上就要撤离之际，杰克很不情愿地将原稿中富有同情心的结尾删除了，而插入一些美国公众更急于想了解的信息。

回到剑桥后，杰克迫不及待地等着论文的出版。6月9日，在哈佛《猩红报》的通信栏中，他不顾曾向父亲作过的承诺，撰文对那些反对美国重整军备的人提出了意见：

5月31日星期五刊载的一篇指责哈佛校长科南特讲话的社论中，你们宣称“没有任何理由能比我们正在进行的重整军备更容易被卷入战争，走向一条自我毁灭的死亡之路。”这种观点忽视了我们从英国连续10年的经历中所吸取的教训。军备是战争根源这种观点在英国表现得根深蒂固，曾令其他国家自叹不如。格雷勋爵1914年发表的讲话——“正是欧洲军备的急剧扩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危机和恐惧感使得战争难以避免”——被那些反对英国扩张军备的人士一遍又一遍多次引用。在投票反对1938年海军拨款这一项法案时，参议员博拉表述了美国人这种类似英国人的观点，他说，“一个国家制定了一项方案，针对该方案，另一国家会立即制定一项与之相对应方案。这样，战争很快就爆发了。”

如果有人想问，为什么英国对这场战争的准备如此不充分，或者，为什么在进行的“五月调查”中，美国的防

务情况竟被发现处于如此悚然的地步，对待军备的态度便是答案。不重视发展军备并未使英国得以躲避战争，反而使她不得不为战争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美国，我们是否也准备对这一教训不理不睬？

同样是杰克，去年 10 月还曾发表文章倡导“我们时代的和平”和进行军队裁军。现在的这番话很好地表现了在他思想内发生的巨大转变。到 6 月中旬，杰克终于完成了他的修改稿，并送到了阿尔加斯那里。“我两天前已经交了稿，明天就会得到关于它的确切消息。”他从海恩尼斯写信向父亲报告，“该文旨在向人们分析英国为何对这场战争准备如此不充分。”他在信中提醒父亲——而事实上约瑟夫·肯尼迪还无暇通读全文——“修改之后文章增加了约 60 页，在修改中，我努力使它变得更具趣味性、更具有时效性与可读性。一有消息我会给您写信。过几天我要回哈佛准备参加毕业典礼。我不记得是否告诉过您我已报名明年秋季入学耶鲁一事？家里每个人都很好，罗茜 100% 的更好。爱你的杰克。”

激昂的前言

6 月 18 日，哈珀兄弟公司通知阿尔加斯小姐，他们一致认为杰克的论文确实是“一篇结构严谨而且颇具有价值的作品，他有充分的理由引以为自豪”，然而，时代在发展。他们说沃尔特·米林斯出版的一本新书在这方面已经超过了肯尼迪的论文。当然，最重要的是：

肯尼迪传

我们认为，法国局势面临灾难性的转变足以让法国人深恐不安。因而，我们判断，此类回顾历史性书籍不大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尽管它所讲述的时期与现在非常接近。然而自从5月10日以来，历史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至于那些战争爆发前发生的事情现在看来已成为陈年往事。而且，英国现在要采取何种对策？我们将走向何方？这才是法国崩溃后，当前国人最关心的问题。

与这场空前严重的危机相比，其他任何事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不知您是否会拿这封信给肯尼迪先生看？我们希望他能理解我们这样做的理由。在目前情况下，我们除了取消合同以外别无选择……随函将原稿寄回。

对于杰克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在父亲面前，他却没表露出这种情绪。“我顺利地毕业了。”在6月20日被授予政治学优等生学士学位之后，他给父亲写信说，“妈妈、尤妮斯和姬克都来了，非常有意思。我为这本书专门去过一次纽约。目前我的书的出版遇到了一些麻烦，哈珀兄弟公司认为法国的迅速沦陷已改变了人们的注意力。我的东西已不如即将要发生的事情那样能激发人们的兴趣。但是，我仍在继续努力另找人将论文出版。经过大幅度修改之后，它约长210页，而原来只有150页。另外我还增强了它的可读性……只要一有消息，我会马上给你寄来修改后的文稿复印件。”他同时还感谢了父亲送的毕业礼物——一笔能够使他在“还清债务后还有一点剩余的”钞票。另外，他再次告诉父亲，入学耶鲁法学院计划未变。“伯恩斯法官认为那里不错，我准备去耶鲁就读，”但“比尔·科尔曼的父亲却不允许他上耶鲁——他觉得那里的

思想太激进了——因此比尔将去弗吉尼亚法学院。”

此时，阿尔加斯小姐也于6月20日之前将文稿另行送到了出版商哈考特·布雷斯之处。“杰克·肯尼迪——肯尼迪大使之子——是我的一位客户，”阿尔加斯小姐在信中向哈考特先生极力推荐说，“随信寄上的这篇书稿已经由肯尼迪大使拿给英国的一些知名人士审阅过，其中包括哈罗德·拉斯基、哈罗德·尼科尔森等人。他们均认为该文颇具历史意义和出版价值。我向肯尼迪建议，贵社应该成为考虑出版此书的首选对象。”她不得不向哈考特撒了个谎，“小肯尼迪告诉我说哈罗德·尼科尔森也建议他将这部稿件交至贵社出版。阿瑟·克罗克曾经看过这部书稿，觉得它内容充实，将会拥有广泛的读者。他决定为该书作序，而且如果尼科尔森有时间的话，他也愿意这么做。他们俩一人写序言，一个写简介，这会使该书身价提高许多倍——您不这么想吗？”

然而不幸的是，与哈珀兄弟公司一样，哈考特先生也不这么认为。阿尔加斯曾答应，如果哈考特愿意出版的话，“这星期将要从哈佛毕业”并“与她经常保持联系”的杰克愿意“增添一个关于评价法国形势的章节，从而使文章更接近当前局势的发展。”但哈考特先生却认为“该书的销售前景并不乐观，我对此持否定态度”，对此，他的主编表示赞同：“这个时候出版这本书已经赶不上局势发展——因为现在局势的变化实在太快了。”

后来，杰克的朋友比林斯在1940年6月底谈起杰克出书的情况时说：“我记得，杰克在寻找愿意为自己出书出版商方面遇到了一定困难，那些有影响的出版商都对他的书稿不太感兴趣。”

肯尼迪传

格特鲁德·阿尔加斯明智地决定找一家规模小的出版社尝试一下，她把稿件寄给了威尔弗雷德·芬克，他在纽约经营了一家小型出版公司。看了稿件之后，芬克很快同意将它出版成书——特别是在听说亨利·R·卢斯同意阅读此书并允诺为之作序之后。

卢斯，这位《生活》与《时代》杂志的发行人，回忆起自己当年收到肯尼迪大使要求帮忙的电话后作了比较谨慎的回答——“大使给我打了个国际长途电话……我说，‘好吧，把稿子寄过来，我看一下。’”

当这篇文稿——确切地说是校样——交到我手上时，我马上就被它深深吸引住了。这篇稿件的学术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该文以英国议会多年来进行的政治活动为基础。而现在，慕尼黑谈判已成为过去……正如人们所评论的那样，英国目前孤立无援。同时新闻舆论都倾向于将所有过错归咎于曾经绥靖政策的制定者身上，即张伯伦先生和保守党中的和者身上。但该书却认为，这个过错应由英国的所有人来共同承担，包括工党。该书对 30 年代各方关于国防拨款的态度特别进行了深刻剖析，并把它作为检验各派的标准之一。书中认为，如果一定要以党派来划分的话，两党都无法得到很好的口碑，显然，保守党和工党一样缺乏远见……

令我十分难得的是：首先，他对描述这场欧洲战争的事实资料，如大众观点和投票表决记录等，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其次，在战争危机日趋白热化的过程中，他那种严谨的求学态度和研究方式，以及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

参与精神和责任心，无不令我为之感动。正是这些理由使我非常欣赏该书中所呈现的思想深度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

然而，尽管卢斯非常欣赏杰克，但他这篇序言的内容却大大出乎了肯尼迪大使的预料。在序言中，他首先称赞了该书的年轻作者：“在我的记忆中，在我大学时代里，很少有人能在大学四年级就将如此重大的课题写出如此深刻的论文。”但是，随后他便将矛头对准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代尔·威尔基，他指责他们俩为获得美国人民的信任，谎称不会将美国卷入战争。“除非美国政府认识到战争已即将爆发，否则，他们是绝不会对战争作好准备，”卢斯言辞激烈地写道，“一年以后不会，两年以后不会，二十年以后也不会……在明白这一点之前，美国会输掉许多战争——包括那些她放弃的战争，和这场她本来以为她不会卷入的战争。或者，即使美国在战争中并没有真正失败，但为了争取到最后的胜利，她仍然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财富、鲜血以及美国文明可能受到的破坏。与这场战争可能带来的破坏相比，国内战争所造成的可怕后果不值一提。”他提醒说，这位沉睡的雄狮现在必须赶快苏醒过来；如果他想在战争中取胜，就必须看到战争已迫在眉睫。而且，他还援引了杰克在书中将美国人民形容成一名拳击手这个比喻：“在拳赛前，如果拳手还没有意识到比赛已经即将开始，那他就无法进入最佳的心理和生理状态。”

“这场战争将要带来的考验，”卢斯接着说，“纯粹是对诚实的考验。虽然，它是对领导者们的考验，然而更重要的是，它将对困在堡垒之中的民主体制的考验……可能他们俩在这

肯尼迪传

场战争中向美国人民都不会说实话。我们将等待着答案的到来。每年花费 100 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到头来却连一句勇敢的话都不敢说？不——民主政体一定不会就这样从地球上消失。”

其实，目前民主体制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勇气的问题。此刻，伦敦战争的硝烟仍四处弥漫，约瑟夫·肯尼迪有关末日来临及英国即将毁灭的预言也似乎即将成为现实。他现在仿佛已成了美国最著名的孤立主义者。在发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肯尼迪预言英国将在战争中失败。为此，他不允许凯思琳或杰克来。同时，他对于包括皇室在内的英国人还不赶快将黄金储备和子女转移到加拿大表示不解。7 月份，在探望生命已经垂危的张伯伦时，肯尼迪坦诚地对这位英国前首相说：“在美国，人们普遍都预言你将在本月底之前离开人世。”——对一位即将病逝的英国人来说，这样的安慰话实属少见。

肯尼迪对英国战争的错误判断最终将毁灭他的公职生涯。但是，他目前却仍以预言家和现实主义者自称。因此，他身边的那些人听说他居然没指责卢斯那篇好战的序言这件事而感到不解。第一批书从纽约运至伦敦后， he 把它们分发给这里的每位知名人士，从首相温斯顿·邱吉尔到国王乔治六世，几乎是每人一册。

这种情况真是少见。这位被《新政治家》的编辑评价为“脑子里只有我，非常自私和胆小的富翁”、这位 30 年代曾在许多与纳粹做生意的大公司内投资，而值此伦敦爆发战争之际，又早已变卖了他在英国公司内所有股份的富翁大使，此时却又公开称颂他儿子那本揭露英国绥靖政策的书——况且书上还有亨利·卢斯所写的那篇充满战斗意味的序言。

或许，这位不受英国政府欢迎的大使希望这一举动能引起

邱吉尔和其他一些蔑视他的英国领导人的好感，然而更有可能的是，他这样做是出于做父亲的自豪。除了他的对手们及那些没有眼光的奉承者以外，其他所有的人都承认，约瑟夫·P·肯尼迪行为古怪，是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人：他麻木不仁，但有时却周到细心；他小气吝啬，但有时却又慷慨大方；他昏庸，但有时却很豁达；他自负，但有时却又很谦卑；他道德败坏，但有时却又助人为乐；他常欺凌弱小，但同时却又是一位充满爱心的父亲。

迄今为止，肯尼迪仍然没有看过杰克的稿件。在 1940 年 8 月 2 日写给杰克的信中，这位大使表示，他期待着能尽快看到这本书，他预言说“如果它能做到针砭时弊，那它的销售量肯定会不错……不管你能否挣到钱，”他鼓励杰克说，“它都会给你带来很大好处——尤其是如果它倍受欢迎的话。一本真正受到知名人士赞赏的书也许今后能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我记得哈佛委员会要求 25 年后再上交的报告中提过这样一个问题：您出版过哪些著作？在这个问题上，你无疑已经为自己铺了路。既然你已经忙完了这本书，就好好休息一下吧。你具备了将来飞黄腾达的机遇和其他所有的有利条件，望你以后继续努力。”

他居然会在信中对杰克大加赞赏，这实在令人诧异，而且 10 天后，当他写信告诉罗丝他已经把这本书看完了时，他依然不改初衷，对杰克的书仍然赞不绝口，“我认为它很优秀，不管他从中能否赢利，它将为他获得一个好名声奠定基础，而且这种名声能为他带来永恒的价值。告诉他今天我还拿着这书去找拉斯基，请他推荐一些人能帮着写一些夸奖杰克的文章。我还准备去英国寻找合适的出版商。”

肯尼迪传

然而正如杰克的那些哈佛教授们一样，拉斯基对此也持反对态度。

全国畅销书的发行

拉斯基的态度典型地体现了文人的缺点：嫉妒。8月20日他给肯尼迪大使致信，表示不支持将此书在英国出版发行。他甚至对肯尼迪大使居然同意杰克在美国出版此书感到非常吃惊。尽管“卢斯所说的颂词很简单，但他，拉斯基，却根本不愿这么做。”“事实上，我选择了一种更为难的做法——我对你允许他出版此书深表遗憾，因为它尽管是位有思想的青年所完成的，但它并不成熟，缺乏条理，而且几乎一切完全停留在表面的分析上。在任何一所优秀的大学里，”他称，“会有不少毕业生把这样的书当成他们大学最后一年里的日常作业。但他们并没将它们发表，原因就在于，重要的是写书过程中的收获，而不是他们想趁机表达的立场。说实话，如果他不是您的儿子，而您又不是大使的话，我认为出版商们连看都不会看它一眼，这些都不是将它出版的正确理由。”

的确，纽约的出版商因为杰克父亲的身份才看了杰克的文稿，但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一身份采纳这篇书稿。甚至连威尔弗雷德·芬克都很奇怪公众居然会对这样的一本书如此感兴趣。格特鲁德·阿尔加斯7月12日高兴地向克罗克汇报说：“发行人预计，这本书的销量将达到3000到5000本。从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这个预计数字似乎马上就会实现，”因为此书“自从在《出版人周刊》上刊登广告及发表通告以来，现已售出1000本，并且有15位评论家表示想阅读此书。出现这种火爆

的原因是否仅是因为这位年轻人名字的吸引力及出售书店的好奇心，目前还不知道。”她很坦诚地写道，“而且，等到书店将书上架之后，该书是否还会继续保持如此好的畅销量，目前我也不敢轻易断定。”不过无论怎样，杰克还是给阿尔加斯小姐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她告诉克罗克，“杰克是我见到过的最优秀的年轻人之一。我将很高兴看着他成熟起来并有所作为。”

不过，阿尔加斯小姐却从没想到过——克罗克也从来没有想到——长大以后杰克竟会入主白宫。与此同时，紧随着书店的订单之后，各种杂志社的约稿也接踵而来。《当代历史》杂志的编辑请杰克写一篇 2500 字的评论并希望能与他在纽约会面。“大家都认为你是位很有天赋的作者。”阿尔加斯小姐的合作人乔尔·萨茨 7 月 16 日给他写信说，“这本书即将出版，因此你应该好好抓住这个机会，尽量在杂志上多发表文章。我们还想与你商量一下洛厄尔·托马斯将要对你进行广播采访的有关事宜……如果你同意的话，这件事能否在书出版之后尽快进行。销售的结果令人振奋，现已销售出了近 1000 本……而书却还没有正式上架呢。下周等弗兰克·亨利推销回来之后，我们将会对此书的销量做出好的估计。此刻，我们对它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我认为，这本书能拥有大量读者的愿望将实现。”

《英国为何沉睡》于 1940 年 7 月底在美国书店内开始出售。此书杰克在 2 月份才动笔，3 月中旬已经完稿，6 月初重新改写，并与克罗克对它进行语言润色，这可谓是杰克呕心沥血的杰作。这位经常穿着随便、吃饭迟到、学习不专心、曾因聚众滋事和非礼而差点被赶出校门、经常患病并因确诊的血液病几次差点病逝、在普林斯顿学院学习跟不上、而在哈佛最初又被视为浪荡公子的书呆子，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位名人。对于

肯尼迪传

他取得的成功，每个人都有心里准备，但他们却从没有想到，他年纪轻轻便会一举成名。

1940年8月5日，杰克在家里接受了《波士顿先驱报》记者的采访。据该报报道说，“在他家的别墅里，杰克竭力反对那些关于此书并非他本人‘成果’的谣言。他很高兴该书能博得如此多读者的喜爱，短短两天内便已销出了3500本。但他也为不断有人讥笑他是其父的传声筒而恼怒。‘我已有6个月没看见过我父亲了，而且我们对英国某些政治家的评价也不尽相同。’”杰克在为自己分辩时提到了邱吉尔。

在写这部书时，年轻的肯尼迪只带有一个目的，他想让美国尽快醒悟过来。他指出，从始至终英国一直处于沉睡之中，直到敌人用炮火叩响了她的大门。而在这里，在美国，一个伟大的民主体制正面临着英国在1920年—1940年所遇到的同样的问题。年轻的肯尼迪请求美国立即重整军备，为防御作好准备。

肯尼迪目前正在考虑为这部书写一部续集，它将发表在《当代历史》的9月刊上，可能取名为《英国的苏醒》，以剖析过去两个月内所发生的事情为主要内容。

肯尼迪接着说他收到了《伦敦快报》寄来的一封约稿信，关于在当前形势下美国应扮演一种什么角色的文章。

尽管他还只是个谦虚的年轻人，但肯尼迪的才智已经超越了他的年龄——因为，他的书为一个面临着战争的民主体制提供了一剂治病良方。

从此以后，报纸和杂志的约稿函和邀请信不断涌入杰克的

信箱。“杰克的书终于出版，昨天他去了纽约等地。”他的妹妹琼写信对父亲说。杰克原计划整个夏天都到科德角去玩帆船，但现在这本书的出版却让他忙得不可开交。“显然，你的书已博得了与众不同的反响，你一定知道吧？”阿尔加斯小姐 8 月 1 日写信对他说，“如果你今天看了《时代》和《论坛》的话，会与我一样感到满意。那些经历和年龄都双倍于你的男士们也很少在他们出版第一本书——或任何一本书时——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对于一位 23 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结果的确非常引人注目。约翰·惠勒—贝纳特在《纽约太阳报》上刊登文章指出，虽然杰克在“了解这个问题上比普通人有更难得的机会”，但他并非“以美国驻英大使之子的身份来创作的这本书，而是以非常谦逊的态度，从一名颇有才智的青年的身份出发，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并经过精心选材，最终进行了非常深刻的心理和政治分析，这一过程中处处透露出一种颇具吸引力的广阔思路和清新之感。”与亨利·卢斯一样，惠勒—贝纳特要求这位年轻的作者对美国在世界和平瓦解之际应发挥的作用进行论述——从它批准《凡尔赛条约》成立和加入国联上的失败开始，到它目前处于的这种“昏睡”状态为止。

催促杰克在这个紧要关头发挥其笔杆子威力的人不只是惠勒—贝纳特一人。杰克似乎已经触动了极权主义时代的民主体制的中枢神经系统。不仅在书评中，而且在私人信件中，公众对杰克评价都极高。罗斯福总统则以“我亲爱的杰克”为开头，写信对他表示祝贺。还有杰克以前的中学老师罗伯茨夫人也祝贺杰克：“自从你离开之后，我一直没有再见过你，”她在广播中听到对杰克的采访之后，写信给杰克说，“我希望自己

肯尼迪传

可以对布鲁克林迪弗逊学校的小‘杰基’·肯尼迪表示祝贺……我想告诉你，对于你的成功我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你的确是美国青年的杰出代表。我相信，如此年轻便一举成名的你一定会成为父母的骄傲……我也坚信，我们将看到你施展抱负的那天，‘杰基’。”一位金融家的妻子比埃尔邦德来信表示，他们很幸运读到这本书，比埃尔邦德先生则说他“至少把它寄给了6名固执的孤立主义支持者”，他认为这些人会从此书中获益匪浅。律师、教育家及经济学家也纷纷来信称赞这部书，并且邀请作者加入他们的行业。一位波士顿律师B·A·布里克利认为它“写得很出色，表现了作者既精于研究又善于思考，作者将来在法律界一定能作一番大事”。《大西洋月刊》则利用杰克的盛名来吹捧它目前正在连载的莫利·潘特-唐纳的新书。一位经济学教授从哥伦比亚大学写信：“对你在法西斯侵略关头，针对导致民主政体弊端的真正原因所进行的出色而又深刻的分析，表达我发自内心的敬意……这是对美国政治思想的重大贡献。”历史学教授杰弗里·布朗从纽约大学写信来，主动提出愿为杰克帮忙，替他的下一部“著作”寻找一家更大的出版商W·W诺顿出版公司。甚至连杰克以前在乔特中学上学时的老校长乔汉·圣约翰也寄来了一封满篇都洋溢着褒奖之辞的信。他极力称赞此书内容“学术性强、严谨、且极具说服力”。“从历史的观点看，即使再延缓一二十年之后出版此书，这样的表扬也一点不为过。对于美国人民而言，这部书的作者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准确的预言家、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传播爱心的传教士。对于你对英国身陷战争的原因的分析与论述，我与所有的美国人都向你表示感激。你的这本书透彻地阐明了一个对美国非常有价值的教训，任何一位有责任心的美国人都应起立向

你致敬。”

杰克的工作人员回忆，到9月为止，杰克的著作已被《出版人周刊》列为“有望进入全国畅销书排行榜的书籍”。在此之前，该书曾经出现在《纽约时代》和《时代先驱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乔尔·萨茨补充说：“公众认可了你的劳动成果，我真替你高兴。”阿尔加斯小姐曾表示对小乔准备写的那本关于其西班牙经历的书颇感兴趣，现在她打算开始着手准备此书，并且已提出要与小乔见次面。不过同时她却又表示：“不过，问题是现在你已先拔头筹，要怎样做，才能获得成功呢？”

正当杰克受吹捧，听夸奖，不断寄出亲笔签名的书册之际，他在海恩尼斯港收到了他年轻时代最与众不同的一个忠告，它出自他的哈佛导师布鲁斯·霍珀，上面的日期是1940年9月5日。

首先霍珀对杰克寄给他的信和那本题词相赠的《英国为何沉睡》一书表示感谢。他坦率地对杰克说：“书写得很出色——当然，在我看来，这并不意外。”

亨利·卢斯在序言中把你吹捧得很高，但我认为，至少他应该在文中声明，你的书并没有涉及所有的问题。而且他也应该清楚，由论文转写成书的过程中，你的工作进展得有多快。

说句心里话，杰克，在第21页上卢斯还这样写道：“我希望肯尼迪先生能继续针对美国在战争中的相关政策和当前全球几乎毁灭的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再写部书。”而我的建议是：“你千万别这么做。这样有深度的主题应由像A·劳伦斯·洛厄尔那样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来

肯尼迪传

写，而你太年轻了。”

其次，无论如何，都别再写书了。如果你非常想要写的话，就将所写的主题控制在一篇文章的篇幅之内。这样以来，你就能有足够的时间研究它。毕竟这本书是你的成功之作，它源于你大学 4 年的学习以及在欧洲局势动荡的 8 个月内享有亲自观察局势的特殊机遇。

第三，因为你的年纪小，你可能会成为各界人士争相邀请的人物。要当心这点，你现在的任务是完成你的学业。当然，也许一些读者会认为你的材料都来自于你的父亲。但我相信你是自己收集材料，并且是独力完成这本书的。到头来，其他人怎么评价你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外界强烈要求你加入这个或那个派别的请求下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公众都是很善变的，而且最终会变得很无情，它常常会亲手毁了自己捧红的偶像，知道吗？

我知道你不会因为公众的吹捧而昏了头脑，所以我这番话实在没有必要。但是我知道，此刻你的信箱中一定充满了各种褒奖的评论、满篇称赞的来函甚至包括好莱坞在内的社会各界的邀请。对这一切你要把握好自己，只把它们当做取得一项成功后的小小奖赏，然后试着把它们抛到脑后。

如果有某位女士在餐桌上滔滔不绝地夸奖你的佳绩，你就对她说：“对，这次我非常幸运，不是吗——可能今后 10 年都无法再做到这样，你同意我所说的吗？”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同时，真诚地向你表示祝贺，祝你永远顺利。如果你

来剑桥城的话，一定要记住我家的大门永远都会为你敞开。你已经起航了，杰克，但在你远行之前，你的船上还需要准备好一切所需装备，等一切配备齐全之后，凭着你的聪明才智，你一定会拥有一艘足以抵挡住任何狂风巨浪的真正舰船，对吗？

加油吧，我的勇士。

第七章 斯坦福生活插曲

性病的治疗

1940 年夏天，托比·麦克唐纳作为一名橄榄球职业选手在“东海岸联盟”队打球。尽管他的性生活充满激情，极为得意，他仍发现离开哈佛大学是一种锻炼。麦克唐纳提醒他的这位室友——杰克说：“等你走出校门，开始工作，你就会明白，我们，至少是我一直生活在睡梦之中。我对一般人的思想知道得越多，就越觉得希特勒有不少观点挺不错。告诉我你在这里将要呆多久，我去那儿拜访你。”最后他还希望杰克告诉他“你的夏威夷之行何时开始”。

然而，无论是夏威夷之行还是上耶鲁法学院学习的计划杰克都未能实现。他再一次病倒了。原本他在波士顿莱希诊所接受乔丹医生的治疗，后来又不得不转往梅奥诊所进行进一步详细检查。他以前的女友奥利夫·考莉写信说，“听说你病了，我很难过！但愿没有什么大毛病。听说你出书挣了一笔钱，我还等着你用那笔钱带我去纽约出席一个真正的社交聚会呢！”她还责备杰克道，“虽然我没有收到你送给我的书，但我最后还是自己买了一本。不过杰克，这钱并没有白花，非常值得。我刚开始读就爱不释手。我听到过很多对这本书的评价，全都是

赞美之词。我可以很自豪地对别人说我和你认识。”

要是奥利夫知道杰克得的是什么病之后她是否还会这样高兴，这就很难说了。梅奥诊所和莱希诊所都是私人诊所，即使在杰克死后很长时间之内他们仍然严格地保守着杰克的病历。然而无论是这两个诊所还是杰克的家人都不能控制或消除这些记录。

从刚刚公开的海军医疗记录中我们得知，杰克的病大部分是因为他的胃，也包括脊椎。“1940年8月，他打网球时将背部拉伤，尽管当时他没有终止比赛，但后来再玩时总会再犯这毛病。他说背部有时感觉没什么事，但如果以某个特殊姿势持续坐一会儿就会背疼。渐渐地他的背部越来越僵硬，最后不得不终止了所有的体育活动，甚至连早上起床时如果以固定的姿势坐着，他左侧的髌骨部位就会感到疼痛，走起路来腿脚也不便……”

这份记录为杰克口述，四年后由一位海军医生记录下来。这份报告刻意掩饰了杰克的病史，不仅忽略了杰克多次身染重病，终生为疾病折磨的事实，还省去了最后阶段在哈佛困扰他的传染病，即性病。莱希诊所泌尿科主治医生后来透露说，最近一次感染性病是“1940年在大学上学时”。他补充说经过泌尿科治疗和使用磺胺后，他的尿道炎已经治愈。

虽然磺胺可以治愈淋病，但它对后淋菌尿道炎则没有效果。杰克得的是一种不太严重但很难治的病，通常由淋病引发，连很有效的青霉素都无法治好。它会间断地引起泌尿系统的疼痛，阴部发炎并伴有脓液释出，这令患者苦不堪言。杰克的病历上这样记录着：“经常会发生膀胱炎、尿频和前列腺部位疼痛等。”

肯尼迪传

从卡梅尔·奥菲斯那儿听说杰克“最近去了一趟罗切斯特”后，布里特大使给了他一份鼓励，希望“他们会告诉你没有任何问题。我相信你状态良好”。

但杰克并不如此，他的脊椎、胃、脾、阴部都有毛病。梅奥诊所的医生很为难，然而如同 1935 年一样，最后医生诊断说只要缓解在耶鲁法学院全日制的学习压力，经过一些日子的修养，杰克很快便会恢复健康。

1940 年 9 月 10 日杰克从梅奥诊所治病回来时，《波士顿先驱报》报道：“约翰·F·肯尼迪，23 岁，驻英国大使约瑟夫·P·肯尼迪的次子。他今夜声称将不能按原计划在秋天进入耶鲁法学院学习。年轻的肯尼迪不得不在他家的避暑山庄再休养两个星期。他声称对于未来还没有具体的安排。他想去旅游，也许冬天会在西部呆一阵子……明年秋天再进耶鲁法学院学习。”

詹姆斯·兰迪斯是肯尼迪大使在股票交易委员会里以前的同事，现任哈佛法学院的院长。肯尼迪大使表示，对于杰克找理由选择耶鲁法学院他感到庆幸。他之所以选择纽黑文“主要是因为他感到这样可以避免与其哥哥进行不断地直接竞争。在那一点上我很同情他”，然而杰克“多年来胃病一直都没好，听说医生建议他休息一年。在这关键时刻看着他浪费时间我真心痛。”日益变得脆弱和失落的肯尼迪大使在伦敦感叹，“不管怎样，他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饱受攻击的美国大使

由于不列颠之战的爆发和德国对英国空军基地的猛烈轰

炸，美国大使肯尼迪始终心神不安。他在匆忙中租下了圣伦纳德的乡村别墅，却没有像过去在股市投资时那样做“背景调查”。后来他承认：“我当时没注意到这座房子离飞机场和工厂仅隔数英里。”尽管他的房子并没有遭到轰炸，但每天夜里的防空炮火都会使他难以入睡。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一次在特别强烈的轰炸之后，人们发现在附近的公园里有一枚燃烧弹的弹翼，而这座公园的简称正好是肯尼迪这个姓名大写字母的缩写：JPK。于是，几分钟内他便被一名摄影师和许多记者团团围住，全世界报纸很快都刊登了“饱受攻击的美国大使”的新闻图片。

肯尼迪每天夜间以“不想参加正式宴会”为借口住在乡下，实际上只有这样做，“我才能逃离市区”。他的这种行为引起了公众的极大不满。邱吉尔拒绝召见他，更别提同他进行磋商，罗斯福同样如此。肯尼迪异常恼怒，以至于后来私下里对英国财政大臣抱怨说：“最后我就告诉他我病了，我讨厌去那儿，对目前的财务状况我一无所知。这显然是美国政府的策略，不想让我知道太多。”他对美国财政大臣亨利·摩根索也有过同样的抱怨。摩根索在与英国政府谈判时竟然把他绕过去了。肯尼迪责怪外相哈利法克斯勋爵说：“我告诉他，上个月除了听说一个没什么影响的意大利事件外，我几乎再没有听到过什么消息。要不是我不想在遭受轰炸之际离开，我宁愿辞职也不能忍受这样的无礼。”

为了不使罗斯福感到难堪，后来邱吉尔同意多见几次肯尼迪。因此，在俄国入侵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法国沦陷而英国实际上处于“孤立无援”地步时，这位美国大使能有幸瞅到一些激动人心的场面。

肯尼迪传

不过令英国人失望的是，尽管肯尼迪的确曾经匆忙记下了邱吉尔一些令后人传颂的名言，但他对邱吉尔这种优待并不领情，甚至还讥笑地称邱吉尔“确实挑了一个好机会当首相”。这位长期不受重视的保守党人用了一句颇令后人品味的话说：“如果首相席位这块骨头上还有一点肉的话，他们是不可能给我的。”

邱吉尔曾让肯尼迪交给罗斯福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要尽力鼓舞法国人的士气。他预言“法国人不会失去斗志的。他们会逐渐强大起来而不会失败。”

邱吉尔雄辩的口才，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善于使用比喻的讲话方式令英国人和美国人情绪不断高涨。然而肯尼迪却预言，如果英国人继续参与战争注定要失败。他无视邱吉尔的号召力，而且在英国能否胜利的问题上误导罗斯福，但他还是会继续努力同“白厅”的那些“犹豫不决的傻瓜们”共事，寻找机会推销他的绥靖立场。外相告诉他法国人可能会“撤退”，但英国人仍将继续战斗，而他认为“我们的防守敌不过纳粹的攻击”。肯尼迪马上想知道，“如果法国人想要谋求和平，你们是否支持？”

哈利法克斯对这个问题犹豫不决，他曾问过同样的问题。他告诉肯尼迪：“我试探邱吉尔：‘如果和谈条件是赔款和割让殖民地，但允许你们保留独立和自由，您愿意吗？’”对此，首相马上反驳道：“那决不可能，我们根本不会考虑。”

然而肯尼迪简直不敢相信有人会宁愿选择战争而不愿答应希特勒的赔款要求。他回忆起自己那有失体面的反应时说：“凭我的形象，如果真有可能实现，肯定会很欢迎。”

然而会有谁欢迎呢？如果哈利法克斯当首相，也许肯尼迪

的看法是正确的。但邱吉尔是那样顽固而高傲，此时罗斯福又出来希望法国总理雷诺斗争到底。他说：“您发表的声明称即使法国一步步撤退，哪怕退到大西洋和北非也要为民主而坚持战斗，对此我时刻铭记在心。而且最重要的是记住英国和法国的军舰仍然控制着大西洋和其他海域，更要记住，外界运输的重要物资对军队的战斗力是极其关键的。”由此看来，正如达兰上将的预言，“海军将要主宰历史。”

肯尼迪到海军部向邱吉尔上交了这份电报。“当时首相正与他的两个女儿和妻子一起进餐……他看过之后显得很激动……反复将这份电报念了三四遍，并马上转告雷诺。他对这份电报的认识是，如果法国人继续参战，美国将会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尽管总统并没有宣布‘参战’，但他发过的电报已表明了一种承诺。首先在这份电报中他保证将会提供充足的物资援助。其次他鼓励法国人即使政府被赶出法国也要继续战斗。”连肯尼迪也明白“这是个承诺……首相很快就饱餐了一顿。除主菜外还有果冻、鱼、鸡和草莓。”肯尼迪回忆道，“他边吃边向我详细描述紧张的法国局势。”

然而，邱吉尔雄辩的口才和罗斯福的“承诺”最终还是没能支持法国人战斗下去。正如邱吉尔描述的那样，他们弃舰仓皇而逃，而没有将军舰交给英国人与英军共同作战。法国人在维希政府和贝当元帅的统治下，开始了一段屈辱岁月。

肯尼迪的行为也很不光彩。当邱吉尔希望肯尼迪给罗斯福去电要求复印罗斯福总统振奋人心的讲话时，肯尼迪一口答应。但他却马上给罗斯福去电，建议他收回承诺。肯尼迪称：“尽管我了解目前的局势很紧张，而且知道鼓舞那些可怜的士兵的斗志对他们取得成功是何等重要，但我还是认为这份讲话

肯尼迪传

作出的承诺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靠买空卖空发家的投机商如今再次运用了他的招术。这次他在电话中称，“如果英国人认为能保证体面地实现和平，那也许会发生一场严重的政变。”肯尼迪声称，邱吉尔将在这场政变中被推翻，这当然只是一种愿望。哈利法克斯问肯尼迪觉得温德尔·威尔基是否“有机会代替”。肯尼迪回答说，“照目前的形势看，很可能。”此话一旦传到肯尼迪“上司”的耳朵里，他便会有“欺君之罪”。当罗斯福坚定拒绝乔回国担任总统连任竞选负责人职务的建议时，双方在电话里发生了激烈争执。罗斯福解释说，“我不希望让你听说你被我任命，又被我撤职了。”罗斯福谎称，“你知道，由你负责竞选工作，我很放心！”他甚至还指责国务院否决了这一建议。“总的感觉是如果此刻让你离开，将会对英国的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

肯尼迪没有上当受骗。他对克莱尔·卢斯表示，“罗斯福总统告诉我国务院想做些他不同意做的事，我有生以来没听说过会发生这种事。”与此同时，他向罗斯福正式表示，称他正“考虑回国之事。在我看来，我正在这里做些毫无价值的事。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回国更好的履行我的职责。”

后来肯尼迪向埃迪·穆尔炫耀说：“我在电话里很生气，我想罗斯福给我打电话是因为他担心我会辞职，他想‘讨好’我。”然而后来他向他的侄子乔·凯恩讲述了他出任大使最后几天发生的那些“奇怪的故事”，并确保这个故事是真的。据凯恩回忆，“好像内维尔·张伯伦和他商量了一个计谋。肯尼迪准备亲自前往德国并向希特勒面呈建议。如果德国愿意呆在欧洲大陆上，英国可以帮助恢复其地位。他们将此想法告诉了国王。几分钟内乔治国王便与罗斯福通了国际电话。据肯尼迪

肯尼迪传

称，当他在电话里向罗斯福解释时，罗斯福立即表示坚决反对。肯尼迪说：‘我认为罗斯福比欧洲任何人都更喜欢参与战争。’当时他表示，‘我准备尽快回国。’罗斯福则称：‘你留在那儿。’肯尼迪却回答道：‘见鬼去吧！谁也不能命令我。’”

不过，眼下罗斯福确实有权命令他仍留在美国。这位大使给埃迪·穆尔写信时称，他威胁罗斯福说：“我随时都可能说‘见鬼去吧！如果这就是你处理局势的办法，我宁愿回国’。”然而他知道要是违背总统的意愿辞职不干，必然会名誉扫地，自毁前程。因此他依然留在伦敦，过着被流放、郁闷和恐惧的生活。

1940年9月，当罗斯福建议恢复兵役制度并训练美国国民警卫队作为战争应急措施时，肯尼迪以嘲笑的口气说：“总统提出的两个重要意见使我们离战争越来越近了。”然而他也必须承认，“当美国人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战争的气氛而变得惶恐时，英国人却出奇地镇定。”此时尽管不列颠之战即将爆发，德军正在集结大批军舰准备渡过海峡侵略英国。邱吉尔听布伦丹·布拉肯汇报指出，乔治国王正举着一支步枪练习打靶。他看见后，国王告诉他说，如果德国人来了，他将用枪来教训他们。邱吉尔告诉他，如果国王真是这样想，他可以提供一支冲锋枪，去教训更多的德国人。邱吉尔果真这么做了，于是从此以后国王便端着冲锋枪练习打靶。

不久，肯尼迪发现他正逐渐受到罗斯福的怠慢。肯尼迪回忆道：“我竟然是从英国政府那里而不是从美国国务院获悉，我国海军上将戈姆利正与其他军方重要人物到伦敦来替总统进行事先‘考察’。”肯尼迪对这种“秘密策略”十分气恼。他打电话给国务院对这一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并称之为是一个政策错

肯尼迪传

误。

肯尼迪自作自受，这怪不得别人。尽管英国人“十分镇静”，但他自己却很悲观而且备受冷落。他带着罗斯福批准驱逐舰协议的消息前往海军部，却被拦在门外。邱吉尔当时正在睡觉。肯尼迪生气地嘟囔道，“这可是邱吉尔一直期盼的消息。他说人类文明的修复就靠它了。可是他此刻却在睡午觉！”

更糟糕的是邱吉尔似乎从不“记得我不喝酒”。他对酒精深恶痛绝。他还说，“天哪，你让我感到我似乎该马上对天主进行忏悔！”在随后举办的“驱逐舰晚宴”上，肯尼迪发自内心地感到“在驱逐舰基地的谈判中自己几乎完全被他们忽略了，只不过负责从白宫向唐宁街发一些电报、传真而已”。当首相突然惊讶地问美国驱逐舰是否配有锅炉，是否需要费力地拖过大西洋时，肯尼迪无言以对。

然而，随着9月份德国对英国轰炸的进一步加强，肯尼迪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电话和电报变得更加恼怒。他表示，如果美国人一旦明白到底这场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永远都不会同意卷入进来。“我给家中写信表示，大使馆根本没有安全保证。‘当德国人连续三、四个小时以每隔五分钟的频率丢下这些燃烧着的炸弹时，你可以看到大使馆被燃起的大火团团围住。看来科德角的家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向萨姆纳·韦尔斯抱怨说，“国务院里谁也想像不出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似乎对此也根本不关心。因此，9月15日下午3点总统给我打电话，还祝愿我们一切顺利时，我态度很不友好。十天来轰炸接连不断，夜里的防空炮火简直令人难以入睡。”

肯尼迪异常担心，每天夜里都住在外面的，置其他同事于伦敦城里不顾，这种做法令人非常厌恶。肯尼迪后来透露，最后

“一群大使馆的女孩子派代表过来找我，要求给她们找到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根据安排，德比勋爵那里为这些使馆的工作人员在森尼戴尔找到了一栋正在出租的房子，共有十八间。不过这位大使自己说，此时他“已下定决心赶快回国”。

东部野汉的生活

正当杰克的父亲计划回家之时，杰克却再次离开了家。五年前他曾去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农场进行病后休养。这一次——1940年9月，他又选择了这个“农场”，这是对勒兰德·斯坦福长昔日在帕洛阿尔托镇的大牧场的戏称。该牧场位于旧金山以南约30英里处，隐没于太平洋与旧金山湾之间的山脊上。自1885年以来斯坦福大学就坐落在这里。

帕洛阿尔托的气候温暖却干燥。斯坦福大学是男女同校，在该校注册的女生大约有2000名。由库利奇和奥姆斯特德设计的浅黄色沙岩校园建筑兼有加州和罗马式建筑风格，堪称美国最佳的校园建筑设计。该校半数学生都拥有汽车。橄榄球场可容纳8.9万观众。女生不穿丝袜不许在院内随意走动。

所有这些特点都引起了杰克的兴趣。前年曾在《校园自白》中大出风头的贝蒂·格拉布尔使斯坦福这所“富人学校”声望大震。正如《时代》杂志所描述的那样，“这里有位于太平洋海岸边上最好的高尔夫球场、一个马球场、两个湖和两个大的体育馆”。尽管曾有位教授向该校校长提意见，认为“该校越来越像个乡村俱乐部而不像学校”，然而，现在恰恰正是这一点与众不同吸引着这位新英格兰学子。

1940年9月23日，杰克决定留在这里。他用《英国为何

肯尼迪传

沉睡》一书的收入购买了一辆绿色别克敞篷车。他在帕洛阿尔托的总统宾馆向哈佛大学的汉福德校长寄了一封信，要求哈佛寄一份他以前的大学成绩单来，以便他能“在斯坦福选法学的一些预科课程”。

到底杰克学的是什么法学预科，他东部的朋友都毫不知晓。后来被哈佛法学院吸纳的托伯特·麦克唐纳认为“杰克去斯坦福进了新闻学院”。然而勒姆·比林斯则断断续续地回忆说：“斯坦福是个很大的学校。那里有很多杰克以前没有学过的课程。我想他也许什么也没有选。我的确有过这样的想法。”

不管怎样，杰克不久就搬出了豪华总统宾馆，住进了梅菲尔德路一座矮小而又破旧的木房子里。这所房子在格特鲁德·加迪纳小姐的别墅后面，在那里他收到了托伯特·麦克唐纳寄来的第一封信。虽然他不知道杰克会对什么感兴趣，但他认为杰克至少主修“‘东部野汉’和‘海滨美酒’的课程。”托比问道：“你的身体是否好些了？”他想知道“离开家乡的生活感觉如何。那些女生还把你当作救星吗？……告诉我，你这个小傻瓜。我会让你的波士顿女孩子都清楚目前你的状况。”

由于这儿的女生聚会太多，杰克相当得宠。不过由于害怕把性病传染给别人，他的性行为还是相当谨慎。1940年10月4日他给比林斯写信，声称他“在这里非常好。在校园里自己有住的地方，过得很不错。认识了很多，他们都很好——与东部人有很多不一样。不过我至今依然无法适应男女同校这种制度。”但他承认“我正发展与她们的感情，希望能够从她们当中挑选一个并给她打上烙印。不过我的进展缓慢，因为我不想被他们当作一个野蛮的东部莽汉。”他引用了麦克唐纳的这番话来自我解嘲。

第一次被杰克“打上烙印”的女孩当中有一个女孩叫苏珊·伊姆霍夫。他们相识时她在旧金山附近的一所专科学校上学。她回忆说：“杰克伶俐、聪明、机智，但也非常顽固、傲慢和霸道。他谈起他的父亲时滔滔不绝，看起来他与父亲的关系不是一般地亲密。他的脊背上有很大的毛病，因为在那时他睡在木板床上，而且开车不超过一小时便要停下来活动一下。由于他背部有毛病，他做爱时喜欢女孩在上面。他发现让女孩主动一些刺激更大。我记得他做爱之后不喜欢和我相互拥抱而睡。但他的确喜欢与人交谈，而且非常具有幽默感——他总爱大笑。”

幽默永远是杰克的优点。凯思琳五月份写信给父亲时表示：“他确实是我见过的最幽默的小伙子。他总能让爱尔兰女仆开心得哈哈大笑。他总是用地道的爱尔兰方言与她交谈。”

一位叫哈丽雅特·普赖斯的女孩则是杰克确定的第二个女友。哈利雅特的朋友珍妮·布沙尔回忆说：“她非常迷人，宽宽的脸庞，大大的眼睛，身材很性感，步子轻盈。男孩子对她迷恋得快发疯了，因此杰克被她吸引住也是很自然的。”

这位被人们称作“弗利普”的女孩被杰克吸引住也当然是不奇怪的。

我与杰克·费勒是好朋友，他曾在乔特中学读书，我认为自己对杰克比较了解。就在杰克到达斯坦福那天我和他相识的。尽管在当时斯坦福大学很流行喝酒，但杰克从不喝酒，他对喝酒没有任何兴趣。他不抽烟，但他很有魅力。我有一种强烈地感觉——产生这种感觉并不难——他对政府和政治都很感兴趣，而且很可能在那个方面会取

肯尼迪传

得成就。我是说虽然他还没有确定将来干什么，但他对新闻很着迷，每次开车时他总是打开收音机听新闻。他对时事也非常感兴趣……与我当时所见的其他年轻人相比他在各方面都与众不同。他看上去成熟一些，年长一些。事实上的确如此，当然在政治方面他懂得更多。我记得有一次当他正在收听新闻时我关掉了收音机，他非常生气。开始他脾气很大，后来马上平静下来。不过我认为他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浓厚的兴趣。

另外一名毕业生回忆说：“杰克和哈丽雅特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对。”他们经常一同去卡尔梅尔观看斯坦福明星橄榄球赛，一同去电影院，一同去跳舞，一同去饭馆。弗利普回忆说：“他是个有名的人物。当时我真的爱上了他，疯狂地爱他。我肯定杰克也爱上了我。我们曾讨论过结婚的事情，不过只是皮毛而已，谁也没有认真对待。”

到底当时杰克是否正寻找终身伴侣谁也不清楚。他母亲在哈佛毕业典礼之后曾给他写过一封信，称“让那个女孩离开，令杰克有些沮丧。她说她是自己惟一愿意成对出入的人。然而，他承认他并不想结婚。”不过，至少弗利普·普赖斯回忆时对此有另外一种看法。后来她回忆说：“我认为他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他正筹划自己的未来，但愿一切如其所愿，当然也包括与他想像中合适的人举行婚礼。我认为他总是在默默地考虑此事，他对谁都不认真，对我就跟对其他人一样。尽管我们在一起关系很好，通常情况下只是我们两个人，但他并没有准备结婚。”

这就是杰克在斯坦福的生活态度。尽管杰克希望男性朋友

绝对忠诚，但他那颗受过伤害又充满自卑的心，却丝毫没有对一个女性有过忠诚的想法。小乔的一位朋友汤姆·基勒菲尔回忆说：“他在那里出尽风头，简直是乐不思蜀，得意非凡。”弗利普·普赖斯回忆道：

周末他经常去好莱坞。在那里通过他父亲乔·肯尼迪的关系他认识了许多人，他认识罗伯特·斯塔克和那里所有的人，并与女孩子们一起外出。他自己告诉我这一切，而我对此并没有留心。

他经常说起他父亲对婚姻的不忠。他父亲很多时间都远在外地。他回来时总会给他母亲带一些很昂贵的礼物，诸如宝石或波斯地毯之类的东西。显然杰克对父母的婚姻状况知道很多。

我认为他父亲的行为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只不过并不都是好影响！在我看来他父亲对自己的妻子很不在意，而对待她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对杰克也有影响。他并没有看不起自己的母亲，但父亲的那种对妻子的态度和行为对儿子是有影响的。这也正是杰克玩弄女人的根源所在！

与此同时，在学校杰克接受《斯坦福日报》的一次采访中解释说：“我选择斯坦福来上学主要是因为我认识该校前学生会主席兼毕业生联谊会总负责人汤姆·基勒菲尔。他是我哥哥在哈佛的室友。他和我们住在佛罗里达时一直对那儿的气候嗤之以鼻。我很想弄清楚这儿的气候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说的那么好，还是仅为基勒菲尔的片面之辞。”他开玩笑说，“目前他是

肯尼迪传

正确的，但等到我看到天空里出现第一片乌云后就不一定了。”

除了干燥的气候以外，女性众多也吸引着杰克去斯坦福。他告诉《斯坦福日报》的记者吉恩·诺维尔，在斯坦福“无论何时询问大学生的意见，什么能提高学校的质量，约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建议男女同读。”他甚至认为该校球队不败的战绩全部归功于“根本性的精神动力，女性也许与此有很大关系。”

杰克的母亲承认，她的儿子在选择女朋友时看的更多的是胸围，而不是看她是否有头脑。不过斯坦福大学内穿着丝袜的女孩子确实使人看了赏心悦耳。后来罗丝回忆说：“我认为他不会对任何一个只有智慧而没有相貌的女性产生兴趣。我想在选择女友上他更注重的是形象，而不是智慧。”

杰克的母亲过去并不认为杰克对异性具有吸引力，所以她对杰克在这方面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颇感意外。她在比较杰克与其哥哥的舞蹈时说：“他的乐感没有小乔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小乔的相貌更好些。但杰克的脸庞是很有轮廓的那种，而且比他哥哥上相，这一点真有趣。他很上相，所以他才显得外表英俊。但正如我所言，如果你在照片上仔细看，还是小乔的容貌更标准。”

然而，杰克却奇怪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女孩已不再被“标准”的相貌所吸引。简·苏伊达姆在新奥尔良的马尔迪格拉斯同杰克相遇时，他正在热烈追求弗朗西丝·安·坎农。苏伊达姆认为他“令人难以置信地英俊，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有这种评价的不仅是苏伊达姆一人。哈佛的同学吉米·鲁斯马尼埃认为杰克是“将严肃的学者和令女孩发疯的花花公子性格集于一身”。杰克的信中清楚地把这些都说了出来。他问

勒姆·比林斯：“你是否记得乔特有一个胖胖的金发碧眼的男孩叫吉姆·费勒？”

他在这里很有名，称得上是个人物，他在乔特中学时称我是个真英雄。学校里大多数的同学认为我长得有点像卡萨诺瓦。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极讨厌的家伙，反正不管怎么样，吉姆在校园里对我开始进行挑战。我很高兴在乔特时，对那些年轻的小伙子还不错，现在终于得到了回报……下次我如果能再见到他时，将详细向他说明为什么在乔特你不受人喜欢，尽管他对你没有什么印象。

他只是认为你很讨厌……最美好的祝福，杰克。

斯坦福商学院

杰克写信告诉比林斯：“我现在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真正的休养方式。白天去商学院上几节课，每晚 10 点上床。”他告诉《斯坦福日报》的记者吉恩·诺维尔，他准备“学习一些商业法”。这位记者最后这样写道：“他计划在斯坦福商学院读一年书，然后去耶鲁法学院上二年级。”

不过由于身体状况不好，杰克最终未能成为斯坦福的一名真正的全日制学生，他成了西奥多·克雷普斯教授的旁听生，主修“政府和商业入门”课程。克雷普斯博士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罗斯福政府的顾问。他对约瑟夫·肯尼迪并没有什么尊敬与崇敬。他们俩在股票交易委员会时便相互认识。他的一名学生后来回忆说：“他的确经常说起约瑟夫·肯尼迪‘赚

肯尼迪传

黑心钱却逍遥法外’。这也正是他成立股票交易委员会时所要消除的行为。我们在商学院听过无数次这样一句古话，即‘1840年爱尔兰发生的土豆饥荒是对美国影响最恶劣的灾难’。”

不过，无论克雷普斯对约瑟夫·肯尼迪有多么厌恶，他还是非常喜欢杰克，一个来自哈佛母校的优秀毕业生，同时还是一本畅销书的作者——走进他的课堂。

虽然克雷普斯愿意接受杰克，但班上的研究生并不喜欢他。杰克对商业研究的那种漫不经心惹恼了他的同学。当时有一位自称其家族里曾出过一名参议员和三名众议员的同學，在他的回忆录《年轻的波士顿爱尔兰人》中对杰克在斯坦福的情况作了如下的记录：

他似乎对课程毫无兴趣，只是想大概了解一下课程的主要内容。他露面也很少，负担极小。我想我从未听他向别人炫耀……他是个十分谦虚的小伙子。这是我对他最恰当的形容。他并不冷淡，只是不爱说话。他的名字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因此谁也不会将他与他的父亲联系在一起，而且叫肯尼迪这个名字的也太多太多了。

一次他出现在克雷普斯教授家中时身着晚礼服，却穿了一双极不相配的网球鞋。我觉得很奇怪，但后来我们就那本有关英国的书展开了讨论。尽管我曾在欧洲上过学，而且有一位担任纳粹医务代表、后来又被纳粹残忍杀害的继父，但我却不敢出版一本关于德国的书，而他仅在英国住了几个月，便认为自己有资格来对英国加以评论。

他在斯坦福没有任何朋友，谁也不知道他住在何处。

肯尼迪传

他到底怎样度过谁也说不清。他来去匆忙，很少能引起别人注意。他从不发表过激的言论……从不谈论饮酒作乐或姑娘之类的事。他沉默寡言，彬彬有礼。总之他显然对自己或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自信。

另外一名学生回忆说：“我记得肯尼迪先生好像坐在教室的后面，但我不记得曾在课堂上听到过他发言。他好像经常缺课，因为有一次杰克逊院长来教室叫肯尼迪先生接他父亲的电话。当所有人都不知道杰克身在何处时，院长有点不高兴。”

另外一名同班同学后来声称：“据我所知，肯尼迪既没有参加校园活动，也没有参与学生事务。身为《英国为何沉睡》这本畅销书的作者，他并不引人注目。这本书从未成为商学院谈论的话题。尽管战争已进行了一年多，但与我熟悉的人当中没有人读过这本书。也许他觉得在斯坦福大学只不过是玩耍的另一种方式，而不是像当初所设想的那样。”

这种无知的观念使杰克想起了比林斯。幸运的是，那些极力想了解“这位相当内向、沉默寡言”的波士顿爱尔兰裔的知名年轻人的人几乎都没有得逞。在课间休息时卡斯伯森曾经“走到他身边与他讨论各种各样的事，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他，也希望他能与大家打成一片，了解更多的同学。我们与杰克聊天而且消除隔阂后，他开始参加我们在草地上的讨论会，而且在我们将他拉入集体之后，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听他讲，而不是大家开展讨论……而当他与我一同上旁听课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似乎是一个记忆力超常的出色学生。”

同龄人的哈利·穆海姆不同意杰克是个在舞会上找不到舞伴的人说法。他还清楚地记得斯坦福学生会的主席布鲁斯·杰

肯尼迪传

沙普第一次介绍杰克时的情形。穆海姆记得当杰沙普抱怨学生和管理上没有能力时，“杰克马上针对这个问题作出强烈反应，而且向布鲁斯解释说，任何一个没有权力的管理机构都是不会有效率的。他说布鲁斯应该去寻找权力的真正基础……肯尼迪以平静的语气一直坚持着他的观点，但他并不认为要将这一机构推翻。他说：‘比如罗斯福，他在美国政府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很少有人注意到。’”

肯尼迪的言论在共和党人士内被认为是怪异的言论。“布鲁斯回答说，他的父亲，一位奥塔德纳商人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肯尼迪微笑着没说什么，继续作了一些与题目无关的解释。”

穆海姆继续说道：“即使你对这些内容并不感兴趣，杰克还是能让你听得入迷。他会迅速提问、思考和解释。他自然流畅，娓娓道来，而且在洋洋洒洒的论述中会把小幽默自然地穿插进去。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信手拈来各种事情作为例证。我从未见过同龄人中有人能如此旁征博引。”

罗伯特·默莱回忆说，很难了解杰克在斯坦福整天到底忙什么的原因是，“他从未真正参加商学院的课程学习。他的学习主要是政治上的学习。要不是肯尼迪与温德尔·威尔基之间的总统竞争十分激烈，我也不会知道这一点。克里普斯则多次开玩笑称他无法使这位学生对商业感兴趣。”

这的确很困难。霍珀教授早就提醒杰克要“先给他的船装好机器，才有可能扬帆起航，搏击人生”。尽管他尽心尽力，他对商业研究还是没有兴趣，而关于世界历史关键时期政治观点的讨论则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说来也巧，政治学系高级教授汤姆·巴克利那时恰巧在麦菲尔路成为杰克的邻居。40

年后，巴克利回忆了他是如何去芝加哥参加 1940 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在芝加哥，罗斯福被提名去竞选第三次连任总统。后来当他于 9 月重新返回斯坦福时，“加迪纳小姐，麦菲尔德路的住所的主人告诉我，她把‘那间小木屋’，即后面的那间小客房租了出去……她说这儿有一位从东部来的年轻人。当然这就是杰克·肯尼迪。每天我都能见到他，渐渐地就熟悉起来，而且很是喜欢他……虽然他没有学分，但他一直坚持听课，而且许多是我的课，尤其是 A - 1 研究班课程中的当代世界形势问题。”

尽管巴克利课程的主要内容都深深吸引着杰克，但这里的政治气氛与哈佛相比，却对共和党人更有利。由于“大部分教职员是共和党人”，学生中三分之二的人支持 1940 年参加总统竞选的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因此，杰克肯定要受到责骂，甚至被那些势利的斯坦福学生所厌恶。然而，在穆海姆看来，杰克与斯坦福里的同学比起来最不一样的是，他能够调节 1940 年秋天“农场上”的乡村俱乐部的气氛。而其他入，无论是男是女，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杰克认为美国迟早会参与战争。哈利·穆海姆回忆说：“杰克给那些遥远无知的西部人带来的信息是，战争正在进行，而且已经持续了一年，我们即将被卷进去。我早就听过同样的消息——不过那是从收音机里听总统本人宣布的，而且直到那天夜里我才相信真正爆发了战争。”

“真有意思，谢谢你，小姐。”

斯坦福成立了国家紧急委员会，专门负责与帕罗奥托征兵

肯尼迪传

委员会相联系。主席威廉·特纳后来认为这是个非常不受欢迎的工作。杰克作为重要成员之一，与其他 1700 万美国人一样，不得不于 1940 年 10 月 16 日之前完成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非战时征兵登记，等待入伍。在这一过程中，他在斯坦福结识了一位新朋友叫亨利·詹姆斯。他是位高大、英俊的唯美主义者，曾在耶鲁大学读书。

詹姆斯回忆说：“在那片土地上我仅仅是个陌生人。在忍受着胃溃疡这个病魔的同时攻读英国文学学位。”詹姆斯与杰克一样也信仰天主教，但他出身于纽约的“上等”家庭。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认为杰克的行为很不礼貌。

到那儿大约两个月后，有一天，我拿起一份《斯坦福日报》，上面刊登了一篇对杰克的采访。文章说斯坦福来了一位哈佛的年轻人，他写了一本畅销书。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因为我与姬克很熟悉。她过来看麦克唐纳一家人的时候，我还曾与她一道跳舞，期间她提到了她哥哥杰克。我所了解的也就这么多。

我由于是孤身一人，很想认识一下杰克。凭我的感觉他应当是我所喜欢的那种人。我们可以高兴地谈论自己是名牌大学转学生的事。因此，我花费了大量功夫，极力想弄明白怎样才能见到他与他成为朋友。我给商学院的人打电话寻找这个人，最后跟踪他到教室，大概在 11 点 20 分他们才下课。我在 11 点一刻便守在教室的门口，我得辨认到底哪一个是杰克。不过我敢肯定眼前沿着过道走来的便是杰克，尽管当时有很多人围着他。采访刚刚结束，他几乎已经成了名人。我走过去，挡住他，然后与他讲话。

肯尼迪传

我问道：“你是杰克·肯尼迪，没错吧？我是亨利·詹姆斯。从纽约来，在耶鲁大学就读。我想找个机会和你谈谈，你觉得怎么样？”

他却回答：“噢，我很忙。有许多事急着去做，我得走了，恐怕你的想法真的不太可能。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一直在这里等我。见到你很高兴，祝你好运！”

我心里使劲骂道：“混蛋！见鬼去吧！”

杰克与詹姆斯的第二次见面的情况则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回忆道：“有一天我正在邮局取我的邮件，恰好这时杰克也进来取他的邮件，他看看我说：‘我以前见过你吧？’我说：‘对，我大约一周前见过你。’”

“‘你叫什么来着？’”

“我们聊了一会儿。我想我无意中说了些很好笑的事，而他所说的关于斯坦福等方面的事则令我放声大笑。他这样说道，‘过来和我一起吃午饭吧。’”詹姆斯解释说，他有溃疡病，得按医生开的食谱吃饭。杰克却非常迫不及待地说：“我说，过来和我一起吃午饭吧。”

“咳，我好长时间没有被别人命令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我说‘行’。然后我们去了咖啡厅，在柜台前坐了下来。很快我就被他的魅力迷住了。”

杰克的魅力正是在于他的超常的智力和才能。“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一位新人，他都会询问对方，仿佛把对方放在烤盘上。‘你毕业于何处？从哪里来？你在耶鲁大学学什么专业？你目前在这里干什么？你是如何学的？’就这样，他在五分钟之内便了解了我的一生！而我对他的了解除了在校报上看到的

肯尼迪传

那些外，其它方面一无所知！”

他们开始频繁见面。“我们定期见面，一直是这样。我们一同出去看各种比赛。自从我离开纽约，两个月来第一次这么开心。噢！他是如此地风趣、如此地迷人、如此地聪明！他讨人喜欢的地方太多了！”

杰克惟一没有的是伤感。詹姆斯很不明智地给他看自己东部女友的一封文采飞扬的情书时，杰克却无动于衷。信中这样写道：“我现在根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内心的悲伤……我慢慢走过你的屋前，步履蹒跚，泪水横溢。”“我说，‘杰克，这篇文采不美吗？’他说，‘噢！这些话对你来说也许很浪漫，但在我看来简直是太无聊了！’”

詹姆斯回忆说：“你知道，对我而言这可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它是那样的残酷，以至于我放声大笑！”

詹姆斯回忆说，杰克对天主教的态度和他差不多。

关于天主教的问题我们谈了很多。他认为大部分天主教的教义都令人难以置信。他特别讨厌教堂！他几乎从来都没去过那里。他对宗教一点也不感兴趣。他是个极力追求现实的人，对正在发生的一切事都感兴趣，但对永恒则持怀疑态度。不过他从没考虑过放弃信仰。他喜欢天主教徒这种身份，这使得他显得与众不同，有别于这个以新教为主的宗教氛围。然而除此之外，宗教没有像带给别人那样给他带来任何影响。他也从没想过像别人那样付出更大的能力、智慧和感情去感受宗教。“我真没有时间去做那些。”

在杰克眼中爱上帝就像随意爱一个女人一样，不过只是一件浪漫的事情，而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詹姆斯认为：

尽管很多女性投入过他的怀抱，但是杰克从没有真正爱上一个人。他需要女人，他喜欢女人，但他并不想对这种关系承诺什么。记得在耶鲁上学的时候我的心理医生曾说过理想婚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建立，即男人表示：“我将献身于这个女人。她将成为我孩子的母亲，成为婚姻的火种的女性保护者，而我愿意将男性的一切奉献给她。”

然而杰克根本不屑于向女人要求这些！对他所需要的我们常常觉得可笑。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真有意思，谢谢你，小姐。”在性关系方面他惟一感兴趣的的就是性交，当然也并不是惟一，这样说有些夸张。但至少是他最需要的，是他自己向我承认的！是他告诉我的！他说：“对女人我没有兴趣。大部分情况下，一旦我和某个女人发生关系，我就不想把关系再保持下去。我喜欢不断征服新的女人，那意味着一种挑战。我喜欢女人和男人之间的那种竞争，我就是喜欢这样。我喜欢追求，但不喜欢屠杀！”

这正是他的人生哲学，这也充分说明了为什么他在很多方面不是个有内涵之人，甚至连知识分子也算不上。

尽管在这两方面他经常自我得意，自我吹嘘，不过他从来没有对我吹嘘过什么，因为我更了解他！我从来都没有因此对他不尊敬，相反，我却觉得我反而更喜欢他，因为他不是个完人。他身上有很多小缺点、小毛病。

肯尼迪传

在杰克刚强的外表之下，詹姆斯认为有可能存在着连杰克自己也不想面对的软弱一面。

我认为杰克内心深处还有软弱的一面，那是他自己不愿承认的。他并不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他只是在别人面前表现成那样，而且极力表现自己的阳刚之气。然而他瘦弱的体型、易受伤害的性格、他的各种疾病，所有这些他都不愿谈及。我觉得，他从心底为此感到羞愧。这些都是软弱的理由，是他不能接受的缺点。我觉得他那种男子汉的行为，如不断征服女孩，只是一种弥补，弥补他身上缺乏的某种气质，而他哥哥小乔却具备这种气质。小乔才称得上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是一个纯粹的男人中的男人，而杰克则不是。他兼有女性化的男人和男人中的男人两者的特点。在这方面他不像小乔那样简单。他是一面多棱镜，可以折射很多事物，而且也会折射出不同的颜色。他非常自卑，这正是同性恋患者具备的特征，绝对是这样。如果你了解同性恋患者的性格特征，你会注意到他们照镜子很频繁，他们非常注重容貌，对于杰克来说也同样如此。我对他说：“杰克，你在那样强烈的阳光下行走真是不可思议！你打算去佛罗里达只是想尽快把皮肤晒黑，使自己显得更英俊些，回来好参加宴会。”他回答说：“咳，亨利，我并不只注重外表，在阳光下我会感觉良好，给我以自信和健康的感觉。我会感到健康、强壮和迷人。”

杰克在一封信里竟然大言不惭地夸耀自己的容貌。这封信是写给哈佛施佩俱乐部一位叫卡姆·纽伯利的人的。纽伯利曾

经给他寄过很多照片，上面加了一些嘲笑他肤色的注释。杰克于 10 月 28 日，即华盛顿开始大规模征兵的前一天夜里，怒气冲冲地写了封回信。信中这样写道：

接到你的信真让我生气。我最不希望的就是发生这样的事，如今还是发生了。也不知秘密是怎么被泄露出去的，也许是华盛顿一些企图搞竞选材料的共和党人。在我的兵役卡肤色一栏里标有“肤色红润”的地方，令我气愤的是体检人员给我打了个大大的“×”。

你只穿了件小两号的衬衫，试图改变狼吞虎咽的形象，以致于快被窒息在走廊里。尽管如此，可是你永远属于“狼吞虎咽”之列，所以最后你还是心神不宁，甚至对着你的老伙计杰克大发脾气。这真是件令人烦恼的事。

当你得知我顺利通过体检时你心都快碎了。我当时穿着往常吃饭、上课和打球时穿的那件普通的翻盖帽子和红色高领绒衣。

我想后来的羞辱使你更难堪。负责注册登记那个人在你的兵役卡“识别标志”一栏填上了“头顶稀疏，头发在一年内就会秃光”的字样，这也使你不得不去找偏方来治疗一下。

也许你会马上采取措施，不假思索地购买一个由梅加通用电器公司生产的太阳灯，从而迅速使皮肤恢复成深柠檬色。我曾经告诉过你，如果从檀香山旅游回来你的皮肤肯定会变得非常棒。1939 年冬天你曾在棕榈滩获得很好的美誉。你希望这回在那里能够重新获得这一荣誉。

你肯定听说过我为了今年圣诞节能保住我的美誉而付

肯尼迪传

出的努力。每天我 9 点起床；早餐吃点可口的玉米粥、浓咖啡和烤鸡蛋；约 10 点至 11 点出去晒背，11 点至 12 点半晒正面，时刻调整位置让阳光从恰当的角度照到脸上；打开车篷在乡村奔驰一会儿；下午则在实验室，测试和检查我的肤色对各种油的不同色素反应。厂家的广告并不可靠，我要亲自鉴定，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第二天出去做准备。有时我也花上几分钟做小饼。晚上时间则阅读霍华德·斯普林斯的名著《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有时也到女生聚会上去以优惠价卖几本有我签名的《英国为何沉睡》。

我相信只要我努力，在今年圣诞节保住我去年获得的美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想你肯定会尽快赶到佛罗里达，同我竞争。我想你额头上不小心脱落的皮掉进汤里，肯定要浪费好几顿美餐。

蒂尼·摩，如果你调整一下自己，承认你自己打败了自己或者被打败，结果也许会更好。这个夏天当你在怀基基海滩的阳光下暴晒时，我则在科德角耐心全面地锻炼，根本不管你的嘲讽。当你带着褐黄色皮肤回来时简直就是一块黄铁矿，我则开始等待“黑人首长”这一西部海岸的最高美誉。

然而这封信是杰克最后一次使用自怜自叹、校园式的开玩笑方式，这倒不只是由于他患上了致命的肾上腺炎这种疾病，他的皮肤色素日益加深，而且还因为第二天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在华盛顿“蒙着眼睛”站在摄像机前把手伸进了一个装满签条的玻璃碗中。在东部时间下午十二点十八分，第一批征兵的签条被正式交给了罗斯福总统。其中第十八个蓝色小袋“序

号为 2748，帕罗奥托区的 2748 号代表的就是约瑟夫·P·肯尼迪的儿子、就读于斯坦福商学院的杰克·肯尼迪。小肯尼迪是最近一本关于二战爆发前的英国政策的畅销书的作者”。《斯坦福日报》第二天在头版报道了这一令人吃惊的消息。上面还附有一张杰克面带微笑的照片。由于病情加重而推迟去耶鲁法学院学习的约翰·F·肯尼迪被应征入伍了！

威胁美国总统

托比·麦克唐纳听到这一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杰克，我发誓我真的快要笑死了。一想到你将与乔·路易斯和摩·西德尔伯格一道在军营生活，我就会笑着睡着，又笑着醒来。”每次他一想到那个外表邋遢、经常生病、反对规定的杰克竟然穿上了军装，他禁不住就要大笑。“主啊！世上有那么多人，你真是倒霉，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过去我们常常遇上倒霉事，原来都是因为你！所幸的是你食欲还不错。”

勒姆·比林斯正在康涅狄格州的可口可乐公司工作，他也发来一份开玩笑的电报：

恭喜杰克，即总统选中的第十八个目标。现通过特快专递给你寄去一大捆卡其布和一本征兵说明书。我建议你别再晒太阳，因为使皮肤成为黄色更时髦些。

还有一位叫里普·霍顿的朋友回忆，那天宣布征兵命令时大家都在一个电影院里，杰克的照片就出现在银幕上。我记得当时一想到他被应征入伍了就很激动。杰克本人却并不感到好

肯尼迪传

玩。他向比林斯承认：“这次应征使我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其实他们是绝不会接受我的。但是如果我不去的话，事情会更糟糕。”

麦克唐纳与杰克开玩笑说：“伙计，赶快让你老爸回来吧！小心让那些炸弹掉在他身上。幸好现在炸弹还只是落在他的旁边，征兵时又失去两个胆小鬼的惟一保护人，我们可受不了。”

作为正在斯坦福上学的学生，眼下杰克完全可以推迟应征入伍，因为在校的学生可以推迟到本学年结束后再入伍，但正如里普·霍顿所言，这件事之所以有意思就在于这样一个经常生病、缺乏军人气质的学生居然能成为首批应征者，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的父亲恰巧又是一个极力反对美国参与任何海外作战活动的人。”

杰克的父亲不只是反对履行作战义务，在他坦诚的波士顿爱尔兰的“现实主义”外表下面，还隐藏着一种软弱的性格。两周前杰克曾经自豪地对《斯坦福日报》的记者吹嘘说：“我听说他们现在评价我的父亲是‘饱受攻击的美国大使’。这可是一个赞美之辞，不是吗？”

天哪，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事实上，1940年9月27日，肯尼迪大使不断向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发来电报，称他“对全面卷入这场战争没有任何信心”，而且“这一点印象非常深刻。希望目前英国在领导和工业生产方面向我们美国人提供有用的东西几乎是不可能”。几天后，当德国人对英国城市发动全面轰炸时，这位大使向美国国务院发表正式声明，他希望能远离英国这艘将沉之船。他威胁赫尔说：“我对这里的一切很不满意。”如果国务院再不将他召回，“我就要自己采取行动，甚至辞职不干了。”

然而罗斯福根本不理他的这种威胁。正如美国记者鲍勃·金特纳和乔·艾尔索普在他们的辛迪加专栏中报道的那样，“总统认为将肯尼迪留在伦敦比回到纽约的危险要小。”因为在罗斯福看来，一旦肯尼迪回到美国，“他将会劝说大批领导人变得和他一样消极悲观。那么，我们的外交政策会因软弱而瘫痪一半。总之，希望他能保持沉默，所以只好命令他留在伦敦”。

然而肯尼迪并不想保持沉默。如果罗斯福硬给他贴上失败主义的标签，他肯定会给罗斯福挂上战争狂徒的招牌。1940年10月10日，哈里法克斯勋爵给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发了一封加急电报，提醒他说，美国驻英国大使准备威胁罗斯福。“他告诉我，他已经寄了一篇文章回美国。如果万一他本人无法回去，这篇文章会在11月1日，即总统大选前五天刊登出来。此举非同小可，当我问他文章主题是什么时，他说是对罗斯福政府的抗议……他是个极度失望和郁闷的人。”

后来阿瑟·克罗克透露，肯尼迪并非仅是吓唬吓唬。他证实，肯尼迪不仅起草了一份“对罗斯福政府的控诉书”，而且还把它交给了助手爱德华·摩尔。他告诉摩尔，如果罗斯福让他继续呆在这个饱受轰炸的地方，他就把这份控诉书向全国各地公布。

同罗斯福总统一样，英国外交部对这篇文章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外交部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记录：“肯尼迪先生的这篇文章将在大选四天前公布，目的就是要给罗斯福总统点儿颜色看看。”英国外交部通过秘密途径已经了解到“肯尼迪决定与罗斯福先生的竞争对手威尔基先生联合。鉴于肯尼迪先生整个战争期间对英国局势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与美国驻法国大使布利特先生之间长期的恩怨纠纷，他的这篇文章如果真的出现，一

肯尼迪传

定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震撼力。”

面对这种情况，罗斯福除了作出妥协，别无选择。第二天，即 1940 年 10 月 11 日，赫尔通知肯尼迪尽快回国。英国外交部的美国问题研究专家 T·诺斯·怀特海德表示很难断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肯尼迪回忆起他向邱吉尔首相告别的那次拜会时说：“邱吉尔认为我这么快回去是为了帮助罗斯福进行连任竞选。我不满地告诉他，白宫无视驻英大使的存在而与首相进行直接联系的行为使得我与罗斯福之间已产生了矛盾。”

邱吉尔不喜欢肯尼迪，觉得他不顾大局，总是在小事上吹毛求疵。于是，他离开屋子去“参加一个会议”。这就是首相与肯尼迪的最后一次正式会谈。而内阁中的工党成员都已听说肯尼迪威胁罗斯福总统的事，所以对他的态度也都很冷淡。肯尼迪后来叙述道：“我发现阿特利先生早在 1940 年秋天就开始琢磨政府战后将向公众提供什么样的福利待遇。”肯尼迪感到惊讶的是这位副首相对打败纳粹竟然充满信心。而工党雄心勃勃的福利计划却令肯尼迪感到幼稚。“未来的英国民主制度半掺和着国家社会主义形式，如果没有集权主义，一切终将会以失败而告终。”

这位绥靖政策的大师终于离开了英国。肯尼迪回忆道：

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给内维尔·张伯伦打电话。他是主宰过世界事务的领袖当中一个最不受欢迎、被误解最多的人，他也是个果断的人。我看望他时他生命垂危。三天后即 10 月 22 日，他将要做一个手术。他微笑着虚弱地说，纳尔维克的失败推动邱吉尔当上了首相，实际上邱

吉尔本人正是发动挪威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人们只知道这次战争失败了，将一切错误归咎于政府。身为首相的张伯伦自然逃不了责任。他说：“领导人只能听从公众的意见，或者比公众意见稍微超前一些……商业是英国发展的命脉，当时要想把资金从商业中提取出来，投入到军备中去，是不可能得到国人支持的。”

张伯伦一面握着我的手，一面为他一生的失误对我解释。他对我说：“我的一生中，并没有干出多少辉煌的业绩，但有一点我肯定，我的确做出了一些贡献。别了，我记得你以前总是说你会一直支持我的，但是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

张伯伦说得很对。1940年10月22日，那天是星期二，肯尼迪从南安普敦启程，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里斯本，从那儿再转飞机经百慕大回国。

在挤走了这么一位悲观主义的大使之后，英国人彻底松了一口气，但罗斯福却深感忧虑。自从艾尔索普与金特纳最近通过报业辛迪加发表那篇文章后，他与肯尼迪之间的隔阂已经为人所共知。那篇文章公开表示，美国驻英大使已经作好准备要在“他通过海关之后，立即向遇见的每一位美国听众表达他的观点”，好让罗斯福下不了台。飞机在里斯本着陆时，肯尼迪收到了一封信。他后来回忆说，信中“特别命令我直接到白宫并且先不要向记者发表任何言论。我当然对此要求感到十分愤慨”。

然而天公不作美。由于天气的原因，肯尼迪先在里斯本，后又在奥尔塔耽误了几天，这样一来，他在1940年11月5日

肯尼迪传

的大选到来之前威胁总统的机会就变得越来越小了。肯尼迪回忆说，他在那儿又收到罗斯福总统的一封“密件”，要求他和肯尼迪夫人抵达纽约后立即到华盛顿去见他，星期六晚上就准备住在白宫。

六天已经过去了，而肯尼迪仍然在风雨兼程地往回赶。10月26日，星期天早上，耽搁在百慕大的肯尼迪又一次收到命令，命令他当天晚上去见总统。他拨通了白宫的电话找罗斯福。据当时在办公室里的一名年轻国会议员林顿·班尼斯·约翰逊回忆说，罗斯福拿起话筒对肯尼迪说，“啊，乔，听到你的声音真令人高兴。请你今晚到白宫来吃顿便饭。”约翰逊惊奇地看到总统用一个手指在喉咙上慢慢地摸了一下说：“对你的话我很着急，想和你好好谈谈。”

最后晚餐的分享

1940年10月26日下午两点三十分，肯尼迪乘坐的航班抵达纽约。罗斯福一刻也不敢耽误，他早已派遣海事委员会的马克斯·特鲁伊特去机场亲自交给肯尼迪一封“总统要求我立即前往华盛顿的信件”——这已经是第四道命令了。

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肯尼迪确实有能力毁掉罗斯福的连任竞选。但是现在他却犹豫不定。记者们早已守候在贵宾室门外。他回忆说：“我先见到了孩子们。然后我们——包括肯尼迪夫人及一些朋友——便进了另一个房间。我们讨论了当时对形势的看法，并商量了我究竟是否应该支持罗斯福总统连任竞选。”

在这出莎士比亚式的戏剧里面，罗丝·肯尼迪一直建议谨

慎从事。而肯尼迪的情人克莱尔·卢斯却持不同的意见。她希望肯尼迪像曾经答应过她的那样辞职，然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

肯尼迪犹豫了片刻。“我个人对罗斯福有许多不满，至于是否表明立场，我还得慎重考虑。”他这样回顾他当时的困窘。在英国时，他与威尔基距离很近，却无法与他达成一致。更重要的是，从最近民意测验的结果来看，威尔基没有什么获胜的希望，即使肯尼迪支持他也不大可能会成功。

“不管怎样，”肯尼迪回忆说，“我和罗丝乘坐五点钟启程的飞机去了华盛顿。”根据克罗克的回忆，罗丝在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上建议她丈夫不要辞去大使的职务：“总统将你——一名天主教徒，派往伦敦出任大使。恐怕换了任何其他的总统都不会做到这一点的。”她说，“他是把你当作他的全权代表派遣到那个教皇曾经加冕过的国家。如果你现在辞职，那么在许多人看来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肯尼迪回忆说，到华盛顿后“白宫的车正在机场来迎接我们，并直接带我去见总统”。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的气氛那时十分紧张。肯尼迪手持张伯伦的一封信。这位绥靖主义者、英国的前首相不久就要告别人世了。肯尼迪将这封信交给了总统，“并向他详细描述了英国目前所处的困境”。然而，“有关他与我的关系以及任何相关的事情他都一字未提”，因为罗斯福很聪明地邀请了两位证人。他们是参议员吉米·伯恩斯及其夫人。与米西·勒汉德一起，“我们去他书房旁边的二楼餐厅用餐。在那儿，我们吃了腊肠、炒鸡蛋、烤面包片和大米一起做的甜点”。在肯尼迪看来，这次宴会并不是为这位饱受攻击的美国大使接风洗尘的。

肯尼迪传

的确不是。实际上，这却是一场鸿门宴。当大家吃到一半时，伯恩斯参议员“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肯尼迪回忆说：“他认为我如果在星期二晚上一个人在电台上发表演讲，那将是一件好事情。他认为我完全有必要这样做，而且这样做对罗斯福连任能否获胜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他多次向总统建议此事而总统也认为应该如此。对此，我既没有答应也没有否认。”

同时，罗斯福也想尽办法，对罗丝·肯尼迪施加影响。总统认为当天晚上她应该陪她丈夫住在白宫。他知道，罗丝·肯尼迪来自一个渴望成为中产阶级、信仰天主教的波士顿爱尔兰裔家庭。她在伦敦被剥夺了大使顾问职务达一年之久，在布朗克斯维尔的社交圈里几乎处于“流放”状态。对她来说，这种邀请是不可能被拒绝的。“他知道说服我的方法是尽力地恭维我父亲。”罗丝后来回忆说，“我知道他的真实意图。虽然我明白他们在诱惑我，但这种诱惑实在让人难以抵御。”

据罗丝说，总统后来特地将话题转移到了她和她儿子们关系的问题上，并用蜜语甜言恭维肯尼迪先生：“我对你与孩子能够确立如此良好的关系感到十分惊讶。对于一个像你这样有太多公务等着处理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了不起。如果你的儿子们也想从政的话，我个人会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们。”

然而，肯尼迪当时十分了解罗斯福的目的。“总统拼命地给罗丝做工作。我想，这是因为他知道罗丝对我会有影响。他跟她恭维她的父亲。在整个宴会上，伯恩斯极力向我推销他的政治主张，但是我没有作任何决定，因为我想在作决定之前，需要和总统单独谈一谈。”

“回到书房之后，看上去他们似乎仍没有让我与总统单独交谈的意思，最后我不得不说：‘既然我与总统不太可能单独

交谈，我想我还是在大家面前说出我的心里话。’”肯尼迪后来告诉克罗克说，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罗斯福的脸突然就变白了，而伯恩斯则愣愣地呆在那儿了。”

“首先，我对于自己被对待的方式非常恼火，”肯尼迪开始了，“我认为这完全没有道理。我认为自己没有理由受到这样的对待。”令伯恩斯和罗斯福吃惊的是，肯尼迪声称他从来没有违背罗斯福，也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说“会给罗斯福带来哪怕一丁点儿麻烦的话”。令人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表示他一直忠诚地支持罗斯福连任：“我从戛纳给你寄过来一封信，告诉你我愿意为你做什么。但是，你仍然给我以恶劣的回报。第一，在没有向我征求意见的情况下，将比尔·多诺万上校派往伦敦；第二，你派了将军去伦敦，可是英国政府却比我先知道此事；第三，你是通过洛瑟安而不是我在关于军事基地与驱逐舰问题上与英国政府谈判；第四，国务院从来没有向我通报过任何情况。”

“我不得不这样说，所有这一切都削弱了我在英国的影响，我不得不转过头来威胁英国政府说，‘如果你们不让我知道所有情况，那么你们会发现在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中我会带有一种非常强硬的态度。’因此我不是依靠美国政府，而是依靠自己开辟了一条路。”

总统本可用以下三句话使肯尼迪住口，即因为你是个绥靖主义者，是个懦夫，是个失败主义者。但是，他还是希望使肯尼迪在接下来的九天里与他仍站在同一战线上。后来肯尼迪回忆说：“罗斯福立即否认了我所说的一切，他本想告诉我关于多诺万之行，并且曾下令国务院将其它的事情也告诉我。”当时肯尼迪无法平静，后来他告诉克罗克说他从来就没相信过罗

肯尼迪传

斯福的话，“如果说有人说谎而不脸红，我想，那个人一定就是总统。”同时，他还回忆说，“我很生气地质问他在艾尔索普的专栏里面怎么会出现我发的电报内容时，总统说他也不明白……他推卸了一切责任，并认为这对我们的友谊没有伤害。”

他们的谈话没有结果，他们的争论也根本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在这个时候罗丝插话了，她说：“当时双方远隔三千多英里，谁都很难看清事情的整个过程。”肯尼迪对她很不满。于是他们继续争论不休。

罗斯福总统与肯尼迪大使之间公开的分歧能否改变 1940 年大选的结果，这很值得怀疑。否则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因为一次宴会而被改变了。实际上，肯尼迪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自己是无能力战胜美国总统的，特别是威尔基在大选中获胜的可能性又十分渺茫。于是，他决定耍一点小手腕，将对总统的讹诈再向前发展一步，争取获得更大的利益，不仅是为了远离伦敦的轰炸，同时也要迫使罗斯福给他在国内另外找一个职位。最后他说：“我认为自己有极大的义务和责任来发表一篇讲话。但是，在我作出这个决定之前，我希望能够把目前的情况讲清楚。我仍然会把这篇演讲写下来，但不涉及任何人，我只讲出心中的真情实感。”

第二天伯恩斯和罗斯福邀请肯尼迪与总统和其他随行人员乘同一列火车去纽约召开记者招待会，但被肯尼迪拒绝了。1932 年的罗斯福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那天晚上，肯尼迪将罗丝一人留在白宫，而自己却偷偷地离开了白宫。他通知记者们，第二天下午他将在纽约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关系出现裂痕

假如肯尼迪大使当时与罗斯福一同去纽约，假如他用1932年和1936年所表现出的热情和精力支持罗斯福的竞选连任，那么罗斯福肯定会主动地在政府里面重新给他安排一个重要的职位。事实上，那天晚上肯尼迪离开白宫，罗斯福跟罗丝开玩笑说，千万不要让她丈夫从她身边逃走。

然而肯尼迪却作出了他的政治生涯中最失误的判断。在拒绝了与总统坐同一列车之后，他告诉罗斯福说，“如果我答应了，我的态度就不会那么坚定了；实际上，”他坦率地承认，“如果这样做，我会给人一种印象，即支持罗斯福。”

话一出口，那么他的这一解释——大家都认为他撇下公务离开伦敦就是为了制定反对总统的计划——就再也难以收回了。他已经通过威胁的手段强行闯回来，现在却又像一个任性的小孩，晚上又偷偷溜了出去，抛下他的妻子不顾，重新坚持自己的立场，希望这样能使罗斯福在大选前答应他什么。

假如像杰克曾经建议的那样，肯尼迪在英国再住上两个星期，然后在大选到来前按照惯例辞去大使一职，那么他会以一名英雄的身份重返美国。然而，他没有这样做。肯尼迪不愿当“傀儡”，他告诉罗斯福说，他已经变成了用来祭祀的牲畜——在被扔给狼群品尝之前先享受一次简单的总统晚宴。

对这段插曲约瑟夫·肯尼迪的描述并不一致。在阿瑟·克洛克和杰克面前，他声称罗斯福曾答应他，如果他支持罗斯福去竞选第三届连任，罗斯福便会帮助他在1944年的民主党大会上成为总统候选人。而在另一些人如克莱尔·卢斯面前，肯尼

肯尼迪传

迪却称罗斯福曾经答应帮助他的大儿子乔·约翰在 1942 年参加竞选马萨诸塞州州长的职务。

无论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肯尼迪取消了原定于下周一上午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在纽约他与助手们一起分析了中途改变支持对象将会带来的利弊。而且说实话，他也一直希望罗斯福给他开一个价，从而“解决我们之间的矛盾”。

但是罗斯福没有这样做，而令肯尼迪更为恼火的是，威尔基也没有。虽然像卢斯那样的共和党人经常劝说肯尼迪加入支持罗斯福对手的阵营，但最后也是徒劳。最终，1940 年 10 月 29 日，在选中他儿子草拟的演讲稿后，肯尼迪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全国发表正式讲话，表示他将全力支持罗斯福总统竞选第三届连任，这时罗斯福才放心了。

那些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曾听到过肯尼迪攻击罗斯福的人们听到讲话后也许会感到十分惊讶，他们一致认为在这两个人之间肯定已经达成了协定。罗斯福充满感激地给肯尼迪拍了一个电报：“我刚刚听到您发表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谢谢你！——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天晚上，总统用他那辆豪华轿车带着小乔和甜蜜的菲兹从波士顿南站开往波士顿花园。然后，当着一大群人的面，欢迎“波士顿及波士顿的儿子、其它地方的人所拥护的、被我派往英国宫廷成为大使的人的儿子乔·肯尼迪回到美国”。

然而这些热情和微笑不过只是表象而已。肯尼迪在电台发表讲话时强烈抗议了“人们对美国总统企图使美国卷入世界大战的指责。这种指责毫无根据。”离大选还有六天时间了，在波士顿花园，罗斯福必须将他的威胁者稳住。“我绝不会把你的儿子送到战场上去！”除了内战以外，其它的战争都是对外

作战，而且无论是罗斯福还是威尔基都曾表示过，如果美国的根本利益受到了损害，那么美国就必须投入战争之中。“我私下里曾对所有的人表示，我认为威尔基会比罗斯福更快地将我们陷入战争之中。我坚决反对那些将我们推向战争灾难之中的人。”

1940年11月5日，罗斯福成功地再次当选总统，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连续三次入主白宫的总统，而且他是以449票对82票的绝对优势取得胜利的。第二天肯尼迪赶往华盛顿提出正式辞呈，辞去美国驻英国大使一职。当时接待他的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以及助理萨姆纳·韦尔斯和布勒金里奇·朗。肯尼迪丝毫没有因罗斯福竞选成功而激动，相反，他却显出一副绝望的样子。那天晚上布勒金里奇·朗察觉到肯尼迪的心情：“他感到英国已经彻底完了。”朗还好心地给肯尼迪解释说，“我想他可能是受了当时他周围环境的影响。在当时看来很难会有什么其它的结局，”朗又坦诚地补充了一句，“炸弹四处乱丢，工业已经瘫痪，通信途径也被逐渐切断，所有这一切的混乱都只会给人带来无限的失望。”

说这是失败主义一点也不夸张。朗解释：“肯尼迪始终认为英国已经完了。”他依然记得肯尼迪当时强烈反对借款给英国以便于它购买货物的建议，“他认为我们在制定政策时一点儿也不实际，我们应该意识到大不列颠帝国已经不复存在，而英国海军也会很快被击溃。在被纳粹打垮之前他们只赢过一次，而且那次是在蒙德维的亚。他们一进入空军基地或岸炮射击和陆军作战范围，就会打败仗。他们无力还击海上偷袭者。如果意大利在希腊胜利，而德军成功吞并了土耳其，那么英军就必须放弃在地中海的基地。也就是说他们也就会被赶出地中

肯尼迪传

海，如果他们还能逃出来的话。”

几天之后，T·诺斯·怀特海德在外事办公室里向大家这样描述：“在伦敦时，他吓坏了，接着就彻底崩溃了。”

“他看到在欧洲战场希特勒横行霸道，又想控制英国，”朗引述了肯尼迪对局势沮丧的描绘，“他对英国形势进行了再次分析，认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美国都无法加入到远东市场和欧洲市场，同时也无法挤入南美市场，因为他认为我们无法接受南美生产的除了黄金之外的任何其它货物……因此他认为我们应该尽快采取措施，补充一些可行的政策，与日本及德国进行一些交流，也许这样能带来彼此间在经济上的合作。”

尽管肯尼迪后来在美国历史上被认为是一个极端孤立主义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他支持孤立主义之前，他是主张对独裁者们施行妥协的。“肯尼迪告诉我希特勒曾派人两次捎信邀请他到德国进行会谈，”朗透露说，罗斯福命令肯尼迪将这些邀请扔到一边，“希特勒肯定有这样一种感觉，肯尼迪的某些想法可以被用来解决与我们的隔阂。而实际上肯尼迪也的确认为我们应该奠定一些合作的基础，”朗说，“虽然这种支持绥靖主义的程度还没有明确，应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的计划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设想，但是他极力主张我们应该采取一些实际的解决措施，寻找一些未知的途径……他不支持我们目前的政策。不相信民主会永远存在。他认为如果要生存的话，我们就应该建立一个法西斯式的政府，或者是类似这样的政府……英国人很快就会认输，他们不得不谋求与德国人达成和解，邱吉尔会下台，而罗埃德·乔治将会接替他。他还进一步认为，全世界的士气和精神力量都已经被击溃。”朗回忆说。当他得知

肯尼迪计划飞往加利福尼亚看望杰克，并准备以个人身份会见当时美国的三大出版商：威廉·兰道夫·赫斯特、约瑟夫·帕特森及罗伯特·麦考密克时，他提醒肯尼迪要注意面前的危险，尤其是不要召见“新闻界人士并讲一些令他们和美国人民产生轰动效应的話……他听从了我的劝告并保证他不会随便讲话。”

虽然最终他还是发表了讲话，表示大力支持罗斯福再次当选，但这个来自波士顿的要挟者还是决定与赫斯特和麦考密克以及帕特森举行会谈。他要将这次会谈所带来的威胁作为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始终悬挂在罗斯福的头上。因此，第二天下午，罗斯福在竞选中大获全胜，当他们再次相遇时，气氛十分热烈却也很紧张。正如肯尼迪后来告诉克罗克的那样，他“向总统上交了辞呈”，而总统却拒绝了他的辞职，说“在他能够找到替代肯尼迪出任大使的人之前，他不能接受他的辞呈”。克罗克说：“他们讨论了对英国局势的认识，并且在下列两方面达成了一致：（1）我们必须使自己置身于战争之外；（2）如果德国继续以目前的力量攻击英国的港口，那么美国最终会处于一种对战局无能为力的地步，特别是当战争狂徒向这个半球进攻时，美国将无力防御。”肯尼迪提醒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无论怎么援助不列颠，你都是在一匹输定了的赛马上下赌注。”

不知怎么搞的，肯尼迪满脑子想的都是马。当他在英国居住时，每天早上他都要到圣伦纳德旁边的温莎公园练习骑马。他仍然为国务院如此待他感到“恼火”。当他在华盛顿建议罗斯福在经济上与纳粹合作的时候，肯尼迪向美国总统发出了一个普通公民所能发出的最粗鲁的警告：“要么你做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要么你就做美国历史上最蠢的傻瓜。”

莱昂斯的采访报道

事实上，成为美国最愚蠢的傻瓜的人正是肯尼迪本人。1940年11月8日星期五的下午，《波士顿环球报》的著名记者路易斯·莱昂斯——这个曾在1936年对肯尼迪进行过采访，并“给美国政府和肯尼迪带来巨大的正面影响的人”——来到里兹卡尔顿饭店准备进行采访。肯尼迪大使已同意接受他的采访。为使采访简明扼要，莱昂斯只要求肯尼迪谈一谈“作为一个刚从战争的硝烟中返回家园的普通旅游者的真实感受，不要谈政治”。这篇文章将刊登在《波士顿环球报》的周日版上。

但是肯尼迪对讲述这个问题并不感兴趣。同时他答应了参加尼曼基金会的新闻晚宴，并将接受他们驻波士顿的两名记者：查尔斯·埃德蒙森和拉尔夫·考夫兰的采访。他们急于想知道一些“对编辑工作具有特殊意义的内部消息”。当他们三个人在肯尼迪的套房外见面时，“肯尼迪的秘书允许他们一起走了进去。我想，他当时既然以为他们都是新闻记者来写采访报道，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差别。”几天之后尼曼基金会的经理这样评论此事。这位大使的讲话大大地违背了他们遵守的讲话谨慎原则。莱昂斯后来回忆说：“看起来他好像是在作一篇竞选演说，但并不是为罗斯福发表的。”

这正是朗最不放心的肯尼迪的事情。他曾代表国务院特别提醒过肯尼迪，“在美国人民了解外交事务之前需要有一个准备过程，一下子将所有真相告诉他们只会使他们崩溃。”看来肯尼迪关于不会发表任何带有争议性讲话的承诺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外衣。他“向我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对这场战争，对美国的

看法。他讲话时的样子如同密西西比河那汹涌奔腾的波涛。”莱昂斯这样写道：

开始时他心平气和、态度坚定且斗志昂扬，让我们根本无法插话。他计划去加利福尼亚见一位在美国影响力很大的出版商。他已经见过几位了，还打算再见几位。而且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让他们知道他的思想。他已同几位国会议员们谈过而且准备跟更多的人谈一谈他的主张。他满怀激情地告诉我，“我得让他们明白一切。”他十分惊奇地发现，他所见到的这些国会议员们对于美国以及这场战争与它的关系竟然了解这么少——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我比任何人都了解欧洲的战争局势，因此我有责任使自己人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内容。”他解释了自称为引路者的原因……“我愿意尽我所能，哪怕是失去我目前所拥有的一切，但我要努力使我们的国家避免这场战争，卷入这场战争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我们现在已经位于口袋的边上，我们不应该钻进去，除非我们不省人事。我们为什么要卷进去？……劳动者参加政府的核心领导机构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正在滋生蔓延……英国的民主政体已经完蛋了。类似这样的事情也可能会在我们这里同样发生……上个星期天我在白宫告诉总统，‘我不需要五十名将军，请派给我一、二十名经济学家。’……不要听信任何人的迷惑，说你最终习惯炮火纷飞。现在的英国没有任何地方还没挨过轰炸……目前他们在海上的货运损失更为严重，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驱逐舰来保护他们货船的安全。除了护航的外，他们剩下来的驱逐舰必须被分

肯尼迪传

出一部分来活动，另一部分用来在地中海保护英国领土的安全……希特勒已经占领了所有的欧洲港口……人们都称我为悲观主义者。请问：我们又有什么乐观的理由呢？民主体制已经崩溃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应该给予多少帮助。问题是英国到底还能支撑多久。如果她很快就要崩溃，那就停止吧！”

正如拉尔夫·考夫兰后来所言：“这实在令我难以相信，一位大使竟会讲出如此泄气的话，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他所说的会立即被人引用。”当有人问他对美国最拥护孤立主义的巴顿·K·惠勒的评价时，肯尼迪宣称，“我与惠勒是老朋友了。拉福莱特曾经与我一起帮助他参加竞选运动。”莱昂斯这样写着：“对此，我们肯定会感到非常惊讶。”令他惊奇的是，像肯尼迪这样一位未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竟然会承认自己曾经帮助过一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拉尔夫·考夫兰问他，希特勒如果赢得胜利，美国是否会拒绝与纳粹进行经济合作。肯尼迪告诉他，“如果这样做的话简直是糊涂至极。”他甚至表示，哪怕是英国女王也会尝试着与纳粹进行经济贸易，“我现在告诉你，一旦这事定下来，只待最后来收拾英国的残局的时候，那将只有女王而不是别的政治家能够做到此事，她比英国内阁更精明。”

肯尼迪觉得英国女王及其与希特勒所做的交易还不够，他继续谈起了美国未来的女王：埃莉诺·罗斯福。“她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吉姆会告诉你，她经常建议我们在华盛顿的那些人多关心可怜的小人物，尽管他们并不是像某些人那样有什么影响。她偶尔也会给我寄一封短信，让我邀请一些小人物到大

使馆聊天喝茶。”

美国第一夫人和伊丽莎白女王谁也没有因为这些话而感到高兴。肯尼迪后来抱怨说这次采访的内容报道“失真”，而且他的话被错误地表述出来。肯尼迪否认他关于战争的评论，这位大使说他的讲话“被误解”了——报道给人的感觉并不正确。他指责报道不准确。

但是肯尼迪自己知道，这次采访的报道一点儿错误也没有。《波士顿环球报》的另外一名记者约瑟夫·迪宁星期天早上给肯尼迪打电话，内维尔·张伯伦逝世了，“在谈话的过程中，肯尼迪问我莱昂斯到底写了些什么，使他不断地受到质疑……星期天下午，通过电话我把整篇文章都读给他听了。迪宁说肯尼迪听完后似乎十分高兴，并叫他打电话给莱昂斯表示感谢。”同时肯尼迪还说：“好，这样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应，不过这正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两天之后，即 1940 年 11 月 12 日，尼曼基金会的总裁在给阿瑟·克罗克的信中这样写道，“看起来有一点是不必怀疑的，路易斯的这篇报道是真正准确的，而且真实地反映了肯尼迪当时的观点。莱昂斯承认他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些引用上的错误，但这是因为肯尼迪说得太快了以至于有些地方跟不上，而且内容太多，即使真的有这样的错误，那也只能是低调处理，莱昂斯还说这次采访太具有突然性，因此他在把这次采访写出来的时候尽量地把它处理得让人们能够接受。他省略了其中一些最激进的部分，以此来保护 K。”

肯尼迪一心想吸引外界注意——尤其是引起新闻及总统媒体的注意——如今却使自己陷入舆论中无法自拔。几乎所有的美国报纸都转载了他那篇具有争论的讲话。《圣路易斯邮报》

肯尼迪传

的主管约瑟夫·普利策在给肯尼迪的信中，遗憾地说：“一位著名的美国新闻界人士竟然会被你指责写了一篇歪曲事实的报道。而令我更为反感的是，这位记者在报道这次采访的时候，他引用的对话是拉尔夫·考夫兰也在场的时候进行的，而拉尔夫·考夫兰正是我们的头版编辑。”但是普利策的这番话并没能阻止《圣路易斯邮报》像美国的其它报纸那样转载这篇文章。而实际上，当拉尔夫·考夫兰给《圣路易斯邮报》编辑部打电话询问是否也刊登了关于这次采访的报道时，他被告诉说“忘记了这件事。他们将发表美联社的报道。”后来他这样回忆说。

阿瑟·克罗克在认识到了这次采访所惹出的麻烦之后，立即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表示安慰。“好像你遇到了麻烦，”他坦率地写道，“作为一个朋友，当自己的朋友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会尽力做一些事情来给予帮助。当四处都在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想说，你应该与惟一能够在报刊上吹捧你的记者取得联系。现在，我还是要说，如果我能够为你做一点什么，来削弱那次采访给你带来的不利影响的话，我会马上开始行动。”

克罗克说到做到。他给美国新闻界的同行们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来为肯尼迪解释，而肯尼迪对此却不领情。事实上他太自信了，以为仅仅是这些记者们根本没有力量打垮他。在过去，当对他不利的文章即将发表的时候，他总是用威逼利诱的手段使那些出版商及编辑们放弃。1937年，当亨利·卢斯的《幸福》杂志计划刊登一篇关于他与格洛丽亚·斯旺森之间不正当关系的报道时，肯尼迪威胁要发动攻势买断卢斯的《时代》杂志，最终使这篇报道不得不中途被撤掉。1938年，肯尼迪还成功地对C·L·苏兹贝格给《妇女家庭日报》写的一篇较为

柔和的批评文章做了手脚使它由批评转为表扬，这让苏兹贝格极为诧异。“我给他看了那篇稿件，他十分生气，他说我如果不修改这篇文章的话他会命令出版公司将这篇文章毙掉。我还是将稿件寄去了，而且几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了清样，”后来苏兹贝格回忆说，“但是它已被全部改写了一遍——用的简直是蜜糖而不是墨水。”

现在肯尼迪也试图通过各种手段使《波士顿环球报》不要和他作对，他命令萨姆塞特进口公司从这家报社撤回威士忌酒广告。但是，正如克罗克指出的那样，“无论那篇被称为失真的报道的实际情况如何，可那说话的语气听起来就像你的。”《波士顿环球报》坚定地支持他们的记者，所以这一次墨水没有变成蜜糖，仍然是墨水。

“在有关‘失真’的报道之后，有一帮名叫莱昂斯的人将有关对他采访的丑闻全部扣在了他的头上，”麦克唐纳向在加利福尼亚的杰克作了上述报告。但即使麦克唐纳也认为大使讲话的语气与杰克向他描述的极为相符：“你应该记得两个月前我们曾在科德角进行的一次谈话——那次谈话的部分内容与这次的非常相近。”

在华盛顿，关于大使在波士顿接受采访的报道完全毁坏了肯尼迪在电台发表正式讲话给竞选运动带来的良好结果。成千上万的人给罗斯福写信，要求大使马上辞职。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英国，新闻界的反响大体上类似。他们都十分愤慨。甚至连《华尔街日报》也对肯尼迪这次“耸人听闻的”谈话感到气愤：

美国政府答应给予英国除战争援助以外的一切援助，

肯尼迪传

美国人民对英国人民表示极大的同情。美国驻法国大使布利特先生，强烈支持给予英国道义和物质两方面双重援助，并描绘了一个英国人民正在从事的为民主和自由而战的美好构想。然而，美国驻英国大使回国之后却接受了一次采访发表了一系列言论，而这次采访完全没有对他离开的那个国度给予任何援助和同情……难怪国务院对这篇的采访报道惶恐不安，而当他亲口否认之后终于松了一口气。在当时情况下，他必须否认。有一点值得引起注意，肯尼迪在否定报道的时候，将重点放在“失真”上，而不是说根本就没提过报道里的内容。某些政府机构希望能有一个更彻底的否定。现在的情况是，大家都认为，那篇报道反映的是肯尼迪的思想，而他之所以要否认这篇报道是因为公众的反响实在是太糟了……无论肯尼迪是否会进一步采取措施纠正公众的这些反响，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重新回到英国继续担任大使。而他也不大可能会在国内的政府里担任职务。根据估计他很快就会辞职，不再出任驻英大使一职，那时候，他就可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至于受到如此多的指责了。

精神粮食

如果美国已经参战，那肯尼迪的言行足以构成叛国罪。事实上罗斯福总统的确已经命令联邦调查局和秘密警察上交有关肯尼迪的调查报告。很快，他们便查出了确有“贝当建议”之事，这个计划牵涉到肯尼迪与维希政府的领袖。伦敦英国外交

部的情报表明，肯尼迪大使“根本没有吸取慕尼黑的教训，他仍然认为英国和德国之间达成一个妥协是有可能的，并且他已经竭尽全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根据这个汇报，“他已经指派了密使——本·史密斯，我记得应该是这个名字——前往德国会见希特勒和贝当，试图寻求重建欧洲和平的方案，这样以来，他们的名字就能够流芳百世。在妥善作出安排之后，他希望在两位英国知名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他没有说出他们的名字，但是英国政府是应该知道的——在英国发动一场寻求谈判谋求和平的宣传战。”

小乔认为他父亲为了推行绥靖政策而制定的计划是完全合法而且值得赞扬的。早些时期，他曾当选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代表团代表。那年夏天的芝加哥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他是惟——一个投票反对罗斯福当选总统的人。现在，他又在哈佛法学院里大肆活动，企图掀起反对美国参战的运动高涨。

但是对于杰克来说，父亲那篇愚蠢的采访使得他感到极为难堪。自1939年秋天他自己在《猩红报》上不光彩地建议再进行一次慕尼黑谈判之后，他已经逐渐脱离了他父亲对他的影响。他写了一本内容充实而又十分畅销的书来详细评述英国三十年代所推行的绥靖主义政策。现在他不仅是斯坦福大学紧急委员会的成员，是罗斯福的一名坚定的支持者，同时还相信，为自由理想而战，美国必须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对斯坦福已经产生了深深地兴趣，”在他父亲来看望他的前一天，那天是11月13日，杰克给勒姆·比林斯写信说，“这儿的姑娘非常迷人——日子过得真滋润。这两个星期我的感觉好多了。”他自豪地告诉勒姆他写的那本《英国为何沉睡》已经受到很多人欢迎。这本书已经出版，“他们预计销量将近

肯尼迪传

六万册。”

像所有出版商预计的那样，这个数字有点夸大，然而这本书在英国的确获得了特殊的评论，特别是当人们都已知道肯尼迪大使是一个坚定失败主义者，而他又怯懦地从英国逃跑后，这本专著则显得更不平常。英国当时最负盛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作家都给他写来了赞扬信。其中令他最惊讶的一封是利德尔·哈特上尉的信，当时他正担任伦敦《泰晤士报》常驻伦敦记者一职，当时他大概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军事专题作家。他在信中对杰克给予了高度赞扬：

我对您在书中将政治谋略和切合实际的判断完美结合的写作手法表示发自内心的敬佩，我在这儿还没有见到过谁能够用如此巧妙的写作手法，当我将它与最近读过的几本书相比时，它给我的印象就更为深刻。在这儿，无论是美国作家还是英国作家，都很容易受表象捉弄。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哈特便已成名，他提出了新颖的军事理论，主张集中使用装甲车部队发动突然进攻，并建议在坦克部队的引导下“扩大战果”。利德尔·哈特的著作和文章曾一度成为法西斯德国从隆美尔到古德里安等装甲部队实施快速闪电战的理论指导。而利德尔·哈特本人的内心思想却在 30 年代“新的大战渐渐迫近的时候”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告诉杰克：

除非我们满足于纸上谈兵——就像军事院校那样——否则我们必须坚强地面对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现实，即我

们很难采用能给战争带来最大成功可能性的突然性进攻。甚于这一点认识，以及我对德国在优先发展新的武器装备方面深刻而且充实的了解，我越来越关心我们如何发展自己的防御技术，以便使我们有能力应对敌人发动的突然进攻。

然而不幸的是，我的这一愿望破产了，部分原因是我们中间普遍存在自满情绪，另外的原因是政府的惰性——这两个原因你都在著作中详细地进行了论述。

但是，还存在第三个原因，即英国的将军们头脑混乱，到目前为止他们依然信奉“理论上发动进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战备和训练。而在实际战争中，尤其是当我们面临更强大的军队时，这种理论根本无法得以实施”这种说法。挪威战争的惨败以及英国远征军在戈特勋爵的带领下盲目突击到比利时的糟糕结果，便是这种战略思想带来的恶果。因此，利德尔·哈特指出，目前的局势与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面临的情况极为相似：

我们的基本目标与德国纳粹的根本不同。他们的目标是想通过征服实现领土扩张，而我们的目标不仅仅局限于将敌人扩张的阴谋击破，同时还要做到在为保护文明所发动的战争中保证文明不被毁掉。由于我们的制度不允许我们通过利用突袭的作战方式取得快速胜利，因此所有的战争都将是一场持久战。

利德尔·哈特给杰克写的这封长达八页纸的信在以后的几

肯尼迪传

个月里成了杰克的精神食粮。正在这时候，肯尼迪大使来到了旧金山，他仍然毫无变化地将他的低调观点带到了加利福尼亚州，而且自 1939 年以来他第一次如此着急地想见一见他的儿子。

震惊好莱坞

记者们将这位颇有争议的大使团团围住，而他却依然说他所支持的政策仅仅是为了“保证美国能身处于战争之外。如果说这就是绥靖政策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政策”。而且肯尼迪还向记者们声明，“只要我还能活一天，我就会为这个目标努力奋斗一天。”

杰克是自己开车去旧金山机场迎接他父亲的，他曾邀请他的朋友亨利·詹姆斯和他一起去，但是他不肯去。父子二人一起驱车前往温顿区的威廉·兰道夫·赫斯特牧场。在路上，肯尼迪大使告诉杰克他已经提交辞呈而且再也不会回英国了，而且罗斯福已经答应只要一找到继任者，便立即接受他的辞呈。同时，他问杰克是否愿意为他的一篇关于绥靖政策的文章起草一个提纲。他准备辞去大使职务之后发表这篇文章。

这一要求使得杰克十分为难。“他父亲已经处在一个充满争议的地步，”克雷普斯博士回忆说，“但是杰克早已确定了他自己的主意。他的思想很独立，而且他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他对此带有疑问。”星期天在克雷普斯家的晚会上杰克一直“背靠着那架宝贝牌钢琴，坐在那儿，吃着克雷普斯夫人最擅长做的小甜点，与人讨论美国是否应该加入的问题”。克雷普斯描述说，激烈的争论使他感到迷惑，“他完全陷入了思考，他对

这个问题十分感兴趣。当他在哈佛大学撰写那篇毕业论文的时候，年轻的肯尼迪就已经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了。他并不支持父亲的意见。但这不是因为个人问题，同时也没有造成任何家庭隔阂，这只是个人政见不同而已。”

“他父亲并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克雷普斯解释说，“他们都主张强化军备，但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加强军备的问题，而是一个为什么的问题。杰克认为我们应该参与这次战争。他认为也许这需要几年的时间，但那一天肯定会到来。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杰克比他父亲思想更为深刻。”

但是勒姆·比林斯却不赞同克雷普斯对肯尼迪大使的评价。“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后来说，“我敢肯定这种感觉是对的，杰克百分之百地、完全不支持他父亲的观点。”

当肯尼迪实现了他与好莱坞制片人及报纸出版商之间的联系，并回到纽约与家人一起过感恩节的时候，杰克和他的朋友亨利·詹姆斯也正在赶往洛杉矶的途中。“也许你已经听到了，”杰克后来给比林斯写信说，“我去了好莱坞而且成了风云人物。发生了许多值得骄傲的事情要告诉你……我遇到了斯潘塞，与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十分荣耀，”他炫耀地说，“虽然他有一点儿激动，也有一点儿羞涩——但是当克拉克·盖博与我聊天的时候，好几次我们都冷场了……最近我在好莱坞还见到了拉娜·泰纳，当她走过的时候，我大声地喊‘哈利·狄克森’。可是她所做的惟一反应就是继续跟她身边的那个英俊高大的犹太人托尼·马丁打情骂俏。以上就是我想告诉你的。向你问好，杰克。”

像这种与好莱坞明星在一起的亲密接触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杰克的性格。他那种自我陶醉的性格使得他渴望成功——性

肯尼迪传

生活、交际及事业等各方面的成功。由于童年时缺少母爱，他渴望得到人们的关注、奉承和疼爱。“为什么不去买一个又好又便宜的小提琴，然后自我陶醉地去拉呢？”当杰克的朋友比尔·科尔曼在报纸上看到杰克的一张照片时，他很幽默地在那张照片下面随意写下了这句话。当时那张照片旁边有一个标题：“约翰·P·肯尼迪：他总是能够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问题。”这种奉承使科尔曼觉得十分恶心。“嘿，这可真是鬼话都有！”最后他命令杰克，“去吧，到太阳地里站着去吧，噢——你太需要阳光了！”

不过玩笑终归是玩笑，杰克的朋友都很清楚他确实有天赋。在他父亲的帮助下，他的这些天赋很容易使得他在未来生活中获得成功，但是他的这些天赋能将他引向何方呢？到目前为止杰克干过的最值得一提的事就是在学校里的時候，在一场萨利文与吉尔伯特主编的合唱剧里面扮演一名持梭标者的角色。作为畅销书的作者，他很清醒，他的那本《英国为何沉睡》的销量对于一个大学四年级学生的毕业论文来说无论是多么的了不起，它也是远远不足以称道的。

虽然杰克在好莱坞经常是指指点点，趾高气扬，但他却不是一位明星，而且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亨利曾这样回忆：

他是一个名人，虽然仅是有一点名气，但总归还是一个名人。在好莱坞的时候，人们都知道或者认识他的父亲，而他父亲在英国宫廷里的行为显然没有带来任何不良的影响。所以，现在杰克要拼命地、最大程度地利用它，就像利用他获得的畅销书作者的名声一样，而这确实起了

很大作用。在宴会上，他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当我们一起前往宴会的时候，女主人一定会迎出来：“噢，杰克，亲爱的杰克！能见到你真是高兴。啊，你看起来帅极了，杰克！你的书写得也很棒——一位年轻的畅销书的作者——过来，你应该见一见这些人。”当我们到摄影棚附近转悠的时候，情形也是一样，那些明星们会走过来和他打招呼：“噢，杰克，亲爱的，我很喜欢看你的书。确实妙极了，非常棒。”如此等等。

杰克对好莱坞确实很感兴趣，但他却对这种事情感到厌恶。他可以容忍他们，但却看透了他们！他们并不重要！他被那些明星和他们的人格魅力吸引住了，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他不能花费太多的时间。他不能让这些事分散他太多的精力。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会对我说：“我们已经厌烦了。”我们偶尔也去一两个很有趣的晚会，认识一些充满魅力、充满趣味的人。但是，这个世界毕竟正充满了硝烟弥漫的战火，而这正是杰克最关心的问题！确实是这样的。

杰克的朋友们再一次品尝了什么是冷酷。在洛杉矶的一次晚会上，詹姆斯扮演了他作为加利福尼亚州的桑丘·潘沙的角色。“我认为杰克是一个势利小人——社交圈内的势利小人，”詹姆斯说，“这是他的性格中十分重要的一点。之所以他愿意和我在一起是因为我来自——他认为我来自——一个带有悠久历史的纽约家族。他知道我曾经参加过一些社交聚会，而且在纽约社交圈内认识很多有趣的年轻人。这些人他并不认识，也无法认识，因为他是一名波士顿的爱尔兰人——他仅是一个

肯尼迪传

‘社交圈内的新手’。”

由于他父亲的权势和金钱，他原本可以成为“斯托克俱乐部或者纽约二十一号”的重要人物，但是仍然不能以这一点为理由被那些有声望的传统社团——即杨基佬社会所接受，“我是说，只要他有个好的名字然后做出好的成就，人们肯定会注意他的。不过，我所认识的人都是一些普通人，他们不会看重他真正的成就、他的作品、他的超凡魅力、他的才智，以及其它的东西——包括他的钱财。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他们看重的是，他不是来自美国的上流社会。既然他并不属于长岛上的派宾洛克俱乐部，那为什么还要理他呢？他简直微不足道。”

这种偏见使杰克十分生气。“可是他无能为力。”詹姆斯说，“他的父亲从波士顿搬到纽约而最终却要到布朗克斯维尔居住，因为他们没有被那里的人接受——杰克能强烈感受到这一点！可是感受到了又能怎么样呢？但我认为杰克并不会因此而变得消极。”詹姆斯又补充了一句，说杰克也不会因此而变得内向，“他经常说，‘让那些出身高贵的人见鬼去吧！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美国的总统或者是其他重要人物，到那时我会说，让这些人见鬼去吧！’他经常这样说，而且他说得到就做得得到。但是我想，之所以我能够吸引他是因为在我身上也有相同的能力，是不是？我在社交界中能够游刃有余而他却做不到这一点，他有时是很害羞的。”

在那些年里，杰克和妹妹凯思琳一直凭借他们自身的魅力和才智来抗议这种反天主教、反犹太人的偏见。但是这种抗争并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获得成功的。在杰克的朋友当中，像马萨诸塞州的卡姆·纽伯利和斯坦福大学的亨利·詹姆斯，对于杰克顺利进入社交圈、取得成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亲密战友——如

果没有他们遮掩杰克的光辉，他将更快地取得成功。他曾参加过斯坦福大学联谊会——一名非常优秀的女生举办的晚会。这名女生的父母在洛杉矶。詹姆斯那次恰好坐在女主人的旁边。

我刚说了几句话，她就开始笑，笑我说话的内容。而且——像这种事情在我的一生中也曾经发生过几次——而且自那以后无论我说什么字，什么话，都会引起她的笑声、她的佩服以及她的掌声。这下杰克真的生气了！事后他对我说，“看在老天的份上，詹姆斯！我决不能再容忍以后你像这样超过我！我不喜欢这样！”

后来当我们重回斯坦福大学的时候，他还在其他人的面前拿这件事开我的玩笑。他总是这样说，“大家看吧，这儿有一位朋友，别看他长得鬼不鬼、人不人的，顶多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男孩而已，可他在洛杉矶时勾引起女人来却是一把好手。”

杰克在斯坦福大学的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托伯特·麦克唐纳从汤姆·基勒费尔的姐姐那里听说“杰克在校园里是有名的‘路标’，许多人都知道。”但是，自从他写完《英国为何沉睡》一书后，杰克所追求的目标已不仅仅是成为“路标”了，他想要干的事情比成为‘路标’要重要得多。

“问题是，他对于斯坦福大学里的人存有一种矛盾心理，”亨利·詹姆斯在解释为什么杰克没有像原先计划的那样继续在斯坦福学习一年时这样说，“我想他并不十分地欣赏他们，就像他不尊重曾经跟他上过床的女人一样。我并不是说他讨厌她们，因为他还会经常去找她们，但这次却大不相同。”虽然欢

肯尼迪传

乐和幸福仍然会留在记忆里，但是新鲜感已经过去。

杰克最亲密的女朋友，弗利普·普赖斯，对于杰克为什么不继续留在斯坦福感到很奇怪。但是根据亨利·詹姆斯的描述，她很清楚杰克想要从她身上得到什么——她也知道杰克是多么不情愿为此而付出任何代价。“她的角色就是在那儿担任杰克的首席女朋友这个职务。她是校园里的主角，大家都称赞她十分漂亮。”詹姆斯回忆说：

当时杰克正在十分执着地追求她。他想上床，但是她一直都拒绝。我曾开玩笑地对她说，“你看，杰克都被你搞得魂不守舍的了……杰克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很多女人都主动向他投怀送抱。恕我直言，你怎么就能将你的两条腿夹得那么紧呢？”——我们经常和她开这样的玩笑。她说，“亨利，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首先你得对着圣经发誓，你不会把我告诉你的话告诉杰克。”

“我是一个‘来自小石城的穷人家的孩子’——我来自菲尼克斯，现在到了斯坦福大学来读书。我已经加入这个令人羡慕的联谊会，而且这里所有女孩子的背景都比我要高贵得多，她们比我更聪明，她们拥有比我多的一切。虽然我有好看的容貌，被许多男人追求，但是我早就下定了决心，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个好的丈夫，那么我一定要以一个处女之身嫁给他。除非杰克向我求婚——这正是我希望得到的，我希望能成为他生活中的主角——否则我是不会跟他做任何事情的，把自己的处女之身给一个马上就要回到东部去而抛下我的小伙子不值得。也许我以后再也见不着他……因此他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会让他一直

去追求，我会好好跟他演戏，但是我肯定不会付出我的全部——至少不会给杰克！”

弗利普·普赖斯坚决拒绝与杰克上床就标志着杰克“西部”生涯的结束。他没有打算结婚。对于自己的商务专业他感到毫无兴趣。他很怀念东部的社交生活。他的健康状况——虽然他曾向纽伯利夸耀过——却仍然反复无常。更重要的是，他父亲干的蠢事比他预料的更糟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离开西部是为了躲避日后回到东部将会遇到的困难。他十分同情英国目前的处境，他也支持美国应该为战争作好准备，但是他那有钱有势的父亲既不同情英国，也不赞同美国应该参战，这使他感到压力很大。

未来的生活仍然飘忽不定，杰克给比林斯写了一封信，通知他自己将在12月16日星期一从洛杉矶乘飞机启程直接飞往纽约，到那里先与他看一场演出，然后在当天晚上开车去波士顿，“星期四上午我要去看望乔丹。”他在12月3日匆忙写道：他“计划星期天离开这里”，“前去参加星期天将在加州里弗塞德的世界事务研究所召开的一个会议，时间为一周。”

然而，在杰克动身参加那个会议之前，他收到了他父亲的电报。读完电报之后，他十分生气。在与罗斯福进行充满讥讽的见面和媒体发表了大量的指责之后，这位大使最后公开的辞职马上就要来到了。他父亲问他，“那篇关于绥靖主义的文章你什么时候能够写好？”

对于杰克来说，这意味着在斯坦福的简短插曲终于结束了。

第八章 肯尼迪的美国海军生涯

代拟讲话提纲

在父亲的督促下，杰克在斯坦福生活的最后一天，找来一位秘书，以最快的速度将他的口述记下来，以兑现对父亲的许诺。在前言中，他向父亲说明道：这篇文章“只是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途径……我没有刻意去写成一篇完整的文章”，杰克强调说，“我并不清楚你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另外，我认为文中应适当地把一些你在英国的经历加进去，以增加可读性和真实性。”

文章的开头非常严肃地写道：

11月6日，也就是选举后第二天，我辞去已经担任了三年的驻英国大使职务。在公开发表的辞职报告中，我曾表示，今后将竭尽全力帮助总统，使美国免于战祸。这也是我一贯的主张。

基于上述理由，我将尽我所能为美国人写下我对国家当前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观点和立场。

这些立场是什么，并且怎样才能使得它更合乎广大美国民

众的口味，杰克不敢妄言，直接深入到父亲理念的核心和关键之处：

就我个人而言，我想，外交之术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神秘莫测。一般人倾向于在外交中打马基雅弗利牌，认为只有外交家才有资格参与其中，这种立场使得在过去悲剧性的岁月里，民主国家陷入疲软乏力的地步。如今，我们没有理由再期望当权者能采取有效的措施与独裁者相抗衡，因为某种虚假的安全和满足已感将他们蒙蔽了。

相对于这些闭目塞听的领导人，杰克认为，大使应该是头脑清晰、立场公正、条理清楚的民主党人士。“我的观点不是吸引人的，我的心情很沉重。自 1938 年 9 月起，这种沉重抑郁的心境一直笼罩着我。可能美国民众并不喜欢听这种灰色理想，但请注意，在 1935 年到 1939 年间，温斯顿·丘吉尔也曾遭受过相同的待遇，当时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到处散布悲观论调的讨厌家伙。”杰克的目的是将父亲与丘吉尔相提并论用以抬高父亲的身价。

但与丘吉尔拉上关系并不能让这位前大使摆脱与张伯伦狼狽为奸的事实，也不能改变他认同‘慕尼黑和谈’的立场。“我认为，‘慕尼黑和谈’在我国朝野中所引起的震动，足以证明缺乏足够的信息所造成的危险的严重性。”杰克这样写的目的是力求扭转当前形势，促成对父亲有利的舆论氛围。但他还是客观地在这里加入一些给父亲的建议：“亲爱的爸爸：您可以在这里加入一些您对‘慕尼黑事件’的反思。例如，如果当时爆发战争会对美国产生什么严重的危害；美国的防卫体系会

肯尼迪传

像英国一样完全垮掉吗？由于英国完全缺乏防守，被轰炸一夜之后非常有可能投降。如果这样，美国就将完全陷入危险的境地。至此，你可以得出结论：对美国来说，应该竭尽所能地确保欧洲这个缓冲地带的和平，所以，你支持张伯伦。”

然而，杰克心里也很清楚：这充其量只能说明部分情况。大使和张伯伦私交太深，他史无前例地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参与了英国内阁事务，他不断利用贝当将军，试图与希特勒求和。所有这些行为，绝不能仅以约瑟夫认为英国和美国尚未准备好参战为藉口，更有说服力的应该是，他本人不认为美国在经济上有理由或有道义参战，所有这些可以从他本人 1917 年逃避服兵役中寻出端倪。

杰克已经约摸觉察到了这一点，也知道在提纲里这件事不能回避。如今这种指控已经摆在公众面前，杰克不得不代表父亲承认：“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个失败主义者，也是个绥靖主义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和罗伯特·金特纳在他们的专栏里也声称，90%的美国人十分反感我的观点。”

但是毕竟父子情深，在提到种种非议后，杰克又用括注的形式插入了这样一段给父亲的建议：

你必须牢记，你必须把“绥靖主义者”这个头衔扔到垃圾堆中去，否则，眼前所有努力的成果都会丧失掉。虽然从长远观点看，你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不论是孤立主义者还是主和者，没有人乐意被称作“绥靖主义者”……绥靖主义这个词始于“慕尼黑和谈”，这样的背景使得它披上了这样的外衣：只要对独裁者让步，就可在争议中获得一个预期的答复。但我建议你不要把自己的观点根

肯尼迪传

植在向独裁者妥协的基础上，你得从别处着眼。看看林登伯格吧，他宣称我们没有必要在乎别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用一切手段，至少，他给人造成了这种印象，所以，大众对他十分反感。

其实，肯尼迪大使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是这样，但与林登伯格不同的是，肯尼迪对战争本身怀有最为刻骨的憎恨：“我认为最好的角度应该是反对独裁，你当然不相信民主制度和独裁政体这两种死对头可以和平共存，你个人的经历使你不能容忍独裁政体的存在。你憎恨独裁统治，因为你是在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发迹的，并且你希望能保持这种生活状态。但你认为保存这种民主制度的惟一方法是避免卷入欧洲战争。这并不是因为你不像干涉主义者那么憎恨独裁统治和战争威胁，而是因为你更爱自己的国家。”

这真是个迷惑人的幌子。但是杰克替父亲架构的框架还是有诸多漏洞，欲盖弥彰。三年来，美国驻欧洲首席外交官肯尼迪大使对记者发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讲话，以及他那些不审慎的言论和信件，就像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至于连他忠实的儿子也帮不上忙了。杰克还是不放弃，于是又建议，“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你应考虑到英国的抵抗决心和能力。”杰克想到几周前父亲在加州发表的失败言论，又提醒说，“你不必像以前那样直接预言，而应该代之以声称这得视德军的实力而定，甚至你可以夸口说，你知道独裁者的狂轰乱炸并不能让英国退缩半步。”

杰克清楚的知道，如果父亲真想和丘吉尔拉上关系甚至相提并论，必须消除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的名声的消极影响：

肯尼迪传

谈到人们对你悲观妥协的指责，你最好的回击就是声明你也不愿这样悲观。大谈天下太平更为容易，而你只是希望能对自己的国家有一定帮助，更何况你认为英法两国的乐观主义者的所做所为已经适得其反，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但这并不表明你认为事情只能越来越糟。

我认为你应该把对未来抱着希望的态度表现出来，否则人们会报怨：好么！不管我们做什么，他都会武断地认为我们注定失败。你要说明，正因为你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你才能够正确面对现实。

为了让民众更加信服，你还可以这样解释：在进入外交界以前，你亲眼见过太多的乐观主义者在股市中跌的头破血流，自那以后，你又见过许多乐观的政治家摔下政治舞台。

杰克意识到，人们很可能会指责他父亲使用诡计从而导致了数次股市跌落，并且在外交方面也曾经故伎重施。即使是自称一直是正确的，也最好以“含蓄的方式表达，否则就很容易遭到那些无孔不入而又自以为是的专栏作家的讽刺挖苦。他们会说，你打着帮助美国人民的幌子，只不过是标榜自己的正确罢了。至于艾尔索普和金特纳，你犯不着与他们针锋相对，因为他们有的是时间和你周旋。”

造化弄人，谁能料到数十年后，乔·艾尔索普居然成了杰克亲密的白宫朋友。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杰克宣布就任美国总统的那天晚上，他不仅以客人身份驾临艾尔索普位于乔治敦区的

摆满古董的美丽的家，更在那里与女主人共宿一夜——尽管表面上他们都称彼此是朋友，但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他是有意的报复这位曾为是父亲政治死敌的人。

1940年12月6日，杰克匆匆赶完这篇有关绥靖政策的讲话稿，并立即把它寄给已经四面楚歌的父亲，以便让他在白宫外面对记者宣布卸任之后，先稍事休息，“然后，我将无怨无悔地全力投入到我认为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事业中去……协助总统，让美国子民们免于战乱。”

雪中送炭，英国得到援助

在前往洛杉矶的里弗塞德之前，杰克没有丧失理智，他很清楚，他的煽情的讲稿并没有替父亲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一位老朋友写信给他说：“给你们家老头子捎个口信……就说这里有许多人都支持他的反战立场，”并且呼吁大使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组织一个‘反战委员会’，努力使美国免于参战。”杰克的朋友托比·麦克唐纳也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甚至大加吹捧大使的观点。但杰克本人却热度不高。临行之前，当他再次试图与弗利普·普赖斯时，他意识到无论如何两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已是不可调和。

“亲爱的杰克，我想告诉你，我很沮丧地发现我并非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冷静’，”后来弗利普在一封告别信中坦承，“有时你让我感到挺难对付的，特别是最后那两个夜晚就足以说明一切，但你其它很多方面恰恰能够弥补这一点。”

另一方面，杰克尽自己最大努力扮演着清道夫的角色，替父亲洗刷失败主义和绥靖主义的罪名，但他意识到，压倒一切

肯尼迪传

的就是维护民主制度。而当时，可怕的现实是为保卫民主制度而战的，只剩下英国在苦苦支撑。

于是，在飞往洛杉矶的途中，他拿出纸笔以“有关该文的一点补充”为题，针对父亲唱起了反调，他小心翼翼地用缓和的语气开了头：

亲爱的爸爸，依儿愚见，我们提供给英国的实质性援助远远跟不上需要，而他们要求提供更多飞机的防务计划也被束之高阁……现在我们的国家似乎正处在 1938 年 9 月到 1939 年 9 月 1 英国所处的可怕的思维模式中，正如“慕尼黑和谈”唤醒了英国民众，五月的一系列事件也让我们的觉醒。但可悲的是和英国人一样，我们也同样在漫不经心地重整军备，而可怕的是根本就没有通过真正的立法来加强国防。这应该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当然，我们的国家有理由自信：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受侵犯，也就是说我们是安全的，尤其是看到缺乏物资的英国坚持了一个夏天之后。但我们并未看到，如果英国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援助，而被迫投降的话，那我们也会陷入英国当年的境地，被打得措手不及。英国正是错误地认为 1938 年不会发生战争，而没有好好利用 1938 年 9 月到 1939 年 9 月这段缓冲时间来加强战备，因而吞下了自酿的苦酒，同样地，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在面临紧急情况时，极有可能陷入一片慌乱之中。

但是，这一点似乎与你的观点背道而驰了。但我认为，你同样相信不应以牺牲向英国提供足够的援助为代价而使美国免于卷入战争。假如我们不向英国提供足够的援

助并促成国会和整个国家行动起来，向英国提供它目前所需的一切援助，让它反对独裁者的战争有稳固的后方的话，在我看来，其危害程度就和我们现在参战一样大，并且，它发生的危险性也是很大的。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旦英国被打败，美国就会在这个紧张而敌对的世界里孤立无援，从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几年之内，它会被迫为每年的国防开支付出高昂费用以维护装备，它也可能会陷入战争，甚至可能被各种极权统治所击败。

如果不幸，真到那时，人们决不会原谅我们的绥靖主义，他们会问“那时候为什么我们这么愚蠢，不尽量向英国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援助呢？为什么我们如此短视，要担心钱呢？这一切都提醒我们应该通过更多的立法来提供援助。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来支援他们。假如 1940 年，国内的国防开支是 130 亿美元，那么从那时起我们就应该做好援助英国的一切准备。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的是我们国防力量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就像现在我们还耿耿于怀于那些让我们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如海因斯·佩奇等人一样，将来，民众们也将不能原谅那些在 1940 年到 1941 年的非常时期，没有理智地指明援助英国之重要性的政治领袖及政客们。

这是一则逆耳但发源于内心的警示，是一位年仅 23 岁的儿子对父亲提出的弥足珍贵的建议。“当然，我并没有要你有应该主张打仗的意思，”杰克补充说，“但你可以刻意阐述援助英国至关重要的这一观点。你可以指明，民主国家往往只有在

肯尼迪传

受到威胁时才会采取行动，而在没有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威胁时，很难产生危机感。该是清醒的时候了，我们应该看到，迫在眼前的威胁，虽不是立即被侵犯，但英国却会因为缺乏我们的援助而陷入覆灭的困境。尽管严峻的形势要求美国行动起来，但对于调动起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你感到希望渺茫。因此，你感到压抑和痛苦。”他绕了个圈子，又回到了父亲的观点上：

当然，没有人想要打仗。当初张伯伦和其他人就是持这样的观点，可结果还是被迫参战！将来回首这段让人心惊的历史时，我们也可能会对自己目前的短视和懈怠感到惭愧和震惊。

我之所以着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既然你认为应该援助英国，就应该向公众清楚地表达出来，你应该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掉《时代杂志》给你贴上的绥靖主义者和反对援助英国这类令人嘲讽的耻辱标签。

似乎可以这样讲，这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早期生活中最为关键而最具影响力的政论性信件。当时，在美国人乃至全世界人眼里，约瑟夫·P·肯尼迪大使被定格为美国孤立主义的死硬派。当时，伍德将军就已经请求这位前大使担任尚在酝酿中的“美国优先、反对干涉”运动的主席。与此遥相呼应，小乔也如愿以偿地在哈佛组成了“反对军事干涉委员会”，并声称“旨在反映哈佛大学绝大多数学生反对美国卷入战争漩涡的心声，”在这个组织的成立宣言中声明，此项运动的宗旨，是为了促使美国“拟定一个固若金汤的西半球防御计划，并只允许

向英国提供有限范围的工业和经济支持”，指责任何超出一定范围的援助“都是不明智的”，不符合美国利益的。

杰克向父亲和兄长的失败主义观点挑战的勇气和胆识，表明在过去一年里他的进步有目共睹，照顾到父亲和兄长的感受，他掩饰说，“我只不过说了你们一直在说的话，惟一不同的是我感觉有些部分你应该再强调一些罢了。”甚至，他还不要忘记恭维老爸一番，在信的末尾写了西海岸的最新社会消息：

杰克·莫菲特在昨天举行了婚礼。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似乎所有的旧金山人都对你钦佩得五体投地，我从未见过你竟有如此众多的支持者，什么原因呢？我猜想虽然有一些人读了那些诋毁你的文章并且注意到这一点，但更多的人根本没读过。克拉伦斯·林德是位在赫斯特报社逐渐崭露头角的记者；他一直在对你盛赞有加，我认为那是，实至名归的。

最后他以表达爱意的充满温情的话，以及“我正要赶去参加圆桌会议”的消息结束了这封至关重要的信，并慎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租借法案的出台

今天，当现实已经说明一切的时候，美国朝野还在闭目塞听地大肆争论是否向英国提供援助，争议中心是罗斯福 12 月 7 日提交国会审议的《租借法案》。

与此同时，在来自西海岸的专家学者们在为期五天的“里

肯尼迪传

弗赛德会议”上，讨论援英问题。当时正值英国孤军奋力抵抗轴心国的历史性地关键时刻，知识渊博的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说和辩论更是精彩纷呈。来自雷德兰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丹佛大学、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内华达米尔斯学院、俄勒冈和新墨西哥大学的专家学者们济济一堂。大会旗帜鲜明地反对法西斯主义，甚至主张干预主义。查尔斯·马丁教授致开幕词：“假如历史阴差阳错地让孤独的民主国家战胜强权侵略者，人们必将发现他们的命运与捍卫人类价值的斗争息息相关，因而不会逃避‘为自由付出巨大代价’的责任。”道格拉斯·米勒教授在有关战争和未来世界经济问题的评论中，提出了“相互冲突的世界经济能否取得和解”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出示从《幸福》杂志中摘录的一份令人触目惊心的民意测验，说绝大多数的美国商界行政主管认为，美国甚至可以通过调整自己来与获胜的魔鬼般的极权国家打交道。米勒总结说，这是一种极度的无知，完全不顾目前纳粹苛刻的贸易合同本质会带来悲剧性的惨痛后果。不公正地合同规定必须使用德国船只、德国保险公司、德检察官来履行合同。他们甚至贪得无厌地要求美国公司在签署一项条款时，注意“此合同必须遵照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原则。”米勒强调说，“每一项贸易中都被不知廉耻地赋予了政治、军事、社会、文化上的替法西斯宣传的意味，这是缔约人谈判从来未想到过的潜在用意。”即就是像瑞典和瑞士这样的小国跟第三帝国签订合同时，还被迫要求附上他们公司员工的名单。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对于大多数以自由为最高价值的美国人而言，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参加会议之外，杰克还为其中四场研讨会奔波起草供公开

发表的会议摘要报告，这四场研讨会是：战争和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研讨会、西半球经济合作研讨会、英国文明轨迹研讨会及和平建议计划研讨会。杰克在关于战争和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研讨会的摘要报告中，强调恢复“建立集体安全是双边贸易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要求“美国必须采取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并且重新审视美国一战后的孤立主义立场。在总结有关“英国文明”的讨论的摘要报告中，杰克仔细记录了林登·马厄的相关评论：“与30年代初的形势不同，近期工党力量有了异乎寻常的增长。考虑到战后大不列颠王国的政治格局的因素，其增长具有特殊意义；报告还谈到了英国的战后局势，曼德教授认为，美国提供安全有助于加强这样一个思想，即：真正的安全，只能建立在各国能在一个新世界秩序中结合的基础上，而他此前在学院中曾不止一次提出过这一观点。同时，他再次强调由于美国的特殊贡献，使美国在未来世界中会扮演具有决定意义的角色，而只有协助促成更加自由的国际贸易秩序，才是达成新世界秩序的最佳选择。”

杰克所有的摘要报告，都无一例外地以呼吁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为重点，尤其是在《关于和平的建议计划》的摘要报告中，“大会主席，即南加州大学的尤金·哈利博士，强调指出正是由于美国不加入国联的错误，导致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件，以及随后一系列不幸事件的发生。”杰克写道，“然后主席请研究国际经济方面的专家，康德利夫教授谈谈未来的国际组织。康德利夫教授首先警告以区域主义代表国际组织原则可能会带来危害并明确指了出来，他认为，有关泛美主义的讨论是美国逃避承担国际责任的遮羞布。他引述费尔曼博士的话说，如果各国能在国联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

肯尼迪传

序，将会是个令人鼓舞的巨大胜利，会为世界留下宝贵的遗产。他建议必须尝试着建立一个类似于国联的联盟，以便适应新情况，他强调了美国的责任，指出美国要提供大量的物力和人力。我们需要增强国际立法会议的影响力，使之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国际立法机构。下午会议时，康德利夫博士总结反映了全体与会代表的观点，他强调指出，必须敏锐地把握缔造和平的时机从而进行广泛磋商。他提醒，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必须以扶助欧洲为前提。欧洲的铁路交通、物资匮乏等问题都必须予以解决，如果错失良机，欧洲将落入共产主义之手。现在是美国做好准备提供帮助的时候了。”

这些讨论的主题，使杰克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比父亲思考层次更加深刻的观点。会议的负责人查尔斯·马丁教授对杰克的工作不停地称赞，认为哈佛的研习使他在讨论和归纳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时游刃有余而且信心十足。“杰克撰写了所有自己参与讨论的会议摘要报告，”马丁回忆，“他对这项工作显得兴致盎然……我清楚地记得他当时咨询了很多大学主管，并且积极参加了大会的很多活动。”

然而，杰克健康状况的日益恶化，使得他的良好的工作表现，在某种意义上得不偿失。实际上，他的健康状况让人担忧。在纽约，对于克莱尔·卢斯邀请12月19日参加为其女儿举行的家宴的盛情，他非常得体而又不失幽默地表示了感谢。宴会上，杰克知道安妮明年打算去上斯坦福大会后打趣说：“我很高兴见到您和可爱的安妮，请相信我，你不用担心这些身高6英尺、体重220磅、高大魁梧的斯坦福人会为难你。”但对于自己的未来，他一片茫然。

波士顿莱希诊所的萨拉·乔丹医生检查了杰克的身体后，

感到情况非常糟糕，杰克体重比去加州之前更轻了。因此，她不得不建议并督促杰克圣诞节之后立即前往新英格兰浸礼会医院接受进一步观察治疗，而且，她反对杰克在明年秋天前返回大学上课，以免病情进一步恶化。

因此，1940年圣诞节，在别人狂欢的时候，杰克只能在佛罗里达州家里度过。因为身体每况愈下，他的心情一片晦涩。但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现在，杰克父亲已经正式宣布辞去驻英大使一职。对于他的下一步举措，新闻界和政界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是因为明年年初，关于《租借法案》的听证会将举行，他的反应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总统对美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说时旗帜鲜明地谴责美国国内的“绥靖主义者”，他表示：“过去两年的惨痛的经验让我们牢记这样的教训：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向纳粹求和而得以苟安。”他同时对“绥靖主义者”以下的言论做了毫不留情的批驳：他们认为“反正轴心国迟早会取胜”，这场世界范围的流血悲剧完全可以避免，美国只需在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影响以寻求和平，并最大限度地取得好的结果就万事大吉了。他们夸夸其谈这种所谓“经过协商的和平”而不知大祸将要临头。总统继续说道，“一派胡言！简直是痴人说梦，当一群不法分子包围了你的家园，并威胁要杀掉你的时候，你为了保全性命而向魔鬼缴纳赎金，这是愚蠢的‘经过协商的和平’！我们应该警醒，这是与战争相提并论的紧急情况。”

总统虽然没有点名批评约瑟夫·肯尼迪，但他言辞激烈而又含沙射影的话无异是对他响亮的回击。杰克的担心也得到了应验，国会中的孤立主义者群起鼓动约瑟夫·肯尼迪去国会的

肯尼迪传

外交委员会作证，并且声明反对总统新的援英提案。他们在一种失败和失衡的心态下，寄希望于肯尼迪大使能鼓动如簧之舌帮助林登伯格，操纵国会投票否决《租借法案》而挽回一点面子。

肯尼迪清楚自己的份量，他的支持对双方来说都是很关键的。耐人寻味的是，在和总统之子小富兰克林·罗斯福二世同乘班机飞往华盛顿的途中，顽固的大使公开鼓吹，“希特勒必将战领整个欧洲，我们能且只能说服英国进行和谈，以争取最大限度的和平。”但私下里，他却写信给参议员路易斯·勒德洛表示只给英国提供象征性地援助。勒德洛在参议院中宣读了这封信，并记录在案。有一次，在华盛顿，前总统赫伯特·胡佛总统曾登门拜访他，胡佛后来回忆说，“他劝我就‘租借法案’发表倾向于保守的评论，并表示他们有信心在听证会上争取到足够多的民主党选票，以否决此案。”

罗斯福被激怒了，肯尼迪的两面派作法让总统无法忍受，但他最终还是静下心来运用策略，使得肯尼迪放弃孤立主义兼绥靖主义的立场。1941年1月16日，总统在白宫与肯尼迪共进晚餐时硬着头皮听他的客人报怨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那帮‘御用文棍’对我大肆攻击，我对此十分光火。”同时又对罗斯福表示：“愿意再次发表广播讲话，彻底澄清我的立场，给公众一个明确的观点”。

两个人正面交锋后，总统意识到肯尼迪企图再次欺骗他，这点以后被证实了。肯尼迪后来向詹姆斯·兰迪斯承认，他确实警告总统，《租借法案》可能会带来无法预料的严重后果。“这正是美国民众担心的问题之一，”肯尼迪明确地告诫罗斯福，“他们没有发现你避免战争的诚意。”

总统的答复远远不能使肯尼迪信服。肯尼迪后来描述说：“他说‘我疲于重复。我想强调的是，在过去的7年中，每次欧洲发生战争我都打算参战，但我一直都很克制。’他继续澄清，‘我根本无意于参战’。但或许是因为我的疑心，这次我却觉得总统没有平时那么令人满意了。”

然而，糟糕的是肯尼迪无法摆脱自身的矛盾心理这一致命弱点，在所有对国务院的不满中，最令他耿耿于怀的就是总统一直拒绝给他一个职位，反而把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许多人安排在新一届联合政府中。肯尼迪回忆说，“我警告过他，把所有重要的职位都拱手送给史汀生·帕特林、福克斯和福里斯特之流，让这些人掌管政务，将使国家蒙受灾难性的后果。更何况这些人对你竞选连任根本毫无贡献，更令我气愤的是，他竟然说目前在民主党中找不到比他们更合适的人选。”

肯尼迪当然自我感觉良好而且信心十足，虽然算不上是个好的民主党人。罗斯福于是将计就计，以驻爱尔兰特使一职诱使肯尼迪作出不公开反对《租借法案》的承诺。“他说，他想和我就爱尔兰问题进行一席长谈，并反复表示萨姆纳·韦尔斯坚信只有我能解决这个难题。”

于是，约瑟夫大使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发表了一篇文采斐然、思想深邃，让人拍案称奇的演讲，其主要内容来自于杰克从斯坦福寄来的草稿。令大家交口称赞的是，他突然转变了反对《租借法案》的立场。后来他解释说，“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显而易见，没有《租借法案》，英国就要沦丧。而我本人也认为，与其愚蠢地冠冕堂皇地出借，不如索性大大方方地给予，况且前者不会有任何回报，因此我采纳了赫尔国务卿的建议，虽然有改初衷，但有些话不吐不快。”更为可贵的是，

肯尼迪传

1941年1月21日，肯尼迪在国会进行表决时，没投反对票，结果，参议院以15:8的多数票通过了《租借法案》，这可以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共同福音。

对于杰克·肯尼迪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胜于他出书获得成功。约瑟夫大使在失势的不平衡心态下，一腔怨气，并拒绝解释自己突然改变对《租借法案》的态度的原因，只是冷冷地表示：“为了现实的目标，我们将不得不面对战争。”

肯尼迪在爱尔兰基地

如果说父亲勉强接受了杰克有关援英的建议，杰克的哥哥却显得更加固执。圣诞节后，小乔匆匆赶回哈佛，参加了定于12月30日举行的午餐会，就有关“反对军事干涉委员会”的组成问题进行了讨论。1941年1月6日，在福特大厅的讲坛上，他不顾日渐高涨的反对呼声和日益严峻的战争形势，发表了措辞强硬的演说，坚决反对援助英国，甚至叫嚣，即使这将导致英国战败也不足惜。小乔声称，如果纳粹胜利了，美国应设法与胜利者建立一项易货贸易体系，以维护目前的经济状况免于重新陷入经济危机。1941年1月26日，小乔在波士顿外交政策联合会会议上，更加大肆宣称：“如果有卷入战争的危险，美国就应该停止派遣‘运送粮食的护航舰队’”。这番过激言论导致了他与杰克以前的教授阿瑟·霍尔库姆之间的针锋相对的辩论。

看到自封为年轻的孤立主义者的大哥的一举一动，杰克心里有些不安，“我哥哥小乔的争强好胜是生性使然”，杰克后来

只得无奈地自嘲地说。但这位偏激、固执而又英俊的年轻人是他的亲哥哥，杰克不忍心横加批评指责，和他不能明目张胆地大加讨伐父亲一样，对于小乔的这番不合时宜的过激的评论，他充耳不闻。

与此同时，在听说杰克前往新英格兰浸礼会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后，托比·麦克唐纳写信给杰克，“我很乐意听听你的轶闻趣事，我听说你还没有改掉那些宝贝脾气，上帝，你得让年轻人相信这种与生俱来的馈赠，毫无疑问将招致麻烦和失败。”

如果说，杰克对比林斯的评价是吹毛求疵的话，那么，麦克唐纳对杰克则显得冷酷无情。波士顿爱尔兰天主教的背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另外，他们都酷爱踢足球，喜欢泡妞，但在其它方面，他们却显得格格不入。麦克唐纳小肚鸡肠且反感犹太人。作为一个波士顿爱尔兰足球教练的儿子，卑微的出身形成他愤世嫉俗、怨天尤人的脾气。在哈佛，他自我感觉和杰克一样睿智帅气，而且津津乐道于比杰克好的身体。同时，考虑到体质的原因，他们加盟了不同的组织。杰克加入了施佩俱乐部，他那胜人一筹、讨人喜欢的本事，使他突破了天主教反爱尔兰的偏见，把学士论文出版成为畅销书，所有这些都让麦克唐纳，这位哈佛前足球明星自惭形秽，同时也给他们原来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告诉我，你将何时到达，在哪儿下车，以便我组织好摄影师、乐队及一切合适的仪式来欢迎你这位了不起的明星人物，不要不好意思，这是你出书以后应受的礼遇。”麦克唐纳不无忌妒地用嘲讽的口气这样许诺。

“接到你的信我很高兴，对你如此匆忙离开斯坦福表示恋恋不舍。”正在圣路易斯邮政快递公司工作的布莱尔·克拉克告诉他，自己参加了征兵体检，正等着结果的通知，“自从上次

肯尼迪传

你给我写信以来，又有什么事发生？因为知道不论做什么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所以我害怕做任何事。你还没打算结婚或申请免服兵役吧？”

杰克没有。相反，在成功地说服父亲转变了对《租借法案》的态度后，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助父亲在总统面前重获青睐，最好能够谋个一官半职以减少内心对父亲的愧疚。因此，1941年1月底，新英格兰浸礼会医院病床上，这位年仅23岁的聪明小伙子，在写了《英国为何沉睡》之后，又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切中时弊的问题：“爱尔兰是否有义务为英国提供海军和空军基地？”

杰克匆匆写了一篇文章投给《纽约全美日报》，该文于1941年2月2日发表，“如果爱尔兰不理智地拒绝把海军和空军基地让给英国人，它是否应该为英国可能被攻陷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他看来，美国是关键，因为英国日益依赖美国提供的军火，因此丘吉尔不敢惹美国人生气；对于爱尔兰共和国，美国的经济支援对他们中立立场，乃至“长期独立运动”都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德·瓦勒拉自然也不敢拂逆美国公众的意愿。

杰克在论文中采取了客观的立场。他提醒读者，一旦英国战败，那么德国绝对不能坐视爱尔兰独立而无动于衷，爱尔兰也会步挪威、丹麦、以及其他中立小国的后尘。“相反，只有英国侥幸瓦全。爱尔兰人才有机会生存在一个没有独裁威胁的自由和平的世界里。”

但是，爱尔兰人却不以为然：“给英国人基地就意味着爱尔兰将面对更加致命的战争。”而且，在爱尔兰人的眼里，美国人没有给要求他们这样做的资格，因为“美国人自己也拒绝

参战”，“正人先正己”，这是美国从爱尔兰人那里得到的经验。

尽管杰克是多么地希望“种族问题以及英爱之间矛盾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决定，”但他也清楚，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宿怨非一日所能化解，其历史比目前的“德英之战”更为久远。翻开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使得爱尔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率“比除法国以外的任何参战国家都大”，但是，更让爱尔兰人觉得委屈的是，“惨痛的代价后，爱尔兰却一无所获。尤其让爱尔兰人耿耿于怀的是，劳合·乔治政府却派出了‘黑与棕色部队’进驻爱尔兰长达三年之久。而现在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当时正担任国防大臣。1938年使爱尔兰人伤得更痛心的是，丘吉尔竟然亲自领导一个反对将港口还给爱尔兰的组织。他们对这次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将港口还给他们，不抱任何希望。”

“很难预测结果，”杰克无奈地承认，文章的结论指出，这些基地本身是否有价值仍是个问题，“因为英国已用水雷将海峡南部进行严密封锁，任何船只都不能经过”。另外，英国在洛夫·斯威利港以东20英里，还有一个港口，两个港口职能相似，我们得衡量为了这些没有决定意义的基地，而违背美国公众的意愿是不是得不偿失呢？

“你关于爱尔兰的文章没有产生预想中的效果，”托比·麦克唐纳很快评论说，“这是由于它很难有赫斯特式的轰动效应。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无聊，而且也不感兴趣。在我看来，你的悲观的立场破坏了你一贯的客观公正，事实上他们确有理由对卧榻之侧的劲敌充满疑虑和戒备。”

令杰克沮丧的是，对他特意寄去的附有亲笔签名的《英国为何沉睡？》一书，托比反映冷淡，麦克唐纳声称真搞不懂杰

肯尼迪传

克究意在什么地方，纽约、棕榈滩、还是好莱坞……但不管怎样，托比对杰克的赠书表示感谢。他说：“我已经接受了你的建议，还在你的签名旁特意附注了张纸条，我想依此证明此书的确是你本人写的，而不像很多流言所说的那样，是你父亲口授，由一位专职作家代为笔录的。”心高气傲的托比不忘嘲讽一番。

杰克父亲也由此知道了麦克唐纳其人，并与他保持了二十年忠诚而秘密的经济联系。后来，麦克唐纳喜欢跟家人吹嘘说，他与杰克的妹妹凯思琳踏入爱河，如果不是杰克的父亲主动提出在其公司给托比找一个高级职位，他们早就水到渠成了。“他父亲老谋深算地激怒了一个骄傲的年轻人，扼杀了这段美丽而浪漫的感情。”托比的妻子对丈夫的这段话记得毫厘不差。

而事实恰恰相反，凯思琳不过像对待所有其他男友一样对自作多情的托比。当时，麦克唐纳盛赞了大使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那番讲话，却偏偏忽视了杰克所作的贡献：“告诉你父亲，他的讲话棒极了，稍显悲观的论调掩盖不了深邃的思想和敏锐的见解。感谢大使，为什么别人就看不到我们的前景呢？你父亲是惟一没有闭目塞听，清楚事态发展的人。实际上，我正想写封信告诉他，但又恐怕这在他看来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如果你有机会，请转告他一个叫托比的年轻人，我以他为荣，大家都认为他的演讲棒极了。”幽默的天性和一贯的立场使他又加了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林登伯格式的附言：“它改变了我关于共产主义反抗法西斯主义的看法。现在，我坚决拥护任何反对犹太人的政策，不论是实行隔离，还是种族灭绝，不论是一蹴而就，还是分期进行。”

“你什么时候来斯坦福？”麦克唐纳以这个问题结束这封信，“告诉我你的疾病是否痊愈，健康及魅力是否依旧。”

事实上，杰克的胃病和疼痛的脊背还在困扰着他，而弗利普·普赖斯的诱惑之不可抗拒，所以他不愿马上离开温柔乡回斯坦福。相反，1941年2月，杰克遵照医嘱，在巴哈马群岛疗养了数周，情况好转之后，便从纽约回到了棕榈滩。而此时，杰克对绥靖政策广播讲话所作的贡献，以及最近那篇关于英爱问题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分析能力，让老肯尼迪也为之惊叹。于是这位大使问杰克是否愿意留下，整理他在担任驻英大使期间所有的讲话，并编辑成册。

坐卧不安

毫无疑问，这位父亲是有意把这作为一种褒奖，表示对杰克杰出的创作能力和写稿技巧的赞赏和认同。

然而，杰克并不领会父亲的良苦用心，他果断拒绝了这个苦差事，而且匆匆向约翰·亨西——即弗朗西丝·安·坎农的丈夫——写信求救。他推荐了康尼·伯韦尔，认为她最能胜任。他有幸在婚礼上见过她，“尽管我只和她匆匆一晤，但她的魅力不可抗拒。我觉得她会对这个工作感兴趣。要说明的是，这大致需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埋头在报纸上相关的报道、父亲的日常随笔、日记以及一些确切的史实堆里，按不同类别编成一种像三卷集的《沃尔特·海因斯·佩奇自传》的形式的材料。”

康尼·伯韦尔对与杰克讨论这本书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我坚持了一些保留意见，”她回忆说，“老大使亲德国的名声让人尴尬，我认为应该给后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肯尼迪传

前大使被总统冷落，感到非常气愤。当伯韦尔小姐会见他时，他表示希望“按实际情况”记述，但内心却希望在手稿中对罗斯福总统发泄怨气。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肯尼迪给他的前新闻专员吉姆·西摩发了一封电报，令他把所有 1936 年期间所写的《我支持罗斯福总统》一书就地销毁，并将剩余的文稿运回美国，希望“从此彻底了结。”据康尼·伯韦尔回忆说，“事与愿违，那些文稿在从英国运回来的途中不幸落水。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这些文稿没有消失，但那件事就此打住，从此杳无音信。”

这个时候，杰克却坐卧不安。他写信让哈佛文献管理办公室把他的学士论文给耶鲁大学寄一份。虽然当时，他还不曾向耶鲁正式申请秋季入学。看到儿子的烦躁不安，父亲建议杰克与罗丝及尤妮斯一起去南美洲旅游散心。她们打算前往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人阿根廷驻法国卡卡尼奥的大使一家相聚。

卡卡尼奥大使的儿子迈克尔是个热心肠，于 1941 年 4 月 19 日发电报给尤妮斯许诺：“卡卡尼奥一家将非常荣幸地在码头上欢迎各位光临，”而真正令杰克按捺不住好奇并欣然前往的是因为迈克尔两个漂亮的妹妹外号叫宝宝的奎塔斯特拉和安娜，她们的等候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呢？

尽管等到杰克办好签证时，母亲与妹妹已经动身了，他还是兴致不减地同意乘飞机赶去。在去年 12 月的里弗塞德会议有关西半球合作的摘要报告中，杰克已经敏锐的指出美国和南美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战略及经济问题，诸如，墨西哥有没有理由被列入拉美？巴拿马运河有什么重要性？一旦拉美各国和欧洲的交易功亏一篑，美国是否有能力吸收南美所有的出口

产品？拉美国家与德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会不会影响与德国签订贸易协定？因为非热带性的气候和即将到来的工业化的因素，阿根廷是否与其它拉美国家被作区别对待？巴西是否是惟一拥有“发展资本主义工业”所必须的充足金属资源的拉美国家？

此外，如果美国不能消化南美全部的出口产品，“西半球联盟”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南美是否“值得美国劳神费思？”“在经济上，拉美对美国的作用事实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与南美的贸易只占全部贸易额的7%,” 杰克在报告中提醒，“即使我们与最大的客户阿根廷之间的贸易也只占全部贸易额的1%。那么，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种现实，即使我们获得了南美所有的贸易，充其量也只不过对我们国民收入有7%的贡献。”

但在军事上，拉美是美国的后院。对于德国是否正对南美进行政治渗透，杰克引述了维克多·莫里斯校长的看法，“西半球合作计划应该以军事为出发点，即使我们被迫付出很大的代价，把极权统治赶出去也势在必行。他认为，这一过程的代价是可以用其它方式来代替的，例如，现在直接援助英国会更为经济些。”

拉美各国政府与美国建立军事联盟时究竟打什么主意？他们对美国是什么态度？他们对纳粹德国的看法又如何？会不会有加入希特勒的军事联盟的危险倾向？这些问题让杰克坐卧不安、费神劳思。

1939年的春夏，杰克周游了中欧和中东。而今，当时光之神光顾1941年的春天时，他又要前往拉美。1941年5月7日，是个特别的日子，这天他从迈阿密起飞前往南美大陆的色

情中心城市里约热内卢，到那里进行有杰克特色的考察。

拉美之行

尽管关于纳粹在欧洲残杀犹太人的传闻不绝于耳，1941年4月29日，固执的小乔还是在布鲁克林的奥哈贝·沙拉姆犹太人寺院发表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演讲，声称不论最终何方取胜，美国都应保持中立，并且公开反对美国依据《租借法案》派出护航运输队奔赴英国。在他眼里，“这是全面参战的序曲，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在战争中将摇摇欲坠。”小乔认为，只要远离欧洲战事，美国人就可以享受自由甜蜜的生活。波士顿的报纸也推波助澜：“他说军事当局认为，如果我们在南美拥有坚固的后院，美国就会免遭战祸。”

但正在南美遍访妓院和各国使馆的杰克，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在给卡姆·纽伯里寄出的印有几乎全裸的妓女的名信片的背面潦草地写了一句：“还需要我说什么吗？”几周后，他与巴西外长在里约热内卢的美国大使馆共进晚餐，后者在回答有关该国政府对于目前世界局势的总体看法时，表现得咄咄逼人，称“胜利决定一切”。

1941年5月26日，杰克飞往阿根廷，这里明显更加倾向于德国。实际上，美国很恼火，它的利益也并不巩固。这与很多呆在家里的美国人，尤其是杰克的哥哥小乔那样顽固的美国人想像的截然不同。

杰克经人护送，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往卡卡尼奥家开阔美丽的弗朗西斯·德·维多利亚牧场享受乐趣。卡卡尼奥的小女儿奇奎塔愉快地回忆说，塞诺拉·卡卡尼奥被杰克深深地吸

引了，“我母亲曾在给父亲的一封有趣的信中，直截了当、不加掩饰地称他是那种典型的美国男孩，聪明伶俐。‘他总是引述总统的话，并认为自己有一天要当总统——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成为总统，我在感到荣幸时一点都不会惊讶，因为他有一种非同寻常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智慧。’”

杰克不改爱泡妞的本色和塞诺拉·卡卡尼奥的大女儿宝宝开始了一段罗曼史。同时，小女儿奇奎塔也为杰克的幽默所征服，“他是个活泼敏捷的人，总是在捉弄别人；他才华横溢，幽默诙谐，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意思的人之一。这个瘦削而且十分英俊的小伙子十分爱开玩笑！”

她们常陪杰克骑马打猎。奇奎塔兴致勃勃地回忆当时的情景：“热闹极了！有一回我们射鹰，杰克瞄准目标——可他险些让我成为倒霉的猎物！我猜他准是把我毛茸茸的头错当成老鹰了！”

两周的阿根廷之行让杰克对这个南美国家流连忘返。宝宝由此陷入对杰克的迷恋而不能自拔，并且从未停止对杰克的崇拜，然而，到处留情的杰克对她却是三心二意。杰克虽是天主教徒，但他从不相信所谓的“天长地久”。在告别了这位眼泪汪汪的美人及其家人后，杰克飞往乌拉圭的蒙得维亚后，又马不停蹄地于1941年6月10日飞抵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呆了四天，又搭乘圣塔路西号客轮从瓦尔帕莱索向纽约驶去。杰克浪漫的南美之行是他人生的宝贵财富。

这一路杰克途经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运河，途中他写信约比林斯请去纽约一叙，“我正在归途中，到这纽约的时间是6月30日，即星期一。我行李很多，因此打算在纽约住两天。我需要车，假如那个周末你能够来科德角，

肯尼迪传

就把我的车开过来，我希望能 在纽约见到你。你要是过不来就给沃尔多夫饭店带个信……我将告诉你一些轶闻趣事及最新消息。”过了很多年，比林斯带着一抹微笑愉快地回忆杰克讲的新闻时说：“除了他生活中从未缺少的艳遇外，其余的事显得无足轻重”。日本扬言要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了”。于是，1941 年 5 月 26 日，罗斯福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三周后，即 6 月 21 日，一个令人心悸的消息传来，希特勒的军队悍然入侵苏俄。

而对于杰克来说，家庭也发生了一场地震。他那一向信奉孤立主义、一心痴想以和谈来消弥战争的哥哥，希特勒的顶礼膜拜者，“哈佛反对军事干涉联合会”发起人之一的小乔，居然放弃了在哈佛的学习，报名参军，并且很快被派往位于波士顿南部的斯宽特姆海军飞行学校受训。

杰克决心不能让突然间 180°大转弯的哥哥抢走所有的军事荣誉，英俊聪明的杰克将会做什么呢？

杰克在美国海军的服役生活

罗丝·肯尼迪会告诉我们答案，“刚刚度过 24 岁生日的杰克，自南美回来后，就义无反顾地自愿报名参加陆军候补军官学校。但由于在哈佛足球队所受的背伤，他在体检时不幸被淘汰。倔强的杰克不愿放弃，又申请加入海军，但由于同样的理由再次失败。整个夏天的剩余时间里，他都在参加各种健美训练和矫正运动。9 月份，他又一次燃起了参加海军的希望。”

杰克参军并不天遂人愿，做做健美操就能如愿以偿是痴人说梦。杰克从南美回来后是否被美国陆军和海军拒绝全无凭

据，所以不得而知。但从他 7 月 8 日写给卡姆·纽伯里的信来看，他当时好像下决心要去上耶鲁法学院了。在信中，他这样写道：

亲爱的卡姆：

当我刚从南美洲回来，你就给我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祝贺你被陆军录取。天啊！没有人——包括可怜且体弱多病的约翰·科尔曼和我在内——可以“幸免于难”了……

说说我的打算吧，今年夏天我准备在一家银行打工赚够学费，然后，去耶鲁大学读书。

对于军队的情况，我知之甚少。在南美期间，我的背部常常发生“故障”，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这封信写到这儿有点落俗套了，而且限于篇幅，有关我南美之行的轶闻趣事，还是等到你碰巧来巴恩斯特布尔演习时，再与你共同享受吧。

过了 15 天，7 月 23 日又有一封加急电报：

亲爱的纽伯里，替我高兴吧，波士顿东部的哥伦比亚信托投资公司吸收我为他们公司的一员。我可否暂借你的公寓，大约是三周时间。然后，我将和一些朋友合租一套房子。

向莫问好。

事实上，在杰克准备上耶鲁期间，他也没有放弃加入海军

肯尼迪传

的努力，一位前海军武官的帮助让杰克有了希望。年初，失势的肯尼迪先生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曾写信给刚被提升为海军情报部长的艾伦·柯克上校，求他帮助小乔进入海军预备役军官学校。柯克上校在负责调查 1939 年的“雅典娜号”沉船事件期间，有幸和杰克相遇，对杰克的聪明才智赞叹不已。因此，当 1941 年 8 月这位前大使再次写信请他设法帮助身体不好的杰克加入海军时，他信誓旦旦地承诺把杰克带进华盛顿。前大使给柯克上校写信说：“明天我让杰克去体检，我希望他能幸运地到海军情报部去协助你工作，这将对他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由于海军情报部长事先的特意交待，1941 年 8 月 5 日，医生只是象征性地为杰克进行了例行公事的体检。而事实上，海军医学委员会没有查阅杰克过去的病历，对军队来说，这简直是不可饶恕。对于“过去的疾病或受伤记录”，只粗略提及“一般性的儿童疾病，1931 年切除阑尾，1933 年患 T&A，曾不得不调节饮食，禁忌油炸和粗纤维食品，无溃疡。”这个总结性的评价对于杰克 24 年来疾病缠身、频频住院的病史来说，显然是避重就轻。

曾经因健康问题严重无法投保人寿保险的杰克，现在却能如愿以偿地通过波士顿海军医学委员会的检查，当然开心极了。1941 年 8 月 8 日，柯克上校写信向过去的“老板”说：“帮这个忙对我来说只是举手之劳，而且我也十分乐意，因为你们家这位年轻人优秀得让人无法拒绝。小乔在这里干得也不错，我很高兴他在海军航空队一切顺利。”对于小乔选择了飞行而不是海军情报部或是舰艇部队，他也表示理解，“关于杰克，我祝福他一切顺利，并获得一份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天赋的

工作。”

接下来便是在波士顿北方工业大楼内办理各种手续。入伍者的个人表现、联邦调查局及警察局的记录将被逐一进行核查。肯尼迪家族在科德角半岛的邻居杰克·戴利推崇杰克是肯尼迪家最聪明的孩子，认为他思维活跃，睿智敏捷，是个非常优秀的水手，“我经常有机会和他比赛，他是个罕见的天才，操纵游艇时俨然像个老牌水手。”波士顿的一位著名律师巴特·布里克利也对杰克赞美有加：“他的与众不同大家有目共睹，他在哈佛表现优异而且是班上最有号召力的学生之一。这个年青人很有主见，我认为这个优点将使他终生受益。我从未听过有人说他的坏话，我之所以愿意不遗余力地举荐他，并不是因为他是乔·肯尼迪的儿子，而是他自身具备的优秀素质让人无法拒绝。”大法官约翰尼·伯恩斯表示“很多方面他都出类拔萃。良好的判断力，敏锐的领悟力，极好的人缘，使他如此与众不同。约翰没有其他许多出身名门的高贵子弟那样的轻浮与自负，相反他平易近人，显露出伟大品格的迹象。任何赞美的言辞似乎是专为他而存在的”。

1941年8月28日，杰克在波士顿参加了由J·A·约翰逊少校和卡尔·斯特恩菲尔特上尉主持的面试，并填了一张有关兄弟姐妹年龄、职业的问卷调查。杰克表示，“对到情报部工作感到非常振奋，因为在那里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来报效国家。”斯特恩菲尔特上尉在随后提交的报告中也不吝笔墨地称赞说：“调查结果显示，这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具备超乎寻常的素质。所从事的工作都有杰出的成就。出身世家却毫无盛气凌人之习。这个历史清白、讨人喜欢的年轻人雄心勃勃，急于开创自己的事业。他的忠诚毋庸置疑，他的谦虚谨慎

肯尼迪传

显示出良好的教养，他的判断力极佳，具备卓越的领导人所必需的基本素质……整个调查过程中，未见任何道德败坏、赌博、酗酒或好色等方面的迹象。”但最后提及的“并无好色迹象”一条，却好像是对弄虚作假的体检的回报，日后却成了有名的笑柄。

华盛顿的海军情报部办公室里，E·M·梅杰中校在看过报告后，于9月10日做出如下决定：“此人的文化水平、非凡的能力、社会关系和特殊的家庭背景，以及个人的素质，使他担任海军预备役少尉一职的资格毫无异议。此人完全适合在海军情报部 OP—16F 部门工作。”幸运之神终于在1941年9月15日降临到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在美国海军第一军区司令的正式握荐下，杰克被任命为美国海军预备役少尉。在海军情报部工作，受负责特种勤务的海军情报作战官领导。

杰克兴奋之余，当然也忘不了对他鼎力相助的人表示感谢，于是他给斯特恩菲尔特写信，表达了对他的感恩戴德。华盛顿的海军医疗检测局在接到8月份的体检结果后一路绿灯，于9月25日二话不说地颁发了合格证明。就这样，杰克·肯尼迪跳过军官学校的培训，直接被录取为美国海军预备役少尉。他终于如愿以偿。

然而，杰克恩人柯克上校却要调走了。杰克接到通知6天后，新海军部副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会见了柯克，对他毫不避讳地说，“我认为部长将下决心重整情报部，我们为了保持活力，必须注入一些新鲜血液。”

柯克毫无怨言，“情报部的声誉极差，”他后来这样形容说，“过于注重关系，经常的吃喝吹捧将情报部给毁了，现在是该打扫一下的时候了。”

离开海军情报部并不意味着失业，柯克上校立即被任命为驱逐舰中队长，负责前往冰岛的运输船队护航的工作，而且很快启程出海。这位杰克的介绍人的离去对刚刚开始海军生涯的杰克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时间知道答案。

东部之旅

新官上任的海军预备役少尉约翰·F·肯尼迪在海恩尼斯待命未果，按捺不住寂寞，于是他又重新开始社交生活。1941年10月9日，他在给卡姆·纽伯里一份自己的最新“东部活动报告”里津津乐道道：

狄克逊的婚礼令人难以忘怀，漂亮新娘，精神抖擞的狄克逊，他们简直是绝配。由于我为参加这个婚礼精心准备了好几个星期，风度翩翩的我几乎成为镁光灯的焦点，——我恐怕有点喧宾夺主了。狄克逊不无忌妒地说，我看上去就像个好莱坞大明星那样光彩夺目，像小莫似的。

我从那儿回到纽约后，登上前往弗吉尼亚海岸的美国海军军官学校训练舰 S·S·普兰瑞州号，目的是想看看终于入伍的新兵比尔·科尔曼，我想我不虚此行，虽本人没有见到，但我在那儿大喊“科尔伯格”，使得他的知名度迅速上升。

接着我又去格林威治看你的朋友、新郎皮特·威克。他略显老态，但风度依旧。我还去波士顿看望了托比和乔纳斯，麦克唐纳即将于12月19日与波利·科特结婚的消

肯尼迪传

息让我不可思议。然后我驱车回来，由于后援不足，于是我不得不结束行程，就一直呆在家里了。

夏天过得非常惬意。泽克过来住了一个月。麦克唐纳邀请我参加一场划船比赛我欣然答应。参加这种比赛得很快上船，还须力争好名次。姬克充满乐趣，她现在是《时代先驱报》总编的秘书，我想，这位编辑准是自以为是地相信姬克会速记，而口述的速度飞快。我自己的海军生涯将要开始，充满挑战的生活即将到来，我将全力以赴。

杰克的闲适生活很快过去了。10月17日，海军作战部部长那里传出消息说，“肯尼迪少尉将赴海军情报部外国情报处上任”，另外，还要看看身体能否满足要求。和上次一样，一周以后，杰克再次经过一番例行公事的体检，波士顿医学委员会弄虚作假，再次证明杰克健康。就这样，1941年10月27日杰克·肯尼迪少尉在十六大街的道彻斯特公寓租了一套房子，然后就赴位于华盛顿特区海军情报部上任，杰克得偿所愿地开始了服役生涯。

手 术

漂亮的蓝军装让杰克兴奋不已，他很快投入日常工作，主要任务是将国外情报站反馈的最新报告和密码电报整理出来，以清晰流畅的英文誊写出来，这些成为海军情报部办公室每日和每周新闻公报的重要素材。

杰克无法忍受枯燥乏味的日常工作。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海军二等兵比尔·科尔曼抱怨说，“除了主持即将在波士

顿举行施佩俱乐部的年会外，你一定对我如何进入海军感兴趣。其实，答案简单极了，有些人天生是军官的材料，而有些人当一个海军二等兵已属不易。对于一个好的海军人员来说，如何识别军官材料不应该成为问题。”

科尔曼不甘示弱，针锋相对地以轻蔑的口气回击杰克：

尊敬的马汉上将：

你如何获得了这个级别的确让人匪夷所思，整个海军预备军官训练学校都在怀疑它的公正性。的确，肯尼迪，我颇为此事感到莫名其妙而且夜难入寐，我常做梦，梦见尊敬的阁下编写了一本《海军海陆战术大全》，作为航海技术方面的课外读物发给我们，想到这种可怕的遭遇使我常常噩梦连连。

真是好笑，除了最负盛名的唐·哈佛号和彼得·大卫·菲尔丁·埃尔瑟号之外，你们是大西洋海军舰队最薄弱的环节，可谓路人皆知。你不要不知天高地厚，你在科德角驾驶海盗船的那点本事比起作战简直不值一提，更何况大言不惭地吹嘘要革新战术。提醒一下：商船上可没有安装中央控制台……

然而，当科尔曼知道了杰克将原本是寄给他父亲的信错投给时，科尔曼原谅了杰克咄咄逼人的语气，友好的调侃取代了先前的些许愤怒。“坦率的说，肯尼迪，我读了你给家人的信后我觉得你很有自知之明。你把自己形容成 1941 年间唐吉珂德式的无所事事的人物，想象一下由一群像你这样的人在海军里干，美国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只能让敌人暗自心喜。我对你

肯尼迪传

会搞好我最后一年的紧张训练持怀疑态度……不能因为你军衔比我高一两级，就会给我二手材料看。是否再次给我写信全凭你的主意，我期待着拜读你的精辟见解。我发现，你给父亲的信是打印出来的，而且不吝时间来描述你感兴趣的琐碎小事，看得出来，你还是挺体贴周到的……我真的希望约瑟夫老爸会喜欢你写给我的那封信。”

约瑟夫·肯尼迪是否喜欢杰克写给科尔曼的那封信只有上帝知道了。华盛顿一度曾是约瑟夫·肯尼迪宣传政见，指点政策的势力范围，威严的马伍德大厦是他的官邸，高大的政府办公大楼则是其指挥中枢。现在这位前大使却风光不再。他不无羞涩地写信给克罗克说，他并不留恋过去被万众瞩目的生活。但这显然不是心里话。布朗克斯维尔的房屋即将出售，家里的保姆后来回忆说，全家人心惶惶。“肯尼迪先生越来越自闭。他变得沉默寡言，就连孩子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这样说有点回避难题。实际上，肯尼迪正在为他的孩子搜肠刮肚地酝酿新计划，他那智力迟钝的大女儿罗丝玛丽，最近引出的麻烦令他终身内疚。约瑟夫正为罗斯福仍未垂青于他，为他安排新职而气恼时，谁能料到祸不单行，他为罗丝玛丽做出的一项错误的决定使她后半生成了植物人，这件事也使罗丝玛丽的所有亲人终生良心不安。罗丝回忆说：“乔和我请来了最著名的医学专家会诊，最终意见是，罗丝玛丽接受神经外科手术或许情况会有所改观。”

数年以后，罗丝改口抱怨说，乔在为罗丝玛丽是否做手术的问题上的决定都独断专行，从未真正地征求过她的意见。罗丝玛丽青春期来得迟，导致了许多与年龄不相称的问题。她开始向往性生活。勒姆·比林斯回忆说，“她的挫折感很深，变得

让人无所适从。她每天都无法安静，动辄就出手打人，甚至造成人身伤害，晚上又长时间在街上游荡，发泄过剩的荷尔蒙和人斗嘴。”曾是肯尼迪家族最乖巧温顺的孩子，如今却变得最让人头疼。“那时候，……她凌晨两点还在街上游荡。”罗丝的侄女回忆说，“你可以想象，对于极有可能成为色狼最佳猎物的智力迟钝的深夜游弋于大街的弱女子来说，其父母心情是多么焦虑不安？”

“设想一下，四处游荡的她有一天也许会跟一个哄骗或绑架她的人走，这将是多么令人恐怖的事！”罗丝在为失败的手术辩解时曾这样说。

有一些对约瑟夫·P·肯尼迪本人在家的所作所为有点了解的人，怀疑他强奸过可怜的罗丝玛丽，所以当迟来的感情迸发时，肯尼迪在负罪的心情下力图让她平静下来。而另外一些人，例如吕尔拉·亨尼西，则对这种破坏家庭稳定的议论嗤之以鼻，认为太不负责任的牵强附会对此事毫无益处。不论真实情况是什么，也不论罗丝事先是否知情，1941年秋的一天，罗丝玛丽被从华盛顿的修道院带走，悲剧性地做了脑白质切除手术。

手术似乎取得了效果。再也不用为罗丝玛丽的出走而牵肠挂肚了。事实上，她已经是植物人了。“手术消除了她的暴力行为和痉挛性的抽筋，”罗丝后来承认，“但手术的后果却事与愿违地使罗丝玛丽永远地失去了一切能力。这么多年来她自己的忍辱负重，以及我们对她充满爱心的帮助全都功亏一篑。她再也不能和我们共享这个自由的世界。”罗丝坦率地承认这是“对我们当头一棒的第一个悲剧”。

“我妻子和我很高兴有九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和你们的孩

肯尼迪传

子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一年以前，肯尼迪对美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时曾这样动情地说。现在，九个孩子中的一个已经过早地凋零了。俗话说：“漏船又遭打头风”，接下来一连串的不幸事件让这个赫赫的家族措手不及。

帕特森的晚宴

尽管罗丝玛丽手术带来的悲剧让杰克始料未及，他还是摆脱悲痛以满腔的激情很快地融入了华盛顿的上流社会。凯思琳虽然不会速记，但她的社交能力和幽默天赋却丝毫不亚于杰克。她倾听的能力让人为之折服。尽管于 1941 年 9 月才到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工作对她来说已是晚了点，但当 10 月底杰克抵达华盛顿时，她已为这位著名的花花公子营造了完美的社交圈。在海军部昏暗乏味的办公室里，海军少尉肯尼迪不被人注意，但华盛顿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交天堂里，凯思琳、阿瑟·克罗克以及其他人的帮助，使得杰克很快成为与达官显贵平起平坐的焦点人物。他交往的对象，虽不是上帝但却都是权倾朝野的人物。因此，几周之后，杰克就被邀请参加《时代先驱报》的所有者、华盛顿的传奇女性，锡西·帕特森女士家的晚宴。历史惊人地相似，和拿破仑发动俄战前夕在圣彼得堡的安娜·帕甫洛夫娜·谢列尔家里举办的沙龙一样，锡西·帕特森家的晚宴的后面就是让美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珍珠港事件”，华盛顿迟暮的气氛在这里被表现的淋漓尽致。

回忆过去，杰克对那个夜晚具有的象征意义始终念念不忘。他事后洋洋得意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兴致勃勃而又欲望强烈的他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他甚至认为由于晚宴的重要

性，而使其具有成书的充分依据。“出席晚宴的，”杰克在他的备忘录里这样津津乐道，“有海军部副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参议员伯顿·K·惠勒，赫伯特·B·斯沃普，伯纳德·巴鲁克，约翰·福斯特，英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弗兰克·沃尔德罗普以及这些人的内人，等等。”

晚宴以宾客之间的一场激烈的争论拉开序幕。

首先是惠勒同福里斯特尔就有关战争问题展开了一番针锋相对的舌战。两分钟之后，惠勒跟福里斯特尔以一百块钱为赌注，他认为共和党人一定能在1942年的国会选举中赢得了多数席位。

丰盛鲜美的佳肴也没法阻止争论。惠勒说，现在还不是真正关乎国家命运的时刻，美国遭受进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坚持认为不管英国舰队目前的处境如何，我们的空军是值得信任的，因此我们是绝对安全的。他强烈反对《租借法案》，尤其不感兴趣援助南美诸国。他们的不信任，妨害了他的公正和客观，认为在租借方面花的钱，等于是石沉大海。

对于这种孤立主义的论调，杰克可谓耳熟能详。惠勒在《租借法案》听证会之前，曾在棕榈滩与肯尼迪一家住过一阵，因此杰克有机会接触这位顽固的孤立主义者。“他估算总债额将达到1500亿美元，而我们根本无法满足，”杰克记述道，“这位参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到欧洲和俄国旅行……他对那里的经济在战争中所遭到的破坏深感震惊。他说，1922年他在奥地利看到，妇女为了一块面包而拉皮条，这种经历使他

肯尼迪传

相信，战争只能给美国带来灾难。“我坚信，”杰克在括号里记述说，“那一次旅行影响了他的一生，包括对于战争的态度和观点。每次我听到他讨论这类问题时，此事一定是不可或缺的素材。”

惠勒从自己的角度坚信，“福里斯特尔的政治立场是错的”。尽管公众现在对英国孤军奋战以及俄国对此所持的立场表示理解和同情，但这种感情是感性的，没有根据的，而且变化无常，最终会回归孤立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使人相信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事处，因而惠勒所主张的孤立主义观点为绝大多数人所抛弃，但到了1922年，反战浪潮的涌起使孤立主义重新风光大显，他又受到更多人的崇拜，”杰克记录道，“惠勒自信，历史将再次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尽管现在他似乎在政治上处于劣势，战后的反战情绪会让他的思想焕发生机。”

这番反战言论让杰克对这个顽固的孤立主义者备加敬佩。他仔细留意同一时代里的不同观点，牢记每一个声音，若干年以后，当他主持为这些人士修建的著名陈列室——“勇者的风采”时，肯尼迪努力再现了他们的声音。在他的眼里，不论他们的意见是否有误导作用，是否客观理性，至少坚定自己信念的勇气让人为之深深折服。富有理性、感情淡漠而且游离不定的杰克对这一点深深敬佩，虽然很多观点杰克并不认同。正如他的新朋友查克·斯波尔丁回忆说，杰克“从未将自己视为知识分子，但却总是关注着知识分子的一举一动”。

聚集的一群报界业主使杰克嗅到了那种清新的气氛。这种气氛，“慕尼黑事件”后他曾在阿斯特夫人的家中领教过，当时英国正为即将面临的战争犹豫不决，争论不休。然而如今，

美国也正重演着英国的历史。美国是否应该参战这一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的恐慌、偏见和希望纷至沓来。惠勒警告福里斯特尔说，干涉主义正把美国引向战祸的泥沼，因为它可能诱发美国的革命和内战，同时可能导致威胁美国民主制度的不满情绪的爆发。他警告说，指责他反犹是十分愚蠢的，对犹太人产生的负面作用比对他本人还要大。“人们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这样做必定是有理由的，”杰克记录道，“他承认自己是个地道的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国佬，他的冷血的特点只是因为他想让自己的国家免于战祸，并称他在同情波兰人和捷克人不幸的同时，更冷静地相信他们的灾难应该让美国人知道远离战争是多么的必要，而不应成为重蹈覆辙的诱因。”

杰克记录说，这番辩白“措辞恳切得体，但斯沃普夫人说他的立场极其怯懦。他反驳说，拂逆美国总统和大多数新闻记者的意愿的勇气证明了一切”——这样的辩解杰克曾经听父亲说过，他声称新闻界对他的指责和非难，比呆在被纳粹轰炸的伦敦还要让人无法忍受。

詹姆斯·福里斯特尔则不以为然。像杰克的父亲一样，他也在华尔街靠见不得人的投机倒把生意而发家致富。据查克·斯波尔丁后来回忆，当时杰克对福里斯特尔推崇备致。我想可能是因为福里斯特尔的处事方式的缘故吧。在我的印象中，他非常理性，不墨守成规，不固执己见，不以公谋私，这种方式很合杰克的脾气。杰克由此怀疑其他人的动机，尤其是那些几近狂热的人，认为他们越狂热就越可疑。

令杰克吃惊的是，福里斯特尔对“干涉主义者”的称呼十分生气。他认为，美国虽不承认，但实质上早已介入战争。“他说美国给英国提供援助就意味着趟入欧战的泥沼之中，因

肯尼迪传

为德国人是不会对美国人援助英国人的行为置之不理的。他以一个酒吧斗殴的例子形象地论证了这一点，”杰克原话记述道，“如果两个人发生争斗，一方得到了第三者的帮助，另一方难道不会迁怒于提供援助的第三方而大打出手吗？他征求了我的看法。”

两年来，杰克一直在这个问题上拿不定主意，如今在分别听取了主战者和主和者的相关观点后，他终于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使得他所受的教育、培养、及其旅行见闻的影响都整合为一体，而他原本不狂热的参与热情也随之沸腾了。

杰克的干涉主义立场

我回答海军部副部长说，孤立主义本来是我的立场，因为以前我认为，美国参战的高昂代价如果是为打败德国而付出的话，美国人会发现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南美之行以及俄国的稳定立场使我对时局有了新的认识。我相信，如果俄国坚持抵抗，美国的援助将让德国知道正义必胜的道理。如果形势紧急，而且可以让德国在极短时间内投降，我认为美国参战有充分的理由。

最终，杰克变为一位干涉主义者——这是在“珍珠港事件”四周之前。然而，他给自己留下了一个余地：“我认为，强求人们在这场战争中采取强硬立场是不现实的，”他解释说，“我们的政策应该有很大的屈伸空间，要随时适应波诡云谲的战局。”

福里斯特尔为这位 24 岁青年的诚实而赞叹不已，他说：

“他不回避自己也一度是个孤立主义者。但他的理性让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必须为 20 世纪负主要的责任。”伯顿·惠勒“给我们造成一种希特勒所向披靡的印象”，但福里斯特尔却发出不同的声音，声称希特勒“疲惫而焦虑不安。也许有一天我们将被迫与之交战，那么为什么不趁现在有盟友时和他决一死战，这才是明智之举。同时，也要明白这不可避免。惠勒参议员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美丽的泡沫世界。”

著名的记者赫伯特·B·斯沃普发言承认自己是干涉主义者，但对惠勒关于他是“防空洞里的爱国志士”的指责声称不明所以。对于帕特森报纸上刊登的、有关 1943 年不会有任何选举的消息，他嗤之以鼻。他拒不接受由弗兰克·沃尔德罗普提出的战后美国将发生革命的说法，他指出只是有发生内战的可能。

詹姆斯·福里斯特尔赞同斯沃普的观点。据杰克记载，福里斯特尔说内战爆发的可能性不存在，因为有关干涉主义和孤立主义的争论还没有严重到使国家分裂到可能爆发内战的地步。此外杰克用括注补充了一点：有趣的是，这反映出他们在看待是否参战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书生气。没人建议应该把它当成一场实实在在可能发生的事情来探讨。空对空的争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而他们认为是一场政治斗争。

斯沃普接着表态说，如果有人建议 1943 年不举行选举，他将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愤慨。他认为惠勒有关“罗斯福可能被弹劾”的指责不值一提。他说自己的必须参战的信念完全出于道义上的考虑，他对自己是惠勒所指责的那些想让国家卷入战争的“华尔街金融家”的一员表示不理解，此时巴鲁克插话说，“斯沃普的确不是华尔街金融家，但他无时无刻不想成为

肯尼迪传

一员。”

现在轮到阿瑟·克罗克发言了。阿瑟·克罗克成了香饽饽，被斯沃普和惠勒争抢着。但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斯沃普要他表明立场，他答应了，但这不代表他就支持斯沃普。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讲了个故事：“一个酒吧招待问老板，喝酒是否对帕特·莫菲有益？‘他喝了吗？’‘他喝了。’‘那就有益。’”克罗克强调说，他看待战争的方式与此一样。他说，讨论对战争持何种态度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事实上我们已经参战了。他否定了惠勒所谓“罗斯福意欲明哲保身”的说法，并且希望“到场的英国人明白，美国放弃中立立场给国家带来一次大震动”他谈到一位国会议员因投票终止中立而损失了价值为三千万美元的合同，一位南方的民主党人也因此丢掉了审判员的职位，这一切让英国人乃至全世界人相信美国人是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选择参战的。

令杰克叹为观止的是，圆滑的克罗克居然能同时在干涉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两派人中人气都很旺，因为惠勒也同意这一点，并且说凯利等一群老板，在最后一分钟被白宫召来，给持反对意见的国会议员施加压力，而“老板”则是国会议员的衣食父母。表决结果：212:200 可见一斑，惠勒说，如果参议员自己作主的话……撤销《中立法案》的提议根本就不值一提。

“无论争论多么激烈，整晚的讨论都是出于良好的愿望，”杰克乐观地评论，“这似乎将英国人提出的不让政策观点影响个人关系的理想境界演绎的淋漓尽致。”

这次家宴促成了杰克高瞻远瞩的策略水平，最终给了肯尼迪一把开启美好未来的钥匙，使他有足够的智慧投身于 20 世纪最非凡的政治生涯中去。

第九章 烽烟与柔情

母亲眼中的杰克

和很多小时候在家里经常挨训的孩子一样，长大后的肯尼迪兄妹没有责怪父母，反而对他们关怀备至。因此，1940年，当这位过气的前大使越是在公众面前“大出洋相”，杰克反而越是维护他，对他过去一贯的帮助念念不忘而且感恩戴德，同时对他目前的处境表示同情，这也许就是亲情的巨大力量使然。

但杰克对母亲却没有多少好感和默契。“杰克和母亲的关系简直糟透了，”奇奎塔·卡卡尼奥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用令人难忘的话把罗丝形容成一个圣母样的虔诚的母亲，她说：“天堑永远不能成为通途，罗丝·肯尼迪本人就是个非常令人反感的人！我的意思只是想说，我是天主教徒，有很多天主教的朋友，而她让人恐惧的而令人无所适从。”

亨利·詹姆斯写道：

我想在母亲面前的杰克总是小心翼翼的，因为罗丝笃信宗教，而这一点他永远也无法做到。她属于那种“宗教决定一切”的宗教狂热分子，我猜想她每天都会虔诚地做

肯尼迪传

弥撒。而杰克却迥然不同！……他也和母亲交谈，但从不与她共享有关自己的活动、行为或别的什么。他们之间的隔阂难以弥合，因为她狂热的天主教徒情节让杰克感到无所适从，我们谈论宗教时，杰克曾很坦诚地告诉我，他觉得天主教宣扬的大部分信条都让人无法相信。

与此相反，杰克认为父亲公私分明，只是在政治上和公开场合自我标榜为天主教徒，而行为却与天主教义格格不入。他通奸，臭名远扬；他对教堂的说教如过耳秋风，只有万事皆可原谅的爱尔兰概念让他欢喜，因为这是逃避惩罚的便捷的办法！

聪明的杰克对父亲不知廉耻的两面派行为深有感触。因此，在杰克看来，宗教对这位前大使实在可有可无，放荡行为才是他追逐和向往的。

罗丝·肯尼迪的眼中的杰克和他父亲一样不道德，要受到谴责。但在杰克遇刺身亡后，罗丝改口，说她“想不起平生还有谁比杰克在饭桌上的吸引力更让人动心……他那欢乐的神情，机敏的对话，他对当前形势的鞭辟入里的分析，以及其他一些让人感兴趣的事情，使每个和他在一起的人，乐意倾听他迷人的谈话，他们知道自己可以参与交谈，同时又被他的超凡魅力吸引而心悦诚服。总而言之，和杰克在一起是令人非常愉快的。”

但这只是事后的溢美之词，事实上，杰克在世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代沟无日不在，彼此之间怨言不断。杰克曾经以充满讽刺的口吻给母亲回信说，“在帕特森家宴上，非常荣幸能拜读您那众人传阅的信。我打算把它们保存起来留着将来发表，

因为您的风格将把数百万的财富送给我们。所有关于通货膨胀以及我们的钱的用途的话，使我为您潜在的赚钱能力深深折服。由您口述，沃克夫人打出来的信，足以使人顶礼膜拜，感谢上帝赐予我们多切斯特高等拉丁文学校，使得您拥有如此牢固的语法基础，您第一个稀疏混合的比喻和有些分裂的不定式将这一切表现得入木三分。”

“我的身体状况尚佳，”他继续冷冷地嘲讽，“我看上去像个鬼，而我的胃却像，像您一样棒。妈，跟我的胃不同的是，您一直拥有廉价的快乐。”

不出所料，罗丝把这封信排除在自己的回忆录之外，那里面收录了孩子们许多义务性的问候。她一本正经、说教式的教育风格代替了她内心的热情、母爱和紧紧拥抱的温柔。这点就是杰克的冷嘲热讽也无能为力，或许这些感情从来都是奢侈品。不过，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杰克在一个出名的“年长女人”的怀里，找到了一个原本应是母爱所营造的温馨和甜蜜。

热力四射

年长的英加·阿尔瓦德很像杰克的母亲。漂亮迷人的身姿，香气袭人的胴体，以及恰到好处的打扮，充满让人无法抗拒的诱惑。但与杰克母亲的一本正经不同，她对性爱充满了渴望和幻想。

金发碧眼的英加出生于丹麦，熟悉四种语言。最初在纽约发迹。那是1941年6月，在一次普利策新闻奖委员会的会议结束后，她在百老汇钓上了阿瑟·克罗克，并央求他帮忙替她

肯尼迪传

在华盛顿报界找份工作。那会儿性感的英加刚刚在哥伦比亚新闻学院读完一年级的课程。她当时问他，如果她来华盛顿，会得到帮助吗？克罗克回忆她当时的问话，温情地说：“我被这个尤物的美丽深深地迷惑了，忙不迭口地答应，‘我会的’。”

克罗克把英加推荐给锡西·帕特森夫人。照英加的回忆，“她听我介绍了在欧洲当记者的经历后，当即毫不犹豫地派我撰写《每日专栏》”感谢华盛顿。”

《时代先驱报》的副主编弗兰克·沃尔德罗普对英加的印象是这样的，“她不擅长写长篇的东西，分析能力有限，但对于描写人物却有一种天赋的直觉。于是我们为她量身定夺，开辟了一个人物专访专栏：‘你是否偶遇……？’那段时间很多人纷至沓来，我让她去找一些人采访。她的成果就是一些风格简洁、小巧的访谈文章。工作以外，她很陌生。她漂亮迷人，常和佩奇·维多科普尔去乔治敦鬼混。”

不错，用这个词来形容她们的生活最为淋漓尽致。出身于荷兰裔的弗吉尼亚家庭的佩奇·维多科普尔，曾在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工作，与小乔、杰克和凯思琳就是那时认识的。“我过去和一群好朋友同住，当时正想再找个室友，恰好阿瑟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英加。于是我们见了一面，她迷人的诱惑力让我无法拒绝，于是我答应了。

“她和凯思琳是好朋友。集体出动是她们的一大特色。同住的男孩子带同住的全体女孩一起出门好像天经地义。这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一群年轻的单身汉喜欢合租一套居室，而且喜欢结伴而行，女孩们对这种方式也情有独钟。当时晚会频繁，因此大家都是结伴前往。实际上，拒绝别人的单独行动在这里没有市场，往往会遭人白眼。”

正是在这种似乎永无止境的交际活动中，佩奇回忆说：“英加结识了杰克。”

多年以后，英加描绘了她与杰克相识的经过：

凯思琳蜷缩着像只恬静的小猫，在她读信的时候，她那长长的褐色头发遮住了她美丽的脸。她突然跳起来……她那爱尔兰碧眼闪烁着的光芒让人联想到上帝是否又要重生，她窜到地板上，跳起了旋转舞，兴奋得像个伊斯兰教的沿街托钵僧。“他要来了。我要在 F 大街俱乐部给他开个盛大的欢迎晚会，你一定会为他着迷的！……”

“谁呀？”我不明所以地问，我比她大几岁，对她如此痴狂的行为难以理解。是她的追求者之一吗？“到底是谁呀？”我充满好奇地问。

“杰克。他刚加入海军，马上就要被派到华盛顿来了。太棒了！太棒了！”凯思琳兴奋得像只兔子。

几天后，他来了。姬克一点也没夸张。他的确有种蛊惑人的迷人魅力。他们看上去像是双胞胎。浓密光艳的头发，天蓝色的眼睛，让人为之痴迷，自然、专注、热情而雄心勃勃的特色使他光彩夺目。他一走进房间，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注意的焦点，但他并没有给人以压抑感，也没有咄咄逼人，只是自然地散发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野性的吸引力……

他的畅销书《英国为何沉睡》的出版让人为之侧目，老板锡西·帕特森说：“写篇肯尼迪的专栏文章吧。”我二话不说就照办了。

肯尼迪传

两页的专访登在 1941 年 11 月 27 日的《时代先驱报》上。文章一开头就对肯尼迪推崇备至：

如果这个世界有人不相信遗传，那就请看看杰克与他的父亲吧，他们会让你对你的怀疑感到无地自容，俗语说的好“有其父必有其子”，约翰·F·肯尼迪大概算是这句话最好的美国版本。如果说前大使乔·肯尼迪才艺双绝，魅力四射，而且有神奇的摄人心魄的吸引力，那么，他的次子则是这笔财富的最大获益者。24 岁的杰克的出现给我们星球带来了福音，有理由相信他是一个前途无量的男孩。

年轻的肯尼迪？可别这么称呼他，他会强烈反对的，他的所作所为不会给你这样的感觉。他在哈佛所做的事不仅仅只是踢踢球，他在同学中的号召力无以伦比。这位哈佛的高才生曾担任学生干部，二年级时参加了一次校际帆船比赛，而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一篇论文。

《纽约时报》的阿瑟·克罗克对这篇论文赞赏有加，决定将它出版成书。此外，《时代》、《幸福》和《生活》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卢斯想必也是不谋而合，竟然为之作序。整个暑假杰克广泛征求意见，以每天 12 小时的艰苦工作为这本书修改润色，最终这本好评如潮的《英国为何沉睡》一书终于如愿以偿地出版了。

华盛顿一时为之纸贵。

在英加眼里：“杰克惟一不喜欢的就是他自己，或许这正应合了“不满是向上的动力”这句老话。从哈帕兰达到横滨，

他的说话技巧让人为之叹服。年长的人喜欢听他发表意见，因为他的观点常常一语中的，相对于他的年龄来说，惊人的客观性让人叹为观止。”

而作为一个 1940 年 2 月才来到美国的丹麦人，英加英语之流利也同样令人为她的语言天赋惊叹不已，而她对杰克的了解更是惊人的深刻。她向同为记者的约翰·怀特坦承：“杰克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因为他真诚而极具亲和力。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对自己的目标有清醒的认识。我喜欢这一点，而且我喜欢他。但很显然，他不是一个能够与之长相厮守的伙伴，他对此也毫不隐讳，他从不装腔作势地让人对他的道德有信心。总之，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而我对能够帮助他充满期待。”

祸起珍珠港

“我们都在塑造他，他在奇思妙想方面有点欠缺，但还点缀着一点微小的希望之花。”英加后来回忆说，“那些迷人的夜晚，他、姬克、托比·麦克唐纳、查克·斯波尔丁及一些别的人集体聚餐，食谱保持强烈的一贯性：牛排、豌豆、胡萝卜和冰淇淋。他们在姬克的起居室凑和着玩橄榄球，这种运动使丹麦人无法理解。他们的争论是必然的内容，政治是永远的话题，但不知怎的，结果总要回到杰克身上。刚满 24 岁的他，正在为服役还是去大学教书而左右为难。我们半当真半开玩笑地建议，有一天他要当总统。他意味深长的笑了，并且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我决定参加竞选，你将为策划人这一职务而苦恼万分。’”

肯尼迪传

让所有肯尼迪迷们感兴趣的是，由于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的适度宣传，这段无谓的感情竟成了杰克一生最为辉煌的恋爱经历。

这时候，在闭目塞听、夜郎自大的华盛顿军界，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松懈气息。12月3日，美国陆军作战计划部门的一名军官电问参议员伯顿·K·惠勒是否有兴趣阅读一份从魏德迈上校的文件柜窃取的最新绝密的“胜利计划”。糊涂的惠勒对联邦调查局的监听能力明显认识不足，因此出言不慎！“把美国最绝密的文件透露给一个参议员，你不觉得很危险吗？”这一句话所产生的威力使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他的影响力可能在若干年后才能完全体现出来。第二天，美国为欧战所做的绝密计划不仅落到了纳粹德国大使馆手里，而且，更成为美国各大媒体争相追逐的焦点新闻。

华盛顿的《时代先驱报》捷足先登，成为最先披露这一消息的报纸之一。锡西·帕特森和弗兰克·沃尔德罗普，这两个狂热的孤立主义分子，希望公开这样的消息能产生震慑美国公众的效果。“这场大战将使欧洲文明社会万劫不复，”后来沃尔德罗普撰文为该报的立场辩护，“在美国，仇恨、疑惧和冷酷的人际关系正在分裂群众、亲密的朋友和每一个家庭。”

当时杰克已经下决心支持美国进行军事干预，正在海军情报部认真供职的他对这则新闻的态度让人为之期待。他在OP—16F办公室的很多曾是记者的同事，对此难以忘怀，其中一位回忆说：

屋子里有六个人，陈设非常简单，笨重的金属书桌是惟一的陈设……编辑三份情报简报是我们工作的全部：一

肯尼迪传

是提供给海军部长及其他要人的每日简报，内容主要是当日重要动态的摘要；第二份是准备给岸上驻军和海上舰队的四页简报，其发行量要少而内容不太敏感；第三份是一种四页的每周简报……哦，对了，我差点忘了每人桌前还有一台打字机，每天我们枯燥乏味地撰写、修改和编辑……肯尼迪对我的印象很深，他才华横溢，思维活跃，文笔不错。他的社交生活丰富多彩，只是那时他多多少少还是个花花公子。

罗丝·肯尼迪在一封陈情书中所透露，他们在纽约的房子已于 1941 年 12 月上旬出售了，那是个让杰克留恋的港湾，杰克对那里的“最好的布朗克斯维尔家具”充满温馨地感情。罗丝告诉远在异乡的儿子，他的父亲将来华盛顿看望他。“他于星期二午夜启程前往华盛顿，并将与杰克共进午餐。”12 月 3 日，星期三，父亲登上回纽约的飞机，杰克有空写信到康涅狄格州，让比林斯周末把行军床带来。“周六工作繁重，”他说，“五点能够结束就要感谢上帝了。但姬克有空。告诉我们你有什么计划，我乐意为你和姬克撮合——带上你的夜礼服——我们可能去切维蔡斯。万事大吉。杰克。”

“那段时间我是华盛顿的常客，”比林斯后来回忆说，“我由于视力不好，根本不能应征入伍。”1941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早晨，哥俩出去“找地方儿打场橄榄球赛玩玩”，比林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杰克的橄榄球玩得特棒，我不是他的对手。他对打橄榄球、垒球等情有独钟，但我则不以为然。这方面我们总

肯尼迪传

是争论不休，最后总是以我的让步换得妥协。

我记得自己尤其不感兴趣跟陌生人玩球。而他则热衷于此，星期天，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找个正在比赛的橄榄球队接纳我们参加。有个球队愿意接纳我，但我的水平比杰克差了很大一截，用不了多久他们就看透了这一点，这简直让我无地自容！不管怎样，那个星期天，我们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参加了一个愿意接纳我们的球队的比赛。我们打完，正在开车返回公寓的途中，一个让人骇人听闻的惨剧传来，车上的收音机里传来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

比林斯惊呆了，突然的消息让美国人群情激愤。滚滚的浓烟从马萨诸塞大街的日本大使馆冒出来，弥漫了整个天空，做贼心虚的日本外交官在焚烧文件以图毁灭一些罪证。成千上万愤怒的人们则聚集在白宫门前，期待着总统发出指示。

1941年12月8日，罗斯福总统在国会中发表讲话。他直截了当地愤怒指责了日本人的行为“必将遗臭万年”，他以前所未有的果断强烈要求“国会宣布，12月7日星期日这天，日本无端挑衅的狼子行径，将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带入战争状态。我们武装部队的强大力量，以及美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决心预示我们必将大获全胜。因此，历史将雄辩地证明邪不胜正，胜利一定属于美国人民。”

一票反对无疑于螳臂挡车，国会以绝对多数票表决通过，大力拥护总统义正严辞的声明。于是，海军情报部也随之进入临战状态：下午五点下班的制度自动消除，24小时工作制的实行用于保证行令畅通和快速反应。

“我知道你对我不能抽空参加婚礼一定很生气，现在我从

头天晚上十点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周末变得遥遥无期。”但他仍希望能赶去参加他们的朋友埃本·派里的婚礼，“我这个绝妙的主意定让大家欣喜若狂，我下班坐飞机过去，周六晚上再飞回来继续工作……请向盛情的新娘转达我的谢意和遗憾。”他疲惫得以至忘了签名，并且加了句歉意的附言：“这封信是否乏味至极？没办法，熬了几个晚上，我实在困极了。”

比尔·科尔曼给杰克写了张便条说，“昨晚我见到姬克，她说你现在上夜班，都快变成夜猫子了！请善待你的身体，这样下去，将对你的视力和灵敏的触觉极有损害！”

第二天传来消息，日本已长驱直入，侵占马来西亚、香港和菲律宾的吕宋岛。12月11日，阿道夫·希特勒宣布，《三国轴心协议》正式生效。德国将与日本一道敌视世界，包括自以为安全的美国。

先前激烈的争论随风逝去，美国百般无奈，终于被逼上梁山，加入了这场世界大战。

无情的战火

无辜的英加成了华盛顿的首批战争受害者之一。弗兰克·沃尔德罗普回忆说，在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之前，倾向孤立主义的《时代先驱报》的气氛就已经十分云谲波诡，战争发生以后，情况更为复杂。按道理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大家应该静下心来，停止众说纷纭的争吵。但实际上情况混乱得让人无法相信。“相反，彼此间的相互攻击一直没有停止而呈现白热化的程度。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以煽风点火为能事。”沃尔德罗普这样描绘说。

肯尼迪传

英加的前室友——佩奇·维多科普尔不合时宜地烧起了第一把火。阿尔瓦德回忆说：“凯思琳·肯尼迪告诉我说，办公室里有一位女孩惟恐天下不乱，正在煽动别人说我可能是个间谍。难道就因为她在资料室里发现一张我在柏林奥运会期间在希特勒的包间里的照片就可以这样对我大肆攻击吗？”

“事实上我可从未在希特勒的包间里照过相。即使照过，也不代表什么。当时，各国大使都应邀坐到包间里，难道他们都同情纳粹德国？所以这个故事本身并没有让我有万劫不复的魔力，但那女孩说我和纳粹关系可疑，这让我火冒三丈”。

“我恼羞成怒，”英加叙述时有意用错了词，逗得杰克乐得直不起腰来，“因此我去询问锡西·帕特森，向她寻求建议……我现在还能记起当时的情景：锡西·帕特森对这些讹传深恶痛绝，希望能帮我一把，同时凭着新闻工作者的敏锐又觉得整个事件是个很好的故事素材。”

锡西·帕特森的的勇气和顽强几乎尽人皆知。然而，《时代先驱报》当时正处在一个尴尬境地：该报一向倾向于孤立主义，最近又因将绝密的美军军事计划泄露出去而触怒政府。如今，“珍珠港事件”的反弹压力必然使政府考虑采取报复措施。如果英加真是清白之躯，最好是及早主动地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以澄清指责。

“帕特森夫人建议，我应该和主编及指责我的那个姑娘一起去联邦调查局汇报这件事的始末。”英加叙述说，“我当时天真地以为在经过调查证明无辜之后，就可以还我清白，同时，还可以从联邦调查局那里得到一纸文书，证明我的无辜。这是我所犯的第一个错误。事情远远没有我所预见的那么简单。”

沃尔德罗普回忆说：“帕特森夫人委托我协同处理，我叫

来指控英加的维多科普尔小姐，以及英加，让她们穿上外套。然后双手挽着两位年轻女士，穿过马路，径直到达拉斐特广场上的巴拿马铁路办公大楼，找到了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办事处。”英加描绘说：“我们最后走进了联邦调查局一个办事员阴森森的办公室，他先听取了那个女孩对我的指控，当然我没有听到有关的内容，因为我正在外面等候。然后他叫我进去，追根究底地把我的陈年往事都叙述了一遍。”

“天真的我毫无心计，出于对正义的充分信赖，我问他，如果联邦调查局查不出任何证据，能否给我出具一份文书，证明我是无辜的。当然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是经受得起调查的，因为谣言终究只是谣言而已。这位小个子办事员从桌子后面抬起头来意味深长地看我。这个典型的办事员，像个受惊的耗子，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一只粉红色老鼠正在偷吃戈尔根朱勒干酪时却不幸被抓住了。”

他当天下午就把题为“保尔·费乔斯夫人，又名英加·阿尔瓦德”的浅尝辄止的报告呈到了联邦调查局长 J·艾德加·胡佛的手里。

1941 年 12 月 12 日下午，华盛顿《时代先驱报》主编弗兰克·沃尔德罗普陪同该报记者 P·维多科普尔小姐及该报专栏作家英加·阿尔瓦德小姐就关于对英加小姐是间谍的指控来到我的办公室接受调查……情况大致是这样的：维多科普尔小姐几天前对《时代先驱报》记者——凯思琳·肯尼迪说，她对英加可能是外国派来的间谍坚信不疑。她列出证据说，她的一位朋友在翻过去的柏林报纸时，意外地发现一张英加在柏林奥运会上与纳粹头子希特勒的合

肯尼迪传

影……肯尼迪小姐不相信这种指控就把维多科普尔的话透露给了英加。

英加小姐随即惶恐万分地找到帕特森夫人，抱怨这是谣言，帕特森夫人对此深感厌恶，如果让人知道英加小姐有间谍嫌疑，这可能会对雇主《时代先驱报》——一家孤立主义报刊——产生消极影响。但帕特森夫人声明丝毫不怀疑英加小姐的清白，于是让沃尔德罗普先生偕同两位年轻的小姐来联邦调查局接受调查，以图水落石出。

沃尔德罗普认为，佩奇·维多科普尔当时可能只是出于女人天性的强烈的忌妒，除此无它。“我相信她并非怀疑英加是间谍，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心上人被英加抢走而愤愤不平，”他透露说，“迷人、年轻而且富有的杰克，与大家闺秀的弗吉尼亚的大小姐本是甜蜜情侣……但这儿突然冒出了个英加，把杰克弄得神魂颠倒。她们都对肯尼迪少尉痴心相报……这就是事情的缘由。但具体细节，我就不得而知了。这些总是一块出去寻欢作乐的孩子惹出麻烦毫不希奇。”

维多科普尔本人后来也惭愧不已，并对联邦调查局表示了不满：“我认为这种谣言根本就站不住脚。当时华盛顿有很多人都被牵扯，但我并不认为英加真是间谍。”

不管佩奇·维多科普尔当时是什么打算，“醋意”的佩奇称自己是在尽一个美国公民或者说一个弗吉尼亚淑女的爱国本分的解释都没有任何充分的根据，历史跟杰克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那段草木皆兵的日子里，维多科普尔小姐所捅的马蜂窝导致了杰克大倒其霉，被开除出海军，而直接当事人英加却安然无事。

英加·玛丽·阿尔瓦德的故事

英加·玛丽·阿尔瓦德于 1913 年 10 月 6 日生于哥本哈根一个丹麦人的家中。母亲曾在英国习医，父亲则出生于地主家庭。英加人生的前半段可谓扑朔迷离，精彩纷呈。她的双亲在没有取得家长同意的情况下私自结婚，婚后双双私奔到南非，在那里父亲不幸染上疟疾，在小英加四岁时病故。后来英加在英国读书，十一岁时，她在哥本哈根的皇家剧院学习舞蹈；后来还拜马克斯·吕特为师学习钢琴；十六岁是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她当选为丹麦选美皇后，并前往巴黎参加了次年的欧洲小姐选美，被福利贝热尔公司识中并高薪聘请，得到父母遗传的她，17 岁时与一位埃及外交官私奔，二十岁不到又和他分了手。

在一次采访中，英加将这些归咎于母亲，“她对我期望太高，”英加抱怨道，“一心希望我能出类拔萃。先是希望我当个舞蹈家，但我在哥本哈根的皇家剧院接受训练期间病倒的事实让她这个希望破灭……后来她似乎又觉得我拥有一定的音乐天赋，于是对我能当钢琴演奏家而津津乐道……我母亲对我宠爱有加，但从不纵容我。她努力教导我独立，但我害怕独立！我喜欢衣食无忧的生活！”

1935 年，21 岁的英加碰到了一位 39 岁的电影导演——保尔·费乔斯。保尔的经历也是传奇性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学过医，并当过匈牙利步兵军官和飞行员，之后才取得了医学学士学位并拥有了行医的资格。战后改行进入匈牙利戏剧界，导演过歌剧、电影、戏剧，还访问过好莱坞，并于 1929

肯尼迪传

年拥有美国国籍。但是费乔斯很快对好莱坞千篇一律的电影风格感到厌烦，于是重回欧洲为米高梅公司拍片。费乔斯在根据美国报纸道听途说成的消息和联邦调查局公布的所谓事实真相拍一部片子，需要一位标准的金发碧眼美女，英加就这样浮出了水面。首先是英加母亲打电话向费乔斯推荐自己的女儿。当时还姓阿尔瓦德的姑娘，对这件事并不是太热衷，但还是参加了面试，而且魔鬼与天使混合的美丽使她顺利地获得了这份工作，在挪威湾拍片。据阿尔瓦德回忆，她拍了六个月的片子就觉得乏味透顶。女主角与导演总是矛盾不断，然后，导演去了马达加斯加，而女主角则去柏林当了一名记者，这次合作不欢而散。”

然而，这段生活却成了英加·阿尔瓦德日后永远无法摆脱的梦魇，据弗兰克·沃尔德罗普说。除此之外，《时代先驱报》还有第三人参与此事，而这个人就是维多科普尔所称发现阿尔瓦德与希特勒合影的那位尴尬的“朋友”。据沃尔德罗普后来反映，此人没有理由指控英加，因为他根本无权翻旧报纸。“他是采购部门的，与编辑业务不搭边。一卷纸有多少张，复写纸一卷有多重，才是他的份内之事。他就是为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审查英加的那个特工，编号为3，二战后披露的文件才让我知道这一切。让上帝诅咒他们的无事生非吧！我太信任胡佛了。他们导演了这一幕：这个无聊的特工人员与佩奇配合，制造了这场尴尬而恼人的事情，而这事正好将英加陷入不义之地。”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联邦调查局选目标的本事可让人叹为观止。因为英加见过希姆莱、格林和戈培尔等纳粹好战分子，甚至接触过希特勒。在德国对美国宣战后，可以想像这样的事

实会将她陷入多么令人可疑的境地。而阿尔瓦德 1941 年 12 月 12 日接受联邦调查局调查时的口供记录证明，她于 1935 年 4 月开始“担任《贝林时报》驻柏林特派记者”，于 1936 年 1 月离开该报。在此期间，德国是她工作的重点关注对象。她奉命采访很多政坛风云人物。她说她两度采访了希特勒，还采访过格林和戈培尔等战争狂人。

不难想像，这位格调低下、猥琐下流的 3 号特工在记录下这段供词时，惊讶得一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英加说，自己听到“肯尼迪小姐告诉她之后，愤怒异常，”澄清道，“憎恨德国人及其政府，如果需要，愿意和维多科普尔小姐对簿公堂，力图将真相公布于众。”英加说：“伯纳德·巴鲁克先生曾告诉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位女记者被误认为是间谍，而被联邦调查局盯住不放直至前途尽丧’。”阿尔瓦德说：“这种骚扰包括监听电话并闯入住宅”。但她说记不起巴鲁克先生提及的那位悲惨遭遇的女新闻记者的名字了。

有关巴鲁克的故事，尽管有些细微出入，但却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预见性。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阿尔瓦德的境遇几乎和巴鲁克所提到的那个倒霉的女记者没什么两样，其记者生涯也彻底完蛋了。但耐人寻味的是，她头口所标榜的对德国人及其法西斯政府的痛恨似乎与她接近希特勒及其密友的传闻矛盾重重。她为之辩解说，她对人们无端的猜测十分不解，她不明白一些有关个人生活的话题，诸如他们对婚姻的看法，早餐吃什么等等，为什么会被拉入到政治范畴而加以攻击呢？

她对曾在丹麦的报纸上报道了格林的婚姻毫不避讳，并且也承认她参加了采访柏林奥运会的报道，当时她已离开丹麦那家报社。“奥运会期间她采访了希特勒”，英加的这些话成为联

肯尼迪传

邦调查局继续的把柄。“英加只是获得希特勒包间席位的外国记者之一，希特勒出现那一刻，刚好她也没有离开而已。她辩解说她被偷拍了一张与希特勒的合影，而毫不知情。她明确表示，认为她为了抢镜头而有意站在希特勒身边的观点简直是无稽之谈。”

阿尔瓦德极力摆脱与希特勒的牵连的作法使她越描越黑，促使联邦调查局追查下去。在私闯英加的住处并大肆搜查了一番之后，联邦调查局渐渐对阿尔瓦德先前在德国的生活有了明朗的认识，而且有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被首次披露出来。后来的一份报告总结说：

阿尔瓦德书桌里存放的大量文章将她与德国政要的交往展露无遗……下面是她写的文章的部分摘要：一篇是记述保尔·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另一份则是关于艾米·宗内曼及其丈夫赫尔曼·格林的一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阿尔瓦德曾为就婚姻问题采访宗内曼小姐而沾沾自喜，深以为荣，而后者又被前者许多甜言蜜语感动，因此破格邀请阿尔瓦德作为私人客人参加她的结婚庆典。她如期赴约，并对现场的情景记忆犹新而且记录下来，尤其是阿道夫·希特勒当天的着装让她津津乐道。她还透露自己与当警察局长的叔叔及前德国皇帝的随从参谋、海军上将接触过几次，并通过他们，结识了戈培尔，又通过戈培尔博士的安排，专访了希特勒。

此时正值希特勒对美宣战，联邦调查局当然对英加有这样一位当警长的叔叔不能置若罔闻，尽管他们后来发现这与事实

不符，冯·莱维特松只是安排她采访了柏林的监狱并介绍她与其女儿海因里希·希姆莱认识而已。与此同时，希特勒也亲自召见了这位 22 岁的丹麦记者，因为在希特勒的眼中，英加是个“标准北欧美人”。英加当时正在街上买衣服，这个消息让她措手不及，几乎与这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失之交臂。联邦调查局总结说：

戈培尔打电话要她尽快赶到元首府。阿尔瓦德回忆说自己走进一间大屋子里时，希特勒坐在对面。她说，“我抬起胳膊打了声招呼，‘嘿，希特勒！’他看去有些困惑不解，我又重复了一遍，但仍鸦雀无声。很明显，他有些窘迫。他示意我坐下，自己坐在椅子的另一端。随后，他问我，‘你是怎么认识戈培尔博士的’，当时我没揣元首手谕这件通行证，因此心里惶恐不安，后来，从别人那里才得知希特勒从不单独接见别人，除非有介绍人在场。”

“当时我的脑子里乱轰轰地纠缠了数以万计的问题，”英加的文章透露，“它们此起彼伏，没有一个问题能清晰地蹦出来。希特勒问我一些有关德国的问题，如：是我是否习惯这里？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什么让我难以忘怀？有没有什么建议等。渐渐地拘束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舒服地靠在椅背上愉快地聊起天来。他显得和蔼可亲，魅力不凡，努力向我灌输德国社会主义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很自然，他的宏篇大论，让我觉得，他的确是世界政坛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英加天真地评论道，“不明白敌人为什么将他视为魔鬼，毫无疑问，他理想主义色彩浓厚，只是相信自己正在推行对德国有益的事情而

肯尼迪传

已。只是。”

英加似乎被元首迷惑了，而元首也开始迷恋英加了。“好几次我试图结束这不同寻常的拜访，但希特勒阻止了我。过了一会儿，刚刚参加完一个重要会议的戈培尔博士回来并加入了我们的谈话。谈话已经持续两个小时了，我意识到我必须离开，于是向元首告辞，希特勒说，‘我非常愉快，希望您每次来柏林都来看望我！’”

英加没有忘记希特勒的要求，而且也遵照拜访。同时，通过格林夫人和鲁道夫·黑斯的关系，她与格林也打成一片，“她对他明显推崇备至。”1940年英加最后一次去柏林时，他正式邀请她为德国在美国的宣传机构工作，英加说她一口回绝了，但联邦调查局怎会轻易相信呢？他们从一个国际新闻机构1936年的新闻简报上搜索到的信息显示“希特勒被其标准的北欧美色迷住了，委任她为纳粹宣传部驻丹麦特派员”。联邦调查局没有理由推翻这样的可能性：希特勒的确可能会委任一位漂亮而迷人的22岁的姑娘为纳粹驻外宣传部工作。

而联邦调查局找到的另一个证据更让人吃惊，以至于英加与希特勒及格林和戈培尔等人的亲密关系还不算是最无法让人饶恕的证据。与她目前和人称“瑞典的斯芬克斯”的阿克塞尔·温纳—格伦的关系相比，前者似乎不算太严重，况且英加的丈夫保尔·费乔斯目前正在斯芬克斯麾下谋职。

阿克塞尔·温纳—格伦是世界首富之一，瑞典最有名的埃列克特罗力士和博福斯火炮制造厂创办人和股东的身份让他为所欲为。英加是在马达加斯加拍片时和他在游艇上首次见面的。而且温纳—格伦还慷慨地资助筹拍一部描绘寻找秘鲁南部消失的城市印加的探险片，另外，他还出资在特拉华州设立了

总部在在纽约的“维金慈善基金”。

但是，世界大战使参战国对各种组织不敢掉以轻心，这样的慈善机构便被美国秘密安全部门怀疑是敌人的宣传机构对外打出的幌子，而温纳—格伦则是挂秘鲁探险之名，为德国未来入侵南美铺路。温纳的游艇“南方十字”号更是成为被怀疑的焦点，这艘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豪华游艇不但配备了高级无线电设备，而且还装备了全套机枪和来福枪。美国海军情报部怀疑，目前该船正被秘密用作德军潜艇的燃料补给船。

情况还远远没有这样简单，温纳—格伦在巴哈马群岛上开设银行，并且结交了当地的亲德的执政官温莎公爵，使得这位前国王得以摆脱英国严格的货币限制，而使盟国对其的影响力锐减。到1941年12月，美国国内收入署已开始对温纳—格伦提起了一项总额为数百万美元巨额财产的法律诉讼案，而他也正式被列入美国政府的黑名单，成为被特殊照顾的对象。更让人觉得骇人听闻的还是下面一则消息，有报道说，他在所居住的墨西哥资助一起旨在推翻总统的军事政变。

尽管英加声称自己完全清白无辜，而且要求“联邦调查局出具一纸证明，以示清白”，但联邦调查局又怎么会这样轻易相信她呢？英加回忆说，这位办事员“摇摇头拒绝道：‘很抱歉，即使你今天不是间谍，明天呢？’他继续说，‘不过请放心，只要我们没有逮捕你，你的生活可以和以前一样平稳。’”

“在回家的路上，我似乎觉得一直有眼睛在暗中窥视我……起初我假装不闻不问，但恐惧渐渐袭上心头。毕竟，很多人无辜入狱，甚至被送上电椅的传闻让我胆战心惊。于是我变得草木皆兵，街上的每一个人在我眼里都有可能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肯尼迪传

后来的事实证明，英加的想法不是庸人自扰。

艳情披露

由于海军情报局的工作性质，有人劝杰克与英加断绝来往。事实上，1941年12月12日后，杰克的确多次被提醒甚至警告过。

然而，正当年轻气盛的杰克和英加怎么会这么容易就屈从于一些似乎捕风捉影的传闻呢？从很多方面讲，英加的万种风情让杰克为之倾倒。周游过欧洲、俄国、中东和南美，也见过无数的大使和外交官的经历可谓是丰富多彩，但较之于英加28年来的传奇经历仍显得是小巫见大巫。她阅历丰富、天资聪慧、艳惊四座、圆滑老练、风情万种。总而言之她是男人眼中的最佳女人。

因此，和那些初入社会的女孩、模特、护士、学生、明星和妓女相比，明艳兼有母性温柔的英加对从小就缺乏母爱的杰克产生更荡人心魄的魔力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像凯思琳一样，初出校门的杰克需要慢慢了解社会。事实上，《时代先驱报》和海军情报局那令人欣羡的工作，都是他们处于相等的地位。所以，杰克义无反顾、心悦诚服地拜倒在这位丹麦美人的石榴裙下显得理所当然。

“她的英语棒极了，”凯思琳的情人——约翰·怀特后来这样赞美英加，“简直是太地道了……她非常聪明，假如当个间谍绝对游刃有余。——到底是什么让杰克为之痴迷？噢，她性感极了，女人味十足，让人为之癫狂，忘记一切烦恼，简直太可爱了。她不是一般的漂亮，倾国倾城用在她身上恰如其分。

她就像蛋糕上的那层糖霜，令人垂涎、浮想联翩。”

“我们多少都知道，他为她癫狂。”沃尔德罗普回忆说，这种危险的关系被一些爱饶舌的花边新闻栏目炒得沸沸扬扬。

为帮助这对情人逃避谣言的骚扰，好心的凯思琳和怀特扮成他们的陪衬，每晚与杰克和英加一块儿露一下面。但床上的事，就是不言自明的了。怀特回忆说，这种安排让他懊悔不已，因为他亲口许诺过，绝不强迫凯思琳上床。

怀特后来忆起凯思琳时说：

她对天主教坚信不疑，而我则对华盛顿的生活流连忘返，试想一下每个男人身边都有六个女人陪伴，是一段多么让人难忘的美好的时光。凯思琳是个可爱而迷人的小东西，我们总是无休止地斗嘴皮子。我们争论的范围涉猎很广，尤其是关于天主教。我曾是个圣公会成员，从不为信仰而浪费脑细胞。我们争论显得事无巨细，她不比我知道得多。但当我意识到，宗教信仰在她心中根深蒂固时，就觉得任何引诱她越轨的行为都是肮脏的，而且良心也会受到谴责。她纯洁而单纯，视贞操为生命，而我也不想伤害她。因此，我们很自然地找到了另一种愉快的交往方式。之后杰克出现了……再之后英加又出现了……

我非常喜欢凯思琳，她哥哥的到来让我觉得碍手碍脚，而且我觉得我们彼此对对方都没有多少好感。我知道，他的一本《英国为何沉睡》的书让他声名鹊起，但我根本不知道这本书为何物，我把时间都花在寻花问柳上，根本无暇去注意他。很快就清楚了，他善解人意地不总呆在凯思琳身边以避免伤害我。那段日子我们约会频繁，俨

肯尼迪传

然像是游戏。

总之，我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记得有一次，他说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天路历程》，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突然在想，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比我想的还要更加让人难以揣测吗？他竟会喜欢这样一本正统的书，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在他身上却根本找不到任何显示他正统的痕迹。

我的印象中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踢踏舞男。我觉得他活脱脱是一个踢踏舞男，行动敏捷，举止优雅。因为我们之间没有利害冲突，他究竟在做什么，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他真想娶英加吗？为什么英加让他如此痴迷？她俨然是个高傲的老师，一个手段娴熟的风月女郎。她喜欢逢场作戏，而且魅力四射，这好像遗传了中世纪欧洲的某种古老情结：年长的情妇与少男之间产生的风流韵事。

有意思的是，很多法国王孙以及一些大文豪，像巴尔扎克和卢梭等人的风流韵事也是这样的套路。但他们有幸没有遭到蛮横无礼而又愚蠢可笑的联邦调查局的骚扰。

英加的乐于合作大家有目共睹，令人费解的是，联邦调查局不肯把英加再次找出了解情况，而却要在 1941 年和 1942 年的头几个星期里用尽监视、拆信、窃听电话、入室检查和四下打听之能事，来拼凑一个有关英加的过去和现在的材料——一个以粗制滥造的情节，及肆意歪曲，主观臆想和无理取闹的故事所填充的喜剧性大杂烩。哈里森探警守在英加位于 16 大街 505 幢 1600 房间的公寓外不辞辛苦地监视，并在英加“自首”

后的第二天，忠实地记录下费乔斯博士从秘鲁回来后第一次来看她的前前后后。然而，费乔斯博士 12 月 14 日离开之后，这位探警却对夜夜造访这位有间谍嫌疑的美人的神秘情郎茫然不知，只知道是位海军少尉，“灰色的套袖大衣，灰色粗呢裤子，一头蓬松的金色卷发……人称其为杰克。”

同样，沉迷于英加美色的杰克于 1942 年 1 月 1 日晚，从纽约给英加的一封让人读之肉麻的电报也被联邦调查局成功窃取。但令人可笑的是，他们仍未查出痴男是谁，电报内容如下：

航班停飞，我只有选择坐火车过去，大致晚上 11 点 30 分抵达。我建议你先休息一会，但如果你要给我个惊喜，来接我的话，就买个热水瓶，并且做碗温暖的汤。除了你，我还会期待谁来照顾我呢？

你的，杰克。

愚笨而可怜的哈迪森探警抱怨说，他的同事对“杰克”这个代号深恶痛绝，因为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由此可见，联邦调查局里养的都是怎样的蠢货。

让人费解的是，华盛顿一些很清楚杰克身份的人，却惟独不知道他那位神秘梦幻情人到底是何方神圣。令海军情报部感到尴尬的是，外面盛传肯尼迪大使之子杰克·肯尼迪正在为一个已婚少妇而神魂颠倒，并打算娶她。12 月 31 日，海军情报部副部长金曼上校在各部门的情报机构会议上，郑重地向两位联邦调查局的资深行政官员塔姆先生和拉德先生透露道：“据说，肯尼迪大使的儿子正在苦苦等待某位女士离婚，然后娶她

肯尼迪传

……”金曼上校万分担忧地说，“肯尼迪先生这个儿子，‘在我手下’，所以他有义务了解关于杰克的更多情况。”一位联邦调查局员后来说：胡佛先生只打了几个电话，就摆平了一切。“我打电话给金曼上校，告诉他，这个女人名叫英加·阿尔瓦德。副部长金曼上校表示，他不会对此件事情善罢甘休的。”

不过，上校的承诺没有很快显出效果，如火如荼的世界大战，使得金曼上校无暇顾及一个下级少尉军官与一名已婚女子的风流韵事。因此，直到时间之神踱到 1942 年 1 月 9 日，海军作战部部长才下达了将杰克调离华盛顿的命令，而且有意思的是居然把杰克的名字误写成了“约瑟夫·F·肯尼迪”，整个案子的混乱程度，因此可窥一斑。更让人可笑的是，海军航海局也不知此事紧急，竟然没有立即落实。

但是，海军方面不着急并不意味着别人也一样，事实上早就有人等得不耐烦了。

老头子生气了

英加开始离婚的征程。

英加的文章显示，费乔斯于 12 月回来时，对英加和约翰的好事半信半疑。他像是打翻了醋坛子，言语中充斥着鄙夷，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没有指责英加的不贞。因为很清楚，这样一来就会加速她的离开。但他的确问了她是否真爱约翰，她毫不避讳地承认了。

“很明显，他依然非常迷恋她，想尽一切办法留住她。她犹豫不定，对于结婚六年的丈夫，她不想给他太强烈的伤害，而且那种对他的迷恋，仍没有烟消云散，但她知道，她并不爱

他。这不仅是因为杰克让她尝到了真正爱情的甜蜜，而且因为她是凭着对成功而知名的人物怀有仰慕之情而以少女之纯情许给他的。而今回过头来她悲剧性地发现，他正是利用这种仰慕之情俘虏了她。”

事实上，费乔斯不但醋海翻波，而且还是个老狐狸。比他年轻二十岁杰克被这件事伤害了自尊。“费乔斯求她放弃华盛顿的工作，跟他到纽约一起生活。他信誓旦旦地许诺要给她买一幢富丽堂皇的房子，他甚至低声下气地保证要陪她去 57 大街和 59 大街逛逛。因为那里有英加喜欢的古玩，并且他知道，她喜欢把房间布置得温馨迷人，而且对安定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但当他意识到他的这些努力付诸东流时，他又威胁她这会毁了杰克的前程，尤其是他的仕途，如果参加竞选，他曾染指婚外恋的绯闻，就会让他声名狼藉。”这种迂迴曲折的威胁“吓坏了”英加。费乔斯于是得到经验，“他可以利用杰克来伤害她，诱迫她回到自己的身边。”

英加看穿了丈夫的鬼把戏，她写信说，她还没有下定决心。但费乔斯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于 1942 年 1 月 11 日回信说：

你对未来的打算令我感到茫然不解。我的最亲爱的宝贝，《旧约》里的预言书还没有你那样晦涩难懂。你写信说，如果你还是十八岁，杰克就会是你的首选。然后，你接下去说，“但如今反而会选择你。”我的让人扑朔迷离的小甜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和杰克的爱情出现了故障？还是，这又是你馈赠给我的甜蜜的无须付出任何代价的怜悯之情？可别这样，亲爱的，你那反复无常已经

肯尼迪传

让我好些日子都寝食不安，老实说，如果你不这样做，也许是对我最好的，最善良的同情。时间会治愈这一切，慢慢地我会适应没有你的日子，适应你不再爱我。我想，你没有必要再违心地装作同情我的样子，虽然最后的结果终究是残忍的，我将一人独自承担。

然而，毕竟是夫妻一场，有件关于杰克的事我想忠告你，在你还没有与他难舍难分之前，是否对他父亲和家人的意见和态度有足够的认识呢？

这是个恰到好处的忠告，因为费乔斯刚刚在纽约与老头子面谈过。英加的母亲随后心急如焚地写信警告她，“费乔斯已经雇了个私人侦探跟踪你，他对你和杰克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他说，如果你再不回心转意，两个月之内就会丢掉饭碗，而老肯尼迪会幸灾乐祸，因为他不愿自己的儿子与你有任何瓜葛。我不愿意重复他说你的那些咬牙切齿的……作为母亲，我心疼你，小英加，答应我，尽量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不要迷失自己。”

但一切都无济于事。1942年1月12日，沃尔特·温切尔发表文章说，“前大使肯尼迪之子，被华盛顿某女专栏作家的万种风情所俘虏，俩人感情笃深，以致这位女士已经筹办有关离婚的事宜，准备与当探险家的丈夫分道扬镳，但肯尼迪老爹对这件事感到非常恼火。”

英加至死不忘这一天，她写道：“我一走进办公室，一位朋友就劈头问我‘读过沃尔特·温切尔专栏上有关你的文章吗？’‘没读。’然后我抢过那份无聊透顶的报纸读了起来……文章没有指名道姓，但明眼人一定会对号入座，因为当时在华

盛顿，女专栏作家中，我是惟一一位有探险家丈夫的，而在华盛顿这个地方，任何谣言都会很快泛滥开来，弄得满城风雨。虽然当时该专栏属于华盛顿的报纸，但它被全国数百家报纸争相转载，而人们的反应又是如此强烈，让我始料未及。”

更令英加难过的是，杰克“24小时之内就必须离开我去新基地报到。我一直怀疑这与他那老谋深算的父亲有关，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情报部门有所避讳，不希望一位海军军官牵扯这种被一般道德所不能容忍的爱情，而有毁他们的声誉。”她这样猜测。

费乔斯很快就对前妻冷嘲热讽：“祝贺你，你在美国报界现在可谓风光大显啊！成为温切尔的专栏人物是多少人梦寐以求而又不可得的荣誉啊。”约翰·怀特也在其日记中记叙了杰克对此的愤怒反应：“杰克在里面嚷嚷，很明显，他正当着沃尔德罗普的面在谴责这篇文章。”

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委屈。费乔斯懊恼地说“自己成了故事中的小丑，大家都看我的笑话，这几周我好像经历了一场恶梦”。他同时对温切尔描绘的英加表示了不理解和极度的惊讶，“如果是你被人追求我还无话可说。可如今，一切却恰恰相反，这可太让人觉得难堪了。我那清高、尊贵而正统的妻子被人狠狠耍了一回，真令人心痛。我对此感到心痛和耻辱”。

与此同时，帕特森夫人“也对温切尔愤恨之极”。英加在书中透露说，“她推断，温切尔是从J·艾德加·胡佛那里得知我正与一位海军少尉交往的一切的。她恼羞成怒，在头版发表一篇社论文章，指责说如果联邦调查局不让手下给沃尔特·温切尔这样的到处散布谣言的人提供无聊的素材，而是让他们去干些正经事，或许要好得多……当然，我和杰克都没有被点

肯尼迪传

明，但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对号入座，而这一点令我们俩人都非常难堪。而且，由于沃尔特·温切尔和 J·埃德加·胡佛都在文中无所顾忌地公开亮相，我又多了两个让人厌烦的敌人。”

尤其令英加始料不及的是，即使就此收手，事情也是无可挽回了。事情是这样的，几天后，霍兰上尉告知联邦调查局：“海军情报部为肯尼迪少尉目前正与英加恋爱的事实感到耻辱，已经采取了果断措施，以便将这种关系扼杀在摇篮里。”霍兰上尉说，“肯尼迪少尉可能不会被开除，但被调离华盛顿则势在必行。”

霍兰的预言不久后被证实了。1942 年 1 月 13 日，即温切尔的专栏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杰克接到调令，离开华盛顿，前往查尔斯顿的一个海军基地从事文书工作。他的恋情在他付出了代价后也凋落了，正如杰克后来向一位记者报怨的那样，“他们近似无理取闹地把我赶到南卡罗来纳州，只因为我与一位那维亚金发美人交往过密，而他们武断地怀疑她是个德国间谍。”

情书的故事

肯尼迪少尉的能力让海军情报部部长威尔金森少将为之叹服。威尔金森在杰克的鉴定报告里写不吝言辞地夸赞道：“该军官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出类拔萃，令人满意”，并给了他 3.8 分的极高评价，而最高为 4.0 分，“他对于工作恪尽职守的作风所起的表率作用，大大鼓舞了其所在部队的士气。”

而实际上，“威尔金森对当时局势感到一片茫然，近乎狂乱，”杰克在海军情报部的上司亨特上校后来这样回忆说，“他

想赶紧让杰克走人，越快越好，因为杰克不合时宜的恋情使他变成了一块烫手山芋。”与此同时，副部长金曼上校“被这突如其来的坏消息搞得晕头转向，并且吓呆了。他对整个局势忧心忡忡……你由此可以想像当时的慌乱恐怖的气氛……“珍珠港事件”使得整个海军上下都陷入了一种极度恐慌的危险境地”。事实上，亨特回忆说，副部长赞成“开除”杰克。杰克走人不可避免。

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开始“正式”调查，使得杰克免于被送上军事法庭的“特殊待遇”，另外也是考虑到老头子的名声，担心他会极尽呼风唤雨之能事，指责这是一场政治阴谋。弗兰克·沃尔德罗普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描述说：“老头子气极败坏地冲了进来，当时我正和他的孩子们坐在一起……华盛顿有些专以打探别人隐私为乐事的老人断言，英加·阿尔瓦德是约翰·F·肯尼迪的至爱……我有什么余地争辩？但我的确知道，1942年有肯尼迪兄妹与父亲闹别扭的传闻，乔·肯尼迪发火说：‘蠢货，杰克，你瞪大眼睛看看，她已经结婚了。漫不在乎，但这个狂热的小伙子却无动于衷。’”

但英加的回忆与此有些出入。她明白，“在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时，最好先结束这场饱受非议和骚扰的罗曼史。”她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深思熟虑之后，觉得如果现在让他离开她，可以避免事情变得更糟糕……俩人都不想让对方受到伤害。杰克让她离婚，嫁给他。英加何尝不想，但最终还是理智而痛苦地拒绝了杰克。”次日清晨，杰克的父亲来了个电话。她描述这位前大使可谓入木三分。“是个典型的职业政客，一个交际高手，笑容可掬，但目光冷酷，老奸巨猾，过分自信。开始谈话时，他人情味十足，与杰克叙了叙家常，然后，话题

肯尼迪传

就自然而然地转到那篇专栏文章上了。由于多年的习惯，杰克总是对他父亲有畏惧心理，现在也没有什么改观。‘当然，’老人说，‘你不会跟她结婚吧？’杰克想了想，但又觉得在电话里解释不清，于是模棱两可地答了‘老实说，爸，她是个好姑娘。’”

英加在事过三年之后的回忆有理由让人相信，她对这番只开花不结果的恋情充满感伤。

他父亲也知道，最好不要在杰克面前贬低英加，这样对杰克的刺激可能会让他产生逆反心理，因为，除了已婚，美丽的英加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于是说，“我也替你难过。那么，回家来看看我们吧！也好散散心。这个周末，孩子们都要来波士顿的家里，我知道，你们这些孩子好长时间没有小聚了，而我们可以顺便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杰克询问父亲，在去新基地报到之前，不知能否先请假离开，老人耐人寻味地微笑说：“我想我可以发挥余热，替你幕后活动一下。”

“幕后活动”这个词，使杰克突然意识到，父亲可能才是策划他调职的主谋之人。

不论老头子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些事已经无关紧要了。根据哈迪森的监视，这位神出鬼没的、有一头蓬松乱发“人称杰克”的“问题少尉”，于1月16、17、18日三个晚上都留宿在情妇的寓所与之缠绵。“哈迪森认为，此人一定离此地不远，在与被监视目标过夜后，他回去换上军装，然后再回英加这里共进早餐。”负责调查的探警如实报告。但当胡佛决定对该少

尉也进行监视时，哈迪森却扑了个空。监视从1月21日开始，28日结束……“在此期间，神秘的‘少尉’好像突然从地球上蒸发掉了。”

原因很简单。杰克已经把他离英加很近的那套公寓交给妹妹凯思琳，并于1942年1月19日，星期二，从华盛顿飞往佛罗里达与家人团聚去了。“你们那里是不是绿树环绕，清波荡漾，而你的家人正在与你分享着久别重逢的天伦之乐呢？”英加在他离开后的第二天晚上就心急火燎地写信给杰克，“我衷心希望我最亲爱的杰克能把世上所有的快乐拥在自己的怀中，请相信这是你应得的。至于原因，我不知道，只是觉得，你的幸运世所罕有，我一直有种感觉，你是上天恩赐给我和美国人民的，生来就该在阳光下逍遥自在……飞机载着你离开时开始，我就无奈地意识到一切将从头开始，我默念星期天在教堂做过的祷告，‘愿上帝保佑他。’上帝会体会我的良苦用心的，正如临行前，你抱着我所说的那样。”

但仅仅过了一天，英加的语气就变得更加迫不及待，充满对爱郎“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思念。备感寂寞和委屈的她靠童年的一些往事和对早逝的父亲的回忆寄托她对杰克无尽的思念。在英加四岁时，父亲就离她而去了。

第一次挨打的情景让我记忆犹新，因为我故意把母亲的笔扔在地上以期引起注意……第一次人人夸我漂亮让我难以忘怀，每每念及，我都有一种复杂的情愫涌上心头……当时，哥本哈根皇家剧院乐观地认为我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帕夫洛娃……想起在丹麦挣得的第一笔薪水，以及在《时代先驱报》得到的第一张40美元的支票……前二十多

肯尼迪传

年的生活让我感觉时光飞逝得太快，过多的情感让我无法摆脱留恋过去的情结……还有所有我爱过的人以及所有我讨厌的人，纷纷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能散去。我永远感谢在华盛顿参加的惟一一次鸡尾酒会，在那个喧闹的场合，上帝赐给我一个极其聪明的小伙子，而且总是笑意盈盈。接下来很多晚上，我们总是共享令人回味无穷的生活，我们吃同样的晚餐，开胃汤、牛排、土豆泥、青豌豆、胡萝卜和冰淇淋，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快乐的时光。

1942年1月19日，世界开始倾斜，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想念一个人，无尽的孤单寂寞让我觉得自己是华盛顿的惟一居民那样凄凉、冷清。

这就是让我刻骨铭心的真正的爱情，除了完全的快乐，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我终于明白了是谁使得我体会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思念的煎熬。

尽管联邦调查局遍地撒网，但这又怎么能阻挡因爱情而疯狂的年轻人呢？然而，并非愚蠢到家的他们关于英加可能去见杰克的猜测却瞎猫撞着死耗子。英加的确在杰克报到当天，即1月24日，风尘仆仆地赶到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和杰克共诉思念之情，并共度了周末。英加1月26日一回到华盛顿就心急火燎地给杰克写信：

火车启动的刹那，我望着站在站台上你的身影，泪如泉涌……我最最亲爱的那个年轻英俊的波士顿小伙子的身影越来越模糊，这些都让我肝肠寸断……那些美好的往事似乎昨天刚刚发生，我无法抑制奔涌而出的泪水，心在痛

苦地抽搐，当时空的距离将我们拉开得如此遥远，我就觉得天崩地陷。

后来，我用沉睡麻醉自己。中午时分，到达首都华盛顿，同样的联合车站，给我如此巨大的反差，1942年元旦时，我曾来这儿，如果时光可以倒流，那该多好啊！那时的我快乐得像只小鸟，好像忧愁、恐惧和烦恼与我完全绝缘，只知道完全沉浸在爱情中——还记得吗？

“你有喜了吗？”今天有人这样好奇地问我。“猜猜是谁的？”

杰克如果对这个谜语的答案有半分怀疑的话，那就不可饶恕了。

这个人还说，“我知道是谁给了你四叶苜蓿……”

我病倒了，两名医生为了保全我的性命，坚持进行人工流产，我没有别的选择，原谅我，杰克！

没有了你的周末，我该怎么度过？现在我就描述一下我度过的这个周末吧。告诉你，我到机场时已经晚点了。我去了，查尔斯顿小街那里的景色让人为之忘忧，还有那年代久远的铁门。我想起我们驱车前往米德尔顿花园消磨时间。我的陪同说他宁愿咬掉一个手指头，也不买2美元的门票……还有那棵布满了青苔的参天老树……还有我那让人心悸的经历……以及那棵耸立的老橡树和散居的房屋。另外还有一座失败透顶的女人雕像。当然，还有个男人，他有无与伦比的热情和理想，对巨大成功的热切渴望，以及对金钱和名气的执着追求，当然了，幸福也不排

肯尼迪传

除在他的人生计划之外，这一切都让他魅力超凡。他自己奋斗得十分辛苦而且不言放弃。他让他的家庭和整个国家为之骄傲。他是如此高大和有力，当你和他说话或与之面对时，你总是觉得他那雪白硕大的牙齿拥有撕碎一切的巨大能量。他那坚毅的神情以及双倍的勇气，来自于他本人和他父亲。他的超凡吸引力让人无法拒绝，他在很多方面都出类拔萃。“他的生活将充满成功的喜悦和丰收的欢乐”，我经常对自己说，“我爱他不论天涯海角还是海枯石烂”。

一年以前，当杰克在斯坦福的好友亨利·詹姆斯略带炫耀地给他读女朋友的让人为之感到肉麻的情书时，杰克还不以为然。如今，这样的用柔情蜜意打造的甜言蜜语他也有幸收到了。

然而理智的英加在信中没有纠缠旧情，而是决心结束这段罗曼史。“真滑稽。事实上，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是天生的一对。难道仅仅因为我已婚的原因，就注定两情终不能朝朝暮暮吗？但最后，我不想再欺骗自己，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或许是上帝的安排，也许只能这样解释才说得过去。”

她确信杰克将来。必定成就非凡。“照你自己的意愿去规划你的生活吧，”英加谆谆建议道，“去攀登功名之峰吧！但是要确信快乐仍在你身边。要不时地驻足停歇来问问自己‘我今天快乐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反复思量思量，直到生活按自己所希望的轨迹前进时再重新启程。希望你能来看看我。我想我永远知道你该干什么。这倒不是因为我有丰富的阅历，而是由于我心中有些更深、更真挚的让人无法回避也无法割舍的

东西——那是我对你的爱，亲爱的杰克，你知道吗？”

在后来的一封信中，英加又写道：

如果允许我选择，我现在会去西部，自由地买一小块地和一堆好书，让生活归于平静，写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但在我离开之前，我必须为你怀孕。你会问，为什么非要这样？嗯，不仅是因为我迷恋你，更重要的是因为你本是天之骄子，你的本事来应付这个世界显得游刃有余，你也有足够的聪明和同情来回报这个世界，而不只是和凡夫俗子一样一味地向世界索取。

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你登上事业巅峰，我私下里认为这也是战争为什么必须停止的最好解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你机会，给世界惊喜，你的确前途不可限量，你的成功的劲头将势不挡。要是地狱之神忌妒我，让我到达巅峰前去世，那么，亲爱的杰克——希望如你所说，人死后灵魂还与你同在——不论天堂还是地狱，请相信，我都会伸出一只手，伴你同行，在你最危险的晋升之阶上留下我的痕迹。我将感到无上荣耀。

露水恋情

如果胡佛是一位有同情心的并且心态正常的联邦调查局长，他或许会被令人感动的情书所打动，而作出让别人高兴的决定。然而，胡佛却是终生未娶，而且他的性生活一直扑朔迷离。因此以他那种变态的偷窥狂的沾沾自喜的眼光来看英加的

肯尼迪传

恋爱史，就觉得其中有很多可以满足他变态欲望和工作目标的地方了。事实上，蒙在鼓里的英加一旦被联邦调查局长胡佛当成掌上玩偶，这就成了胡佛对一大群以前碰不得的所有英加采访接触的人进行监控的合法借口。几天后，胡佛就写信给司法部长报告他目前对英加调查的结果和发现，诬蔑英加“可能以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因此，有必要对她和所有与之接触的人加以严密监控。1942年1月29日，专门负责此案的探警信口开河，英加·阿尔瓦德的案子“是他从警多年以来所碰到的最为棘手的案子”，胡佛助手这种不合时宜和信口雌黄的评论，几乎把整个案子的调查引向歧途。不久后，1942年2月4日，司法部敌侨控制局局长督促变态的胡佛“将英加·费乔斯夫人的一切情况作一份详尽的书面报告呈送上来，以便决定是否有必要为了国家正在遭受的危害而果断地签发一张逮捕令”。

然而，偷窥成瘾的胡佛正在进行“名正言顺”的调查让他得到了许多变态的满足，又怎么会愿意轻易放弃这绝佳的机会呢？况且，他目前所掌握一些有关英加正常的社交活动和对合法人士的采访报道，以及过去对德国纳粹头目的独家专访和现在在华盛顿与人的不轨性行为都不足以作为定罪的有效证据。阿克塞尔·温纳—格伦的亲信从秘鲁回来后，英加也只是与之见面过两次。据电话监控的反馈可得知，她正准备与之分道扬镳。更糟的是，华盛顿办事处的特工们虽然一直在全天候忙碌，对英加这位神秘情郎的身份的了解却少得可怜，“人称杰克”的少尉，这点可怜的信息让联邦调查局颜面尽失。其实，胡佛惟一的把柄只有沃尔特·温切尔的专栏文章以及英加母亲那封提及费乔斯和前大使的家信。胡佛靠这点儿东西，想名正

言顺地逮捕由厉害的锡西·帕特森和知名人士伯纳特·巴鲁特所支持的华盛顿记者简直是天方夜谭式的笑话。因此，他只是下令继续扩大监视范围。

更让英加苦恼的，不仅是胡佛那帮联邦探警们对她的监视，还有老肯尼迪的重重阻挠。凯思琳说前大使又在给杰克施加压力，要求他离开充满麻烦的英加。由于自周末以来，杰克一直杳无音讯，焦急的英加于1月27日给杰克写了封言辞恳切，感伤至极的信：

你居然信任我，我始料未及！今天姬克收到你的一封信，我才明白你对我的真切感受和你迟迟不愿理会我的原因。得知我最爱的人居然因为怕我而不敢写信给我，这种感觉有点苦涩和莫名其妙。其实你不用找更多的借口，我明白你不是怕我本人，而是我有一天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的想法让你顾虑重重。我理解你矛盾的心情，但我心里还是不太痛快。不过，我不想改变你，因为这会毫无结果而且会徒增烦恼，况且老乔比我有本事。

自你离开我以后，我一直心慌意乱，不知道下一步又会发生什么。但我反感跟别人出去；有时既使出去了，又会觉得无聊透顶，想赶紧躲到自己的小屋里去偷偷伤心……糟透了。

“英加回来就病倒了，嗓子一直在发炎”凯思琳立即向杰克通报，“托比和我急切地想知道，女孩子们究竟哪儿得罪了你，弄得她们不是得肺炎，就是嗓子出现问题，或者最终花落别院，”凯思琳用嘲讽且不满的口吻对哥哥说，“医生嘱咐她卧

肯尼迪传

床休息，但她固执地不同意，现在情况还过得去。”

托比·麦克唐纳那会儿正在华盛顿忙着找工作，想借此逃避服兵役。他的婚事偃旗息鼓，目前情绪低落，心情恶劣。他诅咒总统，仇视这场大战以及法学院。他在回首过去在哈佛的黄快乐光时，才能找到慰藉和自信，那时他是足球明星，前途一片灿烂。“他似乎总是萎靡不振而且心里藏着许多心结。”杰克的母亲在一封连篇累牍的信中这样有感而发。而自视极高的托比竟把杰克当成了自己的参照物，而且称其为“劳雷尔”，并自称为“哈代”。杰克被“发配”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消息令他灰色的心情又多云转晴了。“劳雷尔倒霉的消息，让我觉得自己不是这个国家惟一的倒霉鬼，”他写信给杰克，充满了幸灾乐祸却又同病相怜之情。关于英加，他说“尽管我见她只有几分钟，但我们似乎聊了很久。我的理解是，她要么真是爱你爱得死心塌地，要么就是在逢场作戏。她向我查问你的过去，细节的追问让我哑口无言。像往常一样，我恶作剧似的糊弄了一番，尽管有点儿于事无补。”

而英加对麦克唐纳却恰恰相反，她热心而且观察得细致入微。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她竟怂恿麦克唐纳去联邦调查局工作，称那里是战时最佳避难所。据凯思琳说，英加“昨天介绍托比认识了一个以前在联邦调查局工作过的朋友。”“但问题是，托比本人对自己一片茫然，”英加在给杰克的另一封信中说她“很喜欢托比。他是个挺特别的人。我非常乐意与这个小伙子交谈，他各方面都出类拔萃，而且非常喜欢你，当然，这一点你比我熟悉。可能你对此并不感兴趣，但并不是人人都会这样做的，你不要太不以为然，亲爱的。”

一周之后，沉默的杰克终于有了音讯，他来了一封愤怒的

回信，声称“关于英加·宾加反诉约翰·帕特里克·肯尼迪的控诉状。你为什么要写那种怀疑我而又让我很不舒服的话，说对‘你会招来麻烦’顾虑重重，你还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想法？”他诘问她，“我没给你写信是因为我给你留了很多书并且希望你能认真阅读，而你根本没有翻过一页。”他是指离开之前，他留给英加很多书，而她当时也郑重许诺她会读的，“我不知道当你出去会朋友，而他们谈起1937年英国的徬徨和无知低下的错误时，你能说出些什么，你肯定一无所知而且哑口无言，”他开玩笑说，“现在我给你写信是考虑到，通过这种方式起诉比打电话便宜而且内容丰富。”

但杰克很快就妥协了。他打电话说，“下周……如果可能的话，”他会回来看望英加。对此，她提议不如她飞往查尔斯顿去看他。“你真的要来吗？”杰克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过来会让我快乐得发疯的，但总让你回来地奔波，我心疼得很，因此，这次还是我去看望你吧。”

英加提出可在两地之间的一个地方见面，这样可以避免两人的争执，实际上，她觉得只要能见到情郎，地方无关紧要。“你可以选择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亲爱的，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去找你的。”

但杰克还是坚持“我去华盛顿……如果1点钟我有幸能离开的话，那次班机将把我很快地送到你面前，但假如我脱不开身，那就定在周六6点钟返回华盛顿。”

“我的上帝！难道你周六也不能休息吗？”

“亲爱的，你知道我很少写信的原因了吧？”

“你什么时候出海？”英加追问，她认为海军方面会把杰克派到舰队中去。

肯尼迪传

“我没有接到命令。”

“我想不会很迟。”

“不是。”

“你有信心吗？”

“我说过了，这是以后的事，留待以后再谈吧！”

英加缠着杰克不放，让联邦调查局忙得不亦乐乎。是想窃取信息呢，还是真的只是牵挂心上人？联邦调查局窃听了这段谈话之后，却一头雾水，他们惟一听明白的是俩人就电话那端的杰克糟糕的着装争论不休，那是一段连三岁小孩都能听明白的对话。英加问麦克唐纳，“为什么你自私地不向杰克推荐你的裁缝？”麦克唐纳得意洋洋地转述英加的话时，充满嘲讽与傲慢的口气让杰克这位自我感觉良好的少尉感到前所未有地伤害。“你是不是说托比穿得比我漂亮？”杰克质问英加，“你说我应该去找他的裁缝做衣服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是误会，”英加温言相劝，“你穿什么我都喜欢，毕竟亲爱的，你的本来面目才是最最吸引我的。我最亲爱的，你不认为一丝不挂时最美吗？”

在联邦调查局眼中，性爱是某种见不得人的间谍伎俩。因此，这样的对话自然而然地被作为英加间谍活动的证据录音下来，以便联邦调查局的蠢伙们仔细推敲。但对于热恋中的情人来说，性爱是他们爱情中最让人回味的部分——这种爱是杰克先前从来不曾品味过的。不管英加用意何在，她给了杰克深厚的母性爱，在杰克辉煌的人生中，英加超凡的母性魅力及她给予的爱可谓空前绝后，它包含了欣赏、宽容、性欲、幽默、直觉的女性之爱，这份感情令杰克一生中的其他女人都显得黯然失色，不值一提了。“他们如漆似胶。”约翰·怀特在凯思琳面

前这样评价这对苦命恋人。杰克从英加那里获到了平生最为大胆、直白、狂烈而真挚的情书，而他也对英加怀有一种特殊地信赖，向她透露一些从不对任何人袒露过的希望、梦想和恐惧。同样的，杰克的那种指点江山，恃才狂傲的大男子气，以及那种机智和坦率的风格也是英加一生中所仅见的。

“对我的信你有什么想法吗？”1月30日，杰克打电话充满孩子气地问英加。在那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与我同住的迷人夫人名叫英加，和那个花园一样美丽，这使我毫不费劲地记住了那个愉快的日子，我们花了4美元门票。但即使那天没进去，也丝毫不影响我的心情，因为和你在一起，一切都变得很微妙。我不再为逝去的日子惋惜，现在也挺好。我参加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我不必过分唠叨有关细节了。因为如果你是间谍，我就有透露军情之嫌，如果不是，你对这个也会觉得没有多大意思。但我非常思念你。

天底下的悲哀莫过于死亡之时还不知道缘由，很多人都是浑浑噩噩地不知自己为何而战。我想，大概只有死神降临的时候，他们才会找到自己。但我希望死神离我远点，最好是这样。

“在帕特森夫人家赴宴”的复印件也随信寄出，信的末尾签了滚烫的“你的，杰克”。

英加为杰克的痴情和牵肠挂肚而感动不已。“太棒了！太棒了！这是上帝赐给我，哦不，是亲爱的杰克赐给我的精美礼物，我们要把它作为《英国为何沉睡》的增补版。”英加在给

肯尼迪传

杰克打电话时边撒娇边开玩笑地说，“我们都为它感到骄傲。”

“我猜姬克也没有错过吧！”

“不，我只想独吞，我只给她大声读了一部分，这样是不是有点太过吝啬呢？亲爱的，这毕竟是封给我的信，它很让我感动，我很喜欢。”

几天后，托比打了个电话给英加。他在查尔斯顿与杰克呆了几天，说“杰克精神饱满，看上去身体也明显好转，他住在一所位于默里大街的砖瓦房里，离萨姆特堡酒店所在的大街仅几步之遥。”

“他对那儿满意吗？”

“他对房东有些恼火，但我猜他挺乐意住在那里的，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英加。星期五晚上，我们去总统舞厅狂欢了一次。我对杰克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观，”托比说，“他现在对女孩的态度不像以前了，好象变得非常稳重，不再爱寻花问柳。”

“哦，你是在哄我开心吧，”英加笑着回答，但还是对他的恭维感到满意，并还以恭维说，“你嘴巴真甜。”

然而，事实上，杰克几乎被软禁了。“我想杰克出来看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他即使是去离查尔斯顿很近的地方也还得向驻地长官请假，并汇报他的行踪。”托比提醒英加。

“瞧我让他这样难受，真是让我不忍心。”英加如此评价，觉得由于自己，使杰克这么受限制而感到很是过意不去。

“这不只是专对杰克，大家都一样。他们纪律很严。”托比对英加的敏感感到吃惊并纠正道。

“他是不是快出征了？”英加不无担心地问，“我老有预感他要出海了。”

“如果真让他去的话，那才是美国海军的不幸，”托比对杰克非常糟糕的身体了如指掌，又对杰克说起着装时的醋意感到得意，“你可能不知道，六年来，这一直是我们谈论的话题。”托比一说起来这事就乐得像个小孩子。

对此，英加不得不承认，“事实上，你穿衣服很有讲究，但杰克这点上就像个不懂事的孩子，差得太离谱了。”

托比后来有没有再给查尔斯顿打电话，这一点没有记载。而杰克头天电话没打通，又于次日晚上 11 点给英加挂了个电话，亲口告诉她自己无法离开驻地了。“你为什么不来这里呢？”他殷切地期望着建议。

“我可能会去的。”英加模棱两可地回答。

“别含糊其辞，”杰克责怪地说，“我知道连着让你过来太为难你了，只要我一被准假就会连夜赶去看你的。”

“那不挺好吗？只要有可能。”

这类模棱两可的搪塞让这位遭遇长时间性禁忌的海军少尉感到难以忍受。“我也心疼你，很不愿意让你风尘仆仆地跑来看我。”他温言地妥协道，仍想得到英加肯定的答复。

“亲爱的，即使就是要绕地球三圈，只要能见到你，我将义无反顾。”

听到这话杰克有点兴奋得找不着北。听说她最近有一趟纽约之行，就又打趣说“过够瘾了吧”，但他没有意识到，英加已经得知了很多杰克一直隐瞒的内幕消息。

“我不会对你有所保留的，”英加语气有点苦涩地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周末我会把一切告诉你的。我那个四处搜索的丈夫告诉了我一切有关你的事，并不是溢美之词。”在杰克的一再追问下，英加才心酸地透露，“他把你和你父亲面前对我

肯尼迪传

的另一套说词都无一遗漏地告诉我了。我才知道在你眼里我只是个无关紧要而且一无是处的女人而已，好有意思啊！”英加恼怒地说。

“他都向你说了些什么？”杰克不合时宜地追问一句。

“我丈夫认识一个跟你们家很熟悉的人，这个人目睹着你一天天长大，我猜他应该住在纽约。他对费乔斯说，‘杰克轻松地耸了耸肩说，娶她，笑话，我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与她不过是一场游戏罢了。’”

“亲爱的杰克，这真耐人寻味。”英加假装没有因此感到伤害，“告诉我，你何时才能从那个活地狱出来？”

“短时间内看来没戏。”杰克有些忐忑不安。不论他是否真的这样说过，听起来口气却与他惊人地相似。“你丈夫还胡说什么了？”杰克不明智地追问。

“他说我没有必要对谁死心塌地。他说为我在你心中的尴尬位置感到难过。当然，你不用担心，我敢担保，他不会麻烦我们。他也不会告你的，虽然他知道自己有这样做权利。”

“如果他肯放过我就谢天谢地了。”

“他不是你所想象的小人，”英加语气不快地强调说，“不论事情到了什么地步，他也会保持冷静并克制自己，他是个成熟的男人。”

“惹你生气是我最愚蠢的做法。”杰克含蓄地说。

“我没有那么小气。你非常希望我周末去看你吗，宝贝？”

“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我得仔细考虑，然后再告诉你打算。再见，宝贝。”

“拜拜。”

电话挂断了，联邦调查局的追踪监听也到这儿打住了。不

管是什么身份，经验丰富的英加都老练地与杰克周旋。她暗示自己对他的两面派行为不是一无所知，但同时又安慰他，她会宽恕他。或许她真是个圣母吧。

性爱的魅力

罗丝在最近给家庭成员的一封信中若无其事地通报说：“上星期六，杰克就马不停蹄地赶到查尔斯顿去了……并说他的时间都是安排好的，他看起来情绪稳定。”一星期后，她自以为是说杰克“看上去对他的工作兴趣盎然，自我感觉棒极了”。

但勒姆·比林斯的回忆却恰恰相反。尽管战火正在燃烧，比林斯却还在军事部门外徘徊，他为此感到非常沮丧。“杰克对我很理解，而且有点同病相怜的意味。那个时候，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毫无兴趣……他沮丧透顶……我是说，对他来讲好像是在浪费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他很恼火。但是，他无能为力。”

杰克仍在情报部门按部就班地工作，实际上他们的工作是千篇一律地加密和破译信号，毫无新奇可言，而且海军基地也是波澜不兴。他向里普·霍顿抱怨说：“我不知道你对我从华盛顿流放到这让人讨厌的鬼地方作何感想。”结婚的念头一直盘踞在他心头。几个星期前，他不无羡慕地向里普·霍顿的未婚妻恭喜的时候开玩笑说：“时间会过得很快，而一个妻子把事情搞糟的速度更是风驰电掣。”但是，私下里，他对一种非天主教式结合有着狂热而执著地渴望——把婚姻看做是私奔，是对他母亲之类的人那种墨守成规、反对寻欢作乐的旧道德的叛

肯尼迪传

逆。奇奎塔·卡卡尼奥，杰克的一位朋友，在一次谈话中曾开玩笑说：“爱尔兰人是最糟的天主教徒，爱尔兰裔美国人更是让这点显露无遗。”罗丝千篇一律的家书，总带有浓烈的宗教情绪，动辄以主教、教士的话充当说词，并要求孩子们坚持做弥撒，有时使杰克非常恼火，这时他还没有成熟，而是一意孤行和一个被怀疑是敌方间谍的已婚美人搞得如漆似胶。

不管这段情缘多么一波三折，也不论查尔斯顿这个“西伯利亚”多么让人乏味郁闷，杰克对认清世界舞台上各强权角色的兴趣和决心都巍然不动。无论如何，他都热衷于在这个世界上强加他的影响。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就开始对历史和当前形势的好奇让人为之惊奇，这一兴趣在查尔斯顿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其痴迷的程度一如既往。前些时候，他记录了在帕特森夫人家宴时进行的有关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的争论，而在到达查尔斯顿四天后，他又兴致勃勃地记录了他与英国前首相张伯伦的前外交部长哈利法克斯勋爵在棕榈滩的一次交流。哈利法克斯是在洛西恩爵士突然死亡后被丘吉尔委任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

哈利法克斯曾对绥靖情有独钟，是张伯伦最中意的接班人。杰克记录说：“我同哈利法克斯大使就慕尼黑事件及其背景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地长谈。他认同了我一直坚持的论点“慕尼黑不是美国人批评的把子，相反英国的军备状况才是应受谴责的对象，它使慕尼黑不可避免……他认为，如果英国在1938年开战，它就会被一击即溃。并且，他重复了他同英军总参谋长约翰·迪尔的谈话作证明。他问迪尔是愿意在1938年开战，还是1939年。迪尔沉吟了一下说，‘1940年时机才能成熟。’”

杰克对这种知情人对当代历史的看法兴致勃勃。拉斯基夫人对杰克的慕尼黑论文嗤之以鼻，并极力宣扬杰克为之感到羞愧，战后他向她声明，把它作为一本书发表是愚蠢的。事实上这种羞怯出自于杰克所固有的对一位固执的英国学究夫人的迁就和谦虚。其实，有关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孤立主义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他才不会停留在满足于纸上谈兵上，他不断地驱使自己重新审视刚刚过去的事件和人物，以便对目前政治有更客观、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哈利法克斯对张伯伦的看法，特别是关于丘吉尔的言论使这个 24 岁的年轻人津津有味。“哈利法克斯认为张伯伦是和其他事情一样——这些言论他也不以为然——如‘我们时代的和平’。”杰克写道，“从慕尼黑回国的时候，哈利法克斯同张伯伦坐同一辆车。张伯伦对他说，街上人们的狂欢和抛撒的玫瑰两个星期后就会销声匿迹。”

这是在关键时刻对领导层的动机的敏锐把握。在其一生，人们总是用杰克的事业来衡量他的功绩。然而，事实上，睿智的他对当代的重大事件备加关注的同时却一直保持着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超脱立场，能够同时对争论的两方面作到敏锐地洞察。而他的爱情观恰恰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一点：既不愿放弃，又不愿为之付出太多。

英前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个性，特别是与温斯顿·丘吉尔的微妙关系引起了杰克的浓厚兴趣。哈利法克斯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就愉快而坦率地将那次从慕尼黑回国，返回唐宁街的途中，他建议张伯伦让丘吉尔入阁的情形——告诉了杰克，张伯伦固执己见，不为所动。不仅是因为顾及希特勒的态度，而且也因为他与丘吉尔意见相悖。虽然他向自己的私人秘书许诺“晚上再说”，但很清楚他对这一建议不感兴趣。

肯尼迪传

杰克敏锐地感受到，政治家个人的喜好甚至敌意就像军备的统计资料一样是历史的重要一部分。“张伯伦没有什么不可妥协的。”他注意到这个无意中使成百万捷克公民的生命受到伤害的几乎成为法西斯帮凶的前首相，“非进即出，张伯伦反感丘吉尔。”

哈利法克斯谈起 1940 年 5 月 10 日希特勒大兵压境的消息传来后张伯伦辞职的情景让杰克兴奋不已，以前杰克仅仅间接地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只言片语的残缺信息。现在，他直接从亲眼目睹事件始末的哈利法克斯勋爵那里知晓当时哈利法克斯之所以没有成为英国首相的缘由。杰克记录道：

张伯伦在引咎辞职的那天上午，示意哈利法克斯，他想让他掌管内阁，哈利法克斯含义模糊地说，那太困难了，因为阿斯奎斯的经历让他感觉心有余悸。在战争时期，首相从下院产生显得至关重要。张伯伦召集首席秘书大卫·马杰森、哈利法克斯以及丘吉尔开了个碰头会。张伯伦率先发言并提议让哈利法克斯出任首相。哈利法克斯以上午的理由婉拒了，马杰森也表示让哈利法克斯担任首相而同时留在上院简直是痴人说梦。丘吉尔对哈利法克斯的话表示高兴和欢迎，因为他持同样地看法。

这无疑是想说明，“他是首相的当之无愧的合适人选”，同时也照顾到张伯伦或哈利法克斯的感受。

哈利法克斯与杰克也讨论了鲍德温未于 1934 年开始重整军备的原因。当时他为了赢得选举，将数额较高的国防拨款案束之高阁。哈利法克斯在回忆中谴责道，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原

则下，鲍德温应当接受失败：“他要是明智一些，就会提前一年重整军备，总参谋部和其他部门也会让工党政府明析英国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工党政府大概会意识到重整军备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可能性与必然性不一定相一致。杰克与一个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就是在民主国家里，一个政治家在历史关头，考虑到会面临历史的审判，如何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罗斯福在竞选时，为了顺应民意曾承诺不会把美国的青年送上战火弥漫的地方。但是，杰克认为，这种做法如同绥靖主义者所自欺欺人的“我们时代的和平”一样，只是一个动听的幌子而已。在政府最核心的领导中，当国家真正需要时，领导者的决策受公众舆论的影响将是最大的悲哀。

哈利法克斯对杰克提出的在 1938 年同苏联结盟将会改变历史进程的看法不以为然。他固执地认为，那时苏联陷入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泥沼，同希特勒打仗的准备并没有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特别是波兰和罗马尼亚当时出于对赤色革命的恐惧，不允许苏联军队穿越他们的边境。此外，哈利法克斯对英国坚守新加坡觉得希望渺茫，认为只有再派 50 架“飓风”战斗机去，这个邦属国家才可能幸免于难——一个让人骇人听闻的“可怕的评论，因为这近乎到了亡羊补牢的危险境地”，杰克写道，并补充了克莱尔·布思·卢斯的说法：“在战争的前一周，丘吉尔就以一个卓越政治家敏锐的洞察力断定，日本人会像意大利人一样低头认输。他们是远东的南欧人。并将这种预见告诉了约翰·冈瑟。”这是值得深思的重要素材。在查尔斯顿这波澜不兴的地方，面对过去奴隶种植园和南方人的思想，杰克开始进行反思。

肯尼迪传

与此同时，性爱之乐让他乐不思蜀。2月6日星期五，英加再度与他见面。联邦调查局查明，英加使用芭芭拉·怀特这个化名住进萨姆特堡旅馆。他们对她的计划了如指掌，并告知萨凡纳工作站。开始，肯尼迪一直没有离开工作岗位，到了下午5点35分，他与他的1940年生产的黑色“别克”敞篷轿车一起出现在旅馆门口，1941佛罗里达6D951的车牌号，也没有逃脱联邦调查局的眼睛。他径直走进她的房间，并在那里一直待到第二天早晨，只是在晚饭时离开过一会儿。

联邦调查局和海军保卫局不约而同地跟踪这对苦命鸳鸯。然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一定对自己的尴尬角色感到恼火，觉得自己好像是替人捉奸以办理离婚手续的卑鄙雇佣，他对俩人进出英加房间里的时间不厌其烦地记录下来。这对情侣星期六又在旅馆的房间里寻欢作乐了8个小时，只是半夜吃快餐时才地出来一会儿，之后又迫不急待地返回他们的温柔乡。“在他们离开旅馆的时间段里，没有进行任何联络的迹象。”这名特工不无沮丧地记录道。第二天，这位所谓的间谍嫌疑犯和她的猎物去博德大街天主教大教堂做弥撒，更让这位愚笨可怜的特工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做爱后，到教堂去忏悔，这与典型的间谍活动显得格格不入。就连俩人在国王大街的欣德勒古玩店里悠然闲逛时，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的迹象。“在这两个地方，没有发现他们与任何人进行联络。”这名特工不厌其烦地记着。尽管俩人在查尔斯顿郊外的一家私人俱乐部花天酒地地挥霍了星期日的下午后，很快又如饥似渴地回来上了床，直到2月9日星期一的凌晨，英加返回华盛顿，而杰克在她的房间里睡得十分舒服。

一个狡猾的德国间谍对一个驯服的美国海军军官所进行的特务活动就是这样的一些事吗？不由得让人觉得特工们草木皆兵的可笑，海军保卫局的特工比起联邦调查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在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但是，他们惟一可能有价值的发现只是英加对杰克取消了那个周末对他的一个上司的拜访感到很不高兴。这位特工记录道：“英加声称，她认为肯尼迪不应该有意避免她会见雷文纳尔中校。因为，要是肯尼迪在华盛顿，她的一个有价值的朋友打来电话的话，她希望带他一起去。之所以特工对此津津乐道，是因为他们怀疑被监视对象希望会见雷文纳尔中校，是为了窃取国家防务情报。因为她看起来对取消这次拜访而大发雷霆。”

这种推论显出特工草木皆兵的恐惧心态。英加的气愤是出于一种社交上的不满。这位前“丹麦小姐”对杰克不愿把她介绍给他的社交朋友或海军上司，感到十分气恼和沮丧，这值得特工大惊小怪吗？

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这名特工从窃听器听到情况总结道，“很清楚的是，在费乔斯夫人住在萨姆特堡旅馆 132 号房间的期间里，和肯尼迪充分享受了性爱的乐趣。”非常清楚，这充其量对英加来说是对丈夫不忠，对杰克来说是道德上的错失，间谍活动从何谈起？另外，他们发现，相对于对婚姻的兴趣，费乔斯夫人对海军情报的兴趣显得微不足道。“他们的谈话中透露的有关肯尼迪行踪的惟一情报是，四五天后，他可能要到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去学习 3 个星期的火力控制。对于少尉的未来计划以及有关美国海军舰艇行动的近况，她并没有表现出专业间谍特有的敏感。至于她的打算，她说她准备返回华盛顿去上班，并且要尽快与费乔斯离婚，然后与肯尼迪结

肯尼迪传

合。”

但是，志向高远的杰克·肯尼迪能娶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的英加吗？她激情四射，女人味十足，有性生活经验，一定意义上还有一种近似母爱的特质，这是杰克的母亲所匮乏的。尽管他心灵受到孤寂的包围而蒙受扭曲，再加上一些奇怪的疾病，背痛无日不在折磨他，而且他人生的路在何方，还是个未知数。但是英加让人无法拒绝的性感和完美的胴体完全使他神魂颠倒。然而，婚姻却是另一种生活，英加也很清楚。

一名特工在写给胡佛的一份备忘录中记录说，2月6日，他们窃听到凯思琳说到杰克娶英加的可能性时表示，“即使英加同费乔斯分道扬镳，老肯尼迪也仍然反对杰克娶她，因为他父亲不会容忍有违宗教信仰的婚姻”。

当然，每个稍微了解约瑟夫·肯尼迪本色的人听到这种议论，都会哑然失笑。然而，英加却迫不及待地要结婚，她已经28岁了。除了由一个有纳粹企业家嫌疑的阿克塞尔·温纳——格林提供给她钱，以及她那位快要拜拜的丈夫费乔斯博士每月给她汇款外，她的生活毫无保障。她表白说她爱杰克，并希望为他生孩子。华盛顿的“家”，让她觉得孤寂难耐。那天晚上，她在一封充满辩解的信中向杰克询问：“家是什么？”

女人们在我们这个年纪，至少是在我这个年纪，有一个男人和几个孩子显得至关重要而且紧迫之急。如此看来，第16街1600号，充其量只能算是个住人的水泥构成体。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僵硬的现代气息浓烈的地方，是我睡觉，吃饭，但绝无欢乐，缺乏感情的地方。我的意思是，相比起来，132号更像是个家。正如今天夜里我在电

话中所说的那样，昨天夜里要比两周前更加依依不舍，不忍和你说再见。那里面危机四伏，掩藏着眼泪、悲伤和痛苦。爱、思念和困惑交织在一起。对我来说，爱是所有感情中最至高无上的。我几个月前就告诉你了，你看起来有点儿匪夷所思，大概你现在还没弄明白。

其实杰克早就觉察到了这点，只是他有点心虚。一方面，杰克不得不提防英加。她的两次婚姻，充满了谜一样的故事。第三次婚姻如果成为现实，将使她摆脱对费乔斯以及被列入黑名单的阿克塞尔·温纳—格林的在财政上的依赖。但是，它对杰克的前途将产生悲剧性的影响。

另一方面，英加对杰克至关重要。因为他小时候缺乏必要的母爱以至于心灵扭曲，所以杰克一生不同寻常的恋情一直是个谜：自负与征服、感情与肉体的游戏。但是，从任何标准来看，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来解释他与英加的行为显得太简单了。从杰克顾虑重重的心情来看，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部分是让人无法抗拒的尤物，部分是母爱的化身，部分是女强人——充其量只能唤起杰克深深的爱。不管怎么样，这都足以使英加考虑，有时也会使杰克想到，他们可以将世俗的眼光、年龄的鸿沟以及联邦调查局的骚扰扔到一边，而结合在一起。

“坏透了”

但是考虑过没有？如果他们结合，英加就只能带给杰克麻烦吗？“我总觉得他不能没有她，”凯思琳的朋友贝蒂·考克斯这样评价道，“对他们之间的是是非非我都不感兴趣，所以也

肯尼迪传

知之甚少。但我知道他在华盛顿时，常到她那儿寻欢作乐。她超凡脱俗。他对有点儿达拉斯女牛仔味儿的美人情有独钟——这是一种多么不可思议的关系！毋庸置疑，她对他有一种吸引力。但是，那时我只能知道这么多，因为英加不是那种愿同女人讲话的人！当然，可能有年龄的因素在起作用，当时我 21 岁，和凯思琳同岁。”

凯思琳是在报纸和晚会上认识英加的，并认为她是一个能使杰克神魂颠倒的女巫，如果他有真心的话。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海军保卫局对女妖的看法也表露出惊人的一致，当然，间谍的身份更是让人记忆深刻。

这时候，杰克却陷于一场自酿的慌乱之中。与英加在查尔斯顿寻欢作乐之后，他打电话到华盛顿找她抱怨道，她离开后他被人捉奸在床，而且还被要求支付房费。“今天上午，当我夹着包和收音机神色憔悴地走下楼准备离开时，职员们都聚集在那里。一个职员隔着门厅冲着我喊，‘肯尼迪，来结账吧！’我可在这儿颜面尽失了。”

英加很过意不去，提出由她付房钱。杰克打断了她，“你别来了，否则我会把钱退给你，”他以撒娇的口吻提醒说，并且还说他听说，“萨姆特旅馆的职员是海军的侦探。”

“噢，是吗？……棒极了！”英加故意以幸灾乐祸的口吻说，“你离开那鬼地方指日可待了。”

“有点传奇色彩，但事实的确很糟。”杰克解释说。

的确，祸不单行，温切尔的闲话专栏引出的风波更让杰克心事重重。根据流言，《生活》杂志正要写一篇有关他们风流韵事的文章。“这个周末，我得起来一下。”杰克安慰英加，“关于那个《生活》杂志，还有什么新闻吗？”英加没有听到，

但是肯定“他们没有权利刊登任何有关你的东西。”

杰克很是怀疑。他妹妹也顾虑重重。英加为自己辩解，对杰克说：“我对凯思琳说，我没碍你什么事，为什么跟我过意不去。她说，她只是担心我会给你的未来带来麻烦。我说，‘好吧，要是我现在让他快乐，你认为那很重要吗？’她说，‘是的，你怎么做呢？’”

“你怎么回答？”杰克问道。

“我不置一词。”英加回答说。

这使杰克降低了声音，并温情脉脉地说，“很遗憾你不在我身边。”

当他在晚上 10 点 20 分和英加用电话遥寄相思之情的時候，有一个情敌正在英加的寓所里。海军保卫局和联邦调查局除了安装了窃听装置，还派出特工人员在街上巡逻监视。英加那天上午 11 点 45 分返回华盛顿后仅仅 20 分钟，一位住在纽约的旧相好——丹麦男友尼尔斯·布洛克的电话就不期而至。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可谓成果丰富，翻译把谈话录音翻译并记录下来：

他打算到华盛顿与英加一晤。

她对他到这儿的动机猜不透，因此问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不否认，只说他好想她，想见她一面。她说：“是吗？那倒是让人愉快的消息。”她告诉他，她刚结束了一次旅行。当他问旅行地点的时候，她笑着模棱两可地回答：“很远。”她对他的动机充满了猜疑，他说她知道他的目的。他告诉她，工作上有点儿空余时间允许他来看她。她建议他坐飞机来。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那么一会

肯尼迪传

儿，她似乎对见他有些迫不及待，有时又犹豫不决。经过长谈后，他挑明说：如果不能共赴巫山云雨的话，他过来就没多大意思。她拒绝了。

然而，对性充满渴望的英加持续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反悔了。联邦调查局的人记录道，在 12 点 35 分，丹尼斯又从纽约打来电话，“她决定不再拒绝他。她有点儿于心不安，”译员写道，“因为她有时不能让他吃闭门羹。她说，‘我无意于一次和一打男人上床。’他们商定他一到那儿就给她挂电话。”

下午 4 点 30 分，布洛克到了英加那里，整个晚上和夜里都和英加一块儿享乐。杰克是个陷入自我感觉良好怪圈的小丑，他对自己一直被愚弄一无所知，只是对被监视大为光火。根据联邦调查局窃听到的电话显示，2 月 11 日，他向英加透露说，他震惊地发现隔壁房间里的那个家伙把他的邮件一封不拉地复印了下来，但是，他自信他找回了大部分。”他显得小心翼翼而且话语很少，因为他的房东正在偷听。《生活》杂志引起的风波仍然是他们的心腹之患，所有这些以及目前华盛顿对罗斯福的新任命的争论，都使他大为光火。“华盛顿的人除了谈论 1 200 美元的年薪与当红的舞女和气旺的影星们之外就一无所知了吗？”他写信给英加，提及目前报纸头版上的通栏标题。“世界上正在流行浪费病，所有的钱都被浪费掉了——特别是所有正在花的钱。他们只是在‘新政’中无关紧要的小毛病上纠缠不休，而在过去的 10 年里，难道没有其他更好的例子？我认为，那里每件事都让国会议员们搞得太复杂了，”他说，“现在他们好不容易等到像当红的舞女这样一件他们能搞明白的事，当然不会放过大做文章的机会，然后他们再大把

地花钱。尼罗最好动，他的交际太频繁了。惟一有希望的就是你了，”他以温和口气结束谈话，“我希望你能充分理解你的责任而不是置若罔闻。”

英加当然不糊涂，尽管一次和一打男人上床使她的负担骤增。2月12日，杰克写信给朋友勒姆·比林斯：

这儿的生活要比想象的好，起码比华盛顿轻松一些。事实上，只有你到了这里，对华盛顿的生活，你才会有真切而客观的认识。我不知道我们伟大的国家得什么怪病了，既使就是在我最沮丧的时候，战败的可能也从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然而可悲的现实是，大家对我们正在菲律宾遭受的军事上的挫折等闲视之，对国家大事不予重视，却为一个舞女和影星被指定参加民防而群情激昂，那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啊？把公众的激昂情绪浪费在这些无关小节上，而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变成这样。应该警惕，无效率就可以击败我们——尼禄最好滚开，带走和他一起的骗子们。

这是杰克讽刺最为严厉的一次。然而，痴迷于与英加性幻想中的年轻人仍然不忘大志，并以他的大多数同龄人难以企及的热情关注世界局势。他在信中以不无嘲弄地说：“来自华盛顿的那些假话，以及混乱的局面，让我觉得华盛顿与星期六晚上没有女主人的‘古巴茶馆’没什么两样，”他痛心疾首地说，“我觉得我们只是吝啬地以学术性的眼光对待新加坡的战事和麦克阿瑟的战略，而对舞蹈演员梅尔文·道格拉斯和养老金却兴趣盎然，我认为这条道路将让美国滑向悬崖，直到丧钟敲

肯尼迪传

响。要唤醒大家需要大量的士兵死亡，这看起来是个毫不人道地谬论，但是我真的认为舍此无它。”

上述想法使他认为美国制订更大的战争目标势在必行。“我认为，基督教讨伐异教是失败的，这点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但是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与许多与上帝绝缘的中国人和许多不重视上帝的俄国人打交道是必须的选择。我想，我们已经别无他途了。”他谈到了民主美国同社会主义俄国的结盟：这种颇耐人寻味的情况促使他鼓励比林斯“同你见到的任何棕种人或黄种人交朋友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施本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预言，未来的几个世纪是属于东方的。假如日本人完成了统一亚洲大业，似乎林德柏格夫人所谓的‘未来的浪潮’里黄色的面孔必将占据一席之地。”

这番鼓励并不意味着杰克的才智所常用的讽刺会放过可怜的比林斯。在谈及父亲为比林斯向美国野战勤务部门打造的那封推荐信时，杰克提醒他的朋友去认真看看“第四页第六行，‘再继续增加他独特的品质将是多此一举的。’那么，我就不得不关注“独特”这个字眼。他指的是什么呢？剃下巴的习惯？希望有一个晒得黝黑的皮肤这种偏执的心愿？还是你吃哮喘药时，‘独特’的表情呢？当然，所有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而我只想知道他具体谈论的是哪一种。”

这类玩笑只能让两人的友情更加亲密无间。比林斯是惟一能够敏锐地觉察到杰克爱故弄玄虚的男性朋友。杰克是一个疾病缠身，多愁善感的年轻人，而在他的灵魂的最深处，欲望与不顾一切的性追求奏出一曲绵绵不绝的二重奏。杰克·肯尼迪身上充满了自我怀疑和自我怜悯的意味，比林斯是个参照物。后来，比林斯在一次会见中，将杰克在查尔斯顿无聊至极的生

活表露了出来。“我记得他干海军情报工作，但是这时他却在国防工厂上班，如此不一而足。”“他对只以美国为基地的情报深恶痛绝。他是我所知道的在查尔斯顿最郁闷的人。”“他在查尔斯顿灰心丧气。那是一份烦人的浪费青春的工作……他极想离开那个鬼地方。他想服现兵役。”

比林斯说对了。1942年2月14日，杰克在给比林斯的信中描绘了他想像中的最新计划：“我的策略是一如既往地多变而充满吸引力。因为事项繁多，一是到珍珠港上班，另外一个到一艘战列舰上工作。虽然两者大概都不大可能，但是两者都有使我与当地漂亮姑娘们打成一片地可能。”

提到查尔斯顿土生土长的人，杰克的兴趣转到了有关南方人的问题上。事实上，在棕榈滩社会外，杰克从未直面过逆反的南方。“之前我们讨论过南方人的事吗？”他问。“他们总是喜欢用不确定的说话来遮掩他们的谎话。从不在每次评论后说现在来看我们的肯尼迪吧，在这儿，而是用一些‘大概’，‘一不致’等模棱两可的词语敷衍塞责，所有的谎话使我坚信，‘大概’之类的话应该去见鬼。”

查尔斯顿那段时间乏味无聊，杰克用不绝的思念英加来打发时光，而英加也迷恋他。英加在1942年情人节写的一封情书里，不可思议地谈到了对过去的反思，对现实的审视，以及对杰克未来的殷殷关切。她回忆起在暹罗的日子：

那里的寺庙色彩缤纷，壮观极了。太阳普照着大地，龙形屋脊披上一层金色的光辉，镇子祥和宁静，像垂在天宫的一抹彩虹，这些屋顶盘旋着直插云霄，好像准备蓄势刺破天幕去触摸上帝的玉座……那里的佛像多如牛毛。金

肯尼迪传

子、绿宝石或其他贵金属和宝石把她们镶嵌地五光十色。许多还笑容可掬，慈眉善目，好像在垂询“你们为什么信奉我？”女人们拜佛保佑她们的梦中情人，然后，她们到送子观音跟前，求让她们多生几个孩子。如果所求之事应验了，他们还会到此地来献上丰厚的祭品还愿谢佛。

和尚披着金黄色的袈裟。就是好莱坞也为这种巧夺天工的舞台背景而自愧不如。和尚们看起来清癯。破晓时分，他们驾着小船，逆流而上去化斋。人们对这些好像一生中没有吃过饭的僧侣，总会倾囊相助。和尚接过施舍，双手合什，好像他帮了他们大忙——我的上帝，他们自己真有这种感受。那就是信仰的力量。

信仰啊。你总是吹嘘你有信仰。有时，我真的怀疑你是不是相信。在我的眼里，你生来具有的信仰就是没有信仰。当上帝拉开你生活的序幕，人世间所有的善与恶展示在你面前时，生活才使你获得了信仰。如果那时你信奉神，神就存在，它是建在一块坚硬地花岗石上，阿道夫先生的任何新发明对它都无能为力。

从回忆中醒过来，英加心酸地说，“你要走了，”因为她知道杰克对到国外执勤情有独钟而且已经申请了，“我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我想一般的女人都会骄傲地说‘去保卫祖国吧’。我也不脱俗，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很不好受，惟一祈愿上帝保佑你。希望你不要丢失健全、优雅、帅气的身躯，更重要的是坚持成为一名美国总统的志向和在西部某个地方经营一个大牧场的愿望。”

英加在这里清楚正式地提到杰克鲜为人知的想作白宫主人

的愿望。尽管杰克的朋友常常会嘲笑这样一个拖沓、喜好寻欢作乐的年轻人竟然有想当美国总统的野心，但是杰克知道英加会理解他。她的确这么做，因为她坚信，只要他下决心，成为总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像杰克一样，她从来没有丧失她的自信或对他的缺点的宽容。她写道：

你上个星期六说过，“对你，作假没有任何必要，你对我了如指掌。”的确，我没有把你当偶像来顶礼膜拜。世上没有偶像，你也不会破例，因为我知道你的缺点在哪里，那正是我为之自豪的。一个人，如果自欺欺人地坚信并让别人相信自己完美无缺，那么，你们就像是一块劣质的工匠切割出来的“完美”钻石。

我这个人或许是好相处，亲爱的，因为我对穿这种鞋脚哪儿痛的道理坚信不疑；因为我穿过。我知道我的弱点，也知道自己在哪儿跌倒的；而且还会面对挫折。但是有一种人是不会被失败打倒的，他们坚韧不拔，永不停歇，对调查研究和形势关注备至，他们就像财神爷之妻那样痴迷……

大概你最大最严重的最让我难以忍受的缺点是你重理智而轻感情。但是，这也无可厚非，因为要想成名就必须这样。感情与名誉属于两个世界——圣人除外——也不会带来物质上的享受和钞票。

无论如何，你一旦结束兵役，我们就一起共进午饭，行吗？当然，前提是你还没有结婚，否则你的妻子会醋海泛波的。你年轻气盛，又在热恋之中，那总是难以容忍的。大概她会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仍然无牵无挂的话

肯尼迪传

.....

过了两天，杰克打电话询问英加是否收到他的来信，当听到英加气喘吁吁的“你好”时，他有点儿惊讶和困惑不解，这时他甚至还没来得及通报姓名。英加是圆滑的，她狡猾地把自己从不检点的行为中解脱出来。

事实上，在接到杰克电话的 10 分钟前，她一直在同绰号为“老山羊”的伯纳德·巴鲁克讲话。寄居在异国他乡，他的友谊是她一个温馨的避风港。弗兰克·沃尔德罗普后来回忆道：“有一次，有人下意识地问了她一些不合时宜的问题。她镇定自若地回答说，只要巴鲁克请她吃晚饭，她是无所畏惧的。”“只有你一个人？”巴鲁克在电话中问她。“猜对了，”她调皮地回答道，“你可能认为这不可思议，太可怕了，不是吗？不，我的生活祥和宁静，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她老老实实地说自己正在等她丹麦情郎的电话。

现在，同杰克讲话时，英加善于自我表达的超人才华表现得淋漓尽致，就是才华横溢的杰克也自愧不如。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呈交埃德加·胡佛的一份报告中说：“她说她早知道是他，并说‘我还一无所有，我也没有得到你’。”

像杰克一样，英加也是个幽默天才，并明白幽默是解脱自己的灵丹妙药。“她说她乐意开玩笑。然后骗他说，他的信已经收到了，并动情地说‘我为你准备了一本书——情书。’她后来不吝言词地吹嘘这封信太棒了——她不知道他的大脑里还有如此无人问津的神秘的角落……她询问他离开的日子，并且问是不是新加坡。他纠正说，应该是珍珠港，然后才轮到其他什么地方，但是已经落空。他不无沮丧地认为他要被困在查尔

斯顿的时间还远远没有结束，并且说他的所有计划看起来都像
是水中月。”

是有意让肯尼迪留在查尔斯顿的岗位以让英加上圈套呢？
还是想套住肯尼迪少尉本人呢？无论真相如何，杰克不得不重
复令他生厌的情报工作，正如他的同事弗雷德·罗森少尉后来
所回忆的那样：

我对肯尼迪要离开波士顿地区一直感到困惑不解，他
有什么理由要呆在那儿呢？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司令官
的参谋部里破译海军密码。也就是说，当一批密码电报到
达后，通常是一组 5 个字母或别的什么，不是用手破译，
而是有一台打字机辅助干这件事。他坐在那里，搜索，把
密码输进打字机，然后输出英文。这就是他的主要工作。

如果杰克的上司对抓住他在从事秘密间谍活动的证据十分
热衷的话，那么，很显然，他们一无所获。联邦调查局报告中
不厌其烦地说：“她唤他甜心、亲爱的、小精灵、宝贝儿查尔
德·王尔德，并不止一次地说‘我爱你’。”尽管特工们把她作
为一个间谍嫌疑人而对她的活动全程监视，但是他们一种更深
层次的情报搜集方式也正展露在他们的视角里。英加感觉到，
她必须具有高等妓女的高超技巧，一方面保证杰克得到一种前
所未有的爱而乐此不疲，另一方面像罗丝在他童年时那样，故
意不给他爱，让他经受煎熬。联邦调查局记录显示：杰克“催
促她来查尔斯顿，她慢吞吞地说‘三几个月后吧，或者你真的
非常渴望我的时候！’他说他已经迫不及待。”

英加挑逗着正害相思病的无处发泄性欲的少尉，戏弄他

肯尼迪传

说，她只有“完成她的第一本书”后才能来。杰克针锋相对地说她“别过度劳累”但同时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对她采访威利将军的文章的喜爱。威利将军是海军生产裁定委员会主席，是影响杰克的重量级人物。据联邦调查局的人记录，英加对此的回答是，“我正在做最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原因。”当他说，‘你不晓得什么好坏’时，她不失时机地幽默地说，‘我知道你很好，但又坏透了’。”

如此隐晦地提及他性格中道德沦丧的一面，让杰克的虚荣心无地自容，也投合他诚实的特点。的确，在他的一生中，像英加这样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人绝无仅有。她是欲望和幽默的混合体，天生表现欲强烈，又富于冒险精神。她妙语如珠，语速甚至比他还要快。据联邦调查局的人记录，刚才她还对巴鲁克说，“上一次战争，你起了带头作用，显然我要在这次战争中带头”。不久，她的话应验了。没有人甚至杰克也不知道他们的充满传奇色彩的独特恋情的结局将是什么。

查尔斯顿刮起狂飙

英加对杰克的另外几个妹妹也十分熟悉。一个是羞涩的琼，她的性格让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之与肯尼迪家族相联系。另一个是帕特，“她像个小天使，将来一定漂亮，但是常发傻笑。”所以她和姬克“简直是地道的老修女”，英加向杰克这样评价。他们谈到勒姆·比林斯马上就要启程去埃及，然后又聊起杰克的打算。“她想知道新加坡之行落空的原因，问是不是‘老乔’也无能为力。”联邦调查局的人在最新的报告中记录，“他说当他知道的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今天夜里他曾给

‘老乔’打电话，但是没有接通。他已经申请调动工作，但过去了6个月还是没有动静，他担心又要泡汤……他非常思念她。”

不顺心的事接踵而来。当听到盟国对抗德日的战事效果不佳的消息时，杰克更是火气冲天。祸不单行，他父亲在总统面前还没有重新获得信任，杰克发誓无论如何要帮老头子杀回政坛。在珍珠港战争爆发的那天夜里，也就是宣布辞去驻英国大使职务整整一年后，约瑟夫·肯尼迪向总统发了一封效忠电报：“敬爱的总统先生：国难当头，全体美国人与您一道。我服从您的指挥，随时准备奔赴您安排的战斗岗位。”然而，无论如何，罗斯福都不再信任肯尼迪了。数周过去了，接着又过去了数月，这位前大使坐不住了。他烦躁不安，赌气发了封电报，主动请缨为英国比弗布鲁克勋爵效劳。罗丝在她最近写的家信中向孩子们通报说：“他早就愿为政府效劳，但是政府抛弃了他，所以他选择了英国，如果英国需要他的话。”

这位被解职的前大使发给曾出使过的英国的一位内阁大臣这样一封耐人寻味的电报，的确颇费思量。显然，由于罗斯福继续拒绝起用他，这位前大使的理智开始复苏了，但他仍然固执地置他在华盛顿和伦敦被痛恨的程度于不顾。英国政府怎么会理睬他这块烫手山芋呢？尽管在职时政绩不佳，但他还是紧紧抱着“大使”头衔敝帚自珍。他在棕榈滩上过着无聊的无职生活，其焦躁不安和哀声叹气，不亚于他在查尔斯顿的儿子，只是多了一层被抛弃的失落感。

肯尼迪的朋友理解他，但也有些担忧。他们怕老头子的情绪会使孩子们信心受到打击，特别是那位很像是个乐天派的二儿子。克莱尔·布思·卢斯2月5日提醒这位前大使说：

肯尼迪传

杰克的周围簇拥着很多人。他所具有的一切使他获得巨大成功的可能性为 100%，我感到不论什么环境，杰克这样的孩子都会坚强地顶住……而且在美国这样的孩子不在少数，因此，我们是充满希望的。

他对你的消极有些不高兴。这会使他吃惊，让他丧失信心。我坚持认为你……和我都没有理由给他和成百万像他这样的美国孩子增加疑惑的负担，所有这些负担都得远离无辜的孩子们。孩子们毕竟是我们和我们时代的人所犯低级错误的最终承受者，而且总统先生的外交政策要完全靠这些孩子们才能得以执行。并且可悲的现实是，解释原因不是孩子们的责任，他们只是执行命令……我们没有理由使他们感到这些命令太狂妄太虚幻。

卢斯夫人充满激情和责任心的话语，不仅是一份对美国所面临的政局大事的总结，而且也是在她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奔赴战火弥漫的英国和中东前夕，向美国人发出的一个振奋人心的饱含激情的召唤。清醒吧，美国人！如果日本人成功了，就意味着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中心地位的终结。夫人觉得，美国人参加战斗不容再懈怠。

约瑟夫·肯尼迪对卢斯夫人的信感到震惊，他把它抄录下来，并附了一封简短的说明信，寄给了杰克。“天知道，作为父亲，我并不希望我的消极悲观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他不无歉意地说，“但是，我不知道用何种方式告诉你我的想法，难道要我全盘托出吗？”他为自己辩解道。他勉励杰克不要浪费这次到查尔斯顿的机会，因为它不仅是一段很好的经历，可

以“体验不同的工作”，同时“也会帮助你树立信心。行行出状元，特别是在政府机构里面。”

杰克被父亲的话语深深打动了，他仔细读了克莱尔·布思·卢斯那封意义非凡的信。这封信不仅让他终生难忘，而且在他一生中如此关键而敏感的时刻，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甚至，说它标志着杰克早期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也不言过其实。

“尽管报纸的通栏标题对胜利津津乐道，但还是有篇新闻报道却散发着失败的霉变气味。”第二天，杰克给里普·霍顿写信时马上原封不动地摘录了克莱尔·布思·卢斯的一个警句。他开始用这类摘录的主题和话语来驳斥他的朋友，从科尔曼到鲁斯马尼埃都没有躲过这种驳斥。另外，他开始起草他早就开始酝酿但是迟迟不敢动笔的文章。只要老头子一日不放弃“让美国离开战争”的使命，他一定不敢发表，因为这文章将冲决他自己的思想大堤，摄取他从过去的3年里在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的斗争中所获知识的精髓。

“现在美国形势严峻，”杰克动笔写道，“严峻至极！美国人民必须对我们是否参与这场战争的理由和规模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场战争不是口头上或纸张上对战争潜力和可能的生产极限的一次毫无意义的争论，而是一件实实在在的战争，必须由军队来进行认真而长期的战斗。这不是一场以纸上谈兵，幻想将来有一天天空突然布满轰炸机的一纸空文来打赢的战争。这场战争如果作为一场政治战来进行就是大错特错。将军们必须要负责任——如有必要，必须把国家有机组织起来，让纳粹分子的妄想灰飞烟灭，如果我们站出来的话。”

美国卡塞林灾难发生的前一年，巴丹陷落了。杰克于

肯尼迪传

1942年2月中旬鼓动如簧之舌号召人们武装起来，这是他自己政治军事生涯中破天荒的重要地一步。他曾在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之间徘徊了近3年，现在，他成了克莱尔·布思·卢斯的忠诚追随者，常常准确地成篇引用她的原话，并预言：如果不采取激进的措施，美国将遭遇失败。而此时，卢斯夫人已是国会议员和著名剧作家。

尽管他自己一直顾虑重重，尽管他曾与他父亲一道反对美国卷入二战的烽火，正如美国人所担心的，这种参与会使资本主义的民主滑向悬崖。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作出决定的肯尼迪少尉，他号召国人起来战斗，也没有淡化他为战争做出独特的贡献，尽管他与一名充满悬念的丹麦美人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姐弟恋情。他仍然不忘提醒说：“两种危险没有一刻离开我们，如果维持下去，极有可能给美国带来灾难性后果。”

首先是“日本人成功地将势力范围扩展到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紧接着印度也岌岌可危，但这些可能性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杰克断言，“还有一场宣传攻势紧随军事占领之后席卷东南亚，使日本人披上了解放黄种人，脱离白种人控制的冠冕堂皇的外衣。这将产生难以想象的结果，”他承认并宣称“英国人逮捕的印度民族主义分子要比希特勒在欧洲所有集中营关押的人多出很多”。

“如果日本人的目的如愿以偿，”杰克描述了这样一种可能，“印度洋都是日本的范围，而日本人的统治将近乎固若金汤。这种攻势将同德国人穿过土耳其向波斯湾推进遥相呼应。这样做将起到一箭三雕的功效：与德国法西斯通过乌克兰的攻势遥相呼应，威逼斯大林，它将形成一把匕首，插在西面面临隆美尔压力的英国人的后方；而在东面，英国人增援印度的任

何机会都将被堵死。”

与克莱尔·布思·卢斯相似，在这种危急关头，杰克勾勒了德日联手取得成功后的世界前景。“如果这两个攻势势如破竹，到5月底结果将大白天下，”杰克预言道，“如果日本人侵占新加坡、东印度群岛和印度，而德国人迅雷不及掩耳地穿过土耳其——土耳其抵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它想抵抗的话，也会迅速被击得溃不成军”。

“那时，盟国将面临极为严重的危机，”杰克分析说，“由于双重失败的压力，丘吉尔将退下阵来。毋庸置疑，绥靖力量将在英国死灰复燃。德日联手所产生的强大威慑，将使英国人面临这样一种选择，如果它的帝国地位能够得以苟延残喘，媾和似乎也无可厚非甚至是灵丹妙药”。

“比弗布鲁克可能是丘吉尔理所当然的代替者，他是一个强人，声望极高，有绥靖背景和前孤立主义的领头人的资料让他充满神秘。他坚持认为英国在媾和中有更大机会，最起码比在战争中的机会更大，战争是长期的，而且前景不容乐观。”

杰克描绘的图画耐人寻味，好像确有其事。比弗布鲁克对丘吉尔来说，就好像约瑟夫·肯尼迪对罗斯福一样：是一个富有而又有号召力的人，首相要竭尽所能与之较量，以免被他逼宫。当然，杰克对丘吉尔的预言更接近现实。丘氏在四个月内将不得不面临在下议院的首次不信任投票而作出艰难的抉择。

“人们猜想，苏联也要媾和——否则，它将被赶到处于安全地带的乌拉尔，”杰克设想道，正如他为自己国家的命运而充满忧虑一样——“这种危机即使不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

杰克对未来的全景勾勒使他的这类预言表现得淋漓尽致：

肯尼迪传

正是现在，美国不得不作出重要的选择，要么货真价实的交战，要么媾和。如果选择交战，那的确意味着成百万人充当炮灰，成百亿美元的巨额耗费。它将意味着一场旷日持久的人间惨剧，一场远程攻城拔寨的战争。为了发动国民参与，这个国家将不可挽回地滑向法西斯的道路。众所周知，我们的民主也将荡然无存。

那个时候对舆论尤为关注的罗斯福或者选择下台，或者——如果他拒不交出白宫的话，由幕后的军人集团逼宫——成为一名傀儡总统。由于战火的来临而感到惊慌失措的公众将不会原谅他，正如英国人指责丘吉尔一样。靠着洛普民意测验而苟延残喘的他的政治生命将到此结束。

这些是对一位现任美国总统的狂妄至极的预测，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杰克少尉正受到海军保卫局的严密监视，而总统是杰克命运的最后裁判者，因为只有他才能决定是否逮捕杰克和英加。

杰克辩解道，美国公众“不愿为胜利而付出如此代价。孤立主义是最根本的国民性，浩瀚的大西洋和广阔的太平洋形成的安全感，使他们的骨子里没有危机感：这种小富即安的情绪由于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得到强化，因此，美国人宁愿选择和平，而无视这种和平多么不可靠”。

这是老肯尼迪去年春天在奥格尔索普大学所津津乐道的观点。他的传记作者评价说，“这大概是肯尼迪一生最成功的演讲。”然而，杰克却不以为然。

“这个致命的错误将让美国人陷入长久的痛苦中，”杰克告诫道，“我们可以与欧洲的泛德意志主义运动针锋相对，因为

经过三年的和平可能会土崩瓦解。但是，由狂妄的日本所牵头的“东亚共荣”运动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如果让日本主导世界上最广大的土地，亚洲这个昏睡的巨人就会警醒过来。日本人会选择先同中国人做交易。首先，中国人理所当然希望把日本人驱逐出中国。战线过长的日本人也希望让出所占领的中国、香港和缅甸的一部分，希望以此来取悦中国人。日本人需要脱身去做更多的事情，比如把马来西亚、东印度群岛、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几个占领地开发成大后方。蒋介石将败退到蒙古的群山之中，去发动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随着英国的被迫退出，印度将被融入由日本打造的一个巨大的经济与军事圈，这部机器最终会让美国毛骨悚然。在西方，斯大林被德国人打得找不着北，背后又面临西伯利亚的攻势，将会非常愿意加入日本所主宰的运动。那么，最后就该打我们的主意了——有一天，日本法西斯会出现在我们的国土上，像霍默·李在 1908 年预言的那样，即某一天日本人会在战场上痛击美国。”

杰克的政治战略思想终于勾画出来了，但是，这与那位哈佛大学生所持有的前景截然相反。他那时曾撰写一篇名为《血腥》的社论，大肆鼓吹与希特勒妥协。甚至最近同哈利法克斯勋爵的谈话也让他大为发火，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那么，希望温斯顿·丘吉尔会为在日本启动战争前一周与约翰·冈瑟的谈话时所说的‘日本终究会失败的——他们充其量只是东方的南欧人’感到难堪和羞愧，就像内维尔·张伯伦为鼓吹‘我们时代的和平’的言论而付出代价一样”。

“这些是美国面临的几种悲剧性的可能，”杰克断言，“我们参战要么是失败，要么是鲜血、汗水和泪水，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包括从白宫的决策者到街上的行人。”

肯尼迪传

此后在太平洋、大西洋、地中海、北非、意大利以及诺曼底进行的战争，以及攻打柏林的惨烈战况，以及在日本爆炸的原子弹，都可以证明杰克并非言过其实。无论如何，他都是为美国着想。

我们最大的战略储备是同仇敌忾的意志和破釜沉舟的决心。这种强大的意志力能否经受得住即将到来的战争的考验，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我们终究会选择战争，但是，它来得越慢，任务就越困难。而现在，我们只是在为《大西洋宪章》中含义模糊的原则和所谓的“四个自由”而战。当有一天，我们最终意识到我们是为自我生存而战时，当我们的处境有更理性的认识时——战斗不再具有崇高的宗教战争的漂亮外衣，而是一场长期而艰巨的为生存而进行的残酷角逐——那时，而且只有那时，我们的家园才会出现胜利的曙光。

回想起来，杰克·肯尼迪政治风暴的气流可在他首次打算成为某种特殊人物的“施政”演讲中露出“马脚”。那些推测杰克将以他的弟弟们以后为其效忠的方式默默地为他那位孤立主义的、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反犹太人的小乔效力的人，对杰克自己想当总统的政治野心，或者说是躁动的政治良心毫无觉察。这种良心甚至在1942年就初见端倪，也可以说开始于他的大学时代。在天性好玩、喜好女色、漫无目的的伪装后面，是一个成熟而严谨认真的杰克。他念念不忘寻求与现实矛盾的妥协——这是国内浪漫的、公开政治的现实。使他魅力四射的

东西不仅仅是“精灵般的特质”，他母亲在他孩提时觉察到这点，他在那种谦和表象的背后隐藏着明显激烈的欲望和野心。女人和战争都吸引着他。与此同时，世界力量在全球角斗场上的政治大比拼同样也吸引着他。如果说他哥哥只是跟在他父亲的后面人云亦云，那么杰克在政治上的奋斗则是独立而动人的。它表明了在对民主制度和他自己的国家在“战争的迷雾”中所面临的重大抉择中，杰克的特性被发掘了，一个倔强的儿子为了摆脱父亲的影子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凌云壮志

当杰克在查尔斯顿郁郁寡欢时，视力不好的比林斯却准备去西非和隆美尔一决高低了。杰克2月12日给他写信说：“你明白，我认为你去非洲是再好也不过了。首先，越来越繁忙的工作将使你受益终身；其次，无人陪伴的远程经历将使你取得宝贵的财富。当你不再幻想的时候，你将比以前更能适应这个变幻多端的世界，请原谅我说话有点儿像乔治·圣约翰。”

然而，仅仅过了两天，杰克改变了主意，要求比林斯在他哥哥特里梅因在纳什维尔的婚礼结束后“设法到查尔斯顿来”，以重温他们之间那种难能可贵的友情。他们的关系自青年时代以来就是这样。他评价比林斯是个“酷爱惩罚的人……当你听到某人诬赖你为同性恋者，并夸夸其谈地整整谈了两个小时，还坚持说你败给了沃辛顿·约翰逊的时候，你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蒙蔽而认为那个家伙是个大人物——即就是所指的那个是真的。”杰克提醒他的朋友，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婚礼上祝酒时“提起你哥哥的子女或他的后裔”是不合时宜的。

肯尼迪传

杰克更加忧虑重重了，婚礼和新娘使他燃起了对英加的渴望。他该与她结婚吗？英加当然盼望已久。当杰克要她在2月21—22日这个周末到查尔斯顿一晤的时候，英加迫不急待地答应了。

当时，老肯尼迪是否对英加乱七八糟的性生活有所耳闻，我们无从得知。如果他不知道这些，凯思琳2月14日到棕榈滩去以后，他也会明白这一切。英加上星期写信给杰克：“凯思琳是个可爱的天使。我喜欢她，因为她嫉妒我。我的上帝。我所给你的和你所给我的，是她永远也无法得到的。但是她年轻气盛，度量狭窄，”英加体谅地评价道，“她对我将来可能给你造成的痛苦顾虑重重而对我们目前享受的幸福却不感兴趣。”

正如英加自酿的混乱并非她的本意一样，如今，凯思琳的嫉妒之火终于引发了地震。她在棕榈滩向父亲打了小报告，老头子听了大动肝火。他早就严厉地批评过杰克，对这种不正当的恋爱关系，把它视若洪水猛兽。如今，却从凯思琳那里得知英加准备奔赴查尔斯顿幽会杰克，而且杰克仍然痴心不改，于是这位老谋深算的政治老人下决心要让这桩恋情走向坟墓。

对凯思琳来说，打她哥哥的小报告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她曾向男友约翰·怀特透露过一些令其惊讶万分的消息，说老头子本来就定期出钱雇私人侦探和告密者来对他的孩子们进行严密监视，而且特别关注他们的朋友。这种父爱在罗丝玛丽悲剧性的脑叶纤维切除手术之后，终于使凯思琳痛下决心离开家庭回英格兰去。

杰克被折腾得焦头烂额，只能以沉默和侥幸心理来寻找庇护了。英加本来订了星期五7点钟的火车票准备过去，可是她迟迟没有得到杰克的任何消息。凯思琳对她的棕榈滩之行也三

缄其口，因此英加感到毫无头绪。根据联邦调查局的窃听显示，当杰克终于在2月19日夜里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充满幽怨地说“她是惟一被杰克隐瞒的人”。杰克承认“他前一天夜里同老头子谈过话。肯尼迪说，有许多事情他得向她摊牌，但是他在电话上不方便”。

英加心事重重，随即改乘飞机前往查尔斯顿。杰克亲往机场迎接她。显然，由于在萨姆特堡旅馆里有特工，这回他在弗朗西斯·马里恩旅馆以巴巴拉·史密斯的名字订了一个房间，他们在那里缠绵了三个夜晚。

22日，星期日，杰克前往天主教堂向神父忏悔。忏悔的内容是个永远的迷，联邦调查局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觉得忏悔没什么好监视的。不过在旅馆里的每个动静几乎都被监听到了，然后，由负责这个案子的联邦调查局的各種特工进行仔细分析，寻找有关谍情的蛛丝马迹。23日，拉格斯特工得意洋洋地记录道：“被监控对象和杰克在旅馆房间里的大量对话没有逃脱我们的监控。从中得知，英加由于到查尔斯顿来了两次，非常担心会怀孕。她谈到了与其前夫分道扬镳的可能性。我们注意到杰克对这一话题鲜有评论。”

另外，很明显，杰克对有关战争的话题十分热衷。2月15日，珀西瓦尔将军在新加坡望风而逃，拱手交出了英国的整个要塞；在印尼和菲律宾，灭顶之灾为期不远。战事的进展让他心情激动，使他越来越直接坦白地发表各种意见，他同时考虑着如何对待他的让他苦恼万分的情人，如何对待保守而又固执的父亲和如何对待国家面临之种种危机的问题。

杰克的心境被搅得乱七八糟，这一点从特工们在英加到达查尔斯顿的那天晚上所得的一些情况中可窥一斑。当时他试图

肯尼迪传

给在棕榈滩的老头子打电话，但没有打通。他当着情人的面对盟国对战争的处置不当非议颇多。英加和杰克——

对国际形势非常关注，温斯顿·丘吉尔上星期六的演讲更是引发了一场深入的讨论。英加评价说“除了充斥其间的失败主义外，什么都没有”。杰克也持同样观点。在谈话中，杰克说“丘吉尔在英国马上就要卷入战火之前曾告诉约翰·冈瑟，日本会像意大利一样很快垮台。”在其他场合，杰克甚至认为，丘吉尔应对把这个国家领入战争负责。英加认为英国士兵“一团糟”。肯尼迪则认为大英帝国名存实亡了，而丘吉尔似乎明白这一点，所以曾设法试图让英国脱离这场战争。

如果用他父亲孤立主义的观点来看，杰克所表现出来的早熟不过是一种靠道听途说支撑起来的虚假招牌而已。显然，这有失公道。然而，联邦调查局所记录到的只是只言片语，但这足以表明杰克对自己只能在南卡罗来纳州日复一日地破译海军的日常电子信号，向弹药工人解说空袭警报，而对世界大战却无能为力感到沮丧和懊恼。“在另外一个场合，肯尼迪对在海军船厂里的工作口诛笔伐，并告诉情人他的同事给他起了个令人恼火的外号——‘婴儿’。”

英加对查尔斯顿海军船厂里的工作表现得很冷漠。据此可以看出，她不是一名纳粹特工。然而，让人思之喷饭的是杰克对战争的痴迷以及他对孤立主义、绥靖主义还有干涉主义反复无常，却把联邦调查局误导向一个新的怀疑对象——老头子约瑟夫·P·肯尼迪。“应当特别注意第8、9号录音带，里面有杰

克在 1942 年 2 月 22 日晚上与他父亲之间的通话。”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不厌其烦地记录道。

自从去年春天在奥格尔索普的演讲被广泛称道以来，前大使缄默了，联邦调查局现在终于窃听到了个中缘由。“在同一天晚上，杰克抱怨他父亲最大的失误是讲得太少，他演讲停得太快并被指责为一个绥靖主义者。他说，前大使停止讲话并且不再对相关问题作全面阐述，个中原因在于他认为那样可能会对两个儿子未来的政治命运投下阴影。”

如果真是这样，这是一个父亲为两个儿子，而不仅仅是为了老大，进行前途设计的首批造册的证明之一。联邦调查局的记录总结道：“他们的数次谈话显示，杰克至少为他父亲拟定过一份讲稿，用以答复对他所宣扬的绥靖政策的指责。”

然而，这位前大使可没有将英加计算在内。尽管他们风流的事不断，但是很快英加就知道，杰克没有娶她的打算。“在同一个晚上，受控对象英加又向杰克透露了她对怀孕的担心。她埋怨杰克‘只是尽情地享受乐趣，就是不想负责任。’”从上周英加在华盛顿又一次同尼尔斯·布洛克做爱来看，她说这话有点儿虚伪。但是，毕竟杰克还是她最爱的男人，当她返回华盛顿的时候，又给杰克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感谢他的礼物——两盏新的夜行灯：

我喜欢这些漂亮的小玩意儿，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真正的优点，而是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我早已被它们迷住了，并决心绝不抛弃它们。当某一天，我要逃避的时候，也可能是不得已而撤退。因为日本人的迫近会让我窒息，那时我要把它们放在背包里，紧紧地背在我的背上。问一

肯尼迪传

问何以如此？当然，并不是因为南方的奴隶被主人鞭笞着，强迫带着耻辱和满身的伤痛顺从地举着灯照亮美人从舞会返回的路。而是，我亲爱的，因为送我灯的人。总统馈赠的貂皮外衣不会让我感到温暖，而我的水手的一束紫罗兰却使我为之神魂颠倒。

很多时间，当我们一起坐在你的车里，当感受到你在高尔夫球场上勃勃的青春，或体会到你身上所散发的一丝温柔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想说“亲爱的，我是忠贞不二的，纯洁，激情荡漾，心思重重……”但是，它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当然更有点傻气。每次你都能让我学到一些新东西。正如我昨天所说，我非常了解你，而且我一如既往地爱你。你知道，杰克，这是一种奉承，因为任何像你一样聪慧睿智、同爱尔兰人一样精明强干的人，都不可能是一只简单白色的鸽子。但是，天哪，你强壮的手让我痴迷，我情不自禁地想垄断握着你的手的权利，而且望着那双坚毅而又闪亮的眼睛，也是一种享受。你会如愿攀上顶峰的。正如克莱尔所推崇的那样，“你具备了成功的一切。”她无疑是对的，她如此快就发现了这一点让我欣喜若狂。甚至你所具有的素质超过了你的祖辈，但是爱尔兰土豆的硬皮还是深深地烙在你的骨子里。

给堵塞的欲望点上一根火柴，你会像野火一样熊熊燃烧。它将以西部大牧场为大后院，亦步亦趋地通向白宫。如果你能找到你的信仰，那么，我亲爱的，海洋里最大的鱼正悄悄向你靠拢。你可以把它弄上船，但不要太迫不急待，还有时间。

肯尼迪传

英加也清楚，由于自己经历独特而充满神秘，她无法与杰克相伴一生。她对阿瑟·克罗克充满怀疑，“据我所知，他是你父亲的一个代言人，姬克告诉我，他喜欢在华盛顿举行的各种宴会上搬弄口舌，不绝口地谈论我，可能还有你。”英加提醒杰克。

杰克在查尔斯顿期间，对于有关他与英加的风流艳事在首都引起的轩然大波很宽容地放任自流。因此，当勒姆·比林斯写信告诉他，同他母亲的“一个朋友进行了一次充满兴趣的谈话”时，使他措手不及。“她对你母亲说，她听说我是你家的一个好朋友——你母亲没有否认。洛德夫人说，那你一定对使华盛顿各界颇为震惊的风流艳事——肯尼迪家族的一个男孩正在无可救药地与一个让他为之倾倒的丹麦女记者纠缠不休。但是，幸运的是，那位姑娘结过几次婚，所以她要想嫁给那个男孩是困难重重。”

比林斯的信和一个更坏的消息一块儿击向杰克。联邦调查局的一个职员打电话告诉约瑟夫·肯尼迪，这位执拗的老头子也没有逃脱联邦调查局的视野，并提醒他，英加的住所被安装了窃听器，她在房子里的谈话以及电话都被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事无巨细地录了音。

杰克再次和他的父亲沟通后，终于痛下决心终止这段充满争议的恋情。虽然英加已发了电报来，说她在2月28日这个周末没有空闲，只能等到下个周末到查尔斯顿来，杰克觉得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他申请到特许，离开了查尔斯顿地区。2月28日下午，他飞往华盛顿，与英加度过了最后一个缠绵之夜。第二天他便匆匆起程返回。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得到消息，知道英加现在发现了他们

肯尼迪传

装的窃听器，并及早地把窃听器拿走了。因此，“杰克在她的住所逗留期间，”他们对“窃听英加与肯尼迪的谈话感到无能为力了”。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特工们茫然不知。但是，当英加第二天打电话给她在纽约的丈夫时，显然杰克这次急速地到访的主要目的就不言自明了。据联邦调查局的电话窃听人员汇报，她对丈夫说，“她结束了与杰克·肯尼迪的充满非议的交往。”

托比·麦克唐纳从波士顿来信通报说，作为一名少尉军官，他在那儿的战争物资检查长办公室谋得一份固定的工作。他询问杰克：“与那位艳光四射的据说是搞间谍工作的斯堪的那维亚情人的风流韵事还有什么新闻？”

事情当然没有什么进展。事实上，在华盛顿引起轩然大波的那件特大风花雪月之艳事已经随风而逝了。

我心已死

那么，一切都结束了吗？英加并没有方寸大乱，她很快就赴纽约见她的丹麦男友。但是小她4岁而忍受背痛煎熬的杰克却再也无法忍受他们分离的痛苦。毫无疑问，他已被英加迷得神魂颠倒，欲罢不能。“接到我的电话你是不是很惊讶？”杰克在1942年3月6日给她打电话时试探着问道。

“有点儿。”英加模棱两可地回答。

“早该如此啦。”杰克不无怨言。

“凯思琳每天都安慰我，说你迟早会给我打电话的。”英加不无温柔地责备，使杰克感到心里暖洋洋的。

“我的背痛又复发了，一直卧床不起。”杰克道歉说，并询

问她是否已经决定到内华达州的里诺去办理离婚事宜。

接下来的谈话就显得有些沉重了，因为英加的住所遭窃，700 美元的旅行支票，2 只钻戒和 1 个金手镯不翼而飞。那天，她还把俩人分手前她预定的飞往查尔斯顿的机票退掉了。

“你为什么不来？”杰克显得有些急。

“是吗？你难道忘记了我们星期天谈过的事？”

“我没有忘记。”

“噢，你不认为必须遵守我们的协定吗？”

“人生苦短。”

“噢，杰克！”英加忠告道，“你不准备遵守协定，是吗？”

“怎么会呢？”杰克回答说，“我不会放弃我们的保证的，直到下次见面。我有点不可理喻，是吗？”

英加作为一名女性，而且母爱的因子深深地烙在心间，所以被杰克的软弱所感动：“我认为你是完美无瑕的，亲爱的。我们还会有见面的机会的。”

“你是说，下周末？”

“不，我不知道。我不想那么傻。我只是想帮助你摆脱痛苦。你知道的，难道不是吗？”

“是的。”杰克无可奈何地承认。

他询问英加周末的打算。她如实相告。“你是不是以为我会赶去查尔斯顿？”她揶揄地补充了一句。

“我一直这样期待着。”

接着他们讨论起离婚事宜。英加称，她不会半途而废，而且她的工作日程已提前两个星期，“弗朗西斯爵士”也很理解我的决定，她打算继续下去。

“到内华达去没有什么惹你烦心的吗？”杰克问。

肯尼迪传

她担心包围着她和阿克塞尔·温纳—格伦的一些流言蜚语。当杰克把所有这些流言蜚语斥之为“信口雌黄”，置之不理，并谈到“所有这些都是有人信口开河”时，英加却不以为然，认为是“吓唬你的。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个人认为它源于棕榈滩”——换句话说，来自杰克的父亲。

杰克再也无法装胡涂了，不得不向英加承认“星期日晚上我与他通过电话，他与我谈过此事。他说他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警告。他说他刚与某某谈过，他认为事情并不妥当。我觉得难以置信。他说他只是将他所听到的东西告诉我而已。”

“你父亲说的是什么？”英加追问道。

“我推测，由于某些原因，事情有些难以预料。你不幸和某些事情掺和到一起了。”

“我不知道他所指的是什么？”

“那可能是我，”杰克不失风度地回答说，“但是我也一头雾水。显然你那里也出了什么事。你并不拒绝与我来往，是吧？”

“我答应你。”

“我也不清楚。很可能是你对某某所透露的事情，”杰克说，这种事情“可能会成为大家的谈资。”

“但是除了你和我，还有什么可谈的呢？他们能插手的事，难道就没有什么非法的吗。谈恋爱有什么错？”

“可是，也许由于你特殊的经历吧。这点不言自明，”杰克主动说，想起英加与希特勒、格林和戈培尔的交往，以及她丈夫在秘鲁为温纳—格林效力。

但是离婚就能是一剂良药吗？杰克地直觉告诉他，英加仅仅是为了杜绝与温纳—格林和她丈夫的关系而采取离婚是不够

理智的。她丈夫“能处理这事……我认为在这件事上你的判断总的来讲有些偏颇。”他评论道。

“愿闻高见。”

“我说不清楚。是否离婚完全取决于你。无论如何，我都不想在这方面给你增加负担。”

“那太孩子气了。但我一定会离婚。”英加不为所动，“我们承诺不再相互见面了，不是吗？所以，这与你毫无干系。”

杰克不相信事情会这样。“你认为那样做是明智的吗？”他问，激得英加一串言辞激烈的反驳：

“不，那的确不是周全之举，但那也不是肯尼迪少尉想干的事。”她情绪冲动地反唇相讥，“我只是在做我想做的事……而是否丢饭碗不在考虑之列。”

与此同时，英加通告杰克，她想去拜见胡佛，以便使有关她的流言蜚语有所遏制。

“你准备怎么说呢？”杰克问。

“我会说‘喂，听着，胡佛先生，我不喜欢我的私生活暴露于众！’你知道特工们总是在窃听我的电话。”英加抱怨说——与此同时，每个字都被特工们录了下来。

“你从何得知的？”

“电话老是断，难道你没有注意到……”

“如果特工们正在监听我们说话，他们一定会觉得很沮丧。他们这个星期肯定劳而无功了。”杰克揶揄地说。

“如果他们非要听我们的谈话，那么，也无所谓，”英加同意说，“我准备让他知道，我自己希望知道一些内幕，因为我一直被蒙在鼓里，只是从大家的嘴里听到一大堆流言蜚语，毕竟我是这出戏里的女主角。”

肯尼迪传

杰克认为胡佛会矢口否认命令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进行电话监听。

“这还有什么疑问呢？”英加孩子气地问，“我要告诉他们这么干毁了我的前程——这样说如何？”

肯尼迪还是疑虑重重。

“你是不是怀疑我准备对你要先斩后奏——设圈套套住你？”英加反问。

“你说对了！”

“杰克！”

“不要动肝火啊，我只是在逗你玩。”杰克顽皮地说。

“你应该知道我是如何考虑使你顾虑重重的事的。”

“当然，”杰克微微顿了一下，“但是我猜你不知道你的工作。你要知道，帕特森夫人可能会在某个清晨醒悟过来，并决定取消那个专栏。那就意味着你要失去工作，其他没什么事可以威胁你了。”

但是主意已定的英加仍不为所动。

“我只是想确定一下这是不是你想做的事，”杰克试探着说，企图理清一下他自己心中的思绪，“依你所说，我同你离婚的事毫无干系？”

“你清除了我脚下的最后一块障碍，”英加冷静地说，“但是，并没有让你承担任何责任。两个半月前与你的见面让我打定主意。但对我来说，你已是过往云烟了，”她撒谎说，“那正是我一个小时前的感受。我现在还是矢志不移、一如既往地爱你。但是，无论如何，你在我的计划之外。”

事情就搁在那儿了。尽管杰克以背痛为理由央求英加“这个周末过来”，英加理智地拒绝了。她在一封可能是最后的情

书中完成了告别演说：

真想打点行囊，立即起程去看你。并不是因为我对你违心地向我求爱而说些冠冕堂皇的话痴迷不已。只是因为你病的时候，我不想让你觉得孤立无助。亲爱的，你明白，当你完全感觉良好时，任何人都想在你身边。但是现在，一切都面目全非了。如果我认为真的能有所帮助，并能为你效力的话，一切犹豫都会不复存在，星期六我会去看你的。但是，亲爱的，谁会想到有这样一个‘但是’：可能最明智的是呆在华盛顿。有一件事我不愿意做，那就是让你受到伤害。你百分之百属于肯尼迪家族，而我也不愿意因为我的缘故而使你们父子产生矛盾。我以前有很多幼稚地假设，如果我是个 18 岁的小姑娘，为了拥有你和独享你，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像一只为了孩子的母老虎一样殊死搏斗。如今，我吃一堑，长一智。我也得承认自打那个晦涩的星期天以来，我心已死。

我总觉得一个人的胸怀像是个鸟笼，里面圈着一只小鸟。有的鸟在在欢娱地歌唱，有的鸟凄凄地哀鸣，而有的鸟则充满嫉妒，让人恶心。我的鸟总是在欢乐地歌唱，特别是在今冬这几个月里。实际上，它太高兴了，唱得声音太大了，以至于我听不到其他敏感的小东西所预示的道理。在小鸟停止欢乐之前，一切都开始变化了，它给我带来了联邦调查局、海军、让人不可理喻的谣言、嫉妒、恨和老乔。起初，我只是有些惊讶，亲爱的，后来我才慢慢地醒悟了。而让我难以置信的是你竟是一具活着的僵尸！

.....

肯尼迪传

我曾经承诺：“只要你需要，亲爱的，给我打电话。”这话没有失效。请相信那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顺水人情。如果它听起来不太热烈、不那么孩子气的话，我要说那的确是用心血铸出来的。如果我能抚慰你的痛苦，不管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来找我，或者我去你那儿。那可无关自尊心的事。那不是“我无法到你那儿去，但是，如果你可以到我这儿来，我将喜极而泣。”自尊心的确不可少，但过多的自尊心会毁坏自己和其他人的正常生活。请不要让膨胀的自尊心有损已经开始的友谊。我不希望我太容易得到而使你无视这种友谊。如果你正在享受生活中美丽的事情——我不是指我自己——那么，就坦率地说出来，放任地让那只小鸟歌唱。它需要得很少：一句温馨的话，一个善意的笑容，一次轻柔的抚摸。这正是事情的真谛所在，此时一些理想主义者会说，“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不必付出什么代价。”很快我们会感受到所有这些的，因为人生是晦涩的，对于那些充满幻想与希望、有真正所爱的人来说，更是如此；特别是那些深察人性的人。

英加接着就前往里诺办理离婚事宜去了，而杰克则真正开始试图习惯没有英加的日子。

光荣的战火

远在一边的托比还不知道杰克与英加的事已经成为过去。3月9日他还从波士顿写信问“你和丹麦情人的近况如何，因为你的生活中这个阶段充满了迷和诱人的东西——而非常有

趣、非常巧合的是我们的境遇惊人地相同”。他坚持说。

托比解脱失恋带来的痛苦的钥匙是，他们应该一起到海上去散散心。他建议道：“让我做你的侍从或打理你的膳食，我们可以从一些棕色皮肤的姑娘那里来找点乐子。”

作为常去“巴厘屋”的一个老资格，我希望在巴厘呆几天会使我们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说实话，我失望地发现我们正在无可挽回地加入中年人的行列，而我们显得暮气沉沉有什么道理呢？让我们抛弃那讨厌的被认为是老年人的工作——既然我认识到这场战争决不是什么“大冒险”，或是哈佛与耶鲁之间的一场较量，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能再过平淡无奇的年代里的那种寡淡无味的生活了——如果我们不找点麻烦，我们将后悔终身。

我想，如果我们曾经有过一些波士顿至纽约的旅行，长岛的马路，以及从巴黎到戛纳，辉格党人明争暗斗等，德国人、日本佬就摸不透我们的动机所在，因为我们会获得比以往更多的朋友——至少这些人会站在同一边；另外，那里的食品比查尔斯顿军官俱乐部的不知好多少倍，或波士顿公园广场的汤普林矿泉休养胜地的东西都会让我们流连忘返，还将有好多好多爽朗的笑声。让我们到海上去尽情地表演吧。

托比并不寂寞。杰克所有的朋友一个个无一例外地从海恩尼斯走向销烟弥漫的战场。乔治·米德在海军陆战队，不久就要奔赴海外去执行任务。查克·斯波尔丁是一名海军战斗机飞

肯尼迪传

行员，他正在进行训练。甚至小乔作为一名巡逻机飞行员在杰克逊维尔的训练也即将结束。

杰克摆出一种毫不在乎的样子，给他的哈佛同学吉米·鲁斯马尼埃写信，此人当时正在乔治·S·巴顿将军的麾下进行训练。他写道：“如果让我为那种让人乏味的打发战争时光的地方列个顺序的话，首当其冲的是呆在一辆晃晃悠悠、嘎嘎乱响、噪声震耳的坦克里面，你坐在我的上面，脚踢着我，冲着我的耳朵声嘶力竭地大声叫喊，提醒我应该朝哪个方向开。”

然而，查尔斯顿出奇地平静。早些时候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听到英加告诉凯思琳，她打算“请杰克为报纸撰写一些书评，这样他可以在华盛顿不至于被忘记，因为查尔斯顿和诺福克的死气沉沉让人窒息”。但是他们之间的风流韵事被迫结束，杰克决定不再发表什么东西了。“昨天英加看起来很伤感，”凯思琳写信给少尉说，“她说她不会再去见你了。我真不明白你们在搞什么，我当然急切地想知道内情。”

没有了爱情的滋润和期盼后，杰克将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在办公室里写长信，然后由他非常漂亮的秘书打印出来，常常分发给完全陌生或不太熟悉的人。比如，在写给出生在美国的英国下院第一位女议员阿斯特子爵夫人的一封长信中，他开始义正辞严，态度明确地攻击美国的孤立主义，这是发生在盟军在爪哇的 10 万人的部队向敌缴械前 5 天，美军驻巴丹的军队投降前 4 周：

我想像你对贵国正在对继续这场战争的态度不会不闻不问。在业已过去的 10 年里，我们对贵国的错误揭批很多。与大多数热衷于此的批评家一样，对我们的批评使我

们也感到应接不暇，但毫无结果。我们越是细致地研究这些批评，就越是兴致盎然，以至于使我们下定决心认真地用一种地道的美国式，我想，更准确地来说，是一种美国式的精装本来备份一份。这一过程可没有期限，因为贵国不断地想出新东西的速度和我们欣赏她的旧版本几乎一样迅速。我认为，我们的供应过不了几天肯定会得到值得信赖的保证。

我想你们一定对我们何时才认识到宣战仅仅是个序幕，战争只有通过惨烈的战斗才能取得胜利感到困惑不解。我们自己也想知道答案——美国人的一大特色是尽一切办法想弄明白我们为什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球踢来踢去，从劳工到商人，农场主，公众，政府概莫能外。就这样踢皮球，而且他们各有各的道理。

当然，最大的难题是孤立主义还没有走向坟墓。人们预计 12 月 7 日它会有一个悲壮的死亡表演，但是它还在苟延残喘。它正在为了第二轮而且是重要的一轮进行恢复，而来自远东的灾难性的消息更助长了它的气焰。

作为一个曾为虔诚的“孤立主义者”，我反感所谓新孤立主义。这种新孤立主义是在惊惧与挫折的土壤上得到营养，我发现它同战前时代的孤立主义者的政策截然不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我们现在就脱身，这将使我们惨遭入侵。我们将回到我们毫无安全感的堡垒，等待着那必然的瓦解和接踵而至的入侵日子。我怀疑新孤立主义运动能否成功。我认为，你对阻止正在进行的战局无能为力。但是，值得警惕的是，孤立主义者正在进行的这一延缓行动，正在一步步诱使我们为战争付出惨痛的代价。

肯尼迪传

实际上，我们面临的大的威胁不仅仅来自于这些孤立主义者，还有对这场战争的意义缺少正确的理解。我想，美国政策的一个可悲现实是，如果随便拉出一个美国人，仔细研究一番，你定会得出他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当然不是指在政治上，而是指在他根深蒂固的思想深层。他被动接受人们推销的这种战争观念，而且销售工作还正在进行。他仍然抱有些孤立的学究式的立场敝帚自珍，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为了《大西洋宪章》中模棱两可的原则和所谓《四项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只要还是那种观念，那种借口，我们将继续少花血汗，多掏钱，确信这样的胜利还是“恰如其分”的。我不希望长久以来在这个国度里胜利的标准一直就是钱，一直以来，我们受到这样的民间传说的熏染：有钱能使鬼推磨——当然买到胜利也是理所当然。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它买不到胜利，到那时，我们可能才会明白我们参战的原因，不是在为胜利而战，而是为我们生存而战，虽说与胜利关系不大，但它的确至关重要，而且最最要紧的不只是平等的可以承受的代价，每周 40 小时的工作时间，以及成本加合同，而是美国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们也许才能认识到打这场战争是件非常不愉快的，然而却是不可避免而又必须的事。

杰克力不从心而且无聊透顶，却如此地见解非凡，这对他来讲是更为烦心而沮丧的事情。盟军无力抵挡德国或日本的战车令他心灰意懒。总统似乎只愿意派一些象征性的军人到战场上去激荡，那些部队充其量“仅仅是对丘吉尔的支援”。与此同时，陆军部似乎对让目前正在巴丹备战的麦克阿瑟将军回国

一事持反对态度，目的是为了 avoid 刺激华盛顿的军事官僚。“他似乎想把他的结局安排得堂皇一些，尽管他也惨遭失败。”杰克不留情面地评论道。

他给凯思琳写信时，情绪更消沉。德文希尔公爵的儿子和继承人哈廷顿勋爵仍然痴爱着凯思琳，但是杰克现在却不同意这桩婚事，正像她曾做过的一样，尽管原因有些出入。

看到报纸后，我强烈地反对你到战火连天的英国，去嫁给什么英国人。因为我已经得出一个触目惊心的结论，大英帝国的死期到了。你应该明白所有的好事总得有个完。你可能不以为然，但是你想想，罗马帝国土崩瓦解之前的日子里，有谁相信它会被推翻？……法国也不例外。自 19 世纪 70 年代的色当政府开始执政以来，她就已经沦落为一个二流国家了，但是，直到 1940 年 5 月，拿破仑传统这一玫瑰色假象消失殆尽，就被裸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其弱点才一览无遗。英国也不特殊。新加坡只是个预兆，真实原因要追溯到张伯伦或丘吉尔之前。我甚至认为最根本的是要追溯到具体事件之外。是的，应该追溯到一种精神状态，那是有机物成长的一个初始阶段。当一个国家正在努力维持现状的时候，那它正在不可避免地接近老年，当它沦落到愿意牺牲部分现状以维持其余部分的境地时，那它就已经衰老不堪，正在走向死亡——这正是你打算去的英国前些时候所处的精神状态……

今天的这场战争，不允许人们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伟大的历史有丝毫的依恋，它们仅仅是妨碍前进的绊脚石，只能使敌人更容易击败我们。我们自己也到了这样危险的

肯尼迪传

阶段。当然，我们的处境不至于无可救药——我们有了老年人的思想，但是与英国不同，我们有一个年轻人的健壮的身体，所以我们还能脱离毁灭的危险……现在这些想法的确让人难受，对不对？但对我的打字机来说是个难得的锻炼，它们可能还跟不上需要。但是我不敢断定它们没有提高的可能。

凯思琳在华盛顿若有所思地看着杰克那只让人沮丧的预测，她同时为约瑟夫·P·肯尼迪潜伏的情绪而大吃一惊。“收到你的来信我很高兴，正如你所说的，它显得相当悲观沮丧。但是，我们的年纪不允许有悲观的权利，”她对杰克说，“年轻人终究会有一个更好的机会来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是必须机智勇敢，要努力上进。特别是你，杰克。你应该看看欧洲的变化和它的觉悟，看看它出了什么问题。我认为没必要告诉你更多的东西；每个人要有自己的思维，要靠上帝供应精神和爱，而不是他人。”

与此同时，杰克的父亲仍然不放弃他自己可怕的观念，他用电话和信件向杰克供应灾难可能来临的进一步预测，向杰克发去他所搜集到的每一份反丘吉尔、反罗斯福以及反霍普金斯的剪报、秘闻或报道。例如，他给杰克写信说最近有一位英国朋友“本周顺道来拜会我，他的看法很确定，英国的恶劣的经济状况将会迫使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而且时间不会很远。他相信，食品匮乏、物价上涨以及战况不佳等将最终把他们逼上死地”。

然而，英国的情况并非无可救药，而老肯尼迪失败主义的言论充其量只能使他在美国更加孤立，令他的孩子们的生活更

为烦恼。比如，3月2日他写信给凯思琳，抱怨说：“同意你的观点，时髦的观念往往被当做真理而被顶礼膜拜。”然而，他恼羞成怒地警告说，“大多数人只是偶尔碰巧得到一点儿真实的消息……所以不要乞求依靠别人的看法。说不客气点儿，这是懒汉的作为……在某些情况下则更会酿成大祸。”

凯思琳不以为然，绝不放弃她的信念，坚信英国终将胜利。另外，尽管她把她老头子作为父亲来尊敬，但是其他人则让她常常为他自以为是而臭名昭著使她感到恼火。她从华盛顿向整个家庭通报说：

就在几天前，发生一件令人喷饭的事，一位听起来相当有教养的先生打电话来，打算给沃尔德罗普先生的一个专栏出谋划策……我例行公事地问他的姓名。他说那不重要——只是一个古老的爱尔兰名字。我说：“告诉我，因为我同你一样也有一个古老的爱尔兰名字。”

他问：“是什么？”

“肯尼迪。”我说。

他继续说：“我所认识的每一位肯尼迪都很可爱，只有乔·肯尼迪是个例外。”

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为什么，据说他是个相当不错的政治家？”

那个声音里带有一种尖刻地嘲讽意味，回答说：“是吗？我认识他，我们是大学同学。”

这就是他不愿透露姓名的原因。当我将此事告诉沃尔德罗普先生的时候，他微笑着说：“他想告诉你不要那么好奇。”

肯尼迪传

而此时的杰克，他正在尽力协助他四面楚歌的父亲。正如他曾写信努力说服父亲相信《租借法案》在使英国独立自主方面有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一样，现在他努力说服他父亲像他那样改变立场，放弃以前的孤立主义。“根据最近的种种迹象——包括‘华盛顿克莱夫登邦’的文章以及《每日新闻》和《时代先驱报》的社论、总统的演讲等，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之间的明争暗斗已跨入第二个阶段，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他在2月25日分析道，努力使他的父亲发现“战争的新阶段”与以往有着明显的差别。既然我们已拥有自己的人造橡胶工厂，而这些工厂现在像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那么这个国家有些人就困惑不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守住菲律宾，或者更直接地讲，为什么非得死守爪哇不可？除了这一疑问以外，他强调，总统的根据是，“当战局陷入困境时，没人想临阵退缩。我们战斗是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民主与自由，而高唱《四项自由》和《大西洋宪章》对于这点却无能为力……当血泪横流，丧钟开始敲响时，我们将迎来真正的严峻考验。我相信总统会处理好的，而且他必须处理好，否则他将一蹶不振。”

在杰克的殷殷鼓励下，前大使终于在3月4日写信给罗斯福，想在政府里谋求一官半职。“我不想在别人眼里是个为了谋得官职而四处打点的人，”肯尼迪不无歉意地说，“可小乔和杰克都在服役，我想在这国家紧急时期，凭我的一些经验还能在某些职位上为祖国出谋划策。”与此相呼应，阿瑟·克罗克也特意请了一家报纸为前大使杀回政坛摇旗助威。总统也挥动着一只胡萝卜。老头子于1942年3月12日兴冲冲地飞到首都。

“爸爸昨天下午到达。”凯思琳向杰克通报说，“他对这项

工作犹豫不决。”

无论如何，当总统有意为他在政府安排职位的消息一传开来，白宫就成了信的海洋，由此可以看出肯尼迪继续在全国蒙受耻辱的尴尬境地。因此，总统安排了一个很低下的职位——解决造船工业瓶颈问题的空头顾问。在同各位老同事如詹姆斯·兰迪斯商量后，左右为难的肯尼迪还是拒绝了。

这一消息对于杰克来说，是个巨大冲击。他可怜的父亲再次采纳了他的建议，但却由于时机不当，再次落空。事实上，国会和罗斯福的政府班子里不乏以前的绥靖分子和孤立主义者，只是他们在“珍珠港”事件那天夜里就果断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重新聚合在国家统一的旗帜下。如果老头子再次入阁，即使地位不高，在这场漫漫而惨烈的战争中，他也会逐渐赢得罗斯福和公众的信任。然而，肯尼迪是一个何等固执的人，正像他在1940年辞职后要挟总统一样，这次他又故伎重施，坚持要好一点的职位。结果，他除了失败一无所得。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恢复家族的荣耀只好寄托在小乔和杰克的身上了。

质朴的真情

杰克一边劝他父亲要振作起来，面对战争的新现实；一边给自己打气，下决心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他阅读了所有已经面世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书和社论，如果他有异议，立即去信同作者或编辑争辩不休。利德尔·哈特在读过他的《英国为何沉睡》一书后写来的长信，至今仍然使他感激涕零。英国从挪威到新加坡多米诺骨牌式的失败，证实了哈特的看法。一份报

肯尼迪传

纸撰文指责哈特，认为他荒谬的有限的战争理论是“一种可耻的思想混淆，民主国家甚至至今深陷其中”。对此，杰克立即予以针锋相对地回击，他说，混淆就在这位误导的作者的脑子里，而不是在利德尔或美国的民主党人那里。利德尔并没有像报纸所报道的那样说“防御是最好的进攻”。他的意思是，民主国家在与独裁者的对比中，军事上处于不利地位，因而必须因时制宜调整战略。正如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的策略一样，民主国家最初只得选择防御，以便赢得时间组建和训练军队，尔后再反击。杰克指出，哈特也并没有规定可确保防御安全的绝对人数，他只是约略地暗示，我与敌在武器方面的力量对比至少也要达到 3:1 的水平。盟国目前还没有达到，更无从部署。对于“如果按照哈特和其他人的话去做，法国和英国的兵力会比现在还要少，但他们的军队都会实现高度机械化和装甲化，抵抗德军向法国的任何侵略游刃有余”，杰克争辩道，“战前，英国的主要失策之处是对有限战争理论没有理解和认可，而且还把它误解为对国防进行有限的投入，却不建立一支有限的精明强干的打击力量。英国人吝啬钱、自上而下的骄傲浮躁和保守的惰性，使他们没有能够正确地理解和采纳哈特的观念，从而酿就后来的苦酒。”

与此同时，那些谴责慕尼黑而不寻根究源的人也没有逃脱这位来自查尔斯顿的野心家滔滔不绝的指责。3月10日，杰克写信给《经济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循环》的作者说，在他的眼里，希特勒只是趁着德国国内经济衰败而获得成功的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杰克看到：“使德国稳健派人士垮台的是由于他们当年未能合理解决共同裁军问题而种下的祸根。”这又呼应了他在哈佛大学关于《国际联盟》的评论和他的优等生毕业论文

里所津津乐道的观点。“希特勒正是利用盟国没有遵守《全面裁军》的条款”而获得了发动战争所需要的军火，“尽管后来有人断然否认这一点，但是，很清楚，白纸黑字将盟国的承诺展露无遗，而在20年代德国政策的主要成就就是迫使盟国履行承诺。”当英国觉察到这一点时，一切都无可挽回了。1932年的裁军会议是个历史性的错误，“它的确埋葬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我想，有一种说法说，人们认为过去10年外交上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满洲、莱茵省、西班牙，或是慕尼黑，而在于西方民主国家的一系列不明智的承诺和行为，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1932年春天，当时德国稳健派总理布鲁宁，客气地请求与英、法等国进行谈判，以获得原则上承认的平等；同时向法国承诺了充分的安全保证，以保持英法等国明显的优势地位。”假如法国当时接受这一折中方案，“稳健派在德国国内的势力就会受到鼓舞，而布鲁宁如果取得这一重大成就，就会改变德国在全世界的声誉和提高他的政府在国内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他就有了足够充足的政治弹药来扼杀正在地球上燃起的纳粹邪火。”

从杰克的角度来看，法国的不明智扼杀了这位稳健的德国总理的政治生命。“现在一切都为时已晚了。布鲁宁由于未成功，立即被赶下了台，冯巴本和施莱谢尔接替了他掌管德国。此后，德国的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社会日趋混乱。纳粹主义日益嚣张。德国人在无法通过谈判取得平等地位后，选择通过剑来取得优势地位。结果，因选举失利，和平的机会无可挽回地成为泡影。布鲁宁逃到哈佛教书，而希特勒主宰了欧洲。”

杰克补充说：

肯尼迪传

我决不是为绥靖主义鸣怨叫屈，我们自己的经历和英国的经验已经雄辩地证明那是一个愚蠢的错误。但是，我想指出的是，绥靖主义的流行说法及其原因并不完全符合史实。在我们对其毫不留情地抨击时，最根本的事实却被忽略，慕尼黑协定和其他一些妥协与其说是英国外交谋求安全的失败，不如说是英国民主发展军备的的失败。张伯伦和其跟随者应当受到批判，并不仅仅因为绥靖政策本身，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错过了利用绥靖政策所争取到的时间来加强军备绝佳机会。其实我们自己也不例外，我们也对同样的起诉书没有理由不服，公诉人只需展示出大字标题，我们的罪过就铁板钉钉……我们把时间无谓地消耗在对这种征兆的猛烈抨击上——而且完全忽略了对原因的探索。如果我们没有犯罪，假定绥靖仅仅是一个自私的策略，这个策略是由一群托利党人为了苟延残喘而起草的，那么我们重整军备的计划完全有可能会提前一年半开始实施。

然而，针对历史与现实而口诛笔伐，对于一个年轻气盛的海军少尉来说，仍无法渲泄心中的愤闷。他逐渐渴望奔赴战场。他已经圆满完成了有关海军条令和航行经验方面的规定的函授课程，并且正在竭尽全力通过背部练习课来提高身体的健康状况。3月11日，他给比林斯写信说，他“业已完成了‘阿特拉斯’课程，毫无疑问，我已经踏上健康、强壮和个人能力之路，不管个人能力是何所指。我认为，时间终将会证明，我将是强壮的，健美的，而且魅力四射。练习是非常愉快的，也是最有效的。第四课第一练习时我就成功地把背挺起了

来”。

“一切顺利，但缺乏真实的消息。我没有再见到英加，我知道她到里诺去了。如果你访问德国期间我走进教堂，那就太离奇了。”他固执地要比林斯“承认在查尔斯顿期间欠了我的钱……飞机票 28 美元，4 美元左右的饭钱。你已给我 20 美元，还有 12 美元。我知道旅途中你会为此事感到忧心的，所以我在送给你的礼物中扣除了，因为我不想等 15 年。我现在不能离开钱，所以把它扣除了”。他又补充说，对“以前未就此事向你说明表示歉意”，“4 时 30 分了，我的上帝，你别抱希望我在自己的时间里写信。”

然而，实际上，事情并不顺利。他仍无法忘记英加，1942 年 3 月下旬，背部的疾病日甚一日，胃痉挛使他倍受煎熬。所以他获得了 10 天无薪假去罗切斯特和波士顿找他的专家医生以求解除痛苦。

由于是自费，所以他先选择回棕榈滩，与家人共度了个周末，会晤了斯坦福大学时代的老同学亨利·詹姆斯。是他邀请亨利来访的。亨利从肯尼迪家给弗利普·普赖斯发出一封表示相思之情的明信片，说他“孤寂，向往斯坦福农场。杰克向你问好。他穿上海军军服帅极了，无可比拟”。

然而，杰克的海军军服却让杰克和詹姆斯饱尝了来自老肯尼迪的一顿臭骂，全家人呆在座位上战战兢兢，“显然被吓坏了”，詹姆斯事后心有余悸地回忆道。

“我不喜欢杰克的父亲，”詹姆斯评价道，“因为我们吃饭迟到，他就生气，‘杰克，请看在上帝的份上！按时来吃饭！如果你连起码的时间观念都没有，还能指望在你的一生中成就什么大事呢？！’杰克说，‘对不起，爸爸’——甚至他还责备

肯尼迪传

我，真讨厌！”

亨利对他的家人服从这样一个暴躁的老头感到迷惑不解。但是杰克和他的兄弟姐妹早已习以为常，这种吃饭时间的规矩向来如此，因为他们知道老头子正在为某些事情心里郁闷，其郁闷的程度要深于他责骂他们所犯的“重罪”。毋庸置疑，阿瑟·克罗克也注意到，孩子们都明白他受到总统的忽视和拒绝，他们为父亲感到难过。

杰克深知这一点。他对父亲的训斥俯首贴耳，隐藏的不仅是对一个发火的人的害怕，同时还有对失落的父亲的同情。正如后来对待狂热的麦卡锡一样，杰克不忍心让自己与一位失势的朋友或亲戚翻脸。因此，亲身体会到父亲受到总统的公开羞辱，他心如刀割。在写给阿斯特子爵的信的末端，他说，“我怕你会认为沮丧可以遗传。”而杰克个人体会到，在性格上他与父亲截然不同。然而，他父亲越是被羞辱，不知怎么地，杰克就越觉得有义务为失去宠幸而雪耻。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也曾距首相这顶桂冠近在咫尺的地方，与之失之交臂，并经受了他个人不幸的煎熬：梅毒。那种背景使丘吉尔有了一种近似疯狂的成功欲望，他首先成功地加入武装部队，然后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政治家。

杰克也期待着为父亲洗刷耻辱。多年来，他一直热衷于探讨研究绥靖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发生与发展。在“珍珠港”事件后很长时间里，他仍然继续这样做显得有些多此一举。他决心要以驾驶海上巡逻机的哥哥为榜样，不辜负父亲的希望。

父亲似乎不明白杰克的良苦用心。看到面黄肌瘦、疾病缠身的二儿子仍然痴心到海上服役，不知怎么地，他实在是不太好受——这是他在棕榈滩大发雷霆的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机智

狡诈、冷酷无情、富有而痴迷于权力的约瑟夫·肯尼迪竟然看不透其中所隐藏的一个质朴的亲情：杰克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所热爱的父亲。

跛脚鸭

“詹姆斯，你知道吗？华盛顿有个迷人的姑娘，”杰克在棕榈滩向詹姆斯透露说，“是姬克介绍我们相识的。我担心她会带来麻烦。她肯定与欧洲的法西斯，尤其是德国有着说不清的联系。但是不能说她是个间谍，她会干那种事？我无法相信，因为她不但艳丽逼人，而且魅力四射，体贴周到，尤其是有一身让人神魂颠倒的床上功夫。但是，你可能听说过，真可恶，亨利，我发现那个该死的胡佛在她床垫下面安了个窃听器！”

亨利吓坏了。“杰克！”他记得他当时忧心重重，“这可不是等闲之事！你要蹲大狱的！你会因为叛国被关起来的！我想说的是，她似乎是个应该被敬而远之的人！杰克，我奉劝你赶紧终止那种关系！”

“他只是盯着我看，”詹姆斯回忆道，“不置可否——既没说‘是’，也没说‘不’。”

杰克接着从棕榈滩起程飞往位于明尼苏达州的梅奥诊所，再从那儿转道飞到波士顿的莱希诊所，去找乔丹医生。两家诊所诊断的结果表明，如果杰克决心到海上服役，他得先接受一次脊椎手术。

“我亲爱的孩子们：自从我终止定期给你们写信的义务以来，我真有些无话可说的困惑，”罗丝·肯尼迪在佛罗里达写信给寄宿学校的孩子们，“自从我上次去信以来，杰克的病已有

肯尼迪传

一段时间。背痛复发使他在查尔斯顿倍受煎熬，所以他到这里来跟他父亲商谈。他的肚子也不争气，所以他找波士顿的莱希诊所的专家进行了会诊，显然，他得进行一段时间的疗养。”

比林斯曾对凯思琳说过，他心里一片慌乱。他写信给杰克说：“她说你的背痛复发。而且这一次你可能得做一次手术。”但这个时候，杰克已经结束飞行，返回查尔斯顿，“我希望这一切都是梦，因为这意味着你不得不离开海军一段时间——我体会过屁股上疼痛的滋味。我无法想像这次复发的原因——我希望不是‘阿特拉斯’健身练习超负荷了。你知道他不能承诺什么，除非他严格按照一张纯洁的作息时间表来进行训练，”他提醒杰克，原来他已注意到他自己最近不幸感染的传染性链球菌“像蚤子一样躁动不安，这你是再熟悉也不过了”。他这样结束了这封信，“告诉我这次背疼是否严重，或者是姬克式的谎话。”

不幸的是，比林斯美好的祝愿代替不了现实。海军保密局的普赖尔上校在填写鉴定报告时，破天荒地给了他一个 3.0，最高等级为 4.0，认为肯尼迪少尉“不骄不躁，质朴，尽管很富有，但从不清高。有进取心。热爱本职工作，干得很棒。”普赖尔接着补充道：“但是他下脊椎的令人讨厌的毛病使他经受着巨大的煎熬，不得不进行长期的外科治疗。”

1942 年 4 月 9 日杰克给比林斯写信，和盘托出他的最新计划：“我打算 10 天后离开这里，去做手术。如果你没有离开，为什么不过来一下——我想我得回家住几天，或者至少要到杰克逊维尔去看看哥哥。我们可以从那里驾车去华盛顿，因为我打算把我的车送给姬克。以后有事，我会详细告诉你。”同一天，他正式申请休假 6 个月，以便做手术，并休养一段时间。

他说，手术“准备在一家私立医院进行，由家庭医生主刀，这是在海军任职的一个必须条件。第六海军军区的医生同意实施手术”。

普赖尔上校建议批准这一申请。然而，海军军区的司令予以拒绝，至少是因为没有作深入的调查而没有同意。因此，杰克受命“到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海军医院报到，以便进一步测定身体状况。”

接下来一连串东奔西走的住院诊治过程让杰克焦头烂额。1942年4月13日，在查尔斯顿海军医院，据记载，“过去的6个月里，他的病情已经非常危险。最近他在莱希诊所和梅奥诊所进行过会诊。他们的看法是右髋关节剧变……结论：髋关节右侧慢性和周期性错位。”但是，海军医生对手术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并不认为手术是解决这类慢性易位的灵丹妙药。于是，经过在查尔斯顿海军医院长达一个月的化验、会诊以及生理和药物治疗后，杰克才终于获准到波士顿去，但是，是切尔西海军医院，而莱希诊所不在批准之列，尽管他是自己掏腰包。

杰克在1942年5月中旬启程，于18日住进切尔西医院。但是医生们还是对手术治疗各持己见。“他觉得自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由于渴望到海上服役，他才不得已到这里进行检查。”一位旁观的医生断定，疼痛不是I—V椎间盘破裂，而可能是由于腰肌损伤而引起髋关节受损，因此，导致他的大腿疼痛和异常的姿势。”切尔西的医生向华盛顿的海军军医局汇报说。

最终，手术计划还是被搁浅了，在此后一个月里又进行了一连串新的化验，X光透视以及生理上的治疗。

此时，英加从里诺写信打探“你过得如何，你的背还好

肯尼迪传

吗，你对普通生活有何感想。开始往往很难，但是你知道如何坚持理想，矢志不移地走正道。你绝不会不知所措，”她温情地祈祷着，“告诉我你何时起航，在哪里扬帆。如果你对西部的消息感兴趣，就捎个信来，我会尽量满足你的。你知道，如果你不幸病了，我愿意给你写信，只是得告诉我实情——仅此而已。”

“一切都过去了，”她结尾时写道，“真希望有一天我们再吃一次牛排、土豆泥、豌豆、胡萝卜和冰淇淋。那种日子再也不会重演了，”她哀怨地说道，“但是你前程似锦，别让人动摇你的决心。”

杰克对她的来信感激涕零，并于5月24日从切尔西医院打电话给英加。她写道，“昨晚有人震天响地敲我的门。门卫进来说‘是在找英加—宾加。是你结婚后的名字？’我有些诧异，去接电话，传来一个熟悉的很愉快的声音，‘你乐意接一个付费电话吗？’原来是肯尼迪从马萨诸塞州切尔西打来的。谢天谢地，从来没有人对我当头棒喝，即便有，与你的电话相比，份量还是轻了点儿。”

杰克拜托她来一封“长长的信”，英加没有拒绝，主要是考虑到杰克的生日快到了：

25岁，这样的年龄，肩膀上就觉得有些压力了。义务与使命刚刚开始。幸福与煎熬，希望与挫折，爱与恨将伴随你的人生之旅。我认为，你将有五彩斑斓的经历。你会用那只满载生活上的良方的金色高脚杯来豪饮。但是你的智慧太出类拔萃了，你知道什么时候，该啜一口，什么时候举杯畅饮。我希望你幸福，正如我以前预言的那样，

你的生活充满成功的喜悦。

现在你又躺在病床上。关于你的疾病，大使先生都告诉我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到你被困在床上无聊透顶，即使一天能够吃两次里茨牛排。

你的打算如何？我乐意听你说这个字眼，因为你总是有一揽子打算。你告诉我 99 个，但你真正想实现的那一个却深藏在你自己的内心深处。大概这是你的聪明之处，是正确的。我认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独立的生活空间，我们不能奢望互相挤占，即使我们是最亲密的朋友，甚至情人也不例外，这不足为奇。

振作点，你能否成为海军战斗英雄，对我而言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当敌人的子弹瞄向那个漂亮的胸脯或聪慧的脑袋时，请躲避一下。你实在棒极了——我想说的是太好了，不能有去无回或缺胳膊少腿。

英加的如意算盘是，等她 6 月 3 日与充满危险的丈夫分道扬镳，就能使间谍嫌疑不攻自破。不过，正如杰克曾担心的，她太天真了，离婚并没有使她摆脱胡佛的魔掌。阿克塞尔·温纳—格伦最近在巴哈马和南美频频活动，联邦调查局怀疑有一项秘密阴谋，可能要为德国人的一次入侵提供行动路线。一位情报人员声称“德国入侵南美的最佳选择一定会从攻击亚马逊开始，因为一旦在那里扎下脚跟，就无异于引狼入室，很难赶出去。”据称，为入侵提供的物资可以由远洋船只运进来，途经玻利维亚，沿内陆河流，横穿秘鲁和巴西，抵达哥伦比亚。他们甚至可以用直航的方法把战争物资运到巴拿马运河的附近，要比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军事基地更近。联邦调查局现

肯尼迪传

在深信费乔斯在秘鲁的考察是掩人耳目，他一定是个纳粹特工。胡佛在一份报告中告诫罗斯福总统：“他的妻子正在同他办理离婚手续，她以前曾是希特勒所喜欢的女人。目前她以英加·阿尔瓦德的名字负责《时代先驱报》的一个专栏。”

5月4日，总统批示：“鉴于华盛顿《时代先驱报》撰稿人英加·阿尔瓦德与温纳—格伦考察队领导人之间存在着让人怀疑的联系，再加上一些已引起我强烈关注的其他情况，我认为还是对她加强监视。”

杰克不幸言中，与费乔斯——后来得知他根本就与反美活动扯不上关系——分手并没有使英加摆脱胡佛恶毒的魔爪。她一返回到华盛顿，就被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昼夜跟踪，电话被监听，住所被搜查，邮件被截获。特工们甚至截听到她说“她非常厌恶联邦调查局所干的事，联邦调查局和海军如此对待肯尼迪真让她作呕。她把所有这一切都归咎于她在华盛顿的时运不济，并认为海军把杰克调到查尔斯顿去是因为她的问题，尽管他们从未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她说她不想责怪联邦调查局，因为她认为每个人都有嫌疑，何况还有许多人要求调查她呢。她说那太恐怖了，在鸡尾酒会等场合，似乎所有人都在瞪着她，想弄明白她到底是不是个间谍。”

然而，英加的哀叹不无遗憾地撞上了胡佛的铁石心肠。而此时在波士顿，经过一个月的会诊和医学上的论证，负责杰克的海军医生终于定下病症，杰克的确是由腰肌损伤而造成的背部疼痛，而不是椎间盘突出。1942年6月24日，杰克返回查尔斯顿工作岗位。比林斯从姬克那里获知这个消息，感到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错误，深感忧虑地说：“你决定推迟手术，而代之以加强锻炼。当然我对情况不甚了解，但是对我来说，那

可不是件好事。我认为，你仅仅是延缓了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你只能选择去手术。锻炼只是徒耗几年的时间——由于怕再次复发，你干事时会顾虑重重。”

然而，杰克还是坚信切尔西医院的医生所作的不太严重的结论。途经华盛顿时，他希望并央求得到一份海上职务，正如老肯尼迪告诉小乔的：“他对书案工作感到乏味之极，因为他认识的许多人都在奔赴战场，特别是你这个哥哥在舰队服役，他觉得他应该设法做点儿什么事情。我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我知道他的病是真正的绊脚石——只是我们应该找找我们能帮忙做些什么。”

没有了英加，查尔斯顿比以往郁闷。“所有海军都是一丘之貉，重要的不是在于你的学识，而在于你的背景。”4月份杰克给比林斯写信说。此时，他在海滩附近与其他军官合租了一套小房子。在他到海上服役的申请被审核的过程中，他在焦急地等待中混日子。

他母亲从棕榈滩发来毫无新意的短信，尽管愿望是最好的，但却显得僵硬，这只能使寂寞的少尉更生气。“感谢您关于‘9个小肯尼迪和他们的成长’最新章节，”杰克揶揄地写道，“‘在历史上还没有如此多的人对这样的一个人如此感恩戴德’。是吗？如果你回头看看你的《丘吉尔·温斯顿》，我想你可以找到的。”

英加对杰克来说既有情人的浪漫又有母亲的温馨。看到他的老妈那不连贯的、老调重弹的、假装正经的家书，其中的见解无非是鸡毛蒜皮的东西，没法提。杰克恨恨地说道，现在还没有进行真诚的反思来粉碎她那爱尔兰——天主教思维模式的陈旧的条框。他渴望英加——尽管在他的内心深处这段情缘已

肯尼迪传

随风而逝。而他母亲对宗教的偏执态度，如同有毒的常春藤一样令他讨厌。他故意写信告诉他的母亲，说海军要求他“在这里每隔一周的星期天负责组织一次读经班，时间大约半个小时”。他藉此嘲讽她的顽固不化，“你说那不是不合乎天主教的规则吗？然而，我们的职责，难道没有好书可以弄到我们的天主教堂来？我们可不想成为一个完全模式化的、表面的、宗教统治的机构，《圣经》真理寄存在最高层——一个不允许凡人解释的境界——不是吗？无论如何，不用担心，请把‘康威教父的问题箱’寄给我，我想仔细研究研究。”

查尔斯顿的乏味日子终于快熬出头了。他在海军船厂的同事弗雷德·罗森少尉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1942年春天，美国海军司令部向数以千计类似于肯尼迪和我这样的年轻军官发出命令。我们都想服现兵役，但却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于是在芝加哥举办了一个海军军官训练班，并要求我们填写申请表。”

罗森和杰克第一次呈交的申请表被他们的上级退了回来，并不是他们某项条件不合格，而是因为他们走了之后，在查尔斯顿找不到接替者。不过，幸运的是，芝加哥海军军官训练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海军决定开办第二期，于是又发出了招生令。

杰克的上司现在改变了主意。7月9日在国外情报函授课程考试中美国海军预备役教育中心给杰克打了“优异”的3.91分的超高分。然而，普赖尔上校心里明白，由于杰克与一名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女人有染，他不可能在海军情报系统中步步高升。因此，普赖尔上校改变了想法，在杰克这次提出申请时，他批准了。

过去几周了，杰克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于是他催促查尔斯

顿海军司令部给华盛顿发电报询问此事。最后，1942年7月22日，海军人事部门的一封电报终于让杰克得偿所愿：

肯尼迪海军预备役少尉，现立即解除现职，赴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到西北大学艾博特大楼的海军军官训练班参加训练，临时职务待定。

杰克喜极而泣。他在去芝加哥的途中途经华盛顿时，无视老头子的警告，执意见了英加一面。英加措手不及，据她在打给一个朋友的电话中说：“他途经此地，几分钟前他来过这里，然后他将奔赴海上。只有你知道，他的背——从后面看他活像一只跛脚鸭。他走路已有些畸形。让他到海上服役，亏得有人还会批准。”

无论如何，杰克决心已定。他终于结束了在海军情报部门的日子。这只“跛脚鸭”隐瞒讨厌的疾病，踏上了他生命旅程中另一个辉煌。这一次，是当一名联邦战士。

第十章 战火硝烟

六十天的奇迹

海军军官训练班的职责是在短短三个月内培养出合格甚至优秀的舰艇军官。“我乘火车回来的时候，碰到许多从圣迭戈遣往波士顿的小水兵，”凯瑟琳立即写信告诫杰克，“有一个曾在‘奥克拉荷马’号战舰上执行任务，中途岛海战时，不幸被一块弹片击中。他们津津乐道那个90天速成训练班的奇迹，说那个班真让人不可思议。我认为，这么短的训练时间根本来不及，恐怕连敬礼都学不会。当然，他们说有些人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想在90天内有所收获，无异于是要他们去充当炮灰。”

凯瑟琳没料到杰克早在7月27日已经去报到，并作为一名已授衔的海军少尉被分配到托尔训练班接受更快的加强航海训练，时间更是减到了2个月，人称“60天的奇迹。”

经过几个月乏味的日子，高强度的训练对杰克来说似乎格外严酷。“现在你大概更苗条了吧？”杰克写信给勒姆·比林斯说。此时比林斯离开纽约奔赴埃及去了。“如果你没苗条的话，我可是面黄肌瘦了。我现在正在芝加哥这所海军训练班接受役前培训——一个房间塞了8个人——房间里的怪味真让人作

呕。”他充满怨气地说，“当然了，我现在所在的是一个从未领略过的群体。伙食极恶劣——新鲜蔬菜只是奢望，每天必有的大红肠还总是离不了辣椒。部里推行的节俭运动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是这种有些不人道的节俭运动真让我受不了。不过，一群好伙伴可聊作安慰。”

这帮好伙伴并不包括托比。托比曾于7月份打电报到查尔斯顿说，“如果需要我的话，那就稍等一下，因为我遇到不可思议的复杂情况。不说客气话了，理解万岁。”

“由于他迷恋那个姑娘，所以从未到这儿来，”杰克在给比林斯的信中抱怨道，“泽克也在这里，但是3天前因高血压被迫离开海军，他到那里已经有7个星期了。他想换一个军种。”里普·霍顿已经戴上结婚戒指了，“我知道，他现在统领着一支黑人部队。”杰克幽默地说，“恰巧这里住着一些普林斯顿的人——他们说，他们在他的领导下干得不错。”当然，主要的而且是最伤心的消息来自英加。

“你可能还不清楚，英加嫁人了，但新郎不是我，”杰克伤感地说道，“她显然是想到纽约去，所以与她认识多年的那个家伙走进了教堂，他爱她，但她不爱他。我希望，她要聪明点儿就搭乘火车，因为每天有好几趟。无论如何，她走了——留给我的是一片空白。”

7月底，英加辞了在华盛顿的工作，与丹尼斯·布洛克一起住进纽约的一套公寓。丹尼斯已经向她求婚。英加的移情别恋深深地刺伤了杰克的心，虽然训练班的课程很紧张，但感情上的挫折却没有因此稍显轻松。

杰克写道：

肯尼迪传

你将非常感兴趣，这里的一切与乔特中学有着惊人的相似，我的表现也不例外——起床号响了一分钟了，还赖在床上不动，还有其他类似的严重触犯军规的事情。提及结婚，我想你也听说《新政》的策划人哈里·霍普金斯完成了。我推想，当5月份他告诉俄罗斯军事委员会他计划在今年夏天开辟第二和第三战场时，他提到了一个新颖的观点。我想第三战场的战利品可能是波莱特·戈达德小姐。他们在海德公园度过了一个周末——结束时她的男朋友阿纳托尔·利特瓦克得到了一个少校军衔。在同一时间订购避孕用具和重型巡洋舰，对哈里来说一定值得终身回味。

在杰克的老家，他的外祖父——79岁高龄的寿星菲茨决定再次参加竞选角逐，跟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亨利·卡伯特·洛奇参议员的孙子展开较量。但是，前提是菲茨杰拉德必须首先赢得民主党的初选。“他充满自信地告诉我，他完全有把握，他的确机会难得，”杰克说，“他的对手——名字叫凯西——似乎结婚6个月就‘迫不急待’地生了一个孩子，格林夫人以及马萨诸塞州的女天主教徒们正为制造反对他的舆论而忙得不可开交。”

同时，凯思琳也得到弗兰克·沃尔德罗普的鼓动，在英加离开之后，接替那个“你是否碰巧见到……？”专栏，而且干得“相当出色”，杰克不无骄傲地评论道。那年春天，在南卡罗来纳州艾肯市的乔治·米德家开的一个家庭聚会上，杰克曾抱怨姬克对自己的婚事漠不关心，但是他也深知，凯思琳既不是漠不关心，也不是毫无主意，她“正在到处寻觅”，直到找到一位白马王子。“她仍在华盛顿苦苦经营她的男士俱乐部，

与一群男孩子打成一片，但是还没有符合她那异常严格的身体、气质和品质上的标准的人出现。”

此外，他还注意到老百姓“对战争的热情正在慢慢升温”，但是，那些必须直面日本人、与他们作殊死搏斗的年轻人，热情就不那么高涨了。“乔治·米德奔赴太平洋战场，我认为他能在最近的所罗门群岛战役中有出色的表现，”他说，而且他一直倍加关注有关在瓜达尔卡纳尔登陆战中美军惨重伤亡的报道。他评价西北部战局时说，“这里低于正常状态。自从上次我在埃尔莫罗科与奇克·法默一席长谈以来，我还没有听到有什么人铮铮地说过‘我真想揍这些日本人’。”

杰克最后简要地宣布了自己未来的打算：

我已经被批准到巴尔克利少校领导的鱼雷快艇训练班去接受培训。那儿对体能要求非常苛刻——必须得年富力强，健壮而且未婚——因为我年轻、又没有老婆，我打算试试。如果我能通过，就可以主宰一艘鱼雷快艇，并被派到海外执行任务。到什么地方我却不得而知。

每个人都必须离开学校，到冬末时都要远赴海外去，只是目标不同。因此，你不会错失良机，相对而言，你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而我则很惭愧——这个鬼地方比乔特中学还让人无法忍受——我们的指挥官更是愚笨得使以前乔特的杰克·马厄像是个好人——哦，应该不是好人，而是个相对意义上的好人。但是正如总统常说的，这事比你我的事都重要——那是全世界的事——所以我们还是服从命令，乖乖听从调遣。

鱼雷艇的诱惑

杰克参加鱼雷快艇部队的决定真是让人颇费思量。因为，自从日本人发动战争以来，美军在菲律宾作战的为数不多的鱼雷艇突然倍受关注。特别是约翰·巴尔克利上尉，他于3月份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从激战中的菲律宾巴丹岛营救出来，并带着他穿过日本人拉网式密封的560海里水域，毫发无损，抵达澳大利亚，因此名声鹊起，获得了不朽的荣誉。用美国报刊的话来评价，该功绩使得鱼雷艇部队获得类似“不列颠之战”中“烈火”式战斗机的响亮名声。因此，美国在大西洋沿岸罗德岛的梅尔维尔新开设一所鱼雷艇学校，训练周期为60天。

杰克尽管无法预测一旦被选中后自己还能活多长时间，但是他现在热衷的地方就是鱼雷艇学校。一位熟悉的朋友弗朗西斯·麦卡杜已在梅尔维尔受训。杰克对比林斯说：“尽管麦卡杜已结婚，但他仍成功地让巴尔克利将军接纳他。我猜测，他一定是发疯了。因为这样，他将去国外呆数年时间。截止现在，鱼雷艇部队人员战斗减员率为10:1。我真不理解什么理由让他离开辛思。不过，他一定有他的充分理由。”

充分理由便是亘古不变的友情、血性男儿的战斗、荣耀和独立性。正如杰克在施佩俱乐部的好伙伴拉尔夫·波普追忆的那样，以杰克绝佳的记忆力和统筹协调能力而论，他比较适合在大型军舰或海军司令部任指挥。波普后来不得不承认说：“事实上，他根本不该上海军舰艇。我后来才知道，他在大学期间一直隐瞒着他的医疗记录，甚至在乔怀特中学，也没有人

晓得他有背疾，而且情况严重。不过，他想加入鱼雷艇部队更是让我难以置信。”

波普只是对杰克的智慧和领导能力推崇备至，却未能看到杰克在遵守纪律方面的毛病。事实上，他正是忍受不了纪律的约束才选择投身于鱼雷艇部队。纪律一词还会把他带回对乔特中学时光，他母亲对宗教戒律所抱有的狂热之心。在他的一生中，杰克性格特点是彻头彻尾地憎恶权力主义，而其厌恶常常溢于言表。为此，杰克对在海军司令部谋求一份地位低下的差事丝毫不感兴趣，在一艘大型军舰上扮演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更不会让他满意。而新近由新奥尔良、新泽西和迈阿密海军造船厂研造成的“雄野马”或“魔鬼船”鱼雷艇，正对杰克的胃口。在西北大学海军训练班里学习时，杰克从枪炮操作到航海驾驶等各科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现在剩下的惟一困惑是巴尔克利是否接纳他。

巴尔克利的火柴

“巴尔克利将军在5月份左右从菲律宾返回，他的菲律宾之行可谓一波三折。”梅尔维尔指挥官约翰·哈尔利海军少校后来回忆说，“他奉命奔赴梅尔维尔执行短期训练任务，但是，由于他是一位民族英雄，百老汇的彩带让所有人记住了他。还有人写了一本名为《他们随时准备牺牲》的恭维他的书，在《读者文摘》上刊载。所以，他常受邀到全国各地债券促销会和各类爱国集会上作主题演说。”

事实上，巴尔克利引起了全国的轰动，总统不仅在白宫给他颁发了国会荣誉勋章，而且当晚还专门设宴款待他。在私下

肯尼迪传

里，巴尔克利将军不仅在总统面前对鱼雷艇的优点颂扬有加，而且还建议总统再向太平洋派遣 200 艘鱼雷艇。巴尔克利对罗斯福承诺说，只要拥有足够数量的鱼雷艇，美国赢得对日战争的胜利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后来，巴尔克利将军在位于芝加哥的托尔大楼的训练班向杰克等学员们再次谈及他少年时代的幻想。他说道，“鱼雷艇是一种值得我们为之自豪的武器。敌人还不曾在与鱼雷艇战斗中占到便宜。我们小小的半个中队便一举击沉了一艘日本巡洋舰、一艘飞机补给船和一艘货物满舱的运输船，重创另一艘巡洋舰，使一艘油轮燃烧，并让 4 架飞机栽进大洋中。”然而，事实上，巴尔克利中队发射的鱼雷只有一枚触到了一艘日本巡洋舰，而且没有爆炸，更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日本海军记录中甚至找不到曾有一艘舰船受到过打击，更何况有被美国鱼雷艇击沉巡洋舰的记载。

但是，固执的巴尔克利依然不依不饶地向西北大学的这些年轻气盛、天真无知的预备役军官和毕业生们兜售着他曾向总统所做的唐诘诃德式的预言：用“500 艘鱼雷艇就足以使美国完全主宰太平洋，这支高效部队可以切断任何类型的陆上侵略行为”。

回顾前尘，这无疑是一种痴人说梦式的妄言，即就是巴尔克利的同事们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杰克后来所在的那个中队的中队长阿尔文·克拉斯特，熟悉当时的情况：

赴鱼雷艇部队前，巴尔克利与我一起在“萨拉托加”号上共事——他比我早一个月参加鱼雷艇部队。我喜欢他。只是在后来的接触中，我逐渐发现他的自我膨胀欲望

已远远超出其本身的能力范围。

麦克阿瑟将军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关键人物。如果当年麦克阿瑟是通过其他途径潜出菲律宾，约翰·巴尔克利名字或许只是历史尘埃中不值一提的一丁点。那应是一件侥幸的事。

珍珠港悲剧之后，英雄人物成了美国的支柱。人们寄希望于把握任何英雄行为或每一场战斗来显示我们是多么的伟大。事实上，鱼雷艇得到国人钟爱的惟一理由是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拿得出手！但是，这种炫耀的确有百害而无一利。然而，总统不得不找到一个英雄人物。这才是巴尔克利和鱼雷艇令国人关注的理由所在。《他们随时准备牺牲》的作者威廉·怀特瞅住了巴尔克利利用那些破旧鱼雷艇所创造的奇迹般的英雄事迹不放，极为夸张地大作文章，进行宣扬……对众多军官们来说，巴尔克利充其量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正当巴尔克利热衷于打造鱼雷艇奇迹之际，美国对日的海战实际上已离不开美国飞机、战舰，特别是潜艇开始赢得胜利。从军事意义上讲，鱼雷艇令人难以置信地占用了美国人的大量时间、资源和大量的精兵强将。不过，约翰上尉倒是一位鼓动斗志的斗士兼演说家。

弗雷德·罗森追忆：“9月份，巴尔克利到来后，对鱼雷艇推崇备至。实际上，他是在招募海军军官志愿到鱼雷艇部队服役。因为只有这种方法才能说服你加入该兵种，潜艇部队和空军也常这样做。”

与巴尔克利同往芝加哥的哈尔利后来开诚布公地解释了他

肯尼迪传

们招募志愿者的初衷：

你一定要牢记，鱼雷艇性能不太稳定。其速度仅为每小时 28 节，而我们的敌人，日本人的舰船速度都超过 28 节。所以，除非你靠得很近很近，否则鱼雷要击中敌舰简直是天方夜谈。因此，只有那种异于常人的人员才有胆量在死亡威胁之下靠得那么近。

巴尔克利的战术设想是让鱼雷艇潜入距敌舰 500 码的范围之内再发射鱼雷。这是在雷达发现之前可接近的最小距离，而且只能在夜间。倘若在白天，1 万码远的距离也会被敌舰击沉而灰飞烟灭。而且即便是在夜间，要悄然潜入距日本舰船 500 码远的范围之内，同样需要有过人的胆量。

你必须要有有一种特殊的战士。首先应该是一名志愿者，他愿意冒死神威胁钻进与敌人如此近的范围之内再发射鱼雷。

在学习班开幕时我先作了简短的开场白，随后是巴尔克利发表演说。当时，他是一位富有激情，善于鼓动人心的演说家。首先，他被各类媒体一致推为民族英雄。其次，他又是一位与众不同、很有煽动性的演讲者。所以，当他的演讲完毕，大多数学生都争先恐后地报名加入鱼雷艇部队服役！具体的报名人数我记不清楚了，不过，当时加入鱼雷艇部队的人的确出人意料地很多。

哈尔利并非在夸夸其谈。纽约《美国先驱报》9 月 5 日在标题为“巴尔克利招募 50 名战士，却有 1024 人志愿报名”的

文章描述道：

今天，来自纽约市的巴尔克利少校、菲律宾海战中的国家英雄在芝加哥执行其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他计划招募 50 名非同寻常的年轻人加入闻名全国的、充满危险的鱼雷艇部队。难以置信的是，竟有 1024 名年轻的海军少尉军官报名参加，换句话说，校园里所有的人都来了。

巴尔克利与他的随从安顿下来后，与报名者逐个进行个别谈话，试图依照他自己的判断来择优挑选 50 名最为胆量超群、最骁勇善战和最富激情的志愿者——这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情。他精选的人员将奔赴罗德岛的梅尔维尔，在新组建的海军鱼雷艇学校受训。

回首前尘，这位临时被破格提升为海军少校的年轻上尉居然受命在人数多达数千名大多是大学毕业生的海军军官中挑选志愿者，真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对美国而言，侥幸的是，巴尔克利只能挑选 50 人。

在当时的情况下，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巴尔克利居然看中了杰克。杰克不仅没有强健的体魄，而且，当年还在海军医院住院两个月，甚至有的医生建议，对他的背部进行大手术。巴尔克利后来辩解说，他“不知道杰克患有任何背部疾病。但即便是现在我知道，我也不会收回成命，因为我根本就不晓得脊椎错位是什么玩意。我是在寻找勇敢的人！”

这种话后来更被人冠以“令人恶心的谎言”。有人说哈尔利是故意无视杰克伤残的医疗证据。“后来我知道了——和所有美国人一样。但当时我的确不知道，巴尔克利也不晓得。即

肯尼迪传

使是在梅尔维尔的鱼雷艇学校时，我对此也没有察觉！我想背部毛病是不会有在体检中被发现的。”

这种正常体验的观点或许是无可厚非的。令人奇怪的是此类严格意义上的体检却没有参阅杰克以前的医疗记录。不过，哈尔利无法知晓更多的幕后故事，巴尔克利海军少校在决定录取杰克之前已对杰克的情况知之甚详。

乔·肯尼迪的午宴

过了 50 年，巴尔克利坦诚道：“是的，乔·肯尼迪有意与我套近乎。在那些日子里，我是风光大显的人物。他实际上不必通过他人便可以见到我。他赏脸与我会面，邀请我与他共进午餐。”

在肯尼迪的特别套间里，这位精打细算的海军军官与一位老谋深算的商人、一位尽职尽责的父亲交换了各自的看法。

巴尔克利说：“他已被昔日老朋友罗斯福抛弃了。”

他坦露了许多对罗斯福不满的话。他说他的一个儿子现在是西北大学海军军官学校的一名学员，而他坚信杰克具有成为美国总统的全部条件。他希望杰克能够参加鱼雷艇部队，以便提高他的知名度，在战后大选中赢得老兵们的支持。

乔询问我是否有能力将杰克录取为鱼雷艇部队中的一员，我说有，并承诺在下次西北海校之行时与他儿子面谈。我对乔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我认为杰克符合条件，我将尽力推荐。

老先生看上去很是兴奋，说道，杰克最好不要被派遣到太危险的地方去执行任务。

过去了这么多年，巴尔克利的记忆可能会产生某种偏差或失真，然而，核心部分似乎很符合约瑟夫·肯尼迪的性格。甚至连联邦调查局也留心到了老头子寄予他两个儿子的政治期望。同时，在杰克与英加来往书信中，杰克的政治野心已初露端倪，他怀有踏上仕途、甚至是入主白宫的野心。此外，约瑟夫·肯尼迪的性格特点是，他在为自己儿子们寻求扬名立万的同时，又在努力防止他们在战争中送命。

在某些方面，巴尔克利与老肯尼迪是两个世界的人：一个激情奔放，且具有超常的胆量；另一个却是老牌的绥靖主义者、孤立主义者和色厉内荏的懦夫。正如《芝加哥论坛》驻华盛顿首席记者沃尔特·特罗汉评论的那样：“乔缺乏雄心大志，是一个欺软怕硬、胆小如鼠的人。一旦遇到比他厉害的人，他只会逃之夭夭。”

虽然老头子对巴尔克利对太平洋战争所做的煽动人心的描述反感至极，但是，他却敏锐地看到，战争经历对杰克的政治生涯有益无害。正如巴尔克利足以机敏地看到将鱼雷艇部队与肯尼迪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会获益匪浅一样。

哈尔利也愿意接收杰克进入鱼雷艇学校受训。他也深知，接纳这位前大使的儿子，可以提高这支新组建的鱼雷艇部队的名气。而且，正如哈尔利后来回忆的那样，逐个与一千多名报名者进行面谈是“不可能的”。因此，有关方面授意西北大学负责该计划的工作人员首先对报名人员进行选拔，将人员数量精简为 240 人。即便在当时，哈尔利也不得不承认：

肯尼迪传

逐个与这么多的人员进行面谈真是有点荒谬。然而，战局需要我们，我们又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这决定了我们与每个报名者只能谈几分钟的时间。当然，学校还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背景资料，使得我们的面试进展迅速。我们根据每个人的简历就能决定录取名单。

挑选工作便是这样。当然，巴尔克利的演讲和他的奇迹般的经历从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此之外，当时进入西北海校的人大多是军校学员与军官，他们是在珍珠港惨剧后不久拥进军队来的人。他们是爱国主义者，是决心为国战斗的优秀人才。国家正在遭遇战争，而当时的口号是，“如果国家需要，我将义无反顾。”

因此说，他们是美国一些最为优秀的年轻人。然而，他们必须接受一段时间的训练，事实上，他们参加的训练班已经不少了——他们已对学校反感透顶！他们想出去奔赴战场！因此，他们是出类拔萃的候选人——是可选择的杰出的人才资源。

二人分别同每个候选人进行了交谈，然后将记录进行比较。哈尔利回忆说：“我俩都同候选人进行交谈。只有我们两个人都认可的人才可能入选。”

杰克毫无遮拦的自信表现和参加鱼雷艇部队坚强的决心给哈尔利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哈尔利眼中，杰克的精神与自信心会使他成为一名优秀的鱼雷艇艇长，还像许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一样，杰克拥有数年的驾驶海上小型船只的宝贵经验。

哈尔利后来发现，乔·肯尼迪为确保儿子进入鱼雷艇部队，还进行了暗箱操作，他觉得这与那些利用家庭影响千方百计使自己的子女逃避服兵役的人相比无可厚非。他感慨地说道：“请你们想一想美国副总统丹·奎尔。看一看他的家庭如何千方百计使他不用去越南作战……在美国有许多人试图利用政治影响，以使他们逃避兵役。但是，杰克·肯尼迪却藉此影响力去奔赴前线！”巴尔克利当年曾在芝加哥告诫这些年轻人：“你们当中那些企图在战后回去成家立业的人大可不必报名。鱼雷艇艇长是一种危机四伏的职业！”

这种告诫并没有使杰克为之退缩，反而增加了他的激情。罗斯在她最后的一封家书中评价道，“杰克对战争的整个态度发生了转变。他做好了为国捐躯的一切准备，以阻止日本和德国成为他们相邻大陆颐指气使的霸主，并坚持认为他们迟早会侵扰我们的国土。他还坚信，如果他为国捐躯，那对老头子的政治生涯将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当然，我想他完全不必去那样认为。”

同时，1942年9月25日芝加哥《美国先驱报》刊载如下消息：

在托尔训练班受训的1400名预备役海军军官将于明天举行毕业典礼，其中90%的人不久将来将转入现役。

这些小伙子几乎是来自所有行业的美国男性公民。其中有律师、化学剂师、钢铁工人、产品推销员、经济学者、专家和教师、经理、作家、记者、船长、乐团团长、海军上将之后人、下级水兵的儿子、银行家与书商以及纽约众议院的议员和卡伯特家族的后代……

肯尼迪传

请仔细聆听这些孩子们的声音吧。这是真正的美国的语言——是以自由、民主为目标的美国对那些试图奴役他们的人的最响亮的回答；是一丝来自东、西、南、北、中的洁净清新、生机盎然、沁人心脾的空气。

在 1400 名年轻人中，杰克获得了特殊的荣耀。上述报道刊写道：“注意！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25 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半岛。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叫小约瑟夫·P·肯尼迪，他也是一名海军少尉军官。我曾一度在华盛顿海军情报部门以及查尔斯顿的海军造船厂工作。另外，我写了一本书，书名叫《英国为何沉睡》。’”

《美国先驱报》认为：“这些年轻人需要的是战争。杰克，这位前大使的儿子钟情于危险性极高的鱼雷艇部队。而且他极有可能得偿所愿。”

公子哥儿

当然，如果杰克真能得偿所愿进入鱼雷艇部队，那就是医疗界的一件丑闻和笑料。不过，他苦心孤诣的努力应该被理解。他早已对办公室的桌面工作讨厌至极，厌倦了诸如在查尔斯顿时期的暮气沉重的等待。像许多学员们存有的那种抵触情绪一样，杰克对上学的日子深恶痛绝。在过去的 25 年里，共有 11 所学校留下了杰克的足迹。但是，为了能够进入鱼雷艇学校，他又作贼似地掩盖其背部和胃部的疾病记录，以及一些他学生时代就有的未能确诊的病痛。杰克曾以其持续不断的生理

弱点和频繁地入院诊治记录，与博斯韦尔和比林斯开玩笑说，他已为自己的自传拟好了书名：《杰克·肯尼迪：药水泡成的人》。

事实上，杰克于夏天之前就开始隐瞒医疗记录。不过，那时只是做一名专业技术军官，在华盛顿的海军情报部门做一些具体的乏味的办公室工作。因此，其健康状况显得无关重要。然而，时光之梭到了1942年9月，为掩盖其背部疾病，杰克实施了一种新的掩盖手段：故意误导他的上级派他去执行其身体状况无法承受的海上任务：参加高速鱼雷艇或“雄野马”的战斗任务。

无论杰克对此事如何看待，但从他的人生上看，它却是杰克生活中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无论他的出发点是如何的崇高伟大——为祖国而战，为和平和正义而战——但有一点却极为重要：它导致了一连串“必要”的蒙骗包括医疗方面、政治方面、文学方面以及婚姻方面。

当然，出身在一个具有狡诈和欺瞒传统的家庭，杰克的欺骗行为不值得大惊小怪。他母亲数年来一直掩盖着她那无法忍受的婚姻生活；而父亲更是一直想方设法遮掩全部的、从逃避兵役到证券交易欺诈的丑行。他们甚至还掩盖了他们为其大女儿实施手术的错误决定，然后，又毫不留情地将可怜的女儿送往威斯康辛的一个与世隔绝的疗养修道院中去了却残生，不加探望。甚至在罗丝留给子女们的家庭信札中也不曾提及此事。

依照惯例，罗丝对杰克的蒙骗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42年9月29日，当杰克带着已被鱼雷艇学校选上的激动人心的消息赶去海恩尼斯港时，她在写给小乔的信中说，“你一定难以置信，杰克看上去是那样的精神饱满。他对普通生活条

肯尼迪传

件的态度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变……他的脸真切地反映了所有的变化，不仅没有消瘦下来，反而红润了许多。”

但是，仅在两天之后，老肯尼迪却向他的长子吐露了真情。他坦白地说：“杰克回家了。私下告诉我，他的背部疾病的确有些严重……他能在鱼雷艇学校严酷的环境中撑一个星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他想尽快做手术，然后让我出面活动活动，以便他康复后能够重返鱼雷艇学校。不过，这件事估计会十分难办。因此，我和你母亲已决定放弃去加利福尼亚的打算，看看能否为他帮点忙。”

杰克已完成训练。那时鱼雷艇虽然号称速度惊人，拥有船身流线形的精巧设计，但是，很多迹象表明，它们都还很落后，没有完全脱离木制船时代的特征。鱼雷艇用胶合板构成，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防护装甲设施。艇上装配着劣质的鱼雷，雷达只是幻想中的事，动力是易燃的飞机辛烷燃料。它是在英国设计的基础上改良而成，一些作家戏称之为“海上骑兵”。的确，它在许多方面与古时的战马十分相像，而且与当年的骑兵团一样，鱼雷艇吸引着富有而爱冒险的公子哥儿们。

不久，杰克便成了货真价实的梅尔维尔公子哥儿。他哥哥很快写信给他说，“我得知你与布尼·沃特斯打得火热，我保证不久便会出现一个三人帮。尽管不会有什么紧身服装，不过长鼻子和一杆猎枪会随身携带。在他向你的屁股上开了一枪后，会大声叫你乔尔森。”

杰克的朋友弗雷德·罗森回忆往事说，“肯尼迪是梅尔维尔惟一拥有小轿车的学员。每天早晨我们首先进行自由体操、跑步和练习等常规科目。然后在8点钟上课，直到下午3点。下午我们总是一块儿玩触式橄榄球。而那些书呆子军官，会留在

基地里。其他的人则会相约到离我们不算太远的纽波特镇去。我们全部塞进杰克的车里，噢！五六个人挤在一起，赶着去吃晚饭。我们在纽波特度过了回味无穷的下午。周末，我们常相约去纽约。我和杰克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一趟。”

查尔斯顿乏味和芝加哥无聊的时光终于远去了，杰克又充满了激情。弗雷德回忆说，“那些日子真让我大开眼界！”

我敢发誓杰克对纽约的社会生活非常熟悉。那个时候，要是我到了纽约，便会是个迷失的羔羊，找不到东西南北。凭着上帝的名义起誓，我是平生第一次随杰克前去纽约的“21”俱乐部，并参观了许多其他地方！另一位常客名叫诺克斯·奥尔德里奇。在当时，我们合住在小木屋里。而在佐治亚大学时，他和我同为一只橄榄球队效力。我们一道游逛纽约，有时甚至午夜从中央火车站赶乘火车匆忙返回梅尔维尔，以便参加凌晨6点钟的晨练。这种日子大约持续了整整2个月。

一大群女模特和女歌星弥补了英加留下的空白，《魔力》杂志的女模特安吉拉·格林尼是其中的佼佼者。“我可以告诉你！她真的棒极了——后来成了演艺明星，并成功地踏进好莱坞。我们每个周末都去纽约约会，有时，我们还进行双约会。她总是带着一位《魔力》杂志的小姐与我会面。”

凯思琳的朋友夏洛特·麦克唐纳，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尽管她后来拒绝承认杰克曾向她真正地求过婚，但是很显然，她确实是杰克一位更合胃口的女人。她不无沮丧地回忆说：“我与杰克出去过多次，但他并不爱我。他常哄我说他爱我，

肯尼迪传

特别是当他情绪低落，又没有其他伙伴的时候。可我明白，他并不爱我……他曾经与托比和勒姆开玩笑说‘喂，你们觉得我娶麦克唐纳怎么样？’然后，他们津津乐道地议论一番。但是，当谈及实质性问题时便避而不谈。难道能说他真的向我求过婚？没有，绝对没有。”

对杰克来说，部分原因是夏洛特小姐像弗利普·普赖斯类的教徒一样不同意在婚前发生性行为，这一点与“蝴蝶夫人”的英加截然不同。在比林斯看来，除了性爱之外，杰克依旧保留了专横的自我。“不！那个开鱼雷艇的野小子怎么会是我呢？不过，他却把我在那些日子里的感觉展示得淋漓尽致，”11月19日，他在写给比林斯的信中通报，“我刚刚修完课程……你一直杳无音讯，不知你到底在做什么。我高兴地看到，在你抵达后，战局出现转机。”他指的是蒙哥马利将军在阿拉梅因战役中对隆美尔的大捷。

“这里的事情没有新意，泽克因血压高被迫离开，直至现在还没有回来，看来他可能还存在希望。姬克依然经营那家男孩俱乐部，同时为英加·阿尔瓦德原来负责的老专栏撰写文章。”

这些话又使杰克思念起英加。起初，英加拒绝与他会面，甚至不乐意与他通信。“我明白，如果我给杰克写信的话，尼尔斯一定会受到伤害，大为光火的。”她在信中向姬克解释，并央求他转告杰克，“信并不是什么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有海军每天两次在这里走过，而当我见到海军的军装时，心中默想着一张面孔——一张我为之祈祷的幸福而又欢快的年轻人的面庞，一张对生活寄予了百分之百的希望，而且极有可能得到百分之九十九回报的面庞”。不过，最近杰克从凯思琳那里听

说英加“似乎对其新婚丈夫渐渐冷淡，为此有可能重新回到我这儿，也许这一次他能留在我身边”。但是，实际上，“迄今为止，这件事还没有什么新发展。看来，我最后可能会与麦克唐纳在一起。”

夏洛特所担心的正是杰克这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同时，战争开始出现人员减少。杰克向比林斯通报说，“我想凯思琳已经写信告诉你了，乔治·米德已经以身殉国，是在图拉吉岛海域不幸身亡的。”他不再纠缠这件事，“上周末我又去了一趟纽约——泽克作为球员参加了东部地区普林斯顿—耶鲁对抗赛，耶鲁胜出。我们享受了一个美妙的夜晚，你错失了良机。来信告诉我你的近况。祝心想事成！杰克。”

从一定意义上讲，杰克感情淡薄是一代人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的集中反映。因此，现在的这一代人正在为其父辈多年来敝帚自珍的孤立主义者的态度付出高昂的代价。不过，感情的匮乏同样反映在英加之前他对生活所抱有的游戏人生的态度。从“21”俱乐部到埃尔摩洛哥，以及普罗维登斯的巴卡迪酒吧和纽波特的洛博斯特卜特，他决意得意尽欢，频换玩伴，极尽能事忘记英加的背叛。

然而，英加对这段恋情有不同的看法。后来，英加描绘了他们热恋时俩人共度周末的一番美妙情景，“气氛充满了理解和甜蜜。谈话幽默诙谐，温和善意的俏皮话层出不穷。我们一直在极力回避一个话题——未来是分道扬镳，还是相伴终生。他倾诉了他在波士顿度过的岁月，他溢于言表的热情将他的家人对他的重要性展示得淋漓尽致。他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连。我也深知，如果我们结婚，他就得放弃昔日的生活，因为他的家人从心底里反感离婚，不会容纳我……不知道杰克是不是足

肯尼迪传

以放弃他的家、家人以及每月数量可观的生活津贴，而单纯依靠一个小少尉的薪水支撑生活。”

他们的问题的确是一个进退维谷的事情。虽然杰克已经做了 12 个月的少尉军官，并因出色完成了海军规定的有关课程之后，被提升为中尉。已满 25 岁的他理应能够在世界上找到立锥之地，然而，情感上他却依然显得小孩子气。他天性率直乐观，激情四射，与他敬爱的外祖父霍尼·菲茨如出一辙，而与其肯尼迪先宗有很大不同。当年，在一篇为这位波士顿前市长的充溢热忱和同情之意的歌功颂德的文章中，英加在其专栏里写道：“霍尼善于团结人……有一天他在国会……在餐厅进餐时，餐桌上摆着十多个只剩半个壳的牡蛎，每个人聚集他的桌边……与固执的爱尔兰人一样，他一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从不夸夸其谈，从来不会使他人产生压力。他的亲和力，就像阳光普照大地。”

然而，老肯尼迪却与上述溢美之词相去甚远。他常常使他人感到压抑和拘束，他这种气质随着自己被抛弃而越发明显。由于与总统失睦，现在他几乎不去首都。布朗克斯维尔的家宅最后也售出了。除了几个金钱上的伙伴之外，他的朋友少之又少。杰克的朋友查克·斯波尔丁后来评价说：“我认为在肯尼迪先生眼里，家外的世界硝烟弥漫。”

他这种悲观消极的思想让他的孩子们深受伤害。在孩子们幼年时，他有数年的时间忙碌在外。如今，他又天天无聊地呆在家中。他混淆了仇恨与仁爱、苛刻与宽宏、悲观与雄心、老谋深算与坦率开朗。成了一个恶语伤人、独断专横、令人厌恶的人，一个令孩子们不知如何相处的人。

与同胞兄弟姐妹一样，杰克成了他父亲执拗偏执、近乎白

肯尼迪传

日作梦般性格的牺牲品。无论英加何等艳光四射和充满女性诱惑，也打不破杰克遗传于老头子的顽固的保守心理。

罗森记忆犹新地回想起杰克收到一封来自海恩尼斯港的家信时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顾虑。一天，杰克对我说：“瞧，这是我老妈的信！”

“噢，肯尼迪，你说什么？”

“这不就是？她给我写信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罗森说：“他让我看了一眼。那时，‘施乐’复印机可能还只存在发明家的大脑中——信是用复写纸写的，是以一种新闻信札的形式向所有的孩子通报情况。”

信是这样写的

海恩尼斯 1942 年 10 月 9 日

我亲爱的孩子们：

星期三，你们的爸爸从纽约回到了家中，这一天也是你们父母结婚 28 周年的纪念日……小乔今天早晨给我们来了信，看上去他最近把主要的心思都花费在他新蓄的小胡子上了……鲍比不计划外出度假……他决定安下心来以尽快地适应新的环境……我们期盼可爱的特迪能在周末回家，但这位小调皮好像在盥洗室与人打的不亦乐乎……而且麻烦不小……为此，他被禁止活动两个星期……姬克本周末一心想去温泉城……我们是不允许她在无女伴的情况下前去温泉城的……帕特，我向主祈祷祝愿你周末愉快。我不会因烦心而责怪于你，我衷心希望你能在剑桥或纽黑文结识几个漂亮迷人的情人……当然，你没有这样做也不

肯尼迪传

是你的过错……吉恩，我不得不为你穿旧衣服而惭愧不已。我与你爸爸计划前往康文特，因去年错失机会，而我渴望能目睹尊敬的修女的风采。我还希望听到赞美你努力学习、勤奋坚毅的话语。不要给自己增加太多的负担。在学校吃那种长面包卷之流的食物真是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罗森记忆犹新，即便是科德角离家不远，杰克也只回过一次家。尽管母亲唠叨固执，父亲老奸巨滑，而且还有诸如罗丝玛丽手术之类的隐秘悲剧，然而对杰克来言，对这个大家族的归属感仍是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个独特的家庭仍然是杰克痛苦世界中的一个温柔港湾。

糟糕透顶的训练

然而，埃尔摩洛哥与梅尔维尔的瓦楞铁皮房子里的杰克不改旧习，仍旧是一副漫不经心、敏捷聪慧、见多识广的脾性。他是成熟与孩子气的混合体，与哈佛大学时一样，公子哥儿式的生活方式反映出两种迥然不同的自我。但是，无论他的举止显得多么信心百倍和亲和友善，他内心的确在为失去英加而伤心，并真切地希望她有一天能为她的错误而追悔莫及。

杰克也会偶尔疏于伪装自己内心，把一些根植于内心的种族偏见强加给他人，这要从他的经历寻根究源，他父亲灌输的波士顿爱尔兰人的反犹情绪对他影响深远。有一次，肯尼迪在梅尔维尔的铁皮房里夸夸其谈，指责奸诈的犹太人大部分都千方百计“钻进了陆军军需部队”，从而逃避上战场。他的朋

友，身为犹太人的罗森实在忍受不了。

罗森奋起反驳道：“一定是因为他们精熟三角函数。”

“什么？”

“必须指出，海军的导航员绝大多数都是从那儿抽调而去的。”

“要是这样，我想我指的是补给兵。”杰克狡辩说。

生气的罗森不依不饶，坚持要调查一下梅尔维尔的志愿军官们的宗教背景，以便证实一下是信仰天主教，还是信仰犹太教的人多。当时，辩论在他们的小木屋里激烈展开，当罗森终于证明杰克有失偏颇时，杰克低下了高傲的头，表示歉意。

罗森将杰克根深蒂固的反犹太情绪归咎于杰克的父亲，这一点很符合事实。他还对杰克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赞叹不已，并因此对杰克更加敬服。正如罗森所回忆的那样，梅尔维尔的生活，实际上是杰克个人在政治历程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那间简陋的瓦楞铁皮房子，容纳了来自美国各州的军官们，无论杰克喜欢与否，他正在扩大他的朋友圈子。

另一位同居一室的学员西姆·埃弗兰德对他在托尔训练班第一次见到杰克的情景记忆犹新。

我来自南方，学校里南方人比较少。不过我发现，杰克对南方人很热情，事实上他对任何人都这样。我觉得他并不像一个傲慢势利的富家子弟，也不是一个自感超人一等的妄想狂。

我与他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是那种无话不说的朋友。因为他喜欢触式橄榄球，事实上，这种运动相当粗鲁——我想说的是它不仅是扑倒触地，甚至还相当的粗暴：

肯尼迪传

它几乎会撞得参与者灵魂出窍。杰克身材高挑，富有弹跳力。但是，他却对如何进行欺骗和佯攻一无所知。我曾在田纳西当过球类教练……我对他说，你应当到那边去进行如此这般的佯攻。我在左半边进攻，接着将球抛向他……我们的配合可谓天衣无缝。我们同在一个队。终其一生，我们一直很要好。后来，我们一同走访过卡罗来纳。

当问及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的关系不同于一般战时友情时，西姆认为是杰克没有那种势利傲慢的态度。“当谈及我与他的交往时，我感觉他乐意同任何人来往，无论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点的确不可思议。比如，我来自南方，那些来自哈佛、耶鲁等地的人总让我感到屈辱，他们常用讥讽的口吻说‘我们简直不知所云。你说话与我们不一样，速度太慢’，或其他一类嘲讽的话。”

“但是，杰克却截然不同。他尊重每一个人。我认为他还是一个出色的分析家，是他组织了我们的橄榄球队的小伙子们……我对他极为钦佩。”

小乔始终只是在他父亲为他设计的宏伟蓝图里戴着脚镣跳舞，给人一种雄心勃勃的、财大气粗的波士顿爱尔兰裔小伙子的印象。杰克却截然不同，他与在哈佛大学时一样，以睿智、宽容与超凡的勇气，博得了同僚们的爱戴。如果说哈尔利对杰克的背疾一无所知的话，那么，梅尔维尔的同伴们对此却明察秋毫，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告发。“一天下午在纽波特，我又一次与他驾车在镇上兜风，”罗森说，“最后，我们终于在一个木材场，为他搜到了一块胶合板。他垫在了吊床垫下面，因为严重的背疾让他坐卧不安。不错，他的背疾确实严重，但是他却

一直强忍着。除了不得已为自己的睡床垫一块木板外，我从未听到他有任何怨天尤人的情绪，何况抱怨也是人之常情……对一个背疾严重的人而言，鱼雷艇的晃荡显得那样的让人无法忍受，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对此怨气冲天。”

橄榄球明星阿特金森，作为来自托尔训练班的第二批被录取的志愿者，步杰克之后尘来到梅尔维尔，他回忆说：“疾病深深地困扰着杰克。他背部疾病的确严重，我常常说他简直是在拿生命开玩笑。我说，‘就是那些与战斗职业相关的人对战斗也惟恐躲之不及，你却绞尽脑汁地想得到这份战斗职业’——诚然，他的确想在这场战争中出阵杀敌！”

但是，鱼雷艇学校所进行的训练，对真正战争是否有意义，倒很值得研究。

罗森后来描述说：“事实上，我从未向敌人发射过一枚鱼雷。就是在梅尔维尔我也从来没有亲自发射过一枚鱼雷！我们只是有幸看到一个人发射过：25个人在鱼雷艇上，所以我们只是看到身为鱼雷艇基地教官的格林发射过一枚鱼雷。这些就是我们在梅尔维尔的鱼雷训练的全部内容——可是鱼雷是我们的看家武器啊！”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缺乏夜间训练。要知道，鱼雷艇极易遭到敌人飞机的空袭，所以只能在夜间出动。负责设计训练课程的将军阿尔文·克拉斯特坦白承认：“据我所知，从来没有在夜间进行过针对靶船的鱼雷射击训练，因为所有靶船常被改作它用！”

罗森说：“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西姆表示赞同，他说：“在梅尔维尔，我们未能得到正常的训练。”克拉斯特坦率地说：“现在看来，我们在梅尔维尔的所做所为很多都显得那

肯尼迪传

样的荒唐可笑。客观地讲，从实战角度看，我们的训练内容是相当脱离实际的。将时间白白浪费在教你如何驾驶，如何靠岸，以及如何保养发动机、鱼雷、无线电等诸如此类浮浅的知识上。”

巴尔克利少校言过其实地吹嘘鱼雷艇，而且他又与鱼雷艇学校有密切的关系，但学校竟然未能设计合适的训练内容，确实让人难以置信。巴尔克利的夸夸其谈只是兜售了一种创建美国鱼雷艇部队的设想，却没有付诸实施。罗森回忆说：“这简直令人不解。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以前出过海，但是毕业后我们竟然必须出海，担任鱼雷艇艇长或副艇长，执行海上公务！”

八周的训练课程在 1942 年 11 月缓缓结束，军官们开始津津乐道他们优先想去的中队。罗森回忆说：“杰克承诺要与我们同道，我们来自南方——我们将奔赴新奥尔良的造船厂，领取我们的鱼雷艇。这样在造鱼雷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旁敲侧击地了解一些战前细节以及船的性能这类事。”罗森所说的“这类事”当然还包括新奥尔良闻名全国的夜生活。“我们有权申请参加自己中意的中队，可是能否得到批准是个未知数。他打算同我们一道加入第十四中队。”

“但是后来有一天，他突然说：‘不行，我不能随你们去新奥尔良。’”

自己的鱼雷艇

罗森颇为困惑，惊讶万分。看来无疑是哈尔利上尉在幕后操作。后来哈尔利回忆道：

肯尼迪传

我是老资格教官……而杰克是一名踏实努力的学员，他在船舶的操作上表现出优异的天赋让人刮目相看。其实，他是一位如此出类拔萃的学员，我坚持选派他留在梅尔维尔的训练中队担任教官。

他一听此事，马上心急火燎地就来见我，一再要求把他派往海外的作战中队去上阵杀敌。那时鱼雷艇舰队在所罗门群岛与日本人酣战不休……他认为自己没有理由呆在国内……他的要求坚定决绝。

当确认哈尔利留他在梅尔维尔的目的是看重了他的名声时，杰克勃然大怒。哈尔利后来回忆说：“他与我产生了严重的争辩。我知道我又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敌人，但是，我认为他应当留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杰克的失望有所缓解，因为他在这里替托比·麦克唐纳找到了一个职位。波士顿的海军材料监察官办公室为麦克唐纳调走而长舒了一口气。据杰克的母亲描述，托比“再一次闯了大祸。好像是一个署名为‘诚实的纳税人’的女人写信检举说，有一位名叫托比·麦克唐纳的小伙子，日复一日地使用一辆海军军用旅行车造访某条街的某个门牌号。该女人自称对她所纳的税被如此乱用感到无法忍受。后来这条街的这个门牌号被证明是波利·卡特的房子……因此所有事情都很错综复杂。”

“昨天我安排托比到这里，以方便他能够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来报到。”杰克写信向比林斯通报，“之后，我计划教上几个月的课程，再设法转往别的单位。”

如果哈尔利真的认为倔强的杰克会平静地去执行这种让他

肯尼迪传

窝火的命令的话，那他就太孩子气了。实际上，杰克在外祖父的运作下，于 1942 年 11 月 29 日秘密拜访了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戴维·I·沃尔什先生。这位颇具权势的沃尔什是参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堂堂的主席。

杰克对国际关系和军事战略的见解让沃尔什刮目相看。他随后写信给甜蜜的菲茨说：“坦率地讲，我很久没有见到像他这般优秀的年轻人。他品性优异，精神饱满，又具备优异的领导才能，而且谦逊得体。”

沃尔什后来曾给杰克写信说：“对于星期天与你的会面，我感到非常高兴，希望能与你交个朋友。今天我将返回华盛顿，我会尽我所能的。”他说，他已“另函寄上一本书，我想你会对它有兴趣的。书名是《新世界的地平线》。我坚信这些地图上所标示的距离是很好的财富，能帮你丰富知识，使你能进一步密切跟踪战事的发展。”

12 月 3 日，杰克开始了他的教官工作。看过他最近的述职报告后，施佩希特少校批示：“该军官近期较好地完成了布置给他的鱼雷艇中队训练中心的教学任务。虽然缺乏鱼雷艇操作经验，但是，他却十分地恪尽职守，勤奋可靠，想必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一名经验丰富、能力极佳的军官。他具备出类拔萃的个人与军事素质。”

然而，作为一艘 78 英尺的 101 号鱼雷艇上的指挥官，杰克的耐心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刚刚从艾博特训练班调配过来的受训学员保罗·费伊海军少尉，对那天几乎上不了 101 鱼雷艇上课的情形没齿难忘。如同比林斯少年时所遭遇的那样，保罗尝到了杰克那充满尖刻的斥责。由于保罗发出的旗语信号含义不明，被人误认为他想到另一艘训练艇上，导致载有全艇乘员

和 15 名学员的“希金斯”号训练艇被耽搁了 15 分钟。保罗后来回忆说，杰克把他痛斥了一顿：“如果每一名受训的年轻人都像你这样，日本人仅在 3 个月内就能打垮我们。明白吗？”

事实上，前一天在球场上，当保罗第一次见到这位瘦高的教官时，就已经领教到他的严厉和果断了。保罗回忆道：“球赛开始已经半个小时了，就有一个看起来很英俊、聪慧、削瘦的年青人跑过来，他身上反套着一件绣有‘H’字母的汗衫，要求参加比赛。我说，‘再找个人，就可以加入！’结果，十分钟不到，他就带来了一名同伴——他看上去技术还很精湛。”

“两局球赛还正在进行，这个瘦削帅气的小伙子就大喊暂停，指责我们没有遵守规则。我有些反感，心想让他进来就不错了，他还对我们说三道四。然而，令我费解的是，无论我如何据理力争，大家还是采纳了他的意见。”

巴尔尼·罗斯，来自普林斯顿的一名曲棍球爱好者，事后回忆起那天的比赛以及杰克的样子时说：

第一次见到他，我误认为他只有十七八岁，我还猜他是一位刚入伍的海军新兵。他当时反套着一件背上印有“H”字样的红色运动衫。我刚刚在那年春天离开普林斯顿。普林斯顿有一所反潜预备学校。我以为这个年轻人是来自这所反潜预备学校的成员。

我们是一个球队的成员，当我们聚在一起商议策略时，好像是他在指挥着球队。我对此很钦佩。我们还都年轻——他看上去干得很出色。我第一次有机会与他聊天，介绍了彼此。我问他是否来自反潜学校，他说，不，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我此时才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位哈佛高材生！

肯尼迪传

这也是许多人都有过的误解，低估年轻的杰克永远是一个错误！罗斯描述道：“在约有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每天下午都玩球。这是一种触式橄榄球，你可以在场地内任何地方跑动传球，在某种意义上，它更像是一种篮球比赛。他是一名优秀的传球手，可以控制整个比赛。”

罗斯可能永远也无法想到，不到一年，他竟会成为杰克的患难之交。更令“红色”费伊预料不到的是，他日后会成为杰克亲密的朋友。但是，尽管杰克酷爱橄榄球，但在梅尔维尔担任一名教官的生活让他越来越失望。而这种沮丧之情因他的背疾而日甚一日。另一位受训的橄榄球星约翰尼·艾尔斯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他在忍受痛苦的煎熬，事实上这种背疾开始于鱼雷艇学校。我的床位就与他相邻。很明显，他们是按姓氏字母顺序安排床位的。我的第一个字母是 I，而他则为 K，之间没有 J。托比当时来了这里，跟我们在一起，他住另一张床铺上。他过去据说也是一名运动员型的学生，只不过圆滑一些。

杰克在铺位下垫了一块胶合板。木板冰冷僵硬。天气寒冷，我难以入睡，有天夜里我叫醒他，让他给我出个主意。“在如此严寒的天气里，你们北方佬会如何御寒？”他不动声色地在我的床垫子下面铺了许多报纸。自此而后，我就每晚睡得很香。他总是乐意帮助朋友。他自己很痛苦，背疾无日不在折磨他。每天都睡在那张冰凉的木板床上，我记得他没有不痛的好日子。

肯尼迪传

有一次他向我丢过来一本书，说道：“约翰尼，努力慢慢适应这场讨厌的战争吧，请读一读这本我最钟爱的作者所写的我最喜欢的书！”事实上，这是一本他自己所著的书——《英国为何沉睡》，而我过去从未拜读过！

除了忍受背痛的煎熬之外，很多其他令他忧心忡忡的事情也无时无刻地不在折磨着他。他参加鱼雷艇部队，可没有想到却在罗德岛上的一栋瓦楞铁皮房里给一群年轻人上航海课！但回过头来，驾驶鱼雷艇在外执勤也没什么乐趣。尽管学员没有进行夜间训练，但他们却要全天候地出海。正如西姆所说的那样：“天气严寒之极，站在船尾，会把人给活活冻死。”

机会来了，在忍气吞声地当了五周的教官之后，1943年1月8日，杰克终于受命带着训练中队的四艘鱼雷艇进行一次1000海里的航行，奔赴佛罗里达的杰克逊维尔。杰克总算可以透透气了！

奔赴前线

“离开梅尔维尔让我欣喜若狂，”杰克后来给比林斯写信说，“当那种教官，真乏味透顶。纽波特大变样了，已经不是你家长宰了多年的纽波特了。”

惟一让杰克感到遗憾的是此时离开梅尔维尔，打乱了他与托比一起上前线的计划。

我努力使他们让托比进入梅尔维尔的那个乏味的学校，并免除对其进行预科教育。我原打算对他开小灶，结

肯尼迪传

果我突然受命离开，致使托比一时没了教官。我得到的最新消息告诉我，他被搞得很惨，他甚至动了回到公园广场大楼的心思。

原来的安排很令人满意，我计划带一个中队外出，而托比和赛·泰勒也在这个中队，并且托比担任我的副手，没想到突兀而至的命令打乱了一切。惟一令我自豪的是，我是他们当中衔级最高的军官，因此由我负责指挥四艘鱼雷艇。但说句实话，我倒希望与他们呆在一起，并与他们共同进退，然而，就像他们在谢菲尔德大饭店所说的那样，这是战争的特殊时期，难以事事遂心。

由寒冷的新英格兰海域到暖意洋洋的佛罗里达州，需要 5 天的航程，大家都盼着能够晒晒冬日的太阳，然而，航程本身可并不舒适顺利。杰克在船上给他的弟弟鲍比写信说：“昨天我接到了命令，现在正在赶赴前线的途中。对一个像我这样没有远航经验的年轻人来说，佛罗里达似乎遥不可及。我是在颠簸的鱼雷艇上艰难地给你打这封信的。”他们沿纽约海岸航线行进，以避开大西洋险恶的风浪。但是，第三天，1943 年 1 月 11 日，还是有一艘鱼雷艇不幸触礁搁浅。接着，在抛拖索的时候，杰克自己的鱼雷艇也搁浅。拖索缠绕在 101 鱼雷艇推进器的螺旋桨上。杰克凭着对自己游泳技术的自信，跳进寒冷的海水里，解开绳索。这样，四艘小艇才终于得以继续向南驶去。

但是，当他们赶到莫尔黑德市时，杰克便旧病复发了，就像过去一样。他打电话给梅尔维尔的托比，询问天气情况。托比说，已经滴水成冰了。杰克在电话的这头一语双关地说：

“北卡罗来纳的水更寒冷。”

庆幸的是杰克的病情在3天之内便得到了控制并出现了转机。医生诊断他得了“急性肠胃炎”。杰克留了下来，舰队继续沿保护航线前进。1943年1月16日，杰克在杰克逊维尔与小舰队会合。从此以后，他留鱼雷艇在海军造船厂里以便进行补给和装备，自己得以获准休假7天，在棕榈滩与家人团聚。

“我目前正走向前线，至少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他马上向比林斯通报，“不过，我们先是在杰克逊维尔作了暂短的停留，增添了一些装备。上周终于回了一趟棕榈滩，发现家是再好不过了。有些情况与你以前所知的有所变化——军方接管了激浪旅馆，另外，又添了一些新护士。她们的服务质量堪与以前古巴茶屋的相提并论。”

“伯吉·蔡斯兵役体检时被淘汰，此时也跟我呆在棕榈滩。他休整之后，将到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他的新职务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而且是在他没有通过纽约律师考试的情况下被录取的，可见人力是多么地匮乏。他说容易得就像上服装店挑衣服一样，你乐意进哪家法律事务所，就可以进哪家……你知道泽克的遭遇吧？海军因他血压高而拒绝收他——不过，现在他还是加入了海岸警卫队，而且已经开始受训了。”杰克奉承说，“实际上，你现在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接近战争，我打心眼里认为你当初决心出征的想法是正确的。”

不过，杰克不认为比林斯应该继续留在北非。“我认为你最好回来，因为你的成绩已经远高于标准，这是老少皆知、人人认可的事实——因此，无论你是否留在北非，你都已无愧于你的使命。”

或许，这正是杰克对战争的关键所在。如同他的朋

肯尼迪传

友查克·斯波尔丁所说，老肯尼迪也许是在为小乔和杰克筹划着重要的政治步骤，希望他们能够远离危险就能在未来的选举战中拔得头筹。但是，杰克却不理会父亲的良苦用心。在同年龄比他大两三倍的人讨论政治，固然能引起他智力上的成就感，而作教官也许会使他不必冒任何风险，但是，他都不以为然，都不能满足他心中熊熊燃烧着的那股强烈的欲望——他把自己与最近顶礼膜拜的英雄偶像——《墨尔本轻狂少年》中的明星人物洛德·拜伦挂上钩。英加曾经评价他有颗“鲁莽而聪慧的脑袋”，而现在，这颗脑袋忍无可忍了。

“前几天我得到消息，你的朋友约克·皮特尼失踪了，”杰克向比林斯通报说，“我的同学邓克·柯蒂斯也在圣诞节那天以身殉国了。”这些都是悲惨的不幸事件。这些消息令老肯尼迪深感不安，并写信告诉了小乔所在基地的天主教随军神职人员希伊神甫，让他关照小乔。但杰克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战场不仅是复兴肯尼迪家族荣耀的一个福地，而其中所蕴含着的冒险因素，更是满足他自恋式神秘欲望的关键所在。

据托比讲，杰克如此渴盼进行这种危险的冒险，没有与小乔一较高低的心理掺和其中。他说：“两人是一种颇为正常的兄弟，那种相互竞争的说法未免有点危言耸听。”然而，果真如此吗？约翰尼便不以为然。他认为：“哥哥在海军航空兵服役带给弟弟的挑战”是一种极为强大的压力。他们两位海军军官兄弟，曾经和他们的母亲在棕榈滩的照相馆身着戎装拍下一叠纪念照。小乔少尉刻意配戴了海军飞行员那枚弥足珍贵的金翼徽章，而飞扬跋扈的杰克则炫耀着他袖口上那两条中尉军衔的金色条纹。

在哥哥写给弟弟的信中，尽管他总会署名“你真诚的哥

哥”，然而，其中确实掺杂着许多善意的竞争意味。虽然“懦弱”的老肯尼迪颇为担忧，不希望两个儿子过分热衷于战事，但是，能够驾御庞大笨重的美国飞机，小乔的勇气和胆量是毋庸置疑的。在杰克逊维尔基地，小乔在 88 名毕业的飞行员中列名第 77 位。虽然长官们对他的“教导能力”不很看好，他还是被批准留任为教官，然后受命到南美某个安全的后方基地。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件事又是他父亲操纵的。

“哥哥现在在波多黎哥，并准备前往别的地方。”杰克随后写信给在北非执行任务的比林斯，坚信即使他干得不比他的哥哥出色，至少也能和他半斤八两。在佛罗里达待命之际，杰克将怀疑主义与热切的期待相结合的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给比林斯写信，告诉他里普·霍顿目前正在陆军军需部队服役，不过“考虑改行加入伞兵部队——因为他觉得，既然我的胃能承受海军生活，那么，他应该完全能够胜任伞兵这一职业。”同时，“麦克目前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我想那儿一定很有趣。同时，凯思琳仍在写专栏文章，“英加在前不久的一天打电话告诉我，她不想因自己的行为而酿造一坛苦酒。”他报告说，凯思琳的室友，冰肤凝脂、高 6.2 英尺的贝蒂·考克斯依然孑然一身，惟一变化的是自黛娜·布兰德定婚后，她与凯思琳稍感忧心而已。”黛娜的未婚夫年近 34 岁，“由于结婚率令人难以置信地高，显然，他是那种坚持自己的方式的老光棍，我相信，战争结束后，他们的现状也就是我们的宿命。英加也常去纽约与她的那位老朋友同宿共眠，”杰克伤感地说，“她是否结婚是另一回事儿，但是，她不应该那样生活——”他接着写了姬克的名字，然后又划掉了。

“就到这里吧，勒姆。这便是我所知道的全部的新闻。这

肯尼迪传

些鱼雷艇上的工作真是让我快意之极，你可以自由自在，就像过去我们驾船四处游逛一样。只是发动机让我有些麻烦，因为我向来对发动机这个玩意儿很怵。”

1943年1月22日，梅尔维尔第四中队的指挥官施佩希特海军少校命令杰克少尉去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的第十四中队执行任务。1月27日，少校确认了命令，在杰克逊维尔造船厂当总监助理，命令立即生效。2月11日，小乔中尉终于正式受命，前往杰克逊维尔的造船厂报到担任总监助一职，主管“与装备第十四鱼雷艇中队有关的事宜。”在那里，杰克知道了一件令人沮丧的事：第十四中队即将受命调往中美洲执行保卫巴拿马运河的任务。

新的任务

杰克现在所前往的第十四中队同弗雷德·罗森原来在路易斯安纳州的第十四中队没有任何瓜葛，那个中队并没有获得曾许诺给它的鱼雷艇，并被整编为第十五中队，被派往地中海执行任务。杰克前去报道的这个新成立的第十四中队的长官是理查德·E·约翰逊少校。他辖有四艘艇，就是杰克带来的那几艘而已。

在梅尔维尔因哈尔利的原因留任当教官，已经使杰克怨气冲天了，本次任务变动，杰克父亲的幕后活动更值得怀疑。更令杰克感到尴尬的是，哈尔利少校如今已统辖十二艘新艇，组建了第十二中队，打算往南太平洋执行任务，并决定任托比担任其中一艘的副艇长。

在托比的眼中，杰克这次又被“蒙”了，他因此得意洋洋

地给他起了个新绰号“呆瓜”。但是，这位对军旅生涯念念不忘的勇士并没有灰心丧气。保卫巴拿马运河之类的任务并不能满足他加入鱼雷艇部队时心中的期望。因此，就在他接到调遣命令后的第三天，就呈交了一份给华盛顿海军人事局局长的变动正式任务的申请，杰克申请“我应当被派遣到眼下正在南太平洋激战的某个鱼雷艇中队”。当天，1943年2月20日，约翰逊少校就批准了他的申请，但前提是杰克必须“找到一个接班人”。

杰克对海军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忧虑重重，因为他怕老头子赢得时间从中干预。因此，他抢先打电话与华盛顿联系，并直接与参议员沃尔什通话。去年他与沃尔什会面的好印象如今派上了用处。这位参议员立即催促海军的人事部门加紧步伐，甚至在杰克正式的请调公文抵达之前便开始运作了。尽管调职命令还是缓了几天才送到杰克逊维尔，但是，这个迟来的调职令对杰克而言，简直就是天籁仙乐：

即日起取消你在第十四鱼雷艇中队的职务，留待另用。你速速通过政府或民航工具奔赴太平洋指挥部所属指挥服务部队上班……并搭载首班政府或民航飞机，前去第二鱼雷艇中队所在港。到达后马上到该中队指挥官处报到。

1943年2月22日，得偿所愿的杰克欣喜若狂地把他指挥的四艘鱼雷艇的传送密码移交给了副手沙利文少尉。次日，约翰逊少校便批准了杰克的调职令。

再过几天，杰克就将奔赴西南太平洋的前线了，而哈尔利

肯尼迪传

的中队六个月后才能外出执行任务。“蒙人者”被“蒙”了。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杰克的那句大实话：“在美国海军中，重要的不是你的知识，而是你的人。”这只“跛脚鸭”终于出发上前线了。

第十一章 109 号鱼雷艇

奔赴前线

1943 年 2 月底，杰克在以“旧金山·诺伯希尔·马克霍普金斯大饭店”为标头的信纸上写信给比林斯的母亲，并请求她将信转寄给远在非洲征战的比林斯，信中写道：“这可能是我与他的最后一封信了，我将在很长时间内无法给他写信。”杰克又写道，当月的《哈佛大学校友会简讯》上刊出了一张美国战地人员在非洲沙漠中的相片，虽然该刊把其中的勒姆解释为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的奥马利·图尔，然而，杰克却坚信“那人就是从巴尔的摩去的比林斯。他看起来身体很棒。当然，他正在尽职尽责地为国家效力，并且还要再接再厉。他应当为他的贡献得到更多的荣誉。我希望他尽快回到祖国。虽然南太平洋宽广无垠，我希望能在什么地方碰到比林斯的哥哥特雷梅因。祝万事如意。杰克·肯尼迪顿首。”

杰克附寄给比林斯的信通过了军邮安检。他告诉勒姆，他“终于”可以奔赴前线了。“这两天就要出发……很高兴时机终于来了。当然，我也深知在南太平洋这个地方，静静地躺在白沙滩上，尽情享受徐徐的凉风是个太天真的幻想，另外还有那些土著姑娘，每天捧着采撷而来的松嫩的香蕉和香甜的葡萄送

肯尼迪传

入你的嘴中，且那里风光迷人。那里有的似乎是酷热、不绝的雨水和痢疾，另外就是些冷豆子罐头；所有的一切都对你的胃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杰克又幽默地说，南太平洋还不乏“蚊子和奇形怪状的虫子。如果真如他们所宣扬的那样糟糕的话，我计划在1944年把选票投给共和党”。“顺便提一下，我希望能见到麦克。你可能听说辛思马上要临产了，如果她能受得了生儿育女那撕心裂肺的痛苦，那么，南太平洋也没什么可怕的。有一阵子，托比和我，还有赛·泰勒本计划被编在一个中队，可是这个愿望落空了。很遗憾，我只好调往另一个中队去了。”

杰克还提及他在鲨鱼横行的南太平洋待的时间的问题。他忧虑地说，“由于兵员不断地轮换，在秋季之前我可能会返回，不过英加的丈夫可能还会待在这里。”杰克谈到凯思琳计划随同国际红十字会“到英格兰去”，“以前的伙伴，大部分都各奔东西了”，杰克告知比林斯这些事情，是想让比林斯万一决意立即回国时有一个心理准备。甚至泽克·科尔曼也在千方百计想进入“美国野战勤务”部队，他上周刚刚被海岸警卫队除名。“从中你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地苛刻”，杰克是针对部队医疗要求而言的。

杰克建议比林斯继续待在非洲，“假如那里的任务还不是很讨厌，那就等到夏天或秋后，或许甚至可以待到冬天再回国。”“冬天”也是杰克自己打算回国的时间。“如果那儿的工作让人乏味，就努力调往英国或别的什么地方吧。”

在即将上前线之前，杰克并没有谈到自己可能战死的问题，相反，他却让别人关注巴尔的摩一家报纸刊载的比林斯相片的事。他询问道：“他们如何搞到那张照片的呢？难道是那

天早上他们碰巧从开罗寄来的邮袋中发现那张照片的吗？”

最后杰克以命令的口气缀了一句“给我回信”，就此搁笔。3月6日上午11点，他奔赴停泊于旧金山港的“罗尚博”号运兵船报到。下午5点钟，该船从34号码头起程，前往澳大利亚的新赫布里底。

对杰克来说，这只是其极富戏剧性的生活之旅的序幕。事实上，如果说此后几个月在西南太平洋发生的一切造就了美国总统杰克·肯尼迪，一点也不为过。在太平洋彼岸数千英里之外的地方，脱离了父亲的掌握，远离曾经影响其早期生活的绥靖主义、孤立主义以及干预主义的无尽争议，杰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此外，他终于在25岁的时候上了前线，从事一度成就了像丘吉尔、劳伦斯等他心目中诸多英雄豪杰赖以成名的壮举。

令人思之捧腹的是，运兵船驶过阿尔卡特拉斯，抵达金门大桥下时，船上军官却围绕着绥靖主义在展开争论。一伙军官认为，倘若英国前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慕尼黑会议上能够显露出更多一点硬气的话，那么，人类历史上就不会有敦刻尔克大撤退或“珍珠港”事件。没过几分钟，杰克便与邻舱的一位名叫J·A·里德的海军少尉军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里德回忆说：

当时，我的舱内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来自华盛顿，另一位是J·P·摩根的孙子，保罗·彭诺耶，他年前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打算马上出去驾驶鱼雷艇。总之，当时有一群人围聚在我们的卧舱内。后来，年经的杰克走了进来。事实上在那之前，我只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后来，我们

肯尼迪传

讨论到英国的绥靖主义问题。我当时持反对张伯伦的态度，大家辩论得很激烈。杰克站在另一方，替张伯伦辩解。我们争辩了很长时间……我当时并不知晓他著有《英国为何沉睡》一书。但是，我还是要承认，当时他驳得我理屈词穷。不过，他是用那种最温和的方法与我争论。

这便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我的意思是，他会诸如此类争论的议题进行严谨、苛刻的寻根究底，但是，他从不把争论的矛头指向某一个人，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才能。争论使我们很快地变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羞涩感，不太张扬自己，这一点本身就颇让人喜欢。我敢打赌，我对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纯洁。我想说的是，我是被他的个人魅力所吸引的，当时并不知道他有个显赫的家庭。

不过，里德很快就知道了杰克的身份。“有一天晚上，大伙围坐在我的房间里。当时，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罗雷不知从何得知杰克是约瑟夫·P·肯尼迪前大使的次子。他对杰克说，杰克的父亲在电台广播中讲的话他听过，令他感到不解的是，老头子说话的方式竟然与其他波士顿的爱尔兰人近乎无赖的行径大不相同。我认为他说这样的话是想讨好杰克。杰克当时只是看了看他，但是，杰克事后对我说，要不是自己自控能力好的话，那小子早就被他痛击一顿。”

小乔与杰克性格不同之处就表现在这里。小乔坦率，性格暴躁，而他所谓的“著名的耐心”正是描述他那种性急易怒的委婉语。小乔在波多黎各驾驶飞机时的副驾驶员诺曼·拉德后来回忆说：“他缺乏与他出身背景相异的人的交往能力。”而中

队的另一个同事回忆，他似乎在恪守新英格兰长春藤联合会的陋习，遇到陌生人，除非由第三者引见，否则绝不主动打招呼。

而杰克似乎有一种超凡的魅力，他有能力将与他社会背景、教育、宗教信仰、籍贯迥异的人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当时与他同船的来自密苏里州的爱德加·斯蒂芬斯 45 年后愉快地评价说：“船上的陈设简陋至极。我们被指定到一张大餐桌旁的座位上，当时，我就坐在杰克的旁边。一开始，我就觉得他是一个谦恭平和、非常不错的年轻人……那种懂得如何简明扼要地表达观点，而坚守自己立场的人。”

很明显，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为他的魅力所深深吸引，也无论那些人是他的同辈，还是类似福里斯特尔或沃尔什那样年岁较高的长者。尽管他哥哥冷淡鲁莽，难以信任，但杰克却谦恭得体，聪慧过人。当谈到父亲时，他并没有显露出自我炫耀和有意猎取溢美之词的浮浅，而只是表现出一个敬畏于父亲的乖儿子的形象。“我记得他谈论其家庭和父亲的情景，”里德回忆道，“他对我说‘里德，你会喜欢我父亲的。他的逻辑思维能力极为出众，总是能切中问题的要害。’”

在这一点上，杰克无疑是他父亲的成功产品。

里德说：“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彼此谈论了许多东西，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生活、书籍、历史以及漂亮姑娘们。我与他很合拍。我们几乎是在一夜间便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但是，结识新朋友并非是杰克西南太平洋之行的目标所在。他周游过欧洲，走访过苏联，去过巴勒斯坦，到过南非；相比大多数同龄人，他更为熟知起于马萨诸塞州止于佛罗里达州美国大西洋沿岸的风土人情。他的启蒙始自亚里桑纳州，随

肯尼迪传

后又在加利福尼亚上学。但是，他的足迹从未踏上远东，或是跨越过国际日期变更线。所以，此次乘坐“罗尚博”号运兵船的远航是一次通往新半球之旅，是一次他再一次体味世界的良机。

与杰克一样，里德也理解战前美国的和平运动浪潮。他回忆说：“当时，我也坚信战争是一种可怕的事情。而我也是在顾虑重重中参加海军的。杰克自然也不是战争狂，绝对不是。像很多人一样，他只是坚信自己认为正确的理念而付诸实施而已。他胆怯、害怕吗？我记得我们从未讨论过这个问题。不过，我记得我们曾顽皮地做过一件事。那时，运兵船上有许多海军飞行员，我俩就常坐在旁边仔细地观察他们，然后，只是简单地从他们的外表长相来判定谁可能会首先以身殉国。其中有一位年轻的战斗机飞行员，被我俩双双断定为第一个记在死亡名单里的人。”

美军的软肋

就在杰克所在的运兵船将奔赴前线的军官和补给物资运往赫布里底群岛的途中时，太平洋战局也有了新的转机。尽管澳大利亚步兵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联手终于成功地抢夺回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但美国海军仍无法阻挡从瓜岛要塞撤退的日本人。海军鱼雷艇部队的官兵英勇善战，但故障频出的鱼雷艇，加上木质的艇身和易燃的油箱让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原先号称最具战斗力的鱼雷艇原来是一种低效率的武器。海军鱼雷艇部队减员很厉害，但却没有一艘日军的运输舰被击沉。当时，日本钢壳的驱逐舰，穿过分隔所罗门南北列岛的水道，前往瓜达尔

卡纳尔群岛增援，不费吹灰之力就在三个夜间把近 1.2 万名驻军毫发无损地回撤转移。甚至连颇具爱国主义精神的美国海战史学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也为之赞叹不已。他写道：“在海战史上，还从未有过像日军放弃基斯卡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那样狡黠机敏的撤退。”

杰克前往太平洋西南部，就是去弥补图拉吉岛美军第二鱼雷艇中队的人员匮乏状况。然而，该中队当时的几次战绩告诉人们，鱼雷艇在附近水域能否发挥威力还是个未知数。此外，1943 年 2 月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结束后，太平洋西南地区的陆战已告沉寂，盟军指挥官就是否肃清日军残部的问题展开争论。是否应让所罗门群岛上日军残部继续“苟延残喘”呢？实际上，他们争论的焦点是，盟军是否应该集中全部兵力，在太平洋西南部发起第二次攻势？抑或是在太平洋中部更接近日本本土的地方发起攻势？

1943 年 1 月，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在卡萨布兰卡的会议上已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会议上，海军金上将反对丘吉尔首相所提出的“优先打败德国”的战略设想；他还指责丘吉尔是一个骗子，所谓保证在结束欧战后会派遣英国军队协助打垮日本的承诺纯粹是开空头支票。而丘吉尔则辩称愿意就此事签订一个特别协议，但罗斯福为了平息双方的怒火，否定了这个意向。罗斯福还说：“大英帝国绅士讲的话，值得美国人民信赖。”

可是，金上将一回到首都，美军将领之间却又开始了火药味十足的争吵。马歇尔将军提议把太平洋战区的所有部队划归陆军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统辖；而海军金上将则坚持将统帅权交给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而那些不在乎谁掌握统率

肯尼迪传

权的各军种指挥官也纷纷派人返回华盛顿发表意见。本次辩论的焦点是，既然卡萨布兰卡会议已制定了“优先击败德国”的策略，盟军是否还有必要在远东对日军发动小规模进攻？当时，这个计划引发了一场新的争论。

麦克阿瑟将军当时强烈地要求抽调更多的兵力、战斗机，被视为是一张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赌牌。然而，麦克阿瑟认识到，要想克敌致胜不能仅靠海军，尤其不能依赖巴尔克利所幻想的鱼雷艇部队。但是，麦克阿瑟想要的战斗机掌握在美国空军的手里，可是，当时心灰意懒的空军将领们只热衷于对日本进行战略轰炸，而对实施小规模战术行动不感兴趣。

为此，麦克阿瑟将军不仅遭到自己所属空军将领们的不满，而且还招致对他满腹怨言的几个海军上将的反对。结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将麦克阿瑟的计划打了折扣，只批准盟军从拉包尔东西两侧对相对较少的日本守军发起有限的钳形攻势。而尼米兹上将的中太平洋战略计划却得以完全通过。

让人乏味的是，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问题上也曾有过类似的意气之争。而结果都是以折衷收场，相互妥协的战略方案代价高昂，近乎惨无人道。为了争夺意大利和所罗门群岛，盟军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了艰苦卓绝、伤亡惨重的登陆战役和地面战役。但对盟军而言，这两地区又没有什么太大的战略价值，只是让德日军队展示了他们令人思之色变的防御能力。

由于美军作战行动和战略的变动，初上征途的杰克发现他很难进入战场的第一线。1943年4月1日，当他们一行抵达圣埃斯皮里图岛时，这里已成为美军战役和战略的后方。如同盟军在意大利的战役一样，麦克阿瑟将军的西南太平洋战区注定

只能成为一个令其尴尬不已的战区：扮演乏味的、分离的两翼掩护角色，而海战的主体将由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指挥，由其麾下的中太平洋部队承担。当时的中太平洋舰队号称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海军舰队，共有 11 艘航空母舰，6 艘巡洋舰，6 艘战列舰，另外还有数量众多的驱逐舰和各式小型舰。

庆幸的是，走下“罗尚博”号运兵船的杰克，当时并不知晓美军因将领间的意气之争而改变战略的背景。当时圣埃斯皮里图岛的港湾内，闲置的美国海军舰队百舸共济的景象依然让他们没齿难忘。“回想起来，我一生中所见到过的最振奋人心的场面就是在那里，”里德回忆说，“我们奔赴圣埃斯皮里图岛，从外海沿一条河流进入港口，河面宽几百码，几经曲折才进入宽阔的港口。当我们进港时，战斗机呼啸而下，准备降落。当船绕过最后一个湾进入港口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美国海军南太平洋舰队。‘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就静静地停泊在里面。我与杰克一起站起身来，打量着那个庞然大物，我还记得杰克说，‘真是太雄壮了！’我想说，那景象真叫人颈背的肌肉开始战栗，真是太令人振奋了。”

里德和彭诺耶乘船前往新喀里多尼亚的首府努美阿公干。里德记得，当时杰克是在圣埃斯皮里图岛下船和他们俩人挥手话别的，接着，杰克上了“一艘用来联络的小船”离开了。

当晚，即 1943 年 4 月 3 日晚，杰克登上了 449 号运输登陆舰。该舰在第二天上午 11 时起锚出港，途经珊瑚海，奔赴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图拉吉——杰克的目的地。

然而，仅仅过了三天，当该舰驶近瓜达尔卡纳尔岛北岸时，船上的官兵目睹了奇怪的一幕：一组美国运输船和驱逐舰向他们冲了过来。他们事先并没有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事实

肯尼迪传

上，他们将目睹自瓜达尔卡纳尔岛惨烈战役停歇之后日军所发起的最大规模的空袭。日军出动了 170 架战斗机，气势汹汹地扑向亨德森机场和图拉吉港。眨眼的功夫，飞机到达上空。杰克所乘的登陆舰差点被一枚炸弹击中，舰长的脖子被炸伤。

杰克所乘的登陆舰满载燃油和高爆弹药，准备补给在拉塞尔群岛作战的美军几个中队。倘若舰体被炸弹直接击中的话，那么，对杰克而言，战争将在此时此地结束，而生命也将如此结束，如同以身殉国的美国运油船“阿伦沃德”号上和“卡纳瓦”号的同胞们一样。这两艘不幸遇难的船，前者中弹后燃烧沉没；后者轮机舱被击中后，没过多久，便在佛罗里达岛外的三英里处坠入海底。

杰克本以为，现在应是扭转战局的时候，但这个场面却与他的愿望大相径庭。杰克后来写信给远在非洲执行任务的比林斯，谈到“他讨厌日本鬼子作战的方式”时说道：

首先让我告诉你我们的敌人是个什么样子——我到达图拉吉那天，他们便对我们实施了大规模的轰炸。由于我们登陆舰上满载燃油和炸弹，同时又是一条老船。我认为我们应该撤退，过几天再返回。但，自以为是的舰长显然以“北卡罗来纳”号登陆舰的指挥者自居，命令继续向前航行。日本飞机围着我们轰炸，我们旁边的一艘驱逐舰被击沉了，不过，幸好我们还没出什么事。战斗暂歇之后，有个日本军人跳伞落进水里，被卷来卷去，我本打算将他捞起来，谁知当船离他约二十码的距离时，他突然丢掉救生衣，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朝我们舰就是两枪。我当时一面祈祷，一面传送弹药。看到他开枪我非常吃惊，心想他

一个落水之人，如何能与一艘军舰较量。接着，我们开始还击，打得他身边的海水水花乱溅。或许是大家有点心慌意乱，谁也打不准。最后，我身旁的一位老兵端起把步枪，一枪便将那鬼子的头顶盖给掀掉了。他双手一挥，向前一扑，跌入水中。然后，我们调头开走了船。这只是往后五彩斑斓的岁月拉开的序幕。这件事中可以让我们警醒，这场战争必将是长期而艰巨的。

为了避免遭到拉包尔日军的再次轰炸，449号登陆舰改变方向调头向圣埃斯皮里图岛方向航行了几天。再后来，该舰最终奉命转向，于1943年4月13日抵瓜达尔卡纳尔群岛的隆加罗兹，次日又马不停蹄地向北越过佛罗里达岛。杰克下船后，乘坐小艇穿越分隔佛罗里达群岛与图拉吉岛的海峡，奔赴西萨皮，或有人称之为卡尔佛特维尔。西萨皮地处图拉吉岛西岸，是太平洋西南部的鱼雷艇部队的母基地。杰克为期240天的训练和奔赴前线的旅程至此告一段落，而他的鱼雷艇战斗生涯即将拉开帷幕。

家里的圣诞节

让人忍俊不禁的是，约翰尼·艾尼斯与乔·阿特金森比杰克先到达图拉吉。“大约是在4月上旬，”约翰尼回忆说，“那个时候，战事差不多已经停止。我逢人便谈杰克其人，夸他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小伙子，我想说的是肯尼迪颇有吸引力。那时，我们所有的人全部挤住在一座临时的大营房里，睡的是一间土著人住的旧茅棚，类似于大牛棚。每隔一个晚上我们出海巡逻

肯尼迪传

一次。因此，每天下午都闲着无事，海阔天空地神吹瞎侃。其间，我常向他们讲一些有关杰克的事情。基地有一个小艇码头，在低洼的地方还铺有起落飞机用的垫板。有一天，正是在这个地方，他从这个‘跑道’上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能够在远在海外的异国他乡见到朋友，杰克的确颇感兴奋与慰藉。他在中队指挥官阿尔·哈尔西处报到后，立即被派到47号鱼雷艇，担任乔治·赖特中尉的副手。该艇是一艘“埃尔科”级快艇，长达77英尺。他就是坐着这艘鱼雷艇在瓜达尔卡纳尔海域上进行第一次巡逻训练的。哈里斯回忆说：“当时，第二鱼雷艇中队人员流动很快。许多艇长任务满届后，常被轮换调回美国本土或者其他地方，这里极缺艇长。”

基地的状况与马克霍普金斯大饭店相比起来，让人觉得窝囊，里面仅有一些破旧的帐篷和土茅棚，杰克对此有点不适应。此外，英加的杳无音讯更使他在适应新环境方面困难重重。杰克写了一封长达六页的信。信中写道：“亲爱的，事情越来越明朗了，自从你被北美报业联盟雇佣后，除了写有相当可观的酬金的文章之外，你从未给我写过一丁点的文字……我决不会这样做的。倘若说仅凭我们过去的友情麻烦你写封信来谈谈近况还无法打动你的话，那么，我想说，请你为这场战争出点汗吧——请写封信来，而不必为我织一双袜子。”

紧接着，杰克又回到原来的话题，把他对这场战争的最新感受一股脑全告诉了昔日的情人。

我希望能够言简意赅地给你描述一些第一手战况……我不止一次地提到世界大战、全面大战以及后勤补给战等有些专业色彩的字眼，但没有进行详述，其原因有二：其

一，我知道你对战争不感兴趣；其二，开诚布公地说，我也知之甚少。由于后勤缺乏保障，我所订的《华盛顿先驱报》每次都缓缓来迟甚至要晚期两个月。假如你不是在纽约或华盛顿，或是卡萨布兰卡，你就很难对一场如此规模的世界大战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我明白我们正在走向胜利，这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事。虽然胜利的曙光还没有显现，但是，我认为，越远离祖国，就越有胜利的信心，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如果我还在国内，我也可以顺手拿起一份日报信口开河，“那些傻瓜，派到国外为什么不去做点事呢？”这场战争有意思的事情之一是每个留在国内的人都想出来上前线杀日本鬼子，而出来的人却无一例外地都想返回俱乐部舰休整。我认为应该有个事业心强的人站出来拿出点办法，使大家调调位置。但至于我如同我听到你所说的那样，一切都是我自己主动要求的，亲爱的英加，我要的东西已经在我掌握中了。

杰克坦言，到手的与“我内心深处所幻想的东西”天差地别。杰克原本认为，前去太平洋，他“可以恬然自得地坐在凉风拂面的太平洋海滩上，一位热情的土著少女，为我温柔地放松按摩。此刻，她的漂亮妹妹则到外面忙着为我采撷鲜嫩的香蕉”。然而，实际上，由于第二中队的鱼雷艇艇身为木质结构，性能时好时坏，且未能达到其应有的速度，而配装的鱼雷航速缓慢，命中率偏低，白天又只能躲在港口内，夜间的行动也因缺乏雷达导航而困难重重。数月的征战后，官兵们的士气已低靡不振。而且就在杰克来后不久，两艘鱼雷艇中的一艘中队长

肯尼迪传

的指挥艇被日本驱逐舰击毁。艇员们在鲨鱼横行的海域喝了一天的水才被救起。杰克在信中说，这些“前线战士”常讨论的不是战争，甚至对他们所在海域的战事也很少谈及，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何时才能回国团圆。大伙一有风吹草动就说总算可以回家了，但是，传闻总是不准确”。

杰克继续写道：“众人津津乐道的第二个话题是他们如何在过去逍遥如意，”以及一旦回家后“如何好好地喝他个沉醉如泥”。“里肯·巴克主张把前线的小伙子们遣送回国参加生产，但我发现人们与他指的那一群人完全不同，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回到工厂里去了。”

此时，由于艇长匮乏，这就预示着杰克有担任某艘鱼雷艇艇长的可能。1943年4月25日，杰克在抵达11天之后就升任艇长，掌管布赖恩特·拉森的109号鱼雷艇。这条老舰是第二中队里经历1942年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之后硕果仅存的两艘长达80英尺的“埃尔科”级快艇之一。

拉森久经沙场，长期在环境恶劣的瓜达尔卡纳尔岛附近海域执行任务。退役后等待调离回国。他对杰克这个单薄、削瘦，来自波士顿的年轻接班人颇觉得对他不起。拉森虽然留下109号鱼雷艇的原副艇长伦尼·汤姆任原职协助杰克，但是，其他人不是被调动，便是等着轮换回家。祸不单行，三个1350马力的大型航空发动机现在也性能不稳，有时甚至都启动不了。

所以，杰克的统率才能根本无从发挥。甚至连他身为前大使之子的出身也被拉森视为一种烙印，成为众人嘲讽的把柄。他的背景如同是“他额头上的一个烙印，我感觉这将对他产生消极的影响。”拉森后来回忆说，“但是，他却出色地挑起了这

副担子。”

“这里比以前的地方好多了，”杰克在信中向比林斯通报说，“我已经从原中队调了出来。看来，我先前所属的中队将在战争剩下的时间里奔赴巴拿马——我目前正在另一个优秀的中队，而我还掌管自己的鱼雷艇，我要在此重新开始。”

杰克还用同样愉悦的口气向他的父母写了信。“提及这里的环境，情况还过得去，当然，我指的是在干季时节。”杰克写道，“雨季多雨潮湿，每天都有四五个小时的雨——连绵不绝的大雨，几乎全部东西是湿淋淋的。我蓝制服上的青苔已有四分之一英寸厚。”

所谓蓝制服并非战斗军装。同其他绝大多数同僚一样，杰克只穿一件汗衫、一条水兵裤、一双鞋子，腰带上悬挂一柄带鞘的军刀。“我们每隔一夜出海巡逻一次，”他介绍说，“白天玩弄一下鱼雷艇，之后就是昏头大睡。他们一般下午 5 点 45 分叫醒我们，6 点 30 分便进行灯火管制。由于我们住的茅棚四面空空荡荡，因此，全面管制灯火。基地刚刚建立了一个只有一个大帐篷的军官俱乐部，”大家戏称之为皇家棕榈俱乐部。在那里，“有一种含有酒精的饮料，是用鱼雷管把各类含有酒精的液体混合滤制而成，所以又称作鱼雷汁。每晚 7 点 30 分，帐篷里便人满为患。接着便有四五个人猛地冲出去，搜肠刮肚地吐了一地，然后蹒跚地跌倒在床铺上。杰克说，“这种饮料是这里最可以‘牺牲’的东西，任一种自制酒的烈性都难以与其匹敌。但不必担心，只要你忍住不去多喝，一般是不会造成什么永久性危害的。”

杰克在信中清晰地对比林斯说，他可不愿意在热带海岛上长呆下去。当时，比林斯已经跟随得胜的蒙哥马利从埃及的阿

肯尼迪传

莱曼奔赴的黎波里，准备转战突尼斯。5月12日，轴心国的25万大军在那里向盟军举了白旗。比林斯希望能调到南太平洋战区的英军部队去杀日本鬼子，但杰克却不以为然。杰克5月6日写道：“你的来信收到，很高兴得知你依然毛发无损。毋庸置疑，你已经拥有了那份令人回味无穷的经历——如果是我的话，我将返回国内，加入陆军军需部队，安定下来，好好地休养一下，缅甸听起来好像不错，其实仅仅是过得去而已。但要是我的话，宁肯选择回国。”但是，他提醒比林斯说，他是“在南太平洋上的一间土著小茅屋里给他写信的”。有关国内的朋友们，大多无甚变化，“泽克和凯思琳在棕榈滩。小乔在诺福克——老爸在南方，极不情愿。”至于姬克想与那位英国情人洛德·哈廷顿结婚而摇身变为“一位伯爵夫人”，杰克有些“难以置信——不过，嫁给他也不错，也许我会有个爵位或其他什么贵族头衔。”

在这一点上杰克却错了，另外，他一心想尽快返回美国的想法却一点也没有错。“由于任务相当艰苦，他们对休假也不太为难，所以，我渴望能在圣诞节之前回家。”杰克透露说，“现在庆幸还太早——但，我相信假日终究会有的。”他又建议比林斯去拜访一位叫作“J·R·多伊尔姑娘。我期待着与你在一起——今年圣诞会碰面的。”他承诺。

前仆后继

刚到时遭遇的日军空袭以及对瓜达尔卡纳尔战场的凭吊，使杰克逐渐意识到了死亡的威胁。他在给英加的信中说：“对乔治·米德基的哀悼是我许多伤心悲痛的事情之一。他们最先

登陆的海滩附近安息着他们的灵魂……他的坟排在第一排，简朴至极。坟上覆盖着一块可能是用餐具制作而成的一块铝板，上面粗糙地写着：美国陆战队中尉乔治·米德，逝于8月20日，‘一个伟大的带兵官——愿上帝保佑他’。追悼米德墓大概是我黯然而神伤的一次经历，真叫人泪如泉涌。”

杰克是否也会成为一个“坟墓英雄”呢？他能否幸免于难呢？杰克在给比林斯的信的上方潦草地写道：“阿尔迪·豪在外阵亡了，我也刚听到。”他依然期待着赛·泰勒和托比在下个月到所罗门群岛与他一会。事实上没有，他们所属的中队在支援美军登陆作战，而泰勒便在新几内亚的外海不幸阵亡。

与此同时，杰克再次以诙谐的口气给父母写信：“这里有一帮好伙伴，无论如何这里还不算太坏。”他告诉他们，也试图打消他们可能存有的疑虑，“我所提及的那些人很快就要回国，我的意思是‘我们’。”他对美国将最终赢得这场战争充满信心，但是，却对麦克阿瑟的战略不以为然。杰克评价说，“蛙跳战术无济于事。如果他们真的那么干，那么，我想连这里标语上写的‘48年重返金门大桥’的愿望都显得遥不可及。”

老肯尼迪夫妇看过报纸后，认为麦克阿瑟是一个大英雄，但杰克的同僚们却不以为然。“所说的麦克阿瑟颇声名远播的话很值得玩味。”杰克特别强调，“但是，这里却没有人知道他，实际上，他的知名度非常低。他有个‘掩体里的道格’的绰号，好像是在第一次攻击瓜达尔卡纳尔岛时获得的。那个时候，陆战队建立滩头堡之后，本应由陆军前来替换。但是，在随后的93个日日夜夜里陆军的影子都没有出现。无论是对是错，大家认为麦克阿瑟难辞其咎。据说，是他拒绝调遣陆军前

肯尼迪传

去换防——‘他远远地躲在澳大利亚的掩体里袖手旁观，让陆战队自己独力承受一切。’”

但是，在杰克眼里，海军陆战队的确没有退路，只能继续战斗。杰克介绍道：“由于日军建设亨德森机场的速度极快，使海军的行动压力重重。”事实上，空中优势是现代战争的关键，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亨德森机场有利于日军充分发挥这种空中优势，既可以为他们自己的海军和舰船活动进行掩护，又可以空袭来往的美军舰船。美军“刚刚进入阵地，尚需进一步地调整。此时，陆战队为了报复日本人而发动了一次猛烈的攻击。而日本军队在没有搞清楚敌人是陆战队还是陆军部队之前是不会缴械的。如果是海军陆战队，他们就誓死不降，原因是陆战队不收容战俘”。他毫无遮拦地说道，“至于麦克阿瑟，毋庸置疑，当陆战队员们陆续返回国内后，‘掩体里的道格’的绰号便四处流传——我想这一点足以使他颜面尽失的。”

当时，杰克周围的人似乎对政治不感兴趣，可是，野心勃勃的杰克的政治嗅觉却总是那样的敏捷。“这里的人对政治漠不关心，”他写道，“他们只是对回家感兴趣——日日夜夜望穿秋水。他们对回去后能否拥有选举权根本无所谓，他们投罗斯福的票或许仅仅是因为他的名字比较响亮而已。”

同时，“老爸呆在南方，沮丧又难过”，简明扼要地描述了他父亲目前的状况。像林德伯格一样，这位前大使已沦为历史的抛弃物，在棕榈滩过着自我流亡的放逐生活。像持绥靖立场、眼下独居巴哈马的温莎公爵一样，他常邀请记者和巡游的权贵到他最喜爱的饭店共享自助餐，寄希望于他们能为他杀回政坛制造舆论，尽绵薄之力。”

为此，南太平洋寄的长信便成为老头子的慰藉。这些长信

不仅新颖独特、且开诚布公，敢于论理批评，颇有他父亲平素喜爱的风格。而且还批判了这场老头子一向也不希望发生的世界大战，并承诺“将在一年内回国”，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一个失势父亲的理解之情。

对前大使而言，正在作战的次子所展示的机敏、诙谐和忠心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从他自己在一战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为杰克感到骄傲。请注意，杰克从不愿意以冠冕堂皇的任何形式的爱国主义口吻来写信。如果有的话，他只是突出强调美国在战争方面的低效率。“从战争所需的时间来看，我对它会在三年之内结束不抱希望。不过，我坚信胜利最终会属于我们。我们拥有更好的人员和武器。我们的飞行员和飞机都优于他们，”他如此宣称，“我们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杰克眼里，政府以及军队的官僚作风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想，巨大的障碍是他们卸船的那种随随便便的慢吞吞的方式。船已经在港内等待了数个星期，还没有足够数量的‘希金斯’船将他们卸载。首先，他们应该修建他们自己的码头。”现在，“他们在浪费船只，事实上，在外人眼里这便是他们的惰性所致。”

“要是有人认为，军人们都在为传统的美国精神而战，你可千万不要盲从，”杰克告诫他父亲，“他们又召回了许多迟暮的老人当舰长和指挥官，并让他们当这些港口的负责人。用菲茨的话讲，他们是一些脖子上面空空如也的糊涂人。我乘船抵港后，竟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船开进来。船上的数百名官兵，在港口里整整等待了两星期，两边的信号只是无谓地打来打去。只有一个人，让大家能够信任，他就是海军上将哈尔西。他拥有最高的权威。”在此之后的几天内，杰克将亲眼目睹哈尔西。

肯尼迪传

至于麦克阿瑟，只能等到几年之后了。

此时，杰克也想阻止小乔来太平洋与他在一起的想法。“我知道这样说有些不入耳，”杰克在信中写道，“但如果我的话，我要仔细考虑一下。为证明自己与众不同，他也会到这边来的。但是，等他来了之后，就会与大伙有同样想法，他第二天便心急火燎地想回家。”

“我非常高兴我来到了南太平洋，为了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我不能错过这次机会，”杰克给英加写信说，“但是，我也非常乐意回去。我再也不会傻傻地一心要离开那温馨的壁炉了，至少会等为壁炉添一把柴禾再走。”

“你那边如何？”他急切地问道，想知道她最终是否与她的那位丹麦男友结了婚。

你真的决心永远过那种家庭主妇的生活吗？或是你还记得你向我的承诺，等我回去要做晚饭、早点的那些话吗？请不要拖泥带水地回答我的问题好吗？以便让我审查一下我所为之奋斗的一切是否物有所值。你不必为此感到过意不去……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要等，不过，到时我会回到你身边，两眼全是红的。

我的好几个幻想都已烟消云散。但，你是令我依然羡慕渴望的人，虽然我不认为这个字眼是我想要表达的确切意思。我所指的，是我出发时脑子里翻滚的，南太平洋是一个逍遥自如的人间天堂。现在我悲哀地发现，就是你在那里游泳，你的耳朵眼里也会生出可恶的霉菌来的。

杰克风趣地描述说，结果是：“我浑身霉菌地返回美国，

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向政府请求一大笔也许我拿不到手的养老金，请你吃顿饭。然后，就佝偻着一个僵痛的驼背，灰溜溜地到西棕榈滩的老水手之家度过残生……”

“就此搁笔，亲爱的，”他充满爱意却略带揶揄地收笔写道，“我不得不走了，美味佳肴等着我去享受，这些膳食可谓做工精良，烹调考究，用膳的地方舒适幽静，使人逸神养性。”

食人生番

杰克强烈地想回到佛罗里达州，有他现在所处的岛屿到处霉菌丛生的原因，而且岛上没有姑娘也颇使他难耐寂寞。不过，渐渐地，他开始把心思集中到他自己的同僚身上，患难与共的战友情开始弥补享受不到美味佳肴的缺憾。

“今天我们出海进行了一次突袭，但是，总而言之前几个星期大伙有些散漫。”他写信向父母汇报说：

我猜近一时期类似的例行任务总会有的。我们每隔一夜出海巡逻一次。天气晴朗，夜间巡逻应该是一种享受。磷光闪闪的海水的波纹，以及如光一样闪耀的飞鱼让人流连忘返。你通常会看到两三只海豚在船舷下的海水中无所顾忌地游戏，无论鱼雷艇开得多快，它们总能在船前差不多6英尺的地方悠哉乐哉地游着。

这段日子的训练效果差强人意。我的手下全是新来的。当两军决战的日子来临时，我希望他们有能力将开火炮与上手表发条清楚地区别开来。

肯尼迪传

在部队里将军享用的膳食与提供给前线战斗人员的大不相同，这已不再让杰克大为光火了。他给英加写信说：

谈到伙食，简直是糟糕透顶，不过我还能忍受……我终于察觉那些牛排的踪迹了……那些所谓“小伙子们很快会享用到的”牛排。这些天“我拉着不少将军到处跑，很明显，尤其是自从麦克阿瑟临阵脱逃之后，这样的话便四处传开，说是当将军的如果想步步高升，那么，坐着鱼雷艇跑来跑去终会得偿所愿……于是有这样一位将军坐上了我的鱼雷艇。我与我的副手轻而易举地便装出一幅因饥饿而虚弱不堪的样子来，最后，那位将军终于大发慈悲，邀请我们吃一顿饭，结果，我们一到，牛排、青豆、土豆、芦笋和啤酒就源源不断地送了上来。我们像饿狼扑羊一样，一顿狼吞虎咽便风卷残云……当我们打着嗝，将军便开口了，他说据他所掌握的情况，大家吃的东西没有太大的差别，惟一不同的是他吃的只是做工稍微细一点……当时，我已是一瓶啤酒下肚，俗话说吃人嘴短，自然只能忍气吞声。加上我想起海军条令的第 252 条中说，陆军将军难免有错，海军将军永远正确。再者，考虑到部队伙食分配问题应该由比我和将军更机敏精干的人来负责，所以，我只是把话咽在肚子里，转而去谈论其它话题了。

杰克自从升任艇长后，信心愈发地高。这一点在第二中队指挥官艾伦·哈里斯 5 月份填写的述职报告中被反映得淋漓尽致。杰克得到的评价近乎完美无缺，船务操作一项上得了 4 分的满分。而“指挥能力”上也得了 3.9 分。艾伦在最后的评语

中写道，“该军官技能娴熟、果敢、胆略超人，能够圆满完成所交给的各项任务，他定能为海军增光添彩。”

然而，就在5月底，哈里斯被调往另一个中队。一位刚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的24岁的阿尔文·P·克拉斯特接替了他的位置。相比杰克，他或许更看不起海军，对鱼雷艇的战斗力和蛙跳战略更是嗤之以鼻。克拉斯特后来回忆说：

“日本鬼子完全击溃了我们。不过，当杰克抵达所罗门群岛时，战争形势已经扭转。日军已被击退，撤出拉塞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白天，我们掌握着空中优势，我们的驱逐舰和巡洋舰也比较优越，那时，我们正在加紧学习夜间作战技能。与以前相比，情况好多了。”半个世纪之后，克拉斯特对他与杰克初次发生小冲突的情景还记忆犹新：

我老爸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而我对总统以及他手下的所有人没有任何敬意。夜里，假如不去巡逻，所能干的事情只能是一起胡吹乱侃。当时为了避免来自日军的空袭，基地实施灯火管制……我记得我很雄辩——我永远是一个滔滔不绝的人。我老爸是一位密苏里州的“红岩”共和党人，所以我认为我是批判罗斯福错误行事方面的一个专家。最令我感到不能忍受的是，罗斯福总是派款爷出国当大使。因此，那天晚上，我信口开河，批评说这样的外交策略无疑是一种冒险游戏，并计划向那些我认为需要的人好好地上一课时，忽然说话讲理，看法公正的伦尼·汤姆，拍着我的膝盖说，“你知道吗，杰克也在这里，他父亲就是我们的前驻英大使。”

“哎哟，我的上帝”，我吃惊地叫了一声。此后，杰克

肯尼迪传

便一直以我这位共和党人作为笑柄，揶揄了我大半辈子……自从相识之后，只要一提起政治，我们俩便争得难解难分！

那时，杰克艇长已搬进“新居”——自己的“民主党”营棚。约翰尼·艾尔斯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住的大茅棚左边是几间冷藏库，杰克在冷库的后面发现了一间旧茅屋，然后，他建议说‘约翰尼，咱俩去把它收拾一下，然后搬进去住’。就这样，我们清理干净了屋子。茅屋相当地宽敞，后来就有人也搬了进来，他的副艇长，伦纳德·汤姆也过来跟我们住，另外还有一位名叫吉恩·冯坎家的年轻人也搬了进来。屋里总是围聚着一大堆人。他总是那样吸引人。没事时，我们常坐在一起，喝点啤酒，而他就自个写他的信。他真是个写信的天才，会写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信。”

由于岛上条件有限，物资匮乏，杰克的机智与诙谐，以及他对权力的态度是同伴们不可多得的享受。“刚有一位海军上将来视察过，”杰克对英加写道：

天啊！他足有 300 镑重，挤进我们茅棚的时候，活像一头硕壮的大象，一阵风似的闯进了机械间。他先是哑着嗓子，艰难地发出“咳、咳”声音，然后问道：“你们这里都有什么？”

“报告将军，这是我们的机械间。”我立正回答。

“咳、咳，里面摆了些什么东西？咳、咳，是机械吗？”

我小声但却明确地报告说机械间正是用来摆放机器、

工具的地方，他煞有介事地掏出一个小本子记下来。将军携带的这个本子里面记录的内容，无非是一些“亲自到前线看一看就知道了”之类的信息。然后，他“咳”了一声，瞄了瞄地图，询问我们在“那边”有些什么——“那边”是离营区还有一段距离的一个小海湾。我们没有说什么，突然他大声叫嚷道：“因此，天啊，的确需要在那里修建一个码头。”恰在此时，有人提醒说已是午饭时分了，午饭之前盖好码头是不可能的……他煞有介事地考虑了一会儿，又匆匆地与随行的工兵参谋磋商了一下后，点头同意。之后，信步走到餐桌旁，大嚼了起来……英加，这便是最正宗的全面战争。

尽管当地没有像高更画中的异国姑娘围坐身边、并向你嘴里喂送鲜甜的葡萄、香蕉的情景，令人感到沮丧，但是短小的美拉尼西亚岛土著人却诱发了杰克的好奇心。“附近有许多土著人。我设法搞到了一些遮屁股的草裙、部落战争用的狼牙棒等等很有意思的东西。”杰克5月份向父母汇报说，“今天我们碰到了一个土著居民，他向我们讲述了上一次吃人的情景。他说日本人的肉好吃。”他们会为了一包烟，拿出菠萝、甘蔗或其他东西甚至老婆来跟你交换……当年英国人只为这些劳作了一天的土著人支付17美分的工钱，而我们对他们可好得多了。‘我们讨厌英国人’，这是土著人对大英帝国的最后评价。”

他们告诉我们，澳大利亚人的肉不如其盟友的那样鲜美松嫩。“我们早以为食人族已经销声匿迹了。”约翰尼后来回忆道，他还描述了他们当时把一个土著人小孩带进营房里的事情。“这个小孩很机灵，他对我们说他们是食人族。后来我们

肯尼迪传

还逗他玩。他人很聪明，甚至会说一些蹩脚土著语。”

这个名叫兰尼的土著小男孩，有意无意帮助杰克学会了一点点蹩脚的英语，而这点本事后来却恰巧成了他的救命法宝。兰尼一般睡在杰克的旁边，他双眼常虎视着杰克的副手汤姆身上的“腱子肉”。汤姆是一位碧眼金发，高大威猛的小伙子，高 6.2 英尺，北欧日耳曼民族的血统与特征表露无遗，有一副令人艳羡的职业运动员的身板。据艾尔斯回忆，汤姆身上的腱子肉令兰尼垂涎欲滴，“兰尼常对汤姆的前臂垂涎三尺。并告诉我们前臂是人体最好吃的部位。”后来新西兰当局来人，将兰尼给带走了。

尽管他们饱受着食人生番、鲨鱼、珊瑚虫菌感染以及鱼雷汁自制私酒的威胁，但相对而言，在整个所罗门群岛的战事当中，他们仍处在较为完全的后方，所以还是应该庆幸他们的幸运的。

另一位高大的美国人巴尼·罗斯此时也来到了图拉吉。当年在梅尔维尔，他和杰克一起玩过橄榄球，并回忆了他们初次见面时的情景：

他已经成功地在那些留守的老兵中间建立了某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威信。这些老兵对我们这些新来的人有些瞧不顺眼，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在鱼雷艇部队里熬过了真正艰苦的岁月而理应高人一等。

杰克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他是那种既能与各式人等打交道，又能坚守自己信念的人。

鱼雷艇中队的小伙子个个特点鲜明，许多人是玩橄榄球的，甚至有些人还打过职业球赛。他们净是一些魁梧的

小伙子。

杰克身材瘦削，而其他的人，如汤姆，体重达 210 镑，倒颇具俄亥俄州橄榄球大赛十大明星之一的塔克鲁的风采。约翰尼来自路易斯安纳州，是一位非常棒的橄榄球好手，乔·阿特金森来自田纳西州，足球特棒。拜伦·怀特则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知识分子，而且后来当了最高法院的法官，他橄榄球打得也相当出色。中队里有许多橄榄球高手……

夜幕降临后，我们常常围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我们是肝胆相照的朋友。这帮伙伴们是我一生中所遇到过的最棒的年轻人。

正是与“这帮年轻人”的战地生活，杰克拉开了为自己命运搏击的序幕。

通天历程

同杰克共居一室的约翰尼说，“杰克是一个优秀的军官”。

我坚信他是一个真正优秀的军官。他掌管的鱼雷艇井井有条，属下纪律严明，组织良好。年仅 25 岁，但却鲜有地大器早成，比起他来我们其他人是一帮孩子……

他为人幽默谦和，有着超凡脱俗的魅力，但仅从喝酒聊天中你或许永远对他个人的优越生活一无所知。他一向真诚、坦率……我们常常互看对方的信件，对彼此的回信进行查阅，以发现不妥的地方。他是写信的天才，“著作”

肯尼迪传

等身，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自己的观念阐述清楚。当我们其他人在胡吹乱侃之时，他总是有一个人在写信。天知道，他以前常写的那些讨厌的信到底有多少——写给朋友的、副国务卿福里斯特尔的、参议员的、女国会议员卢斯的。我常常检查那些信件，并确信自己是最恰当的人选，因为我只是一个极为平凡的人，对其中所写的种种事情并没有多少兴趣进行过分地关注。

无论认真与否，约翰尼后来与比林斯一样，坚信杰克将终成大器。

毋庸置疑，他必将成就大业。他有那种独特的魅力。他的天性、以及人们喜欢与他交往和交谈将魅力体现得淋漓尽致。事实上，他常给一些达官显贵写信。很明显，他的血液里涌动着对政治的狂热。也许他从父亲身上得到了某种启示与灵感。在波士顿，爱尔兰人面临重重艰难，杰克将此全盘道出。他谈到了他父亲的过去。解释前大使最初无法在一家银行工作的原因。然后，涉及他的外祖父。他外祖父在政治舞台上颇为活跃，并替他父亲搞到了一个职位……他父亲是一位投机股票的金融天才。与许多拥有成功父亲的儿子们缺乏动力不同，杰克却拥有这种弥足珍贵的动力。

他酷爱竞技体育，争强好胜。我记忆犹新的是有一位达拉斯的老兵，他们在我的床上打纸牌，他打牌就是为了赢，虽然他并不特别爱玩牌。杰克英俊儒雅，拥有一种迷人的笑容，声音悦耳，幽默诙谐……他喜欢与一帮人围在

一起指点江山，胡吹瞎侃。他总能总结出一些独具匠心的见解——那种你没齿难忘的见解。我记得当一位表面上有印第安人血统的小伙子经过杰克房前时，他抬头上下看了他一下，然后回头对我们说：“半个哈利—戴维森，半个印第安！”

没人怀疑，他天生就是个政治动物。事实上，我以前常开他玩笑。我与乔·阿特金森两个人常常逗他。我说，杰克啊，等我们胜利后，我准备卖命干，以便到时候帮你拿下路易斯安纳州的选票。

他们还谈到了棒球和女人，以及胜利后如何犒赏疲惫的身心，好好放松放松。他说：“也许可以计划一下，南美洲风光迷人，姑娘热情极了。‘约翰，你可以定居那里，每天挣点零花钱。老头子在那里有不少地产，我们只是去那儿干点事而已。’——我们也没有什么具体安排，只是在凭空设想。”

杰克谦恭得体，与一些鲁莽草率的人对比鲜明。在努美阿调入鱼雷艇部队、后又跟随杰克抵达图拉吉的詹姆斯·里德后来回忆说：“杰克不是那种在聊天时不容他人插嘴的人。他有一种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的特有的超凡脱俗的气质，也是一个杰出的小伙子。首先，他兴趣广泛，与我们相比，占尽先机。他有机会接触一些权力高层人物，且拥有直接的外交经验。此外，他风趣过人，幽默非凡。他活泼适度，严肃有节。”尽管里德没有机会亲眼目睹杰克身为一个地方政治家的迷人风采，但是，他却在写给马萨诸塞州一个朋友的信中，“全盘告诉了他有关杰克的事。我对他说我认为杰克终将会成为美国总统”，这不仅是因为杰克有一种对政治的内在动力和野心，而且还因

肯尼迪传

为他拥有一种接纳不同社会背景之人的与众不同的方式。

里德说：“那时，我们也读过不少书。”如同凯思琳的男朋友约翰·怀特，他对杰克阅读和欣赏的范围与质量叹为观止。当时，杰克几乎通读了所有有关美国总统的书籍。丘吉尔的著作也未能幸免于难。他还看过 T·E·劳伦斯的著作。而且对戴维·塞西尔勋爵在《墨尔本轻狂少年》一书中对拜伦和卡罗琳·拉姆夫人之间的艳情描写津津乐道。然而，里德回忆说，他“最喜爱的书还是《通天历程》。他向我极力推荐此书，但当时我们却没有”。

只到后来，杰克将自己私藏的《通天历程》寄给里德后，里德才逐渐明白，这本书对这位谦恭而又野心勃勃的波士顿爱尔兰裔年轻人的重要意义。巴肯所著的这本自传体小说，感情强烈而真挚感人，说的是英国维多利亚爱德华时代末期，一个天资聪慧的苏格兰小男孩通过不竭的自我奋斗而出人头地的故事，并以凭吊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失落的一代人结束，犹如一曲泣诉的挽歌。

巴肯散文般的笔触、略带雕凿的章句后来更多地被那些对杰克本人凭吊之人所引用，以表达对逝友的哀悼。比如，巴肯在书中提及他仰慕的牛津大学同窗、英国自由党领袖之子雷蒙德·阿斯奎思之死时，他感伤地写道：“对与雷蒙德这样的出类拔萃之辈来说，没有理想的破灭；他们携童趣步入生活之晨曦，及至等到事业有成的正午，晨时的蓬勃与朝气依旧。”

杰克是否认同雷蒙德并以此人自说呢？在里德看来，二人之间有着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之处。巴肯在书中说，雷蒙德不仅是他在牛津求学时同辈中最为聪颖之人，并且“在写信修书方面无疑在我们之中无出其右者”。巴肯强调，“这些信函

随意投送是很危险的，因为他有一支放浪不羁的锐笔：遣词造句，匠心独具；立意高远，略带妙讽。”

里德明白，这些话用在杰克身上也恰如其分。此外，雷蒙德与杰克还有其他相似之处。雷蒙德的父亲身为自由党党魁，英国首相，这点，杰克无法与之相比。但是，两人均是天赋极高，且父辈势强权大，面对的是相同的问题。雷蒙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立志从戎之时，起初也是“一名情报参谋”，随后颇感乏味与沮丧，在他的坚持下，终于在一年后被调入战斗部队。1916年，雷蒙德所在的那个营奉命到“西部防线”驻防。在那里，“报国和患难与共的责任”，最终使他找回了自我，不仅使他勇于接受艰巨战斗任务的挑战，而且还使他再一次充分领略到了与当年在大学时代类似的“令他振奋的那种豪情蓬勃和轻松愉悦的战地情谊。”

这种文字简直是为1943年春天杰克的感受而设计的，不过，雷德蒙却在1916年惨烈的索姆河战役以身殉国，把青春永远留在了西部战线。杰克在其私藏的《天路历程》的书页空白处点评道：他热爱自己的生命，但他的生命已成永恒；他谦恭可亲、才华横溢、胆略超人；他如今已成为不知年迈、疲惫、失败的那种不朽的伟大的英格兰精神的一部分。

1943年5月底，南太平洋战事开始由短暂的平静逐渐转入惨烈。5月30日，杰克所属的中队奉命奔赴拉塞尔岛，接替开赴前线的其他中队所留下的防务。那些上前线的中队的任务是，为美国对所罗门群岛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攻势作掩护。

一切与零

令人思之喷饭的是，麦克阿瑟将军在所罗门群岛发动的攻势正是美军一度反对的盟军地中海战役的翻版。美国海军参谋长金上将怀疑丘吉尔所拟定的在南欧“打击软肋”战略会把太平洋的美军调出太平洋之外，所以，便下令麦克阿瑟立即采取攻势——无论此类攻势代价有多高，无论是多么的不必要。因此，为了故意刁难英国人，可笑的美军在所罗门群岛发动了“由陆基飞机作战半径所决定的步步推进”作战行动。事后表明，这种战术与盟军在西西里岛潘泰莱里亚和意大利所采取的“逐点”推进战术一样，问题很多。这种“逐点”推进的战术，其战果也必然是零碎的。

面对麦克阿瑟集中兵力进行的两栖进攻，日军被迫转入防御作战。据阿尔文·克拉斯特回忆，战局扭转给鱼雷艇部队带来了新的任务，而且，新任务恰恰与其传统的角色相吻合，即负责巡逻海岸。“鱼雷艇开始纷涌而至，数量越来越大。不仅瓜达尔卡纳尔设有鱼雷艇基地，就连拉塞尔岛也有，另外还渐渐地设到了其他地方。”因为“日军仍然在夜间调动军队。由于我们控制着空中优势，日军的增援部队进入，以及伤病人员的后送只能赶黑进行。而驾驶鱼雷艇在夜间巡逻以阻截日军的物资和兵员运输确实是一种好手段”。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艇体长度分别为 80、78 和 77 英尺的木质鱼雷艇，以及它们所装配的武器装备完全不适合新的作战要求。当时，德国的 E 型鱼雷艇是金属艇体，马力强大、柴油发动机安全可靠。美军的鱼雷艇却仍在使用着易燃的航空燃

料，且无装甲防护，火炮性能比步枪好不了多少，被人们嘲讽为“口径 50，射速 50”。如果遭遇日军的钢板船体、吃水浅、并配有火炮的“大发号”驳船，鱼雷艇部队将发现自己陷入一片尴尬的境地之中。“鱼雷艇通常在日落后出港，奔赴作战区占领战位，”克拉斯特后来回忆说，“最大危险是日军飞机。日机一般晚上出动，他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鱼雷艇划过水面时形成波光粼粼的 V 形尾波，夜间一片昏暗，很多时候他们看不见鱼雷艇，但 V 形尾波却昭然在目。所以，敌机便对着尾波顶端狂轰滥炸，因为他们知道尾波前一定会有鱼雷艇。”

在写给凯思琳的信中，杰克提及他曾在《生活》杂志上看到的约翰·赫西撰写的一篇描写美军鱼雷艇的报道，觉得很让人玩味。杰克说，“文章倒是没有像《他们随时准备牺牲》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无边无沿，”而是描绘出“一个更为真实的现实。开鱼雷艇不是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必须每晚在涛凶浪恶的海上低速巡逻，颠簸两个钟头，然后回来躺一会儿，再出去转悠两个钟头。即使这样，也比在其他海军部队幸运得多……事实上，这颇有点像帆船比赛，我们的时间往往花在怎么才能使它开得更快一些。”但是，这可与往日在海恩尼斯港截然不同，不是为了在“肯尼迪杯帆船赛中战胜达利”，而是为了保全性命。因为它的速度快，就能躲避白天日军的巡逻机。

但是，对杰克来说，除了要避免日军的空袭，他还必须赢过与之并肩作战的其它鱼雷艇。因为巡逻结束后，谁先返回，谁的鱼雷艇就可先加油。更要命的是只有在重新加过油之后，艇上的官兵才被允许睡觉。

在一次返回拉塞尔群岛时，杰克差一点将自己的鱼雷艇撞成了碎片。那时，杰克先是紧随另一艇后奔驰，当它俩追风赶

肯尼迪传

月般地快要进港时，杰克的鱼雷艇赶了上去，两艇比肩飞驰，比起速度来。在进港的一瞬，杰克赢了。可是随后他在以信号通知底舱的轮机官倒舰时，三台发动机却莫名其妙地全部熄了火。正如《109号鱼雷艇》的作者鲍勃·多诺万所描写的那样：“109号鱼雷艇像一发出膛的子弹，向码头飞驰而去。”正在码头干活的人全都吓傻了，等他们缓过神来，就发现“一艘鱼雷艇撞进码头的一角，削瘦的艇长犹如一尊雕像纹丝不动地呆立在船艏，沮丧地看着眼前的情景，他手下的艇员也默默无语，他们会吓傻了。”艇员布基·哈里斯回忆说：“这之后，每当大伙发现我们的鱼雷艇进港时，常常争先恐后地跑向海滩。从那时起，杰克就有了‘撞撞肯尼迪’的绰号。”

据多诺万所说，由于同时还有一艘艇因缆绳脱松而酿成毁船事件，吸引了海军上司的注意力，才使杰克得以免遭军法处罚。但是，巴尼·罗斯回忆的结局却有些不同。他说：“快到港口时，他的鱼雷艇是快了一点，再加上艇上的倒档失灵，使得它撞上了油料码头，搞得杰克狼狈不堪。这的确是一起众所周知的意外事故。杰克明白，上级大概不会轻饶他的，就诙谐地叹道：‘天啊，没有谁能阻挡109号艇！’大家都被逗笑了。”

杰克的中队长回忆说，鱼雷艇部队确实成为他人的笑料。“我确信，如果把太平洋战区的一些资深的舰艇指挥官找来让他们谈一谈鱼雷艇部队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鱼雷艇部队令人好笑。那些驾驶大型军舰的观念陈旧的老海军认为鱼雷艇一无是处。我们被他们嘲讽为‘混混海军’。其实，他们这种看法，贯穿于整个战争期间。从未有一位鱼雷艇部队的军官晋升为将级军官。鱼雷艇当时已变成某种污点和耻辱的代名词，然而，我们当时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当然，克拉斯特从未说自己比他手下的所谓“混混”更出色。有天晚上，他凭借中队长的身份，登上了戴维·利维掌管的48号鱼雷艇，巡逻时该艇触礁搁浅。事后杰克驾着109号鱼雷艇用缆绳将其拖了回来。可是，祸不单行，这仅仅是他们一连串倒霉事的前奏。“那是个大浪滔天的夜晚，”克拉斯特回忆说，“我们的船进了水。我们试图通过发射鱼雷来减轻重量。破洞在吃水线的上方，我们加速前进，企图让鱼雷艇能够像水上飞机一样滑行在水面上，以免继续下沉。可是，撞上好几个浪头，船内又进满了水，我们开始大声呼救。我们用无线电向杰克发出求救信号。当时杰克离得很远，而此时已是破晓时分。过了一段时间，他驾着109号鱼雷艇将我们拖走了。”

由于怕鱼雷艇进水沉入水中，杰克从附近的美国驱逐舰上借了一台水泵用以抽水。然而这一措施无异于杯水车薪，他们决定在余下的航程中把它拖回去。给养和淡水越来越匮乏。终于，他们将这艘倒霉的鱼雷艇留在了布鲁库岛进行维修，而船员们全部挤上了杰克的鱼雷艇踏上返程。

“在航程中，我问杰克能否让我掌舵，”克拉斯特记得当时自己颇有点过意不去，“以前我从未驾驶过80英尺长的庞然大物。我开得相当好，一路乘风破浪。后来，由于错误的判断，撞上了一个浪头，船上装载的鱼雷剧烈滑动起来。索姆读过《他们随时准备牺牲》一书，书中讲到有人用塞卫生纸的方法防止鱼雷发射，他就用一些卫生纸塞住了鱼雷的引信管，以免它下到水中时爆炸。但是，那枚该死的鱼雷最后还是滑落出去，还将一枚深水炸弹碰得弹过甲板……当时，下舱的船员正想去检查水泵，结果鼻子被撞破了——船舷两侧，风急浪大。杰克本来呆在他下面的舱铺上，当海浪越来越汹涌时便走了出

肯尼迪传

来。这倒是十分侥幸的事，因为之后深水炸弹恰好砸穿了他所呆的舱位，掉进海里去了。”

就这样，48号艇上的四枚鱼雷，109号艇上的一枚鱼雷以及一枚深水炸弹被报废了。当海军上将福特得知这一情况时，勃然大怒，“一帮饭桶！我在担任‘南达科他’号舰长时，就常常觉得莫名其妙，你们鱼雷艇部队为何能发射那么多的鱼雷，现在我算搞清楚了！你们发射了五枚鱼雷，却没有发现一个敌人的影子。”

然而，杰克所在的第二中队的这一闹剧，与第九中队的鱼雷艇击沉自己部队所属的“麦考利”号旗舰的“丰功伟绩”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了。在所罗门群岛战役的一次战斗中，第九鱼雷艇中队突然发现前方有条军舰，虽然有人向中队指挥官罗伯特·凯利少校报告说那是己方舰只，但是，这位6艘鱼雷艇的指挥官不为所动，“果断”地下令迅速实施攻击。据当年“麦考利”号舰上的一名军官事后回忆说，事故发生在“伦多瓦岛东边的布兰奇海峡”，“我们被一个美国鱼雷艇中队包围。虽然我们尽力向他们发出识别信号，但仍有一组鱼雷齐冲过来。事后得知该中队是由凯利少校指挥的。后来我与凯利所属的一个士兵聊天，他告诉我说，当时艇上的人发现了识别信号，但，凯利却说那是日本鬼子玩的花招，并下令我们将它击沉。”

杰克的朋友阿特金森事后回忆说：“这是鱼雷艇部队一个典型的耻辱。凯利击沉了特纳上将的旗舰，随之也丢了中队长的职务。”

这个事件的后果是，在新乔治亚之战的后期战斗中，所有鱼雷艇都待命在登陆区域之外的海面上。更让人可笑的是，在

炸沉旗舰后仍嫌不过瘾的第九中队，接连两个晚上又有两艘鱼雷艇触礁搁浅，不得不弃用和摧毁。

如同杰克的朋友，西姆·埃弗兰德所回忆的那样，当时，鱼雷艇触礁搁浅是巡逻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岛屿丛生，而且海图非常陈旧，有些甚至还是德文的图，图上并没有标出太平洋中所有新生成的珊瑚礁，所以触礁也就不足为奇了。晚上一旦触礁，我们没有排除事故的应有设备，只能花一天的时间潜到水下，卸下螺旋桨，然后将艇拖开。”

还有，鱼雷艇配置的引擎性能极不稳定，好几次击落了自己的飞机，酿成惨剧。有一次，艇长查尔斯·多诺霍的 166 号鱼雷艇为了救援一艘发动机有故障的友艇，一直在海面等待到天亮。“到了清晨，他们仍未移动，”巴尼·罗斯后来回忆说，“一些 B-25 轰炸机发现了他们，误认为是日本军舰，便对他们进行低空扫射。在飞机进行第二次俯冲时，鱼雷艇进行了还击，并破天荒地击落了一架 B—25 轰炸机，同时自己也被飞机击中，燃烧后沉入水中。”

如此看来，杰克将鱼雷艇撞进拉塞尔岛油码头的纰漏可谓不值一提。后来，海军指挥部限制鱼雷艇中队的巡逻次数，以防止因失误而酿成的伤亡。而杰克的惟一的敌人只是尾随的日军水上飞机罢了。

大失所望的杰克遵循着早被验证的战争哲学：忠诚于你的同伴，别相信其他任何东西，包括宗教信仰。为了回复他母亲所说的“大西洋沿岸所有牧师与修女都寓示我长时间的祷告，的确令人欣慰”的消息，杰克于 6 月 24 日写了封家信。他的鱼雷艇终于卸下了旧式的“帕卡德”引擎，换上了新式的，并且以三艇一组轮流休整。然后继续执行从拉塞尔群岛开始的巡

肯尼迪传

任务。他在家信中说：“姬克报告说，一位算命先生预言我将毫发无损地回家。假如我继续执行海上任务的话，我不希望他的预言变成一种对你们或是教堂缺乏信心的表现。”

杰克从童年时起便开始为自己的命运而奋斗，尽管太平洋上的战争岁月使他乐此不疲，从某些方面迟滞了他的努力，但他从未停止努力。他自己天赋聪颖，才华横溢；谦恭腼腆，但却和蔼可亲；幽默诙谐，自谦娱人；执著坚定，一丝不苟；一旦做出决定，必是全力以赴。然而，1943年5月29日，在杰克庆祝26岁生日的当天，他仍对如何去实现心中日甚一日的想当总统的野心有些迷茫。他的《天路历程》一书内页空白上有自己写下的如下评语，算是总结了巴肯对劳伦斯的评价：

他的个性一直是分析家深感兴趣的课题，我也无意去说三道四。简而言之，他本身便是一个永远不会或是永远无法达到统一和谐的各种矛盾的复合体。他没有从一而终的品质。虚荣心与卑微之意并存；刚愎自负与优柔寡断同在。他品位严格，却缺乏欣赏力。他儒雅英俊，同情他人，却又可以六亲不认，冷酷无情。

以其有些死板的苏格兰风格、隐蔽心理和对时尚十足狂想的钟爱，巴肯对劳伦斯的评价十分接近杰克内心对劳伦斯的依恋之情。巴肯描述道，“从一开始，他内心便存有这种断层，作为和梦想相互脱节。”

杰克的作为与梦想步调一致了吗？重要的是巴肯所称颂的主人公无人能实现他们自己孩提时代的梦想，至少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从性格、境遇上看，他们无一人可与杰克相提并论。

然而，总体而言，他们所描述的却是杰克灵魂深处的内容。当然，太平洋战场上的同伴们也鲜有人能够知晓杰克内心的野心。杰克总是感觉他被时间抛在后面，落在许多现实中的或是设想中的竞争对手的后面。这种感觉萦绕脑海，挥之不去。后来有评论者认为，杰克之所以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仅仅是因为老肯尼迪对他的强烈期盼所致。可是，这样的认识并没有觉察到杰克失调的自我，如同后来有些人将杰克追逐性乐归因于老肯尼迪沉迷脂粉的看法一样肤浅可笑。像巴肯描述的一帮花花公子一样，爱好广泛、自恋、天资聪慧的杰克同样渴望着成就大业。所以，他永远不会感到满足，总是“得寸进尺”，不断向前。对赫西在《生活》杂志上称颂鱼雷艇的文章颂扬之后，杰克对凯思琳说，“我认为他的新作《峡谷行》写得相当不错。此时，他登上了山巅——一位畅销书的主人，又是《时代》周刊上的热门人物——而我则倒霉地身处讨厌的峡谷之底。”

待命在拉塞尔群岛营地那幢老破的农舍里时，杰克常用随身携带的留声机，反复播放他最钟爱的一张唱片——弗兰克·西纳特拉的《一切与零》：

嗨，请不要将你的樱唇贴近我的脸颊，请不要浅浅巧笑，否则我会神魂颠倒，“万劫不复”。

好事多磨，杰克又错失了一次绝佳机会——进攻新乔治亚群岛。然而，1943年7月15日，在美军攻打新乔治亚群岛两个星期后，杰克的鱼雷艇奉命暂时离开第二中队，奔赴伦多瓦。那里的基地由托马斯·G·沃菲尔德指挥——一位鱼雷艇员憎恶之人、一个注定要成为像J·J·马厄那样的令杰克深恶痛绝

的人。

最大洋上最大的饭桶

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托马斯曾一度是海军学院的枪炮教官。他为人死板顽固，墨守成规。到鱼雷艇部队后，他反感驾艇出海，而一味地躲在地堡里指手划脚。这个地堡是在凯利蒙羞之后，他特意在新乔治亚以南的一个隆巴里的小岛上的小型海军基地里修建的。他痛下决心要用偷来的高频无线电通讯装置，全面整顿所罗门群岛海域混乱不堪的鱼雷艇部队。

这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盟军登陆作战起初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接下来的行动则溃不成军。现在日本鬼子又从位于肖特兰群岛与布干维尔岛上的基地派遣一支绰号为“东京快车”的增援船队乘着夜色迷雾进发。他们将弹药与人员迅速地卸在新乔治亚西面的科隆邦阿拉岛的海岸上，目的是用来加强位于新乔治亚群岛的重要战略要冲——蒙达的防御力量，返航时将轮流的物资与人员运过狭窄的库拉海峡。

虽然屡次交手，登陆突击与惨烈肉搏，美军第四十三步兵师与第九陆战营迟迟未能实现攻占蒙达的战略任务。而且几个营长因指挥不力被就地免职，同时不可计数的士兵因为恐惧与劳累过度而虚弱不堪。由于病号太多，使所有的团野战医院都忙得不可开交。另外还有一种类似于一战期间的炮弹休克症的新病症困扰着官兵们，医生们称其为“恐战神经病”。当时，仅在新乔治亚的美突击部队里面，就有 2 500 人患有此症。在蒙达战斗后，有的士兵甚至歇斯底里，用刀互捅，甚至相互投掷手榴弹。时间转到 1943 年 7 月 13 日，格里斯沃尔德军长开

始对第四十三师能否攻战蒙达将信将疑。两天后，特纳上将被撤职，负责新乔治亚战事的指挥官也丢了全部指挥权。美军的进攻也由此暂告一段落。

事实上，盟军在 1943 年 1 月便开始拟订这次战役的计划了，原来打算几天便可拿下蒙达。结果却适得其反。盟军后来辩解说，之所以久攻不下，原因不外是指挥不当、训练不力、领导无方、医疗保障差以及一大堆类似的毛病。正是在这次艰难的战役处于紧要关头之际，杰克率领 109 号鱼雷艇赶往增援。

杰克的调令让第二中队的同僚们既沮丧又失望。此前，阿特金森为了和伙伴们在一起，拒绝带领其所属 110 艇奔赴新乔治亚北岸的一个新基地，当杰克调令到达后，他大为光火。尽管如此，因为杰克要执行的巡逻路线很长，沃菲尔德少校专门又为他配备了一艘“艾尔科”级鱼雷艇。“80 英尺长的舰最为庞大，也最经得起风浪的考验——这就是杰克给调到那儿的理由。”阿特金森后来如是说。

至于杰克，该调令无异于一场噩梦。他将痛心地告别自己的中队及他了解的好伙伴们，再也无法在一个他钦佩与喜爱的年轻指挥官麾下工作了。这时他已从属于一个陌生的中队，顶头上司是一个他憎恶的沃菲尔德。

沃菲尔德躲在地堡里指手划脚的方式，其悲剧性的后果相比起凯利的“不顾一切向前冲”的指挥作风如出一辙。杰克刚调来两天，沃菲尔德便派出一支由 3 艘鱼雷艇组成的小支队，由一名完全是新手的中尉指挥，开赴科隆邦阿拉岛西海岸执行巡逻任务。在巡逻中当僚艇汇报说他们发现一个青绿色照明弹——这说明了在该海域有己方的部队，这位年轻的中尉自恃艇

肯尼迪传

上装有雷达，对其他艇的汇报充耳不闻，反而固执地下达了实施鱼雷攻击的命令。这次射击搞得海面上的美军驱逐舰被迫暂停对蒙达附近的美军地面部队进行的舰炮火力支援，而到处乱窜以避鱼雷，并以猛烈的炮火还击，以保卫自己。

值得庆幸的是，这次双方都未被击中，但仅过了几天，类似事情再次令人不可思议地发生。这次是 166 号艇被几架 B—25 轰炸机轰炸一遍，其中一架在激战中被击落。166 号艇上的一名鱼雷发射员事后说：“我都搞迷糊了，还误以为是狡猾的日本鬼子涂了我们的标记呢。”在这次混战中，B—25 飞机机组中有 3 人坠海淹死，166 艇上也有一人在鱼雷艇淹没时稀里糊涂地死了。

但是，这些接二连三的事件并未能使得沃菲尔德重新整训官兵，反思他的战术。他仍死板固执地寄希望于地堡顶端大功率新型雷达以及以强凌弱的战术上。曾与杰克上过梅尔维尔鱼雷艇学校，并晚几星期抵达图拉吉的约翰·米德评价说“沃菲尔德是最大洋上最大的饭桶”。他回忆说：“他从未学过当时的战术，对鱼雷艇要是有两艘以上同时发动出击，战斗力就不易发挥一无所知。当多艘鱼雷艇一起出航时，他常下令除紧急情况外，一律保持无线电静默，如此领队艇就不能传达指示信号告诉后面的艇应该如何行动。第 2 艘虽然会跟着首艇的行动而做出相应的反应，但这里存在着一个时间差的问题，而这个时间差对后面的艇来说，一艘比一艘大，所以第 4 艘艇常常掉队。”由于沃菲尔德从未摸过鱼雷艇舵把，因此没有切身的感受，而这愚蠢战术的筹码却是许多活生生的人。

对杰克来讲，这是一段难熬的时光。他负责指挥着这艘惟一原本属于第二中队、参加过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鱼雷艇

——也是最陈旧的一艘——增援攻占新乔治亚的战斗，而这场战斗已经出了严重的差错。鱼雷艇非但不能阻隔日军的再补给，而且在切断日本的驳船运输上也是力不从心，遇到作为“东京快车”一部分的日本快速驱逐舰则只有望洋兴叹的份了。最艰难的是，它们还成了日军水上飞机的活靶子。

在7月19日到31日期间，109艇没有一次遭遇日本舰船，但是战况报告中却记录，遭到敌人5次袭击。例如，虽然得到预报说“东京快车”将于7月19日乘着夜色驶出港口，杰克巡逻时还是没能发现蛛丝马迹。倒是日军的水上飞机两次发现了它们。日机投下的照明弹让这三艘鱼雷艇大白于夜色之中，然后杰克的艇被重点攻击。虽然他以“之”字形高速运动规避，并施放了烟幕作为掩护，但还是受到两枚炸弹的袭击，炸弹在离艇不远的地方爆炸，致使两名艇员受伤。

一名艇员安德鲁·科克塞回忆说，这两枚炸弹太恐怖了。他坚信这是不祥之兆。尽管杰克也曾想过109艇下次任务后调回岸上工作，但为时已晚了。7月21日，罗斯的鱼雷艇被B—25轰炸机轰炸沉入水底。23日，109艇奉命从科隆邦阿拉岛穿过布拉凯特海峡开赴一个叫吉佐的小岛执行巡逻任务。据悉日军正在对那里的战略要冲进行增援。24号夜里，109艇随中队再次出巡，并又一次在途中受到空袭。

这次日机没有白费力气，有一枚炸弹恰好击中105艇，副艇长因之丧命。后半夜，还有一些炸弹险些击中109艇和106艇。当这些鱼雷艇艰难地航行在返回隆巴里的途中时，它们不幸再次被发现。日机投下了一颗达500磅的巨型炸弹，挨着161艇艏部爆炸，几乎将其掀翻。显然，“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正如老肯尼迪在写给一位高尔夫球友的信中所描述的那

肯尼迪传

样：“前天晚上我们收到杰克的一封信，显而易见，他有好几次死里逃生，他手下有几名小伙子不幸受了伤，109艇有好几回受到了袭击……他向我们保证他不会有事。他还说，他已经得到了他出去想得到的东西，现在他倒是希望尽快回家。”

然而家现在对于杰克来说，仍然十分遥远。7月27日深夜，由109艇与其他4艘鱼雷艇组成的小分队又围绕吉佐岛进行一次巡逻，深入敌后达100英里之多。他们再次被日机发现并跟踪，值得庆幸的是他们设法避免了挨炸的霉运。

29日夜里，109艇同一个巡逻小队再次驶进科隆邦阿拉以西的布拉凯特海峡。109艇这次因船舵出现故障被迫中途返回基地，其他艇遭遇一艘日本驳船，于是开炮轰击，并声称已将其炸到太平洋底了。

如果真是这样，杰克思量，那岂不是能够把鱼雷艇改为炮艇使用，这预示着未来的发展。为了为自己及艇员们共同的付出和牺牲讨回某种回报，杰克自作主张，在艇上装配了一门口径更大的火炮。在船舵接受修理期间，他到位于伦多瓦岛的陆军基地去了一趟，在那里发现一门37毫米口径的反坦克炮，并要了回来。回到隆巴里后，他对惊奇的下属们宣布，他希望他们把它安装在前甲板上。

说起容易做起来难，这要求必须拆除艇上的充气救生筏。虽然大家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用螺栓将火炮的轮子固定在甲板上，但两根大炮架却难住了小伙子们，因为火炮需要它来吸收巨大的后坐力。讨论了一下，艇员们决定临时把它们与两根长长的椰子树干绑在一起，并将树干用绳子固定在甲板上，这似乎更像是纳尔逊时代战舰上固定加农炮的方法。

终于，1943年8月1日清晨，这项工作胜利结束了。除了

鱼雷，杰克的艇也凑合是一艘炮艇了。

从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出杰克头脑的高瞻远瞩。就在此时，命运也决定了美军鱼雷艇部队要在所罗门群岛西南海域与日本战舰进行最后一次鱼雷大战，这是他们最后的厄运，而 109 艇也将成为其中最辉煌的牺牲品。

决 战

同图拉吉和拉塞尔群岛不一样，隆巴里岛和毗邻的伦多瓦岛，二者的鱼雷艇基地，就像一个沼泽池。基地通信军官后来描述这里是一个由帐篷搭就的“鬼地方”，“帐篷外面就是蓄满了污水的堑壕”。

修堑壕是为了防止日军对伦多瓦的空袭会影响这里。这种空袭打击在 1943 年 8 月 1 日下午达到如火如荼的地步。“那天下午我们正围坐在一顶帐篷里玩扑克，”巴尔尼·罗斯后来心惊胆战地回忆说，“帐篷外出现了骚乱。空袭警报刺耳地鸣叫，但大家都置之不理。这个小岛从没有遭到过空袭，这里与伦多瓦多少有些隔绝，我们也从未料到他们会来空袭我们。”

“显而易见的确发生了什么事情，帐篷里的人停止了打扑克，开始动了起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杰克也在玩。大伙儿曾在帐篷边开掘了一个猫耳洞。我记得我们都跑向那里。杰克削瘦单薄，可以利索地跳进洞里。我是最后跑离帐篷的人之一，跑在我前面的是来自底特律的胖子卢西纳斯，他身材就像个硕大的冬瓜，刚钻进洞便被卡住了，我记得有人使劲地踹了他一脚，才跌进杰克·肯尼迪藏身的洞里。”

日军这次的空袭倒是专为隆巴里而来的，他们的目的是想

肯尼迪传

在当天夜里“东京快车”驶往科隆邦阿拉之前打乱美军鱼雷艇部队的布置，以便混水摸鱼。此前沃菲尔德曾接到了上司威尔金森上将的“日军将出动飞机空袭鱼雷艇部队”的警告，他为何不事先通知他的官兵并采取防范措施或者疏散鱼雷艇呢？至今仍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谜。在这次袭击中有两艘鱼雷艇被击沉，一些人受伤或阵亡。

然而沃菲尔德并没有因此内疚，而是辩解说空袭提供了“东京快车”当夜驶向科隆邦阿拉所走航线的宝贵线索。当时阿雷·伯克司令已经奉命带领一支驱逐舰部队开往科隆邦阿拉岛北部以逸待劳，以便一旦日军的运输船队在到达目的地前绕过该岛东北岸时予以阻击。但是假如日军对以隆巴里为基地的鱼雷艇如此小心翼翼，沃菲尔德认为，这一定意味着“东京快车”将改走南线，穿过吉佐岛与科隆邦阿拉岛之间的布拉凯特海峡，而这里也正是隆巴里的鱼雷艇经常出没的海域。

就在对被突袭的后果进行了总结后，两枚走火的鱼雷自己冲上海滩，该死的沃菲尔德便召集艇长们。据他说明，他奉命“出动最大数量的鱼雷艇”，而他也正计划这样做。甚至他没有进行任何意义上的预演，也没有思考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可能引起多么糟糕的混乱。罗斯后来回忆说：“那天所有能跑得动的鱼雷艇全部乘着夜色出动了”，参加当时所罗门群岛战役中最惨烈的一场鱼雷艇大战。

共有 15 艘鱼雷艇符合要求。为了保证这样大规模的行动秘密进行，沃菲尔德指示艇长们尽量不要与隆巴里他的指挥掩体进行远距离无线电联络，同时命令除非万不得已，彼此严格遵守无线电静默规定。他将这些艇分成 4 个分队，各分队相对独立行动。这些分队奉命遵循“一击即退”的鱼雷攻击战术，

以便避开日军驱逐舰的袭击，同时又为自己同伴的行动提供方便。在过去 19 个月的战斗中这种战术已经被证明是完全无效的。

8 月 1 日下午的那场空袭打乱了一切，杰克已没有时间来试验自装的加农炮了。他在最后一分钟找到了一名军官来负责这门临时捆在艇上的火炮。“我自己的艇已经被我们自己的飞机击毁了。”巴尔尼·罗斯不无伤感地回忆说：

现在比尔和我的艇都没了，我们便无所事事地呆在海滩上，海滩上刚遭遇了一次日机的空袭，乱哄哄的。当我跑到码头时，杰克与那天夜里参加行动的其他艇长正跑向他们的鱼雷艇，准备出发。在结束情况通报会后，他们各自的艇从锚地开过来接他们的艇长。

当时我正立在码头上，杰克向这边跑来了，109 艇也开过来接它的长官。艇艏正慢慢地靠向码头，杰克一跃跳到艇上，这时我向他喊道：“我可以也上来吗，杰克？”他爽快地说：“当然可以，来吧，我正缺人手呢！”因为他们上次巡逻时几名弟兄不幸遇难，他现在正需要补充几个人。

我对他的船头上绑着的那个新玩意儿记忆犹新，那门陆军的老式口径为 37 毫米单发加农炮，炮的轱辘没被拆除，几个略通木工的水手已经把炮固定在甲板上，以免它四处乱滚。杰克问我：“你知道如何操作这种炮吗？”我回答说：“恐怕不行。”他有点沮丧地说：“恐怕我们对这玩意儿都比较陌生。”于是我们一起探索起这门炮来，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会操作了。

肯尼迪传

杰克让罗斯做前方观察哨兼炮手。“接着我们开始起程，夜幕刚刚降临——当时正是黄昏，也正是鱼雷艇通常出动的时间，以便它们在夜幕拉上时正好能到达战位，而岸上的日军也不容易觉察。我并没有参加情况通报会，因此我很庆幸，事先对这次行动的目的——阻击 4 艘日本驱逐舰一无所知。”

罗斯怀疑艇长们是否知道“东京快车”的确切航线。“他们有可能绕道前往维拉港，当然也有例外。”他后来回忆说，“他们可能走科隆邦阿拉岛的北侧，也可能选择南线。而我们负责南侧。”

汉克·布兰廷汉姆上尉，第一分队的指挥官，他的鱼雷艇有充分的雷达保障。下面是罗斯的追忆：

汉克上尉当时是在第一艘艇上，而其他艇上是谁就无从得知了，杰克在最后一艘艇上。

由于天墨黑，要不掉队非常困难——那个夜晚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人们常充满疑惑地问我：“你们的鱼雷艇如何会被驱逐舰撞沉了？我只能沮丧地回答说，当时就像你呆在一个漆黑的壁橱里，而壁橱的门都关上一样——就是类似的黑夜——月亮和星星全部凋残。

有一点罗斯没有提及，据他的一位好友后来披露，罗斯是个夜盲症患者——他在夜里与瞎子无疑，因此就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观察员，对此杰克却一无所知。

汉克上尉要算是鱼雷艇上的老资格了，他曾参与过将麦克阿瑟救出菲律宾的行动。他当时任巴尔克利的副手。就在不久

前他还临时负责指挥新乔治亚北岸莱弗港外作战的凯利中队。“杰克的艇不属于我们中队，”汉克后来回忆说，“109艇是为了那夜的行动临时借调过来的，我奉命指挥整个科隆邦阿拉岛南岸的战役——或许还有向北三分之一的地方。我的艇上装配着雷达，也许你们叫它原始雷达。这条艇的艇长是佩索拉诺上尉——他的艇是我们中队的旗舰。”

与沃菲尔德不谋而和，布兰廷汉姆也鼓吹无线电静默战术。“我们中队的人都恪守无线电静默规定，乃至在发起攻击时也没有人在电台上通话。当领头艇发现目标并攻击时，其他艇便立即仿效，废话不说。”

事实证明其后果是悲剧性的，因为“东京快车”整整提前一个小时抵达布拉凯特海峡，这样便幸运地避开了阿雷·伯克的驱逐舰伏击部队，因为后者在夜里12点半才迟迟抵达科隆邦阿拉北部的斯洛特海峡。

汉克上尉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东京快车”来得如此快，他起初只是将雷达屏幕上的反射信号当成日军的驳船，“如同我们每个晚上司空见惯的。而当我们迫近时，它们向我们开炮。终于明白了，它们是我们多少有些料想到的日本驱逐舰。我们肯定是在几英里外侦察到它们的，因为我们已经向着它们行驶了一段时间了。我们试图阻击它们。当我们向它们发射鱼雷时，距离已不足1英里了。驱逐舰在开火时，火光冲天，标志着它们不是小船。同时由于我们离海岸非常远，所以它们不是海岸炮。”据汉克上尉讲，那天夜里一片墨黑，“海岸炮”不可能发现任何东西并向其开火”。

如果海岸炮发现不了这些鱼雷艇，那么汉克设想他的艇队乘着浓浓的夜色，脱离雷达甚至无线电，也能紧随其后，并能

肯尼迪传

发现敌人，便毫无根据了。沃菲尔德的战术违背一般常识，鱼雷艇部队在所罗门群岛战役中的尴尬情况现在又愚蠢地再现了。汉克发射的鱼雷不仅没有命中一枚，更让人可笑的是艇上的鱼雷发射管竟然着了火，因而该舰大白于夜色中，给日舰提供了绝好的靶子。“日舰的炮弹不断地落在我们周围。”157艇艇长威廉·利伯诺不无沮丧地回忆道：“汉克上尉的鱼雷发射管着了火，犹如一个灯塔，我在他与敌舰之间来回穿行以施放烟幕，以使他们看不到火光，而避免遭到围攻。”同时，威廉也设法发射了两枚鱼雷——同汉克一样没有命中。“后来我们都驶离那里，以‘之’字形路线行驶并施放烟幕。”

根据威廉的回忆，这两艘鱼雷艇让过日本的护航队后，并没有立即停下来。“我们以‘之’字形路线航行了10到15海里，我全然不知道东南西北，只是一味向前。”

其实，整个日本舰队与他们擦肩而过，而且他们向一个错误的方向驶去，最后抵达吉佐海峡。与此同时，无论是威廉还是汉克都没有试图与分队里其他两艘艇进行联络，当威廉最终在吉佐岛后面赶上旗舰时，显而易见，他们已经失去了同杰克上尉的109艇以及劳利上尉的162艇的一切联系。

此时汉克指挥官并没有通过无线电与他们取得联系，而是做出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回基地。他让威廉——此时他还余有两枚鱼雷——返回布拉凯特海峡，自己却带走了分队中惟一的雷达。汉克指挥官后来将这些归咎于沃菲尔德，说沃菲尔德“命令所有发射全部鱼雷的艇都必须返回基地”。但是其他战区的鱼雷艇艇长，如杰克的朋友弗雷德·罗森就认为撒下同伴自己逃走的分队指挥官犯了赎职之失。罗森后来断言：“这如同撒下自己的家逃跑一样。这种事在地中海想都不敢想起。”

不幸的是，这样的事在那一夜不止发生了一次。

混 战

罗斯后来回忆道：在杰克艇上，一切都很顺利。当时间定格在 11 点时：

我们突然大白于探照灯光下。我们当时距离对面科隆邦阿拉岛的海岸没有多远，一束探照灯光使我们无处藏匿，同时某种重炮在攻击我们，而且离我们很近。于是杰克采用了所谓的规避战术——鱼雷艇的所有战术都是以奇袭致胜的，而当日本人用探照灯突然照向我们时，惟一能做的就是使劲逃离探照灯的范围。

起初我们只发动一台发动机巡航，以便保持安静，以免被发现，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我们启动所有的发动机，杰克驾控着 109 鱼雷艇来回兜圈子，很快探照灯便熄灭了。

由于汉克分队长已经卷着雷达消失在茫茫夜色中，没有他探测并通报的消息，我们无从得知究竟是谁打的探照灯。罗斯继续讲道：

后来的报告显示，显而易见光束来自正沿着海岸前行的一艘日本驱逐舰，我们太迫近海岸，以至没有料到，至少我没有料到这是一艘驱逐舰——那时，杰克没有和我交换意见。我们还天真地认为那是海岸炮兵的探照灯，因为

肯尼迪传

看上去它没有移动——显而易见这些驱逐舰要么是朝着海岸的方向停了下来，要么正慢慢地离开港口，后来我们得知汉克——我们的旗舰——曾向它们发射了鱼雷，而当时我们已同他失去了联系，汉克凭着他的雷达，探测到那是一艘敌舰，并予以攻击，而此时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呢？

杰克的另一个下属，查尔斯·哈里斯描述的情形印证了这一切，但措辞更为激烈。由于日舰来得很早，“那天夜里我们根本不知道那里有敌舰，不知道这趟‘快车’已早早地到了维拉。我们猜测那是海岸炮在开火。我们装了雷达的艇探测到了目标，但愚蠢的汉克指挥官并未通知我们。他们向敌舰发射了鱼雷，然后就抛下我们自己回去了。由于炮弹落得很近，我们便施放了一阵烟幕。回来以后我们真想拜访拜访这位分队长，并问问他有什么理由把我们丢下不管。我们都气得发昏。他有雷达而我们却是瞎子。”

与此同时，同样的噩梦几乎也落在第二分队——171、169、163 与 172 艇的头上。拥有雷达的领队艇，即 171 艇在荧光屏上看到了几个尖头信号，便无谓地发射了所有的鱼雷，然后掉头驶回基地，而撇下其它艇使之暴露于敌舰的炮口下，庆幸的是他们没有被击中。尤其是 163 艇，它的第 2 与第 3 台发动机有 10 分钟出现“死机”——“这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 10 分钟，”菲尔·波特艇长后来说，“我们就暴露在那里，活像个靶子……另外两艘艇极力紧随着贝恩特松驶出海峡，而我的发动机不能工作，只能单独晾在那里。”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163 艇单独停在夜色笼罩着的海面上，没有留下波光粼粼的尾迹，竟然比另外两艘艇更安全。

169 艇和 172 艇在失去了与领队艇的目视联络后企图自己驶回基地。他们闪闪发光的尾迹立刻被至少 4 架日机发现了，日机向他们抛下了炸弹与照明弹，庆幸的是无一命中。

沃菲尔德的第三小分队停泊在弗格森隘口里。当初，鱼雷艇就是由这条水道进入布拉凯特海峡的。他们也遭遇了同样的尴尬。领队艇上的雷达将荧光屏上的两个反射信号误以为两艘敌方驱逐舰，并倾其所有向其发射了鱼雷，然后返回基地，将没有配备雷达的同伴留在漆黑的夜色里。其他的艇在重新启动后开向科隆邦阿拉时，由于尾迹暴露，被日军水上飞机狂轰滥炸。此后他们便返回基地。

第四分队更加糟糕。领队艇上也配备了雷达。就在午夜过后，指挥官罗姆在荧光屏上发现了信号，并将反射信号判定为日军的战舰，向其发射了所有的 4 枚鱼雷后便掉头跑掉了，这时他也没有幸免遭到日舰上的炮弹与一架飞机的追击。与另外 3 个分队长不谋而合，他也未将发生的事通报分队里的其他两艘艇。所以当 105 艇艇长克雷西发现炮火的火光时，他和杰克一样，最初认定是日军海岸炮的炮火。“看到火光，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是日军的海岸炮。”克雷西事后回忆道：

那天夜里一片漆黑，我们正在驶向科隆邦阿拉岛的途中……我发现炮火笔直的沿着海岸线冲了过来，这是我能看到的一切。

我的顶头上司分队长，不知发射了鱼雷没有，但是猛地我发现他调头从我的艇边朝着另一个方向驶了过去。另外有一艘艇也掉头跟了去，但我没有得到任何指示，而且我知道那边也有一个目标……由此我向那里驶去，我们必

肯尼迪传

须保持无线电静默，除非万不得已。我用电台极力呼叫分队长，我问：“目标在何处？”因为我只知道它在我前方某处而已。我不晓得分队长去了哪里，当他掉头驶向另一个方向，他已经距我艇有 500 码的距离了，我好像被遗弃在这个四面环岛的小块水域里了，也不明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像前面的杰克。我们的遭遇惊人地相似。

就在此时，一架日本飞机偶然间向分队长投掷炸弹，但所幸没有命中，炸弹大约在我后面半英里远坠落。我明白那是炸弹。坦率地说这个分队长真毫无经验，当它爆炸时，我都能判断清楚这是炸弹的火光而非炮弹，我对此二者十分清楚，因为我都领教过它们的厉害。这毫无疑问是炸弹而且不止一枚。

分队长便打开电台说了些什么，似乎是在向基地报告“有一艘日军驱逐舰正在攻击我，正在逃离”。

我也呼叫他：“驱逐舰在何处？”

他这才缓过神来发现我掉队了，于是在电台上大呼我的呼号“橡树 7”，命令我：“赶快驶离那里，你掉进圈套里了。”

我又问：“目标在我的后方吗？”

紧接着沃菲尔德基地传来通话，我听不清楚，我猜测是指示我赶快离开，说我正在圈套中。

而在隆巴里的基地，沃菲尔德少校更是稀里糊涂。“大家的情绪都很激愤，”他的通信兵后来回忆道：“他们都呆立不动，忘记应对。‘东京快车’一下子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过去，让他们措手不及。大家都打开电台互相呼叫，我记得

沃菲尔德当时对他们大声呼叫：‘你们怎么呆立不动？冲进去交战啊！’”

“有许多艇长都是新手，我们能清晰听到他们在电台里焦躁不安地叫喊——他们都茫然失措，情绪紧张，接着他们开始发射鱼雷，可以想像这场殊死搏斗又重新开火了。而且一上阵就自乱阵脚。”

沃菲尔德在电台里恼羞成怒地大骂年轻的艇长们。“他在电台里说了很多粗话……他们评价他好像是一个足球队的劣等教练，因为他们都在前方殊死搏斗，而他却坐在后方指手划脚……那天夜里出击的许多艇长事后都对沃菲尔德龟缩在后面表示气愤。他坐在隆巴里的基地里说三道四，就像有一支足球队正在参加比赛，而四分卫却呆在场边指挥一样。”

“如果你认为指挥这次作战的人经验丰富，冷静沉着，那你就大错特错了，”105艇的艇长后来评价说：

我敢打保票他们谁也不明白自己说了些什么。

我不晓得分队长这个家伙为何离开。但我坚信我前方有一艘驱逐舰。我正航行在通向科隆邦阿拉岛的途中，天一片漆黑。事实上，整个科隆邦阿拉岛就是一座大山。如果船靠近岛的话，是不会被从外面看到的，即使它是一艘驱逐舰也不能例外。大多数人对这点都知之甚少，除非你发现了船的轮廓，你才会看到它。然而我坚信那是一条艘驱逐舰，因为我发现了它开炮的火光。后来火光虽然消失了，但那艘驱逐舰铁定是在离岸100码左右的地方。

就在此时，老天有眼，我前炮塔的枪炮军士长——那个只有17岁的毛孩子——侥幸地看到了这艘驱逐舰，要

肯尼迪传

不他就惨了。我起初也看不见它，后来看清楚了……我发射了两枚鱼雷——我还想再攻击一次，但此时我受到了该舰与一架飞机的夹击。后来这个目标便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此时我接到基地离开那里的指示，便掉头去寻找分队长了。

所有 4 个分队长全部正在返回隆巴里基地的途中，他们携带着鱼雷艇编队里装配的所有雷达。克雷西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过意不去，掉头又驶向科隆邦阿拉。

我遍寻不到分队长，便查阅一下海图并粗略估计这些驱逐舰已经驶入这条狭窄的水道，我猜那就是新乔治亚岛与科隆邦阿拉之间的布拉凯特海峡，我确信日本军队在这里肯定有个基地，他们就在此处卸下物资或装载部队。

我距他们可能泊舰船的位置最近。杰克一定在前方 5 海里之外。最初看到他时他当时在第一分队。我决定悄悄潜入海峡，想碰碰勇气，看能不能逮着一艘正在卸货的船。还真让我发现了一只活靶子。

为了使这些处于险境的船安然无恙，日军水上飞机在整个水域上空盘旋巡逻。如同克雷西回忆的，“在我眼里，一半的日本空军都出来保卫这些家伙，他们时不时地袭击我们的某一艘鱼雷艇。我便低速潜行，如同杰克在 5 海里外所做的那样——当然那时他还在海峡之外，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果然不久克雷西便看到了一艘船的影子。“17 岁的枪炮军士长出色的夜视能力帮了我的大忙，他发现这个家伙悄悄地驶

了出来。大约 30 秒后，我也用望远镜看到了它，我敢断定那是一艘驱逐舰。当时它的速度不会超过 8 节。现在我总算看清了，但当我刚算出提前量是多少时它便发现了我们，随即仓惶逃窜，我发现它的尾迹越来越宽大。”

克雷西顶着敌人的照明弹与炮弹发射了仅剩的两枚鱼雷，可惜的是又没有击中，后来他也驶回基地了。

掉队，加上无线电静默，鱼雷艇在这样一片漆黑的夜里怎么有伏击日军驱逐舰的可能呢？克雷西事后回忆说：“只有分队长所在舰上备有雷达，其余的人只能依靠老妈所赋予的眼睛了。没有人能否定这一事实：分队长发射完鱼雷便溜掉了，把其他人都抛弃了，他们没有雷达，只能靠目视行动。”他用严谨但又很超脱的口吻说，这确实是一次“瞎打仗”。

腰 斩

当在维拉港的“东京快车”卸弹药与人员时，杰克任舰长的艇与 162 艇还没有离开布拉凯特海峡。“我们对事情的进展无从得知，因此我们与另一艘艇仍在那里不停地巡逻。”巴尔尼·罗斯后来回忆说。

此前他们没有给“东京快车”制订代号。尽管杰克的通信员约翰·马圭尔已经通过电台里听到了南边一片大乱，但沃菲尔德竟忽略了向艇长们汇报简单明了的最新战况，致使杰克与劳利都无从得知事件的进展，甚至无法确定“东京快车”是否已经开过去了。

1943 年 8 月 2 日凌晨 2 点，即 109 号鱼雷艇遭遇日军探照灯光束后约 3 个小时，109 艇与 162 艇与第二分队里掉队的菲

肯尼迪传

尔·波特的 169 艇不期而遇。这 3 艘艇通过艇上的高频无线电台对话后，确认“东京快车”已经穿过了他们的封锁线，但很可能原路返回。

事实上，这时就连日本人也不晓得该走哪条路返回。日军 4 艘驱逐舰中的 3 艘：“岚”号、“秋风”号与“时雨”号已经改为快速运输船，而另外一艘，就是海军上校胜守山代统率的第二驱逐舰分队的旗舰“天雾”号，被用作护航舰来警戒敌军的舰只。最初当山代得知拉包尔的消息说美军的驱逐舰有可能在库拉海湾伏击他们时，也曾讨论过这次行动的可行性。但是岛上日军急需增援，刻不容缓，“最后决定按原计划进行”，山代记录道“我们走西南航线通过布拉凯特海峡。就在距锚地有 30 分钟的距离时，在弗格森水道的东端与敌军一组鱼雷快艇遭遇。相互交火并将他们击退，运输船队于 22 点 30 分抵达维拉港并卸船。”

根据山代的记录，在大约 1000 名日军和亟需的武器弹药被卸到海滩上的近一个半小时内，“‘天雾’号护航舰一直在科隆邦阿拉岛西南部的布拉凯特海峡内部，沿着一个东西方向的长方形，以 21 节的高速来回巡逻，而其南北端分别是吉佐岛和科隆邦阿拉岛。”

一路上他们并未遭遇美驱逐舰，但却与美鱼雷艇不期而遇，估计这会惊动美国海军指挥部，所以他们决定沿原路返回基地。山代记录道：

在卸货时进行了一次轰炸，总共投下了 4 枚炸弹，但幸好没有任何伤害。24 点卸货工作终于结束，运输船队随即离开锚地驶往基地。

当时“天雾”号正在向西行驶，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当我们再次发现运输船队时，卸货工作已经结束，他们沿着科隆邦阿拉的西海岸在向北前行，后面的舰跟随着前面的尾迹航行。为了防止掉队，“天雾”号掉头朝着船队，加速至 30 节向船队驶去。当时“天雾”号正航行在运输船队以西 2000 米的位置。

五六分钟后，准确地来讲应是在午夜两点，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正前方大约 1000 码的地方黑乎乎地有一个船形物体。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是我方一艘用于岛屿间日常联系的蒸汽快船，渐渐地知道这是一艘敌军的鱼雷艇。它丝毫也没有改变方向，反而逼近我舰。这艘鱼雷艇似乎正朝着向东行驶的“天雾”号的右舷冲来。假如碰撞，我们也会不免受损，倘若他们发射鱼雷，就更糟糕了。就在那时，为了从那艘艇的后面躲过去，我扬着左臂高喊：“左满舵！”我已无法记清我的口令是被领航员还是被军舰的指挥官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就在我舰刚开始转舵时，敌艇却突然失踪了，似乎是沉没了。突然，传出了一阵沉闷的撞击声和一道锃亮的闪光，接着便有熏棉花的气味弥漫了整个夜空。这决不是由鱼雷爆炸所致，而是因为军舰撞击鱼雷艇脆弱的船壳，激起的火花引燃了艇上的燃料所导致的。火苗随着破损的船板漂至舰艏部便随即熄灭了。紧接着我舰开始剧烈地颠簸，这是舰身还在左转，把残骸的一部分掀起与螺旋桨相撞所致。

我随即命令他们“稳住舵，继续原航线！”然后采取了紧急措施。我舰的首部有轻微的损伤，所以在高速航行时，舰艏有少量的进水。后来我们发现军舰以 24 节航行

肯尼迪传

时震动比在 28 节要剧烈一些，于是将航速保持在 28 节上。接着我们向基地发出紧急电报，汇报了这起意外事件的始末。

“天雾”号是否真如山代所说，本想从尾部躲过鱼雷艇，还是像“天雾”号的舰长花见在战后所宣称的，这是一次蓄意的碰撞？山代上校出于维护良好的日美关系，指责花见是个信口雌黄的骗子。“我清楚地说这是一次偶然事故，”山代明确地说，“无论他是否有意陷害，假如我看到花见的谎言被揭穿，他的话没有被写进肯尼迪总统的传记时，这就足够了。”这种争论曾甚嚣尘上，上了日本报纸。有的报纸甚至以“前海军上校指责花见舰长编造故事”为题发表文章说，“山代先生评说花见先生的罪责不仅在于歪曲事实，而且还无视长官，甚至还暗示花见当时实际上处于他的领导之下。”

山代不满之处就在于，花见从未提及当时在他的舰上有一位高级军官。而山代辩解道：“由于此次第十一驱逐舰分队实际上只是‘天雾’号一艘军舰，所以分队司令山代上校当时也在这艘军舰上。所以山代上校理所当然地会在舰桥上负责指挥，而花见少校则依令行事。”

然而花见少校却不以为然。他一味说：“无可争议是我在驾驶台上负责指挥。”

1943 年 8 月 2 日，“天雾”号驱逐舰以 30 节的速度驶往基地。那天夜里黑云压境，风暴在即，所以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由于我们在来的途中曾遭遇美军的鱼雷艇，所以我命令下属们进入战位并保持高度警惕。

约是在凌晨 2 点 30 分，我们看到右舷 10 度前方大约 800 到 1000 米处有一艘船。我立即判定这是一艘美军的鱼雷艇并决定径直向它冲过去，我认为撞击是最佳的选择。我下令舵手：“右舵 10 度，冲向鱼雷艇”，我们的军舰冲着按原航向航行的鱼雷艇飞速驶去，军舰一击奏效，并把它劈成两半。残骸从驱逐舰的舷侧漂了过去并在艇艏部燃烧起来，然后沉没。

相撞的情景令我没齿难忘。令我惊奇的是，我并没有很大的震感，也没有看到附近水域有落水的艇员。

事件之后，我们暂时停船检查螺旋桨与舰艏的损坏状况，庆幸的是它们还有能力高速航行。所以为了在破晓前脱离美军空中力量的辐射范围，我们便以 26 节的高速返回基地，并在当天安然抵达……在事件之后，我们在停下来检查损坏程度时曾保持高度的警备，但既没有看到落难的艇员，也没有看到附近有美军的舰艇。

虽然山代对这种讲法提出批评，但花见仍固执己见：“当时，我认为，鱼雷艇由于小而速度奇快无比，很难用炮击中，撞击是最好的战术。以前我与鱼雷艇遭遇过很多次，但这次机会难得，所以我决定试一试。山代上校所讲的他伸出左臂并命令左满舵以躲开敌战舰的说法，我不敢苟同。事实上，事发时我正位于舰桥的最右侧，身体探出栏杆外，密切注视着前方，既没有听到他的命令，也没有看到他伸出左臂……军舰向它冲去，一下子就将它腰斩了！”

令人痛心疾首的故事

倘若说日本军官对事件的真相众说纷纭的话，那么美军鱼雷艇部队的艇长们就更是各执一词了。一些艇长声称他们得知此事时正在返回隆巴里的途中；另一些则说他们已经通过电台向沃菲尔德报告了此事。“我记不得有谁在那个非常时刻通过电台向我报告过此事，”沃菲尔德后来抱怨说，“众所周知这些家伙狡猾奸诈，满脑子小九九。”

在地堡里的沃菲尔德当然无从得知此事了——“我不晓得它在哪里”——他推测杰克的下属们“有些拖沓”。他猜想，当日本驱逐舰出现在视野里时，艇上一下子便陷入一片惊慌之中，“眼看着这个庞然大物向他恶狠狠地冲来时，他一定有些措手不及，由此向前猛推油门杆，以便使发动机熄火，我猜他准是这么做的。我无法确定事情就是这样，但只有这是合情合理的解释。他不应该没有警惕。当知道敌舰正在向他冲来……他可能正让3台发动机，或许是两台开着空转，而他想陡然开足马力，推杆推得太急，结果熄火了。”

如果按照沃菲尔德的观点，杰克倘若麻痹大意，那是不可饶恕的。“每天晚上我们都要举行一个情况通报会，我们有一张海图，我会告诉他该做什么，该如何占领阵位，该朝哪儿发射鱼雷。我已明确地告诉他们‘东京快车’的来去线路。”在沃菲尔德看来，他的这支拥有十五艘鱼雷艇的庞大部队的失利是不可饶恕的罪责，尤其是109艇更难辞其咎。“它的尾迹可能比舰艏的波浪更明显。那天夜里风平浪静，凭着望远镜他们应该能发现它。你知道，那里的水波光粼粼，他们也知道这些

驱逐舰会何时到达。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能避开它。”

显而易见，沃菲尔德对那天夜里海面上的情况无知得令人可笑。事实上，正如波特上尉后来披露的那样，沃菲尔德在来所罗门群岛之前从未对他的鱼雷艇部队进行过夜间巡逻的训练，而此后他也从未乘船出海。然而沃菲尔德却急于批评他的艇员怯懦，后来还指责杰克“并不是一个好艇长”。

J·E·吉布森后来接替沃菲尔德担任第十中队指挥官的职务，他尽管从未参加过阻击“东京快车”这一重大战役，但他对杰克却更是说三道四：“因为他管理不善而酿成了 109 艇的悲剧”。

那天发现那艘日军驱逐舰的竟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艇上的一名乘客，而非正式艇员，在巡航时他把发动机开得很低，所以，无法很快提速。他在沉没之前所采取的每一措施都是愚蠢的，他的判断力低劣。每个艇长都明白当发动机空转时，要想完全启动需要花费 30 秒到一分钟的时间。那天夜里他是出去搜寻日本驱逐舰的，而他却擅自离开了本分队的另外 3 艘艇。这样的不应该的事情绝无仅有。他完全可以继续航行——他明白领队艇去了哪里，他完全有能力赶上他们……我是影片《109 号艇》的技术顾问，当拍到这一部分时导演疑惑地问我：“喂，上校先生，他为什么会掉队呢？”

这事完全可以避免，当时他并未仔细观察，舵手也可能麻痹大意，观察哨也可能擅离职守。接下来导演又问：“那当时他在干什么呢？”

他使发动机空转，压抑着声音在巡航。

肯尼迪传

导演又问：“他为何要那样做？”

鬼才晓得他为什么那样做，他完全可以做到径直前进，他清楚速度与航线，这样就有机会与驱逐舰面对面遭遇，但一艘鱼雷艇对付几艘驱逐舰占不到什么好处，他也可以果断地返回基地。而拙劣的他只是让发动机空转，傻呆在作战区域外的海面上，于情于理，全然不通，109艇的沉没他难辞其咎，尽管很少人能够真正理解这点。那些喜爱杰克的人难以置信他竟犯了这样一个低劣的错误，拍电影时摄制组的一个人也幽默地说：“我们可不能让他就这样掉队了，必须编点东西使得这个故事在银幕上更曲折动人，合理合情一些，万万不能让总统先生干蠢事。”

对于这起事件，吉布森仅凭一知半解就大放厥词，可见其是多么地愚蠢，杰克、波特与劳利认为，舰艇相撞的经过与电影情节大相径庭。那个夜晚极度混乱，躲在地堡里的沃菲尔德只是一味地咒骂，却从未试图控制局面。而杰克非但没有“让发动机空转，傻呆在作战区域外的海面上”，恰恰相反，却主动与162艇和169艇一起组建了一个新的分队，这个分队是第十中队里在“东京快车”的撤退路线上组成惟一拦截线的舰艇，而且各艇还没有雷达。其余的鱼雷艇全都奔赴科隆邦阿拉岛以南，与这趟“快车”返回基地的航行失之交臂，而阿雷·伯克的6艘装配着雷达的驱逐舰也不例外，在凌晨3点钟左右时便返回了基地。

显而易见，较之其他地方出现的胆怯行为与混乱局面，杰克、波特与劳利非但没有犯下“拙劣地错误”，反而在行动中表现出超凡的胆略和应变能力，这才是值得颂扬的。在漆黑的

夜里，没有装备雷达的舰艇无异于瞎子。在没有雷达的情况下，波特上尉反复强调，“我们主要依靠眼睛。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月亮和星星都不敢出来，简直比地狱还黑，还有几次日机发现了我们，后来他们也追得乏味了，便飞走了。”

由于有日机的干扰，这3艘艇都不约而同地只开了一台发动机行驶，以便减小尾迹并能听到敌舰的声音，而且还要保持队形。而最后一项要求是最难做到的。试想一下，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在这样一个风恶浪凶，宽度仅有英吉利海峡三分之一的狭窄海域里，在彼此相距一英里的情况下保持编队，并被严令保持无线电静默。艇上的观察哨必须花更多时间相互观察，而不是观察敌舰。“保持编队实在是太难了，因为周围一片漆黑，”罗思记忆犹新：

那时我们并不了解战况，所以一直没有停止来回巡逻。我们必须试图使各艇间保持最大程度的距离，以便覆盖更大的范围，同时还不能失去目视联络……

那天凌晨的早些时候，我们依旧低速巡航。那条海峡狭窄之极，仅有8英里宽，我们驶往科隆邦阿拉岛，接着掉头驶向吉佐岛，就这样重复行驶。同时还要与同伴保持整齐的编队。大约在早上一二点钟，我们曾经暂时失去了联系，我们当时正开着一台发动机航行，我们几乎同时在船头右舷外看到了这块白色的光芒。

在如此条件下听到或看到敌舰有多困难，可以从日军“天雾”号在其姊妹舰卸船时在布拉凯特海峡里来回巡逻了一个半小时而没有被发现看出来。而此后所有3艘日本运输舰都启航

肯尼迪传

离开锚地，穿过弗狭窄的格森水道并通过布拉凯特海峡里由 3 艘鱼雷艇组成的拦截线，抵达所罗门群岛两岛屿间的海上交通线而没有被发现，更是将难度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时“天雾”号正在其姊妹舰后面 1.5 海里处以 30 节的速度行驶，但发现它的却是距它最远的波特的 169 鱼雷艇。

“当时我们正在掉转船头横穿布拉凯特海峡。现在已经忘记了到底我们行驶了多远或多久了，”波特事后回忆道，“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半夜 1 点左右大家曾在什么地方会合过一次。我们已经向南巡逻了一大圈，开始掉转船头了，那时大约是 2 点到 2 点 30 分之间吧。一直到今天这件事仍让我觉得莫名其妙，我看到日军驱逐舰的尾迹直奔杰克的小艇而去，使用电台通知提醒，那道尾迹径直向他冲过去了，但他似乎措手不及。”在一片漆黑的夜里波特不敢断定那就是驱逐舰，他回忆说：

在我眼里，这似乎是一艘驱逐舰，何况当我们在那个倒霉的夜里与驱逐舰不期而遇后，还能指望它是什么呢？那天夜色很浓，那样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在那样平静的海面上，任何尾迹都非常显眼。我曾在那里多次看到海豚，当它们快速地游过时你误以为是鱼雷。这种磷光很奇特，你从老远就能看到它……

我们清楚地发现驱逐舰的航迹径直驶向杰克。它离他最近而且是径直冲着他去的，当时我们都在他后面两英里的位置。我们马上用电台提醒他，我们竭尽全力，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距波特及杰克都很近的劳利也没有做出反应，虽然他的伙伴们“也发现了敌舰，我记得当我们发现敌舰后，曾启动电台向他们大声呼叫过，”波特回忆说，“但不知为什么他们两艘艇都一片沉寂。我怀疑他们当时是否正在开小差。”

3艘日军驱逐舰已穿透了拦截线而未被发觉，他们已经掩在科隆邦阿拉岛巨大的风暴与山影中了。而为何紧随其后的“天雾”号突然间如此突兀地冒了出来，这就无从得知了。这时，杰克的艇员们才看到它并试图采取应急措施。但是从发现到撞击总共才有短短的“10到15秒”，波特后来回忆——这与109的艇员们事后计算的时间相同。而波特只能眼睁睁地瞅着“小艇被驱逐舰拦腰截断后爆炸。喷出火焰来……你能看到它拦腰将小艇劈断。当时便发生了爆炸，我明白这是油箱爆炸了。油箱里满载航空汽油……我离它较近，所以我们能看见甲板上的人，甚至能确切地辨认出小艇的轮廓。”

劳利当时如何应对呢？波特记不清了，他说，“等到敌舰驶离了劳利所在的水域时，我便向其发射了两枚鱼雷。”敌舰“当时正在向我开炮，由于对手是一艘驱逐舰，又加之在不远处还有几艘，所以我惟一的选择便是向左掉头加速驶向吉佐岛，同时大量施放烟幕。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两艘艇。他是怎么离开的或劳利做了什么，我也无从记起。”

“天雾”号是“东京快车”的最后一节，而且当时整个快车已经穿透了美军的拦截线，悠悠然向基地驶去，现在鱼雷艇逃走已经没有必要了，但波特不晓得这一常识。当时波特已经到了吉佐岛的后面，并在那里兜了几个圈子后返回了发生撞击的海面。后来他称此时又看到了一艘舰的尾迹，而且向其发射了余下的两枚鱼雷，还“看到它起爆，我相信这次应该是击中

肯尼迪传

了目标”。他后来回忆道，虽然回想起来还不能确定说击中的是什么东西。

波特声称他用半个小时到 3 刻钟的时间在这一水域里来回巡逻，寻找艇上的幸存者或鱼雷艇的残骸。“小艇爆炸后开始燃烧，我猜想我们回到那片水域也许能发现艇体残骸，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大伙儿在漆黑的夜里与瞎子无异，“那天夜里我们并没有发现另外的己方鱼雷艇。我当时是否通过电台向沃菲尔德汇报了当时发生的情况，已无从记起了，但我的确报告了 109 号艇被撞的事，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是在我发射了头两枚鱼雷并大量施放烟幕时，但是躲在掩体里的沃菲尔德并没有发出战斗警报，通知 109 艇已被击沉，下令我去寻找幸免于难者……在我们发射了另外两枚鱼雷后，我们起程返回基地。大概是在 3 点 30 分到 4 点钟左右动身回去的。当时，我们一般在天亮前离开任务区，因为白天我方飞机就会控制这里。假如我们位于日本人的水域，美国飞机才是最头疼的心腹之患，而不是日本飞机。”

劳利的艇也离开了那里，由于他失去了与 169 艇的联系，在加上在他的印象里 109 艇与艇上所有的艇员们都已沉尸海底，于是便返回了基地了。显而易见，他也没有做寻找幸存者的努力。

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夜是十足的打乱仗。他们发射了 30 多枚鱼雷，全部落空。而且 4 艘配有雷达的旗艇全都撇下他们的同伴自己跑了。而“东京快车”已为科隆邦阿拉岛补给了足够的物资与人员，这足以保障新乔治亚岛的战斗再持续一个月，他们在撞沉 109 鱼雷艇后几乎安然无恙地逃回拉包尔去了。

“我们在拉包尔抛锚后，”山代上校拉开了记忆的阀门，“我立即在花见的陪同下奔赴旗舰‘仙台’号拜见我的顶头上司，第三驱逐舰支队伊集院海军少将指挥官。在‘仙台’号军舰的后甲板上，少将笑容满面地迎上前来对我说：‘上校，你为什么不在无线电报告中说鱼雷艇是被腰斩的？’我现在还记得魁梧的少将说这话时，眼睛大睁，一副仍难以置信的样子。”

对于作战的双方来说，鱼雷艇与其说是一种武器，勿宁说是一件宣传工具。8月4日，东京一时纸贵，报纸纷纷登出了这条消息：《我们所向无敌的驱逐舰中队在维拉港之夜斩敌立功》。副标题是：敌人的鱼雷艇被腰斩。《朝日新闻》还宣称：“8月2日破晓前的黑暗中，这些军舰在科隆邦阿拉岛以西的维拉湾中与3艘美军鱼雷艇交火。其中“天雾号”以高速碾过一艘敌艇，顷刻间让它灰飞烟灭。这是在大东亚圣战中首次出现一艘驱逐舰将敌舰拦腰截断的壮举。它是我驱逐舰值得大书特书的伟大业绩。”

与日本人欣喜若狂相对映，这件事却成了象征美国海军无能与不幸的痛心故事。不仅一艘鱼雷艇被撞沉，而且其友艇竟然在爆炸后连最起码的救援努力都没有尝试。当第一艘鱼雷艇在一个小时之后回到基地时，109艇及其艇员已经踪迹全无。109艇连同艇长杰克，以及艇上的十名官兵，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沃菲尔德从任务表上勾掉了，这也成了二战期间鱼雷艇打乱仗的一个具体而鲜明的反映。